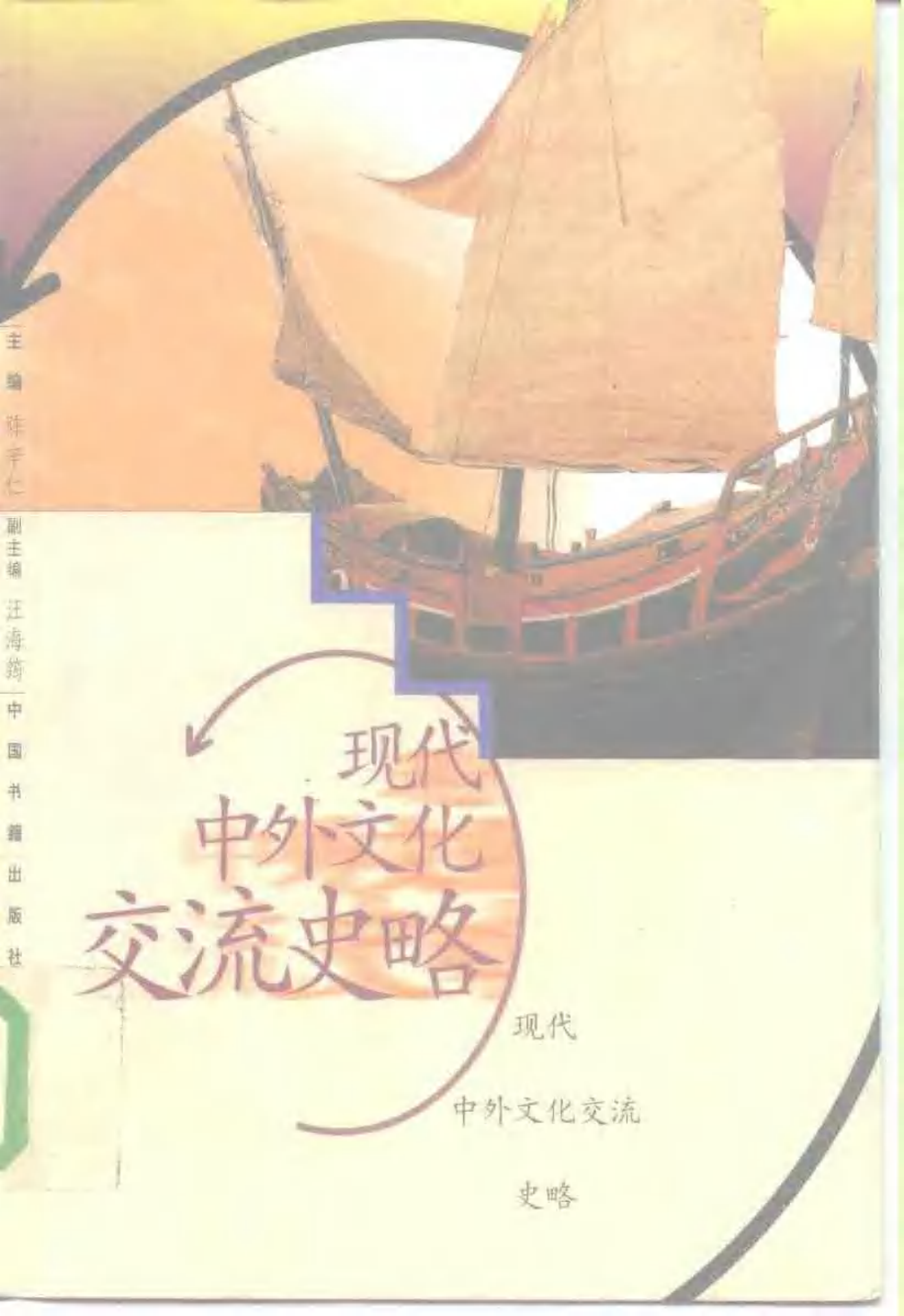


主编 薛辛仁

副主编 汪海筠  
中国书籍出版社



现代  
中外文化  
交流史略

现代

中外文化交流

史略

990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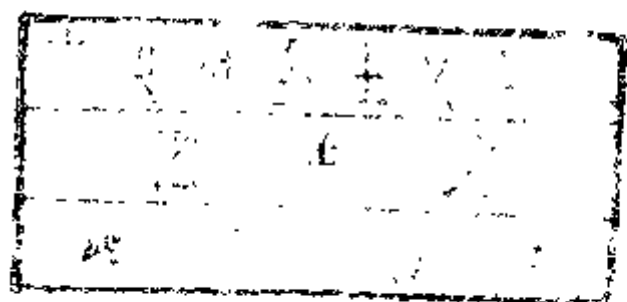
\*200332112\*

# 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

---

主 编 陈辛仁

副主编 汪海筠



中国书籍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陈辛仁主编.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3

ISBN7-5068-0583-9

I. 现…… II. 陈…… III. 中外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现代  
IV. G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25439号

**责任编辑** 孙煜华

**封面设计** 张朋

※

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甲7号 邮政编码:100031)

北京市友谊印刷经营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6.75印张 360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

印数:1-1500册 定价:35.00元

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  
编辑委员会

- 主 任 陈辛仁
- 副主任 汪海筠
-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 石雅娟 齐 铨 齐卉之 刘朝晖 陈辛仁
- 汪海筠 吴京波 倪隆德 郭毓基
- 蓝子安
- 资 料 唐毓彬 刘 明 程 敏 赵桂兰
- 李保德 张标华

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忠德为本书题词

以史为镜，加强中外文化  
交流。

刘忠德



祝賀現成中外文化交流史著出版

文化藝術交流  
促進相互了解  
加強人民友誼  
有利社會進步

周巍峙

一九六五年  
國慶

中国文联主席、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  
委员会主任周巍峙为本书题词

承前启后  
发展中外文  
化交流

艾青春  
1991.10.27

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艾青春为本书题词

文化部原副部长、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仲秋元为本书题词

冲破思想禁区，开阔文化领域，致力于

中外文化交流的先辈们的光辉业绩，永

垂史册。

仲秋元

九七·十五



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刘德有为本书题词

继往开来  
发展对外文化交流

贺中外文化交流史略出版

刘德有为

---

## 小 引

本书所述的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即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史。

回顾我国现代和当代文化发展史时,首先得到的经验,就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应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政策和实践。“古为今用”是继承本国文化遗产的问题,应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发展当代民族文化。“洋为中用”是中外文化交流问题,这应根据本国需要,吸收有益的外国文化。当然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不同历史条件而表现有不同的侧重方面。

从近代到现代,世界上有过两次广泛高涨的政治文化思潮:一次是以欧洲文艺复兴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思潮,一次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思潮。这两次思潮都是人类历史上必然的发展阶段,它将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交替地奔流向前。

社会主义是新生的事物,它的发展必然有曲折的过程,各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会是一个模式。根本的问题是要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不断增长的需要。

从历史的纵面来看,从前一历史阶段发展到较高的另一个历史阶段,要经过各种激烈的斗争,但每个新的历史阶段又都是在前

---

一阶段生产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历史的横面来看,各个国家间随着交通、通讯、信息的发达,总是在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闭关锁国只能招致落后和挨打。但经济文化的交流,不管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都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才能达到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目的。

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的历史阶段,主要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阶段,主要是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学习。中国的历史说明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也说明了马列主义理论只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改造社会的威力。以前各社会阶段的生产力和文化的优秀成果,是新阶段生产力和文化的营养物。外国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有益的文化也必须吸收,以繁荣本国的经济文化。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两个基本点,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指路明灯。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全党全国人民跨世纪的崇高任务。

现在我们把《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公诸读者,目的在于要让人们认知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经验教训,希望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书中如有不当或重要遗漏之处,尚希读者指正。

编者

# 目 录

<b>第一章 资本主义文化思潮输入中国</b> .....	(1)
第一节 中国文化从先进到滞后 .....	(1)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 ...	(7)
第三节 资本主义文化思潮输入 中国的渠道 .....	(13)
<b>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b> .....	(43)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43)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47)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思潮的论争 .....	(61)
<b>第三章 外国文艺作品和文艺思潮的引进</b> .....	(96)
第一节 《新青年》的良好开端 .....	(99)
第二节 鲁迅在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业绩 .....	(102)

第三节	文学研究会的贡献 .....	(109)
第四节	创造社“异军突起” .....	(119)
第五节	新月派 .....	(128)
第六节	美术方面 .....	(132)
第七节	电影方面 .....	(143)
<b>第四章</b>	<b>五四前后赴国外学习的热潮 .....</b>	<b>(153)</b>
第一节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	(153)
第二节	赴欧美、日本留学 .....	(159)
第三节	赴苏联访问和学习 .....	(173)
<b>第五章</b>	<b>“左联”与中外文化交流 .....</b>	<b>(179)</b>
第一节	“左联”与中外文学交流 .....	(180)
第二节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与马克思主义 社会科学的传播 .....	(202)
第三节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电影小组、 音乐小组及其对外活动 .....	(211)
第四节	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与 中外美术交流 .....	(221)
第五节	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与 中外世界语交流 .....	(227)
第六节	东京“左联”分盟的活动 .....	(236)

## 第六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 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247)
- 第一节 国统区的中外文化交流 ..... (248)
-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的对外文化交流 ..... (276)
- 第三节 盛成在法国创作的传记  
文学《我的母亲》 ..... (289)
- 第四节 郭沫若流亡日本与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 (291)
- 第五节 巴黎的《救国时报》 ..... (295)

## 第七章 30年代和40年代国际文化人士对增进

- 中外文化交流所起的杰出作用 ..... (298)
- 第一节 中共取得国际友人的支持  
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 (300)
- 第二节 斯诺夫妇、史沫特莱等采写了一批揭示  
“红色中国”真相的经典性著作 ..... (306)
- 第三节 抗战期间外国人士对  
抗日根据地的报道 ..... (319)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外国人士  
对解放区的报道 ..... (333)

---

<b>第八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b> .....	(340)
第一节 延安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 .....	(342)
第二节 国民党统治区 .....	(352)
第三节 上海沦陷前后 .....	(388)
第四节 香港及东南亚地区 .....	(399)
第五节 从《新知周刊》到战工队 .....	(422)
第六节 抗战戏剧史上的 一次海外“长征” .....	(429)
第七节 抗战文艺的国际交流 .....	(437)
<b>第九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b> .....	(482)
第一节 解放区 .....	(482)
第二节 国统区 .....	(492)
第三节 香港 .....	(503)
第四节 南洋《风下》、《南侨日报》 等进步报刊 .....	(512)

---

## 第一章

# 资本主义文化思潮输入中国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从先进到滞后

15 世纪以前,中国文化远远地走在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前面。据 1975 年《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公元前 6 世纪至 11 世纪,世界上重要的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共 231 项,其中中国有 135 项,占 58.4%,从 11 世纪到 16 世纪,世界上的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共 67 项,其中中国有 38 项,占 56.7%。英国剑桥大学凯尼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通过 30 多年对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和科学历史发展的研究后,指出:中国古代的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在 15 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众所周知,对世界文明影响最大的,首推中国古代物态文化中的造纸、印刷术、火药、罗盘针。这是因为,造纸术的传播,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内部交流,为此后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活字印刷



术使欧洲的书籍成本大为降低。火药西传后，欧洲市民利用它作为反对封建贵族的锐利武器。指南针则促进了地理大发现，开拓了欧洲文化的视野，有助于近代对世界的认识。由此可见，中国四大发明不仅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上技术上的准备，还对欧洲近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大发明对整个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7、18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古代文明也为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有力的思想武器。在西方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杜尔哥、黑格尔等人的著作中，都承认他们的学说曾不同程度地接受过中国哲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不仅是对西方的启蒙运动，也不仅是对法国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更对东方，对亚洲的日本、朝鲜、印度等邻国（包括中国的汉字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例如日本的古代文化，从语言文字到哲学、文学、史学、艺术，从习俗、宗教到政治制度，都曾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一定养料，通过化解，与日本固有的国家观念、家族制度、神道及艺术（和歌、和绘）相合成，而成为了日本文化。即使到了近代，日本在主要吸收欧美文化之后，原先受中国影响而形成的一些文化（最明显的是中庸）、礼乐观念仍在起作用，中国古代典籍，如《论语》、《史记》和唐诗等，还在日本民间流传。在日本文化中，从中国输入的文化成分，至今仍可明显看到。

然而，自15、16世纪以后，中国一直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长期徘徊不前，占统治地位的仍是以封建帝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社

会生活基本上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文化有她对人类做出贡献的一面,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的文化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

就在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却开始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已冲破中世纪的黑夜,迎来了新时代的黎明,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西方文艺复兴有三大思潮:一是人文主义思潮,二是宗教改革,三是近代科学的出现。从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继意大利之后,西欧各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需要改良生产技术,改革生产工具,培养通晓经济理论和科学知识的各种专业人才,不得不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一场反对封建旧文化,建立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以便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文艺复兴就是西欧早期资产阶级掀起的这样一场反封建、反神学的新文化运动。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所谓文艺复兴,是指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个特定时代的具体内容,就是从中世纪文化形态过渡到近代文化形态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艺术界、思想学术界高举人文主义旗帜,主张以社会生活中的人为中心,猛烈抨击基督教的以神为中心的观点。他们强调人的尊严,赞美人的伟大,追求人性解放、自由意志和现世享乐。他们的态度十分鲜明:主张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个人解放,反对宗教桎梏;提倡现实的幸福,反对虚幻的来世;提倡科学,反对愚昧。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如但丁、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等。在宗教改革方

面,出现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反对罗马教皇封建统治的运动。在启蒙运动方面,出现了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莱辛等哲学家、思想家,他们推崇理性,反对教会的权威和封建制度,倾向于自然神论或无神论。这些人文主义者唤起了人性的觉醒,推动了人类第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在自然科学方面,16世纪,哥白尼创立了“日心说”,认为地球并非静止不动的天体,它既有自转,又围绕太阳旋转;它只是个普通的行星,并不处于宇宙的中心位置上。太阳则是宇宙的中心,它使周围的行星围绕自己运转。这个学说从根本上推翻了教会关于上帝选定地球作为宇宙中心的谬论和由此支撑起来的神学世界观。这就使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并标志着近代科学首先在西方诞生。

在近代天文学诞生的同时,近代物理学和医学、生理学等学科也相继诞生了。

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标志就是实验——以至近代科学有时被称为“实验科学”。但仅有实验还不行,科学是一种理性思维,是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抽象。当西方科学家还在研究运动为什么发生之时,伽利略要研究的却是各种自然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即寻找规律来回答问题)。正是他指引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因此伽利略被后人称为“现代自然科学之父”。

这一时期西方科学的发展,主要在理论科学方面。科学家努力的重点,不在于实际的应用,而在于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探索。

由此又可见,近代科学是指文艺复兴以后起源于西方文化的

一种对自然界的理解方式。科学既然要对自然现象各方面的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它不但要采用精密的方法和工具,还必须有精确的理论说明。运用理性以获得真理,正是西方文化自希腊以来的一贯精神。

和西方相比,中国落后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明中叶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仅仅在东南沿海局部地区,十分嫩弱,因而中国不具备产生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条件。

西方的欧洲基督教文化,在16世纪末也曾输入封建中国,如明万历九年(1581),利玛窦来中国布道时,带来一些近代科学知识和技术,以后又陆续有一些传教士来华。虽然他们都限于为朝廷服务,但也曾初步打开了有些先进的中国人的眼界,并介绍了一些中国文化到欧洲。由于西方教会人士在行使传教特权方面引起中国人的反感,清朝封建统治又十分顽固落后,到了清雍正元年(1723),清廷终于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这样,延续了一百多年的这次中西文化交流进程遂告中断。

17世纪以前,中国曾出现过李时珍、徐先启、徐霞客、宋应星等蜚声世界的科学巨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先启的《农政全书》、徐霞客的《游记》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并称明代四部科技巨著。他们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如从形成科学规律、科学理论的严格意义上说,和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相比较,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

联系到社会文化背景,中国儒家思想崇尚“义理”,鄙薄“技艺”。中国古书中一向把科学技术称作“方技”,含有蔑视的意味。尽

管中国的手工业历来相当繁荣发达,但科学技术的地位并不高,创造发明不受鼓励,因而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致力于此。

中国的封建文化在处理人伦关系(君臣、父子、长幼)上,不承认乃至扼杀个人的独立性。三从四德、三纲五常,都是封建的礼教,它的基本倾向是维护腐朽糟粕,反对发展创新。孔、孟、朱熹等儒学大师的著作,不论精华与糟粕,历来被奉为不可更易的圣人之言。中国旧文化之所以绵延二几千年,却始终保持其基本构架,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已在西方各国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但清王朝长期实行海禁及由此形成的闭关锁国政策所衍生的巨大惰性、封闭性、自大性和保守性,却使封建官吏以至士大夫自以为中国永远比“四夷”高明。清廷对世界上早已变化了的国际权力格局毫无所知,直至鸦片战争前,还一贯视欧洲人为“番”、为“夷”,视欧洲各国为“藩属”,一应外事活动均由“理藩院”处理。中国封建士大夫,和朝廷一样,对西方著作中描述的世界除了中国以外还有五大洲四大洋,竟鄙之为“狂诞荒谬”;凡有关介绍海外的图书,一概斥之为“海外奇谈”,认为没有根据;对西方近代的先进科学技术,一律贬为“奇技淫巧”、“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在当时中国的皇帝和官僚士大夫的心目中,中国永远是“天朝上国”,“天不变,道亦不变”。正如郝侠君等编著的《中西500年比较》一书中所指出的,他们完全没有也不可能想到,在当时中西方实力的对比上,“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大规模工厂生产相对的,是中国相沿已久的小规模的手工作坊生产;与西方以强大的热能、电能做动力的机器生产相对的,是中国以人力或自然力做动力的手工操作;与

---

西方大规模的冶金工业相对的是中国的冶铸作坊；与蒸气织布机相对的是中国单人手工织布机；与铁路网相对的是中国的骡车；与汽船相对的是中国陈旧的帆船；与英国来复枪和冶铸车架大炮相对的是中国的弓箭长矛和明代式样的滑膛枪；与西方被称为‘宇宙之灵魂’的磁和电的卓有成效的系统研究相对的，是停留在摆弄罗盘定位的中国阴阳之术；与西方文理兼顾、重视自然科学教学的新式学校相对的，是中国专重‘子曰诗云’的私塾”。

就这样，当欧洲、北美，还有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走上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阶段时，中国却还处在保守落后的封建统治阶段，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甚至后退，中国文化也从世界的先进行列跌落到落后的行列。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危机。

---

##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寻求 救国真理的过程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为标志，开始了西方列强对这个封建古国的武装侵略、宰割、掠夺和剥削，中国从此逐渐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道路。其过程，一方面是清廷的对外屈辱求和及对内的镇压搜刮，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他们之中的先进人物，追求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的真理。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是这样描写这个过程的：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 80 年间，中国思想文化所起的变

化,中国人学习西方谋求救亡图存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来考察:

**(一)第一个时期,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

在外国资本主义强国的侵略下,中国社会开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但它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太平天国(1851—1864)农民起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猛烈地冲击了封建文化,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文化形态。然而,思想文化上毕竟还是出现了以下两方面的新情况:

一方面,抵抗外国侵略的“御夷”、“制夷”和以“励精图治”为内容的振肃内政,成为一部分封建士大夫议论的主题。19世纪40、50年代以后,少数有识之士不能不“睁眼看世界”,努力了解世界大势,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上的长处,发出外抗强敌、内求变革的呼声。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以反对侵略、揭露清朝黑暗腐朽统治为内容的作品和著作。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打击封建统治的同时,还用从西方基督教那里搬来的“上帝”和改造过的某些教义,对旧文化中的孔孟“圣道”进行了大胆的改动。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种新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因此随着起义的失败,它就消失了。

直到太平天国后期,天国方面的洪仁玕的以“革故鼎新”为内容的《资政新篇》,和封建营垒中的冯桂芬的以“采西学、制洋器”为内容的《校邠庐抗议》,才提出了在思想文化上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



(二)第二个时期,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失败,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

19世纪60年代,洋务思潮在中国兴起。在作为洋务运动纲领的“中体西用”论中,认为在处理“中学”(指儒学)和“西学”的关系时,要以中国的正统封建文化为主体,以西方近代文化为辅用。从政治上讲,就是针对当时出现的“民权平等之说”,强调要维护君主制及其思想“三纲五常”,以抵制和反对当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改革运动。从文化上讲,就是要确立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准则,力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解决引进西方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发生的矛盾冲突,即中西要“兼学”,但有主次之分。然而,当洋务派在京师、上海、广州等地相继设置同文馆和一批工艺学校、军事学校和其他新式学校,较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史地、国情等方面的知识以后,中国封建文化的正宗地位就开始动摇了。此时,西方书籍的翻译出版,报刊的创办,中国留学生的派遣等,也都应运而生。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兴利除弊、求强求富的政治改良思想开始流行,并逐步演进。洋务运动还在经济范围内进行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引进了大机器生产、先进的生产技术、新型的生产方式,首开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在当时陈腐的封建体制内,大胆地引进新的生产力,当它产生了经济效益后,就能导致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人们就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意识到改变封建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在思想上动摇了几千年来一直奉为神圣的“本末观”。

随着早期一些改良主义思想家如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的出现,以及洋务思潮的兴起,“中学”和“西学”之争也日趋

激烈。

**(三)第三个时期,从中日甲午战争(1895)失败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

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思潮迅速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新的文化,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引进的“西学”已不再局限在“洋务”范围内的船、炮、路、矿、造械、织布以及声、光、化、电等,而且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指导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的思想理论武器。传统的尊君、亲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政治信条,已为民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所取代。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只有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才能国富民强,摆脱落后挨打的厄运。

这一时期,宣传维新和革命的报刊、书籍大量出版,新式学堂普遍出现,“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体革命”、“史界革命”等口号亦纷纷提出。一批思想文化巨人站到时代潮流的前列,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黄遵宪、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柳亚子、夏曾佑等,就是杰出的代表。

康有为等维新派不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法,尤其强调要效法欧美的民主政治和国家制度。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就是要把清政府的君主专制制度演变为君主立宪制度,把封建自然经济演变为大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从完整的意义上提出了资产阶级近代化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要在中国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

戊戌变法提出的主张，对中国封建统治基础的冲击，远远地超越了历史上地主阶级改良派、农民革命派（所追求的是“每家五母鸡、三母彘”、天下通一式的小农经济天堂）和洋务派。

#### （四）第四个时期，从辛亥革命失败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

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又因袁世凯篡夺政权而失败，中国又陷入黑暗和混乱之中。政治上的倒退、封建势力的复辟，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压迫，又导致了文化上的倒退。尊孔读经又被提倡，复古气焰嚣张，腐朽颓败的书刊流行一时。辛亥革命时期的朝气为浑浊的逆流所淹没。

另一方面，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知识分子，在彷徨中奋起。他们反对尊孔读经，反对封建礼教，抨击“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1915 年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李大钊、陈独秀、吴虞、鲁迅、胡适、蔡元培、恽代英等人，就是这场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文化巨人，文化战士中最著名的代表。

与此同时，俄国发生了 1917 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革命开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转变。新文化运动也就很快发展成为空前深刻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即五四运动。

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救亡图存，一直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活动和思想，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情况才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第三节 资本主义文化思潮 输入中国的渠道

晚清以来,资本主义文化思潮输入中国(以下简称“西学东渐”)的媒介,主要是以下几种人:一是西方传教士,二是中国留学生,三是西方的商人、游客、使节和侵略军。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前两种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一是美国,二是日本。下面分别介绍西方传教士、中国留学生以及中国向日本学习在传播“西学”中所起的作用。

#### (一)西方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

资本主义的成长,要求在海外获得更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打破一切处于封闭状态的国家 and 地域,以便进行不间断的商品输出和原料攫取。为此,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采取了武力和宗教文化互相配合的手段:武力方面,用兵舰、大炮、军队,进行占领据点、贩卖人口、输出鸦片,掠夺财富;宗教文化方面,在战略上,是配合争夺“世界市场”的需要,但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以了解世界各地情况,输出西方科技、价值观念,求得宗教传播的存在和发展为主;到了资本主义成长为帝国主义时期,西方宗教的侵略形象和本质就暴露无遗了。

西方教会;指的是欧美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沙俄的东正教和它们的派别。西方教会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在早期确实起了一种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作用,尽管整个传教的总目标是服从于

西方列强的政策,而我们对于西方早期传教的特殊作用,仍应给以历史的考察和评估。

明末清初,中国封建政府奉行的是容忍各种宗教的政策,西欧天主教耶稣会来华的传教士,除传教外,还从事各方面的学术活动,受到康熙、乾隆的信任和保护。清廷皇帝利用法国传教士传播科学技术的目的,同明末朝廷对待利玛窦等人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1685年法国政府派5名耶稣会士来华,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伯曾指示:“我愿你等教士能在传教之余,在各地作各种观察,以使我国科学技术臻于完善。”可见,法国派遣传教士来华,本来就带有发展本国科学的动机。同时,清帝和法王的关系有时也很好。17世纪末,康熙和路易十四曾互赠过礼品和书籍。在康熙年间,特别是1685年以后,法国传教士来华人数逐渐增多。他们中的一些人常采用中文姓名进行活动,如洪约翰、刘应等曾用金鸡纳(奎宁)治愈康熙的疟疾,罗德先修士为康熙治愈心悸病和上唇瘤,安泰修士还随康熙巡游。传教士陆伯嘉于康熙年间在宫中供职,专造钟表和物理器械。传教士蒋友仁于1761年将手绘《坤輿全图》敬呈乾隆,介绍了“地动说”和行星运动的最新学说。相自新曾献给乾隆一只自行狮,能走百步,发条藏在狮子腹内。传教士巴多明以他的科学知识和语言翻译技能为清帝所赏识,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而不衰。

总的来说,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他们的科学、技术、语文、史地知识却为中西文化交流服了务,而这也往往成为他们接近官方和士大夫的敲门砖,一部分传教士甚至充当了钦天监监正、译员和教师,从而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医学、文字学、地理学、制图学、火器制造、艺术、音乐等科学文化知识传

入中国。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中写道：“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 17 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方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

但是，天主教毕竟是新传入的异教，它在中国的流传终于引起两种文化的撞击，并遭到一部分儒家士大夫的反对。最后，由于天主教内部的纠纷以及它对中国传统习俗的干预，传教活动于 1724 年被禁（耶稣会本身也于 1773 年解散）。

传播西方近代文化并产生更大影响的，却是后期到中国传教的欧美基督教（新教）。它虽于 17 世纪初传入中国，但没有成功。直到 19 世纪初，它才在中国有了立足点，在时间上要比天主教、东正教晚得多，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和天主教、东正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第二次“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最大的影响，无疑首推美国。而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又是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来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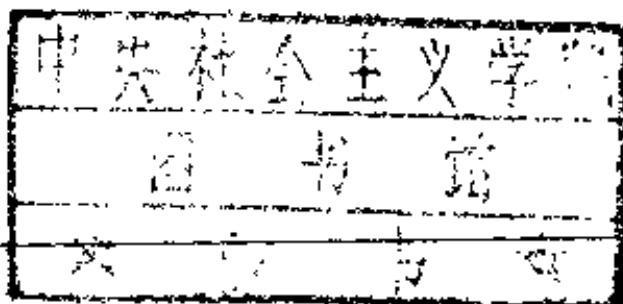
其实，中美间的贸易往来，早在 1784 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邮轮到达中国时就已开始。当时来华的美人是一些海员、商人和冒险家，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只是做生意。他们的知识水平限制了他们对古老中国的认识。

1830年,美国首次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寻找传播福音的机会。此后,浸礼会、圣公会、美以美会都向中国派出传教士。从1830年到1848年,各国新教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共计98人,美国就占了73人。可见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各国对中国的传教事业,美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美国传教士的知识文化水平,当然要比美国的海员、商人高得多。在19世纪封闭的中国,他们就成为最早接触普通中国人并传播西方文明的中介。由于基督教本身就是西方精神文明的体现,因此,传教士在此后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方面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美国传教士为了在中国传教,首先要学习汉语,并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况。著名美国学者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说:“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人是通过传教士的眼睛来观察亚洲的。”美国传教士是怎样看中国的呢?传教士卫三畏写的《中国总论》(1848)是美国人第一部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性著作。书中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滞的文明,由于更加优越的欧洲基督教文明的输入和影响,中国将会引起一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革命。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商人与中国通商的口岸只限在广州一地,西方人在中国传教和印发教会宣传品都是被禁止的。因此,在早期传教被认为是“妖言惑众”,应严加防范。加以西方传教士采用传统的福音传播方式不合中国国情,易使中国人产生反感。为了使传教士披上合法的外衣,早期美国教会是通过办学的方式来传教的,其做法是:教一些中国人学讲英语,以培养西方教会和洋行



所需的通译、买办。

教会还创办“本色化”中文印刷所，将近代西方新印刷术传入中国，印刷宗教宣传品；还举办了慈善事业，吸引贫苦百姓信教。此外，又开设医院，首次向中国人介绍西医，并翻译西方医学书籍，训练西医人才。

上述的学校、印刷所、医院，都不过是传教的工具，因为按传教士的职能，他们所应做的主要是设法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传播西方的知识与文化则是附带的。但其结果，传播西方文化知识却比传播基督教的速度要快得多。

19世纪初期的早期传教活动，主要限于沿海少数城市，对象又是少数读不起书的贫家子弟，活动范围极其有限，传教士不可能与中国社会广泛接触。直到19世纪后期，美国的传教事业和教会办学才有了较大的发展。

19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掀起了向海外传教的热潮，招募大学生自愿到海外传教。从1868年到1918年的50年间，这种“志愿运动”派往海外的传教士达8000多名，其中派往中国的就占2500多名，包括后来著名的司徒雷登等人。

中国之所以受到美国的特别重视，绝非偶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内的自由资本主义正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加强了对亚洲进行贸易扩张的势头，中国被视为海外最大的潜在市场。后起的美国，在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斗争中，提出“门户开放”原则作为对华政策的新基础。而在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民族觉醒，1898年的维新运动与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起了西方国家对发展前途的极大关注。更由于美国国内



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和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教案,使中国老百姓的排外和仇美情绪有了较大的增长。这样一些复杂的新形势,迫使美国调整它的对华政策,其中包括教会的政策。

美国各教会本来就在寻找如何深入中国内地以及征服人心的有效策略,因此,提出将教会工作转向教育的计划,在美国就被视为具有远见的好主意。教会认为,通过教育能争取到更多的群众,特别是能够影响上层知识分子;通过教育,灌输西方文化,可以逐步革新中国文化,使之成为中国整个国家“基督教化”的社会基础。当时,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一些士大夫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开始有了转变,能够接受西方教会在中国办学的这种方式。

美国教会在中国办学校,最初规模很小,只相当于小学或中学的水平。从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少数教会大学逐步建立。这是一些由普通教会学校增添课程和设备而试办的高等教育,除英语和宗教课程外,开设了有关西方科学和医学方面的课程。新办的教会大学,最初的规模都很小,学生入数也很少。

1898年戊戌维新前后,西方传教士发动了一次颇具声势的宣传运动,对百日维新推行的教育改革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内容主要是:中国应改革科举、兴办新学,在现有书院设置天文、舆地、格致、船政、法学等科,还建议“请英、美等国的学部大臣来华专掌(教育)”,并主张先办师范,聘请英、美懂中文的人士负责。英美两国传教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施加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伴随着废除科举,美国在华创办教会大

学也进入鼎盛时期。

据统计,到 1875 年前后,在华的西方教会学校已约有 800 所,学生约 2 万人;到 1899 年,教会学校增至 2000 所左右,学生增至 4 万余人。其中,美国传教士在华所办教会学校,到 80 年代末,已有 1100 多所。比较著名的美国教会大学,按创办时间顺序分列如下:

苏州东吴大学(1901),武昌文华大学(1903),广州岭南大学(1904),上海圣约翰大学(1905),华北协和女大(1905),上海沪江大学(1906),南京金陵大学(1909),杭州之江大学(1910),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10),武昌华中大学(1910),长沙湘雅医学院(1914),福州华南女大(1914),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福州协和大学(1918),北京燕京大学(1919),北京协和医学院(1920)。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杜恂诚在《伦理比较的合理性和相对性》一文中说,1918 年,中国有教会学校约 1.3 万所,其中大学 14 所;学生总数约 35 万人,大学生 1000 名,其中天主教学生 15 万,新教学生 20 万。到 1926 年,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 1.5 万所,学生总数达 80 万人。20 世纪 30 年代,大约 35% 的各界“精英”受的是“教会教育”。这证明从小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中国学生,可以同时接受西方文化。

美国教会大学遍布中国沿海各城市,并深入到武昌、长沙、成都等内地,几乎囊括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大学十之八九。当时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国立的只有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三所,私立的也不多。有一个时期,中国办的大学(包括国立北京大学),

除了国学课程外,很多课程都是用外语讲授,并采用西洋课本。有些教会大学则与美国国内的著名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康乃尔等)保持联系。诸如教学体制、院系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教学工具、参考书等,也都直接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西方的一系列新学科就是这样地介绍到了中国。可见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在中国新制大学中影响之大。

但是,文化教育不同于政治,其中好的部分包含各民族智慧的结晶,这一部分理应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中国文化当时正处在破旧立新的转变时期,外来进步文化的输入,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仍然有利。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教会所办的教育,尽管本质上有其政治的宗教的目的,但也有其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作用的一面。

可以认为,传教士输入中国的,不只是一种新的信仰系统,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知识系统,它对于与新文化相对立的中国旧文化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并启发中国人去辨识陌生的外部世界。最初,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还不足以引发中国旧知识系统的革命,但至少已引起人们去怀疑中国的旧学能否完全适应时代的变化。随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会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促进了中国新制学校的建立与教育改革,尽管他们主观上是为了发展在华势力,为西方侵略者效劳,客观上却充当了输出西学的桥梁与中介。他们向中国输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对中国的近代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二)中国派遣留学生

“留学生”一词起源于唐代,是日本人创造的。此后,凡留学外

国学习的学生,统称为留学生。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向西方学习”成为当时的风尚。一批批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兴起了近代中国的留学热潮。从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算起,到五四运动前后,据有关统计材料,出国的留学生共约4万多人。

这一发展过程,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洋务运动时期**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急于创办各种军事工厂和民用企业,但又缺少了解外国情况、懂技术、精明能干的新型人才。因此,在兴办科技学堂的同时,洋务派向美国、欧洲派出了留学生。这批近代留学生的先行者,在洋务派实用主义方针的指导下,基本上是单纯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戊戌变法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国外派留学生成了朝野上下多数人的呼声。随着维新运动的夭折,留学生运动处于低潮,在这期间只有少数人出国留学。20世纪初,清政府已朝不保夕,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加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推进,又出现了留学高潮,尤其是去日本的留学生人数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时的留学生,已由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主转到以攻读社会科学为主,并直接配合辛亥革命的发动,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清末民初** 从190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又出现了留美高潮。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退回了部分的“庚子赔款”,吸引中国青年赴美留学;一方面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很多青年误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国家主要是搞建设,就到美国去学技术。这时在美国留学

的青年,80%以上学的是工程技术,其中出现了中国早期一些出色的科学家。

**五四前后** 1915年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展开,“科学”和“民主”成了风靡一时的口号。与此同时,不少人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青年知识分子中兴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运动和赴苏联学习,寻求新的救国方案。这些活动均为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

以上可见,近代留学生运动的发展,是和中国人民向西方和向东方寻找真理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直接配合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立、民主、富强等进步运动。

众所周知,中国人最早在美国接受正规教育并获得学士学位的,是容闳。他回国后,提出选派青少年赴美国留学的教育计划,宗旨是“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几经周折,这一计划终于在1872年至1875年间实现。赴美留学生初定120名,年龄在10—15岁之间,分为4批,每批30名,留学期限定为15年。这次选送的留美幼童被安排学习军事、船政、路矿、机工等。后因美国排华暴行,容闳与驻美公使不和,并遭顽固派上奏弹劾等原因,1881年清政府将前4批学生全部召回。除詹天佑等2人毕业于耶鲁大学外,其余学生全未完成学业。实际回国的有94名,经考核分配船政局、机器局、电报局等处任用,成为中国自己近代工业与技术方面的第一批专家。他们后来在中国的造船、铁路、采矿、机器制造、电报以及外交事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开创在生产部门学习西方的风气之先。

在此前后,选派赴英、法、德等国留学的工作也开始进行。清政

府往欧洲派遣留学生,主要出于加强海防的需要。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决定从各方面基础较好的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优秀青年往欧洲留学。

和留美幼童比较,早期留欧学生有不同的特点:一是人数少,分期派。第一批在1877年4月,共30人,往英国、法国,学习轮船制造和驾驶。第二批在1881年12月,共10人,赴法国、英国、德国,学习枪炮制造、火药、鱼雷、驾驶、营造等。第三批在1886年3月,共34人,往英国、法国,学习测绘、驾驶、兵船、管轮和制造等。这样,北洋海军从19世纪60年代动议筹建,到80年代末初步建成,共派出留欧学生88名。时间之长,间隔之大,人数之零散,都在留美幼童之上。二是年龄大,基础好。留欧学生大都在20岁左右,能独立生活和学习,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和较高的文化水平,大都掌握一些基础科学知识,外语大致过关,能掌握航海、操作、制造的基本技能。这就比留美幼童省费用,收效快,易管理。三是期限短,规定严。留欧学生学习期限不完全统一,大致2年、3年或4年,最多6年。有的专攻英语、法语、拉丁文,或学习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但留欧学生选课的总的原则,仍定在军事科学方面,即学习海军技术。综合来看,留欧学生的出国学习,目的明确,基础扎实,年龄合适,规定严格,回国后的效果和留美幼童就不尽相同。

1880年后,留欧学生陆续归国,为南北洋海军和各造船厂输送了一批宝贵的技术骨干。留欧学生的主要作用虽然在军事技术方面,但由于他们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有的人后来就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举以下几例:

严复（1853—1921）福州人。他与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不同点是他从小就从洋学堂接受资产阶级教育。1867年他考入福建马尾船政局附设的海军学堂学习英语和驾驶术，1877年由洋务派保送去英国学习海军。留学期间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英国的社会制度发生浓厚的兴趣，想从中寻找可资借鉴的拯救中国的理论。他去居民区观察基层社会组织，参观工厂、学校、天文馆、博物馆、军队、商店等。他还阅读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穆勒、边沁、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名著。他研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接受进化论观点，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进化论的信奉者。1879年他回国后长期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职务，一直探索的问题是：中国应往何处去？1884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失败使他怀疑洋务派的“新政”措施。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新政”的彻底破产。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各划势力范围，要求“瓜分中国”。中国首次面临帝国主义列强大规模入侵宰割的危亡局面。清廷当权的顽固派依然故我，不肯改革；封建士大夫也仍然愚昧无知，抱残守缺。严复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巨大刺激下着手翻译《天演论》的。他通过翻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等著作，把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理论这一整套系统地搬到中国来。可以说，严复是将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知识介绍过来的第一人。他翻译《天演论》，介绍“物竞天择”思想，翻译《穆勒名学》，介绍逻辑学，特别是归纳法，以及翻译介绍《原富》、《法意》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基本理论，都是为了要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盛”，并不仅

仅在于“船坚炮利”，也不在于“善会计”、“善机巧”的注重功利事务，关键在于去伪存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公而忘私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也就是后来“五四”提出来的“赛先生”与“德先生”——科学与民主。严复的译著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某些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更重要的是，他结合这些介绍、翻译，给予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主要表现在《天演论》的译著中。人们通过读《天演论》，获得一种观察一切事物和自己如何生活、行动和斗争的观点、方法和态度，亦即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态度。因此，不但在严复所有译著中，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前的所有译著中，《天演论》的影响是最大的。自《天演论》出版后，数十年间，“自强”、“自力”、“自立”、“自存”、“自治”、“自主”以及“竞存”、“适存”、“进化”、“进步”等一类词汇盛行不已。从严复同代或稍晚一些的人，到鲁迅的一代，到比鲁迅更年轻的一代，无不深受其影响，用严复搬来的这些思想武器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于是严复成了近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总代表，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如上所说，这种启蒙思想，不只影响了戊戌时期和改良派，更主要更突出的是影响了后几代的年轻的爱国者和革命家。

严复还是第一位提出翻译标准主张的人，他在所译的《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译事楷模。”瞿秋白在致鲁迅论翻译的信中批评严复是“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指摘“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但鲁迅替严复解释了一下：“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指’。”“但他



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些。”(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讯”)

马建忠 1876 年被派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律。他在巴黎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过几年实地考察,认识到西方之强,主要在议院之设、制度之良,也就是说,欧洲各国的制度和政策,要比清代封建王朝优越。回国后,他利用各种场合,介绍西方的议院、学校、法律、军队、商店、工厂企业以及市政建设,并强调议院的设立是最关键的一环。

他既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同时又精通英文、法文乃至希腊文、拉丁文。他著述的《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对欧洲文字的沿革、语言的结构、中外文的异同等,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证,而且旁及“泰西古今一切文学”,博大宏深。

魏瀚 是留欧学生中涌现的律师、外交和翻译人才中突出的一人。他既是著名的工程师,又精通法律,既在法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又在对外交涉中做出贡献。他当过铁路会办、汉阳机器厂总办,是一位优秀的先进技术的管理组织人才。

陈季同 在法国,他一面办公务,一面苦研法国文学,回国后致力于翻译。他用法文写作的《支那童话》、《黄衫客悲剧》等书,在法国风行一时。他还是将《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名著译成法文的第一位中国人。他为当时的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以上说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涌现出了一些杰出的人物。

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时期就很少有人赴欧留学了。20 世纪初,清政府制定了鼓励出国留学的政策,重新往欧洲增派留学生,但人数少规模小。

在此期间,北洋海军也派一些青年去英国海军学校、航海舰队和军事工厂学习驾驶、指挥和制造等专业,从1904年至1909年,总共40名左右。清政府中海军骨干力量主要来源于赴欧洲留学生。

留学生在国外学习期间,外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洋务派所设想的那种只让留学生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又不超越封建专制主义的轨道,不要成为新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留学道路,是根本脱离实际的。因为,从本质上分析,留学生思想上所起的变化,也是欧美社会制度优于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反映。

而且清廷对留学生并不信任,只是从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目的出发,要利用他们。腐败的清朝政府和后来的北洋军阀政府并不重视留学生的工作安排。不少留学生回国后有才无处用,有志不能伸,报国无门,爱国有罪。有些留学生竟至“散处无事,饥寒交迫,甘为人役”,或被洋人聘去办事,或往各国领事署、各洋行充当翻译。而北洋海军和大军事工厂却重金聘请洋人来解决技术难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方面呼叫人才缺乏,一方面又见才不用,随意弃置。总之,近代中国缺乏留学生施展抱负的必要的社会土壤。留学生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文化和当时中国腐败落后的生产关系,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总的来看,近代欧美留学生的发展情况,是和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环。

### (三)中国着意学习日本

远在隋唐时代,日本曾通过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和人数众多的

留学生、学问僧来到中国学习文化,将中国的文物、制度和典籍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当然,古代的日本文化也曾对中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

19世纪末叶,日本于1868年发起了学习欧洲的运动,即“明治维新运动”。这个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由资产阶级支持的倒幕军以武力打败了封建的幕府军,建立了天皇制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从此,“文明、开化”之风席卷日本群岛,日本全面地学习西方,开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曾从中国转译了一些欧洲书籍,到明治年间才大量地直接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实行改革,很快地变成工业国家。

日本实行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新政策,虽曾引起中国人的注意,但下决心要向日本学习,是由于1896年中国的戊戌维新运动因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薄弱而失败,特别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朝野受到极大的震动,中国人认识到,日本所以取得成功,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因此中国如要改变现状,也必须效法日本。

当时,强烈地主张要向日本学习的,主要是洋务派和维新派人物,他们都认为学习西方的捷径是学习日本,尽管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并不相同。

戊戌变法后,人们痛感洋务运动的路线行不通,中国出现了研究日本的高潮,得出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变法自强的结论。最早提议派学生留学日本的,是维新派的御史杨深秀,他在1896年5月的奏折中提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日本的政俗文字有些与中国接近,学起来容易,去日本留学的运输费用和饮食比较

便宜。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从1888年10月到1898年1月的六次上奏中,四次提到变法应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

洋务派的张之洞也同样主张派留学生去的国家,“西洋不如东洋”。总理衙门和一些大臣也纷纷上奏提出向日本派留学生事。

当时,派留学生成为与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紧密联系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最早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从1896年清朝驻日使馆招募唐宝锜等13名学生开始的。20世纪以前,虽然陆续有学生赴日留学,但人数都在百人左右。直到1901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呈复内阁奏折中,决定将向日本派留学生作为一项政策推行,同时各地官吏也纷纷遴选学生派往日本,于是留学日本的活动逐步达到高潮。1903年后,中国出现了“留日热”。如每年留日学生人数,1896年仅有13人,1901年增至280人左右,1903年又骤增至1000—1300人,1906年最多,为8000—12000人(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和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两书中所述略有不同)。

何香凝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戊戌政变以后,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一时称为风尚。”据梁启超1902年的统计,在众多的留日学生中,自费生几占一半。

在学习方面,留日学生有几个特点:(1)学习的科目广泛;(2)学文科的占绝大多数;(3)政法、军事是当时留日学生的热门;(4)90%以上的留日学生进中等学校学习,能入高等专门学校的只占百分之三或四,入大学的极少,仅百分之一,其主要原因是日语水平不够。

这些青年大都是怀着爱国思想去的。到日本后,他们接触到大

量的经日本学者介绍的西方思想文化,和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风行一时的新思潮、新理论,耳目为之一新。他们以寻求救国真理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心情竭力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知识,逐步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大批留日学生纷纷结社团、办刊物、译撰书籍,进一步推动了日文书籍的翻译,加强了大量介绍日本近代思想文化著作的活动。

这个时期留日学生的翻译活动,最初是在东京创办翻译刊物,如《译书汇编》(1900年12月6日创刊)、《游学译编》(1902年11月创刊)等,它们“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务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刊物曾据日文转译了法国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卢梭的《民约论》,英国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代议政治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迈尔的《自助论》等学术著作。

从20世纪初开始,留日学生还比较集中地译介日本学者论述日本情况的著作,最初多与明治维新的内容有关。据中国学者陈应年在《近代日本思想家著作在清末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一文中的介绍,清末时期译介有关维新问题的中文本约有十八九本之多。

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由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启蒙时期(1868—1875)。它的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加藤弘之和西周,还有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因成立于明治六年取名)的其他成员中村正直、津田真道、森有礼和西村茂树等人。1874年以后,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又出现了中江兆民、大井宪太郎和植木枝盛为代表的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家。当西周和津田真道留学欧洲,把“哲学”传入日本,形成日本学院哲学的过程中,出现了井上哲次郎、大西祝等学院哲学家以及井上园了等

人。到了 20 世纪初期，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这些从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的日本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理论家的论著，都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重视，很快地介绍到中国来。留日学生还通过日文译介西方的科学方法论（逻辑学）著作。日本学者著述的逻辑学著作的中译本，虽不能和严复早些时候翻译的《穆勒名学》（即逻辑学）相比，但都给清末的中国青年提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留日学生回国后又继续翻译出版了相当多的日文著作中译本。所译的日文著作，有的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有的是次要的或不好的作品，尽管译者多少作过选择，但由于时代和译者学识水平所限，所选未必精当，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无论如何，留日学生的上述大量译著对于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事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

还不能不提到，在翻译日文书籍的同时，很自然地也把大量的现代日语词汇介绍进中国。现代汉语中许多词汇就是从 19 世纪晚期起从现代日语借用过来的。而日本的现代日语词汇，又大都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在翻译西文书籍时创造出来的。

学者王立达在《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语汇》一文中，对此做了详尽的介绍，现只简述一二如下。

日本人在翻译西文书籍中的专门术语时，采取“音译”和“意译”两种方法。用“音译法”译出的是所谓“外来语”，起初一度用汉字书写（现在用“片假名”书写），如瓦斯、士敏土等。用“意译法”译出的如交响乐、伦理学等，都用汉字书写。这类词在现代日语中

占的比重很大。其中除一小部分用“训读法”(即日本语固有词汇的读法)外,绝大部分用“音读法”(即按照日译汉字音来读)。

回顾清末时期,中国当时学者曾引经据典式地将经济学译为“计学”(严复)或“资生学”(梁启超),将哲学译为“理学”(《新约全书·歌罗西书》)或“智学”(梁启超),将社会学译为“群学”,将物理学译为“格致学”。由于不可能从古典中找得到适合所有新事物的翻译名称,这种翻译法终于行不通。为时不久,“计学”或“资生学”、“理学”或“智学”,以及“群学”、“格致学”等,就分别为“经济学”、“哲学”、“社会科学”、“物理学”等所取代了。

由此可见,日本人翻译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术语时使用的意译法,是与新事物的发展形势相适应的方法。中国从日语借用过来的词汇,不仅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也使中国人接受近代科学技术更加方便。直至今日,日语词汇仍被汉语借用,如“电视”、“基本建设”、“居民点”等新词也是运用日语的构词法而创造出来的。

现代汉语从日语中借用词汇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现在中国人已很难辨别哪些词汇是借日语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留日学生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和发起人中,留日学生就占相当大的比例。如:陈独秀,1901—1915年间三次留日;李汉俊,1918年底留日归国;陈望道,1915—1919年留日;李达,1913—1920年间三次留日;李大钊,1913—1916年早稻田大学留学;董必武,1914—1917年两次留日;周恩来,1917—1919年留日;彭湃,1917—1921年早稻田大学留学;王若飞,五四前明治大学留学;施存统,留日学生;周佛海,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

陈独秀首先在上海筹建党组织,一个重要原因是留日归国学生大多集中在上海。上海共产党小组的重要贡献之一,是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留日学生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过程中的作用。

西方近代文化艺术,如音乐、绘画,很多也是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

### (1)音乐方面

欧洲的五线谱虽在清代初年就已传入中国,但一般中国人习惯用从日本传进来的简谱。音乐术语,如“旋律”、“和声”、“音阶”、“音程”、“音符”、“对位法”以及“交响乐”等,都是日本学者所译,后才通行于中国的。

中国在设立新式学校的初期,许多音乐教师都由回国的留日学生担任,不少日本歌曲也由他们介绍进来。著名的李叔同,就是清末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音乐教育家,他采用日本歌曲,填写中国歌词,他编的教本风行一时。又如萧友梅,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曾兼习音乐,归国后,被北京大学聘请为音乐传习所(1922年设置)主任。著名教育家丰子恺,曾游学日本,也写过许多有关音乐教育的书籍,对中国音乐界做出过贡献。

北洋政府时代的有些军队,还用日本军歌的曲调来唱军歌。

### (2)绘画方面

中国早期的洋画技巧、西洋美术知识,是经过日本输入的。

中国美术家中曾赴日学习的为数不少。如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徐悲鸿,在赴法国之前,曾到日本参观学习、游览名胜古迹和著名收藏,达一年之久。南京的吕凤子(潜)、吕秋逸(澄)兄弟,是在



日本学的画艺。凤子教授美术数十年，秋逸在南京美专等校讲授西洋美术史、色彩学。李叔同（上文已介绍），在音乐教育之外，还从事美术教育，介绍美术技法和西洋美术知识。又如广东岭南画派的画家，多出于日本关东关西画家的指导，其中如何香凝以画虎著称，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善画猿鸟花果，陈树人、经亨颐画花鸟竹树，都能独树一帜。

北平艺专校长郑锦，曾就学日本，所作花木鸟兽，技法严谨，为中日画坛所重。北京著名画家陈师曾（衡恪），早年在日本学习，对书法、篆刻、花卉都有独到见解，他在中国南北各大学讲授中国美术史。又如曾主持南京艺术师院与画院的陈之佛、傅抱石，都曾在日本求学。

中国的插图木刻版画艺术，同日本的“浮世绘”版画艺术，都有数百年历史，代表了各自民族艺术的传统。但西欧的新版画刻法，却是日本先行接受，中国是向日本学习才汲取了这种技法的。

统计资料表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五十多年中，从中国到日本留学的人数，约在五六万人左右。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原动力主要是留日学生；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留日学生仍然起了很大作用。留日学生对中国历史进展所做的贡献，上述许多材料已足以说明。

#### （四）翻译工作在引进西学中所起的作用

翻译工作是引进西学的重要手段之一。鸦片战争时期，鼓励和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者是林则徐。林则徐之后，翻译活动以中日甲午战争作为分界线，即战前的洋务运动时期和战后的维新运动时期。

**洋务运动时期** 由于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所需要的西学要服从两方面的要求：即一方面要输入一些外国工业（军需工业），造船造炮，镇压革命；另一方面要改革教育，办新学堂，以便培养买办和外事翻译人员。它的副产品便是翻译了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和少数社会科学的书籍。

这一期间传播西学的有三个中心。

一是成立于1869年（同治八年）的同文馆，开始只有英文馆，到了1896年，法、俄、德、日几个主要语种相继配齐。1863年李鸿章又奏请在上海成立外国语言文学馆，即广方言馆，专办英、法文两馆。1864年两广总督瑞麟也在广东设立同文馆。北京同文馆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翻译西书，所译述的书籍以公法为主。1864年出的第一本书就是《万国公约》，由该馆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成。传教士选择这类书，是让中国人接受帝国主义世界所必需的知识。

二是属洋务派机构的制造局。江南制造局创设于1865年（同治四年），1867年该局即设置翻译馆译西书。当时译书较多的首推此馆，所译述的书籍以“制造”为主，亦即殖民地的加工工业，特别是军火工业所必需的知识。翻译馆内，除聘请从事翻译的西方人士外，还有几位当时较有名的华人科学家以及若干译员。在江南制造局创办的同时，左宗棠奏请在福州设立船政学堂，招收学生学习英、法语言文字和制造、驾驶技术，也译刊西书。

此外，北京海关税务司、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机器局、金陵制造局等机构，也都翻译西书，但成绩都不能和同文馆与江南制造局相比。

三是由西方教会中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于 1887 年在上海创办的广学会。据道光末年统计在所有西方传教士 140 人中,曾编译著述小册子问世的就有 39 人,书目 266 种,咸丰、同治以后,1860—1890 年间,传教士在中国发行的期刊有 76 种,其中属于宗教性质的 40 种,文化性质的 36 种,而由教会办的编译出版机构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广学会。该会以编印新书为主。据有关材料记述,三十多年中,它所著译的出版物如神道、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之类,以及《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等约四百数十种,卷数约数百万。

教会的其他编译出版机构还有墨海书馆、益智书局、博济医院、立文会馆、中国教育会等。

在甲午战争以前,尽管上述编译机构不少,但洋务派和西方传教士所选译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大多不是第一流的著作,不足以代表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水平。翻译工作基本上是由外国人口述、中国人笔录而成。口译者缺乏专门知识,笔录者不懂外文,两者又都很少懂得翻译工作的理论和技巧。至于所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也只限于法律和地理等方面的一般知识,极少介绍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理论,因这不是洋务派所需,也非传教士所愿。

**维新运动期间** 甲午战争以后,国势危急,洋务派的政策已经破产,维新派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要变法,就以介绍西学、新学为其一项重要行动。梁启超、严复、高凤谦等著文,认为甲午以前引进西学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维新派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去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等来论证无神论。从此,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因此,

在维新时期内，翻译工作极受重视，既译西洋的书，又大量翻译日本的书。康有为、梁启超认为西书从日译文转译是速效之道。由于他们的提倡，此后译自日文的书籍多于译自英、法、德、俄文的书籍。据杨寿椿著《中国出版界简介》一书引用材料，光绪后期的译书共 533 种，其中译自日文的 321 种，占 60% 以上。

自甲午战后至庚子年间（1895—1900），翻译东西文报纸和书籍的报馆有 30 多家，分布在上海、北京、天津、长沙、广州、桂林、成都、重庆、澳门等地。

这一时期译风之盛，还表现在专为译书而创办的社团与国家机构相继成立。如：强学会（1895 年成立）、上海强学分会（1895）、译书局（1896）、南洋公学（1896）、务农工会（1896）、译印西文地图公社（1896）、大同译书局（1897）、译书公会（1897）、质学会（1897）、圣学会（1897）、明达学会（1898）等。

据何兆武著《广学会的西学与维新派》一书介绍，维新派通过译书所传播的西学，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天赋人权论和所谓“民权平等之说”；②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能主义的学说；③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维新派还着重介绍外国历史以为中国变法的借鉴。这类书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①记述某些国家因循守旧、不图自强以致亡国的教训；②论述某些国家由于维新变法导致国势昌盛的经验；③综合考察某些国家盛衰兴亡的历史，作出“尊新必盛，守旧必亡”的结论；④讲述近世资产阶级革命的残酷，警告清朝统治者要尽早实行变法。

1902—1903 年间是上海出版新学书报最风行的年代。革命派

办的印书馆,如作新社、镜今书局、国学社、东大陆图书局等,都在印刷革命书籍。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大同书局等,也竞出新书。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发动辛亥革命之前所做的大量舆论准备中,就包括编译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作,都是从日本人著作中翻译或编译过来的。

马克思主义,也是由留日学生最早从日文书籍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的。

在文学方面,晚清之际,欧美小说也陆续介绍进来。当时封建士大夫和文人大多鄙薄小说。但梁启超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当时他所指的是文学的政治价值,他自己就译出流行日本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在国内引起轰动。

这一时期翻译外国小说最多的是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州人)。他不懂外文,却在近30年中,通过别人口授,翻译介绍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的183种小说,约1200万字。由于他不了解外国文学情况,选材不由自己,他所译的作品中属于名著的只有40多种。林纾鄙视白话文,坚持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因系意译,于是有随意增饰、删削甚至谬误之处。但名家认为他的译笔很不错,尤以对他在辛亥革命前的译著50多种评价更好。如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提到沈雁冰(茅盾)对他说过,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还另举出林译《孝女耐儿传》中的一段译文评论说:“像这种文调,在中国可算是创见。我们虽然不能把他的译文与原文一个字一个字地对读而觉得一字不差,然而,如果一口气

读了原文,再去读译文,则作者情调都可觉得丝毫未易,且有时连最难表于译文的‘幽默’在林先生的译文中也能表达出;有时,他对于原文中很巧妙的用字也能照样地译出。”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也说:“《迦因小传》在世界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但经林琴南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真是增添了不少光彩!”郭氏说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在文学上的倾向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朱自清在《国文教本》中说:“读《聊斋志异》和林译小说,都曾给我影响”,“中学时代曾写过一篇聊斋志异式的山大王的故事,词藻和组织大约还模仿林译小说”。阿英(钱杏邨)在《晚清小说史》中评价说,林纾“使中国知识阶级,接近了外国文学,认识不少第一流的作家,使们从外国文学里去学习,以便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因此,郭沫若认为林纾“在文学上的功劳,就和梁任公(启超)先生在文化批评上的一样,他们都是资本制革命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且是相当有些建树的人物”。

下面介绍这一时期翻译欧美小说名著的简况,从中也可看到林纾的作用。所有书名在译成中文时,有若干不同的译法。

### (一)英国小说

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最早由跛少年(沈祖芬)于1898年从英文译出,译名采用日译本《绝岛漂流记》,1902年印刷发行。1905年又有从龔译本《绝岛英雄》。1906年才有林纾译本《鲁滨逊漂流记》和《鲁滨逊漂流续记》。

斯威夫特的《小人国》最早译文载在《申报》的《谈瀛小录》(1872年4月15—18日),即该书第一部分“小人国”的中译。又有佚名译成《汗漫游》(原题《倏侥国》)。林纾的节译本名《海外轩渠

录》(1906)。

司各特的作品,最早的中译本是林纾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1905)。以后林氏又译出《十字军英雄记》(1907)和《剑底鸳鸯》(1907)。

兰姆的《莎氏乐府》,最早是达文社译的《海外奇谈》(1903),只选原作的10篇。

史蒂文生的作品,佚名译出《金银岛》(1904)。另一本,林纾译为《新天方夜谭》(1908)。

狄更斯的作品,林纾介绍得最多,如《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冰雪因缘》、《贼史》、《滑稽外史》等。魏易另译出《二城故事》。

## (二)法国小说

大仲马的作品,译成中文的较多。如伍光建译的有《侠隐记》、《续侠隐记》、《法宫秘史》,林纾译的有《蟹莲郡主传》、《玉楼花劫》,公矩译的有《大侠盗》,由抱器室主人另译为《基度山恩仇记》。又有冷血译出的《赛雪儿》,洪观涛译出的《地亚小传》等。

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林纾译得最早也最有名。

雨果(又译为器俄)的作品,有苏曼殊、陈独秀合译的《悲惨世界》节译本,有包天笑译本《侠血奴》(1905)和平云译本《孤儿记》(1906),有包天笑译本《卖解女儿》和平情主人(狄楚青)译文《噫有情》,有东亚病夫(曾朴)译本《九十三年》和俞忽译本《活冤孽》等。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有陈冷血译的《义勇军》和胡适译的《二渔夫》、《梅吕哀》(1917)。五四后才大量翻译他的作品。

## (三)美国小说

欧文的代表作,译文题名《一睡七十年》发表在《申报》(1872)

上。林纾译的《旅行述异》、《拊掌录》、《大食故宫余载》，先后于1906和1907年出版。林纾译的斯陀夫人的作品《黑奴吁天录》(1901)，曾引起很大反响。

#### (四)俄国小说

托尔斯泰小说，中译本颇不少。最早的是将他用宗教题材写的“民间故事”12篇，译为《托氏宗教小说》(1907)登在教会报刊上。1913年有马君武的译本《心狱》(即《复活》)。1914年有天笑生译的《六尺地》(即《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刘半农译的《此何故耶》。1915年有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罗刹因果录》，内收小说8篇；雪生译的《雪花围》(即《主与仆》)；朱东润译的《骠骑父子》(即《两个骠骑兵》)。1916年有马君武译的《绿城歌客》(即《卢塞恩》)。1917年有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社会声影录》，内收小说两篇；他们又合译《人鬼关头》(即《伊凡·伊里奇之死》)；还有陈家麟和陈大镗合译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和朱世湊译的《克里米血战录》(即《塞巴斯托波尔的故事》)；周瘦鹃编译的《宁人负我》(即《上帝看出真情，但不立刻讲出来》)。1918年有林纾和陈家麟合译的《现身说法》(即《幼年、少年、青年》)，周作人译的《空大鼓》(即《工人叶美良和空大鼓》)。辛亥革命时期，《民立报》译载了《讼祸记》。

高尔基作品的最早中译本是吴棹自日译本转译的《忧患余生》(即《该隐和阿尔乔姆》)。辛亥革命时期，《粤西》月刊译载了《鹰之歌》。1916年，有刘半农译的《二十六人》(即《二十六男和一女》)。1917年，有周国贤(即周瘦鹃)译的《犬义》。



**(五)西班牙小说**

塞万提斯的不朽名著《堂·吉珂德》，由林纾译为文言节译本《魔侠传》。

其他国家作品的中译本，不一一列举。

---

## 第二章

#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转变时期。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以它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成为这个转变的伟大转折点。从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五四时期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革命斗争,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彻底地反对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因为当时的共和国是建立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相妥协的基础上的。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很快被野心勃勃的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所篡夺。

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固有矛盾日益激化，国内政局动荡恶化。袁世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对外更加投靠帝国主义（特别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日本帝国主义也趁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对内，袁世凯变本加厉地推行专制独裁统治，武力镇压人民的反抗，并逐步修改《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公开向复辟帝制道路上走去。

与此相呼应，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反对共和的逆流。袁世凯公开提倡祭天祀孔，发布维护纲纪的文告和表彰“节烈”、“孝行”的条例；并下令全国学校恢复尊孔读经，国民教育要“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同时以康有为为首的君主立宪者们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也由改良主义转到尊孔复古反对共和的逆流中去，大谈不忍纲纪的灭亡、国粹的丧失，并创办《不忍》杂志，连篇累牍地攻击民主共和思想，叫嚷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帝国主义分子也公开宣扬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社会上，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等团体纷纷出笼，叫嚣要把孔子之道（实际上是儒教的糟粕部分）写进宪法，定为国教。这一切，被当时反封建斗争的先进分子贬称为“孔家店”。

面对着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对着复辟倒退的封建专制统治，曾经对辛亥革命抱有满腔希望的广大知识分子，感到彷徨苦闷、失望不满而又找不到明确的出路。他们盼望的民主共和制度

不仅未能真正实现,甚至连仅有的民主共和招牌也挂不住了。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积极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卖国的同时,也在认真地思索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当时,他们还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但他们清楚地看到民主共和制度并没有在中国实现,正如陈独秀所说: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得将这班反对共和的理论、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于是他们便把唤起多数国民自觉地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革命,提到新的高度,发起一场中国有史以来没有过的启蒙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陈独秀早年曾留学日本,主张民主革命,反对君主专制。辛亥革命后,曾任安徽师范学堂校长。1913年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逃亡日本,在日本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思想的影响。1915年回到上海,创办《青年》。直到1917年,这个刊物主要由他主编。他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首先提出中国需要改弦更张,认为中国旧有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大大落后于欧洲。该文历数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腐败,痛陈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号召青年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解放思想,养成独立自主的人格,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急起直追。

尊孔复古逆流是民主和科学的大敌。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孔子学说,特别是其中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发动文学革命,反对束缚思想、

脱离生活的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当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传播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仍是19世纪末从西方传来中国、并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进化论。陈独秀在一些文章中就曾提出:新陈代谢,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优胜劣败,理所当然。因而他对中国当时社会的黑暗、落后、愚昧,对国家的贫困、虚弱,对民族的危机,痛心疾首,大声疾呼,并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激励青年发愤图强,当时确起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但他并没有找到国家贫穷落后的真正原因,也没有找到走向富强进步的正确方向。

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前期,也是接受进化论思想的,但他从侵略者利用此学说发动战争的事实,看出了“社会进化论”的谬误,从而对“社会进化论”产生了怀疑以至否定。他把握了进化论的合理核心,即发展的理论。他热情歌颂青春长存,鼓舞青年创青春的中华。他发表在《新青年》的著名论文《青春》中,寄厚望于中国青年,号召他们冲决过去历史的网罗,破坏陈腐学说的囹圄,鼓舞他们“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因此,到1917年,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能够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除进化论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还热心地传播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撰写的第二篇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说明:近代文明的特征,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者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二曰生物进化论,三曰社会主义。他还要求仿效法国、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实现共

和。他说：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这都值得我们借鉴。到1916年，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更进一步说：我们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必须抛弃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的官僚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资产阶级的共和立宪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其他原因，当时启蒙思想家的共同向往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1917年2月，俄国发生推翻沙皇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希望这能促起中国人民的觉悟。他们是真诚希望在中国实现共和，他们已经认识到腐朽的封建思想是共和的大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实现共和的最大障碍；但他们还没有认清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没有找到实现共和必须依靠的革命力量。

虽然如此，新文化运动仍以其彻底的革命精神，给予封建思想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促使人们解放思想，激起人们要求进步和追求真理的热情，唤起了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这就在思想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思想文化革命继续深入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9年的五四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提高

了人们的政治觉悟。它促使新文化运动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展开，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面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逐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并与中国现实政治斗争相结合，开始展开了中国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界空前活跃，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局面。这明显地表现在当时涌现出的新刊物上。据估计，五四以后仅一年间，各地出现的新刊物就达400多种。除北京、上海、天津、长沙、武汉等新文化运动比较先进的地区外，在山西、甘肃、云南等文化比较落后的边远地区，也出现了传播新思潮的新刊物。这些新刊物绝大多数都是由各地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织的各种社团或学会编辑出版的，大都以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为宗旨，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性。这些刊物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大都辗转引进或介绍了国外的各种文化思潮。

五四运动彻底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政治腐败、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经过五四运动的教育，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抛弃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对反动军阀和官僚完全失去了信任，因而要求推翻政府、改造社会、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呼声响遍全国。当时各地新出版的许多刊物，尽管在思想倾向和内容上各不相同，但大都抱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和对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极端不满，热情地探索和议论社会的改造问题和中国的出路问题。当时的思想舆论界，比较一致的是认为中国社会必须改造，但在怎样进行改造，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的问题上，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直到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反动的唯心主义和改

良主义,都纷至沓来传入中国。另一方面,由于十月革命的发生,人们对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从科学社会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也都在探索。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修正主义等都被笼统地当作“社会主义”新思潮介绍到中国来。因而,许多关于改造社会的讨论和设想,又带上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色彩。

五四以后,急于救国救民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在短短的时间内,几乎抓住西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过的一切社会政治思想。他们当中一部分先进的人们,则希望从十月革命中吸取一切有利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改造的因素。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着巨大影响的《新青年》杂志,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7卷1号发表的说明刊物社会主义倾向的《本志宣言》中,开始表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已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时候)了。”宣言表示“尊重劳动”,要继续打破成见,抛弃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它向往改造后的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事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人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以至于消灭。”这种按理性或道德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新社会,并把它看成就是向往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接近于幻想,但它在当时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五四以后,由瞿秋白、郑振铎编辑出版的《新社会》的“发刊词”以及由赵世炎编辑的《工读》第五期中的文章,都有类似的观点和说明,邓颖超在回忆天津“觉悟社”社员活动情况时也说: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



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些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

五四前后的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纷乱的思想状况下,传播着科学的社会主义真理。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积极热情地宣传、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的真实情况,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和探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从而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各式各样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批判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传播,并被先进的思想界所掌握,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改造的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 (一)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

十月革命以前,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虽在中国有所传播,但那是十分混杂和含糊的,且大多是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科学的社会主义真理——马克思主义被作为社会主义流派之一,零星、片断,并常常被歪曲或篡改而介绍到中国。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播。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作为产生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的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微弱。在国际上,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又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

革命运动,完全排斥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外,这使中国人民更难有机会和可能去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情况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才开始得到根本的改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开始阶段大都希望在中国建设西方式的新国家和新社会,但是,这种努力一次又一次以失败告终。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表明它并非是理想的王国。一些先进人物开始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持怀疑和保留态度。如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杂志时,李大钊在1916年5月的谈话中,毛泽东1917年8月致黎锦熙的长信中都曾表达了这种怀疑和保留。当时,他们虽然还不能指明新政治制度和新的思想应当是怎样的,但却推动着人们继续去寻找和探索救亡图存的新途径。

在此关键时刻,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了,而且是发生在情况与中国大致相同(严重的封建专制压迫)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从而特别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它说明物质文明不高的国家,也可以采用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社会改造,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先进的人们开始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这时,中国社会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较多较快的发展,工人阶级开始成长壮大,有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欢呼十月革命的同时,很快就接受并积极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

## (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

### 李大钊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是他首先认识十月革命的本质及其伟大意义,并积极热情地进行传播。1918年7月他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阐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10月他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在1919年元旦,李大钊又在《每周评论》上撰文,歌颂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1914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热情歌颂和宣传,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十月革命的意义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潮,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1918年下半年到五四运动前后,他发表了多篇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他主编了《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特别指出:这三部理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在中国首次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并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联全面进行研究和阐述的文章。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从一开始他们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李大钊正是这样,先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发表

了一系列论文,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革命和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某些问题。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等学校,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利用讲坛向学生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他还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关心和帮助五四前后涌现出来的许多进步社团和报刊,团结大批青年学生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的这些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使思想启蒙运动冲出了资本主义的死胡同,进入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 陈独秀

五四运动以后,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开始谈论社会主义,并在思想上逐渐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1919年12月,《新青年》7卷1号发表了《本志宣言》。该宣言是陈独秀执笔撰写的,它表达了继承过去《新青年》的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又大体上确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宣称抛弃罪恶的资本主义,幻想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个宣言表明了《新青年》由一个民主主义刊物转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刊物的过渡状态。陈独秀也处在转变中。

1920年,陈独秀从北京回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回上海。这时,关于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的讨论日益展开。同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来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并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

组。这期间，陈独秀逐渐接近并比较明确地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在《谈政治》一文中，他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他首先指出：“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克思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文章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特别是他引用了《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指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全都是解释阶级战争的历史及必要性，马克思的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尽管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有时还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去理解马克思主义，而这些局限和不足，他又未能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加以克服，最后逐渐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但是，在他主编《新青年》时期，终究是起到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扩大社会主义影响的历史作用，同李大钊一起被当时人们誉为“南陈北李”。

《新青年》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报刊之一。它从1915年创刊，中间几经变动，直到1926年最后停刊前，始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新思想宣传的主要阵地，它充分反映了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文化思想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其逐渐成为运动主流的过程。陈独秀不仅是《新青年》的创办者，而且是主要撰稿

人。在《新青年》上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在陈独秀明确表示接受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以后，《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从1920年9月的8卷1号起，《新青年》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并开始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了当时搜集得到的外国报刊上有关介绍苏俄革命理论和实际情况的材料，包括一些列宁著作的译文和列宁生平介绍。在此期间，《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与伪装成社会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两次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大论战，正确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很好的思想准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改组为季刊，正式成为党的理论刊物。在此以前，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性质的刊物，它宣传过民主主义，宣传过社会主义，也宣传过被作为新思潮从西方传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它也宣传过一些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这正好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思想的面貌，也和编者们的思想状况有关。但是，经过探索、比较、鉴别以后，《新青年》终于首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为急于救国救民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拨开迷雾，指明道路。《新青年》季刊发表的《新青年的新宣言》中指出：“《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是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它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它唤醒了一代知识青年，使他们投身革命洪流，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曾经谈到：“这些会社（指新民学会和当时的其他进步社团，如觉悟社、利群书社等）的大多数，或多或少地是在《新青年》的影响

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当时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又说：“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界领袖。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很快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指1920年），我和陈独秀讨论过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的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周恩来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谈到：“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以及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这些书都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所编印的。我本人亦见过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也谈到：他的朋友孙炳文曾介绍一本杂志——《新青年》给他看，《新青年》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给予他的影响，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生难忘、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五四前后，特别是五四以后出现的许多进步社团和报刊，都开始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在1919年4月6日出版的第16号，就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五四前夕创刊的《国民》和《新潮》杂志，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刊登过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919年2月，《晨报》副刊大加改革，吸收李大钊参加工作。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它增设了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个栏目，并在同年5月1日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纪

念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在同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1周年纪念日,它又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这个专栏持续了半年,发表了五篇论著,包括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的最早译本《劳动与资本》,以及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全译本和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通俗解释马克思经典著作的文章。此外,《晨报》副刊还从英、美,特别是日本的出版物中,翻译和介绍过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劳工运动的文章和著作,介绍过一些有关马克思、列宁、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传记材料,其中虽然有不少著作的观点仍存在一些问题,但也有一些纲领性文件和经典著作,如《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等。它还曾大量刊登了有关介绍和报道俄国革命和建设的文章和通讯,特别是瞿秋白作为《晨报》社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所写的一系列通讯,是十月革命后中国人在国外第一次向国内所作的关于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方面情况的全面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他发起并领导的新民学会,曾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广泛的活动。五四后不久,毛泽东又创办了《湘江评论》,以此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五四以后全国出版的众多进步期刊中,《湘江评论》是思想性和战斗性最强的刊物之一。1920年,毛泽东和几位新民学会会员联络当时长沙文教界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士发起成立了长沙文化书社,继而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马克思研究会,发起留俄勤工俭学会等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新思想。



毛泽东草拟的《发起文化书社的缘起》一文中说明：该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杂志，作为青年及全体湖南人研究的材料。该社的宗旨是：使各种有价值的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的机会。该社成立不久，就和全国六七十家进步出版社、书报社建立营业往来，并在省内各地设立 9 处分社，大力推销《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进步刊物，以及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丛书。该社又以“文化书社同仁”的名义，向每一位购书的读者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希望帮助介绍、推广新书刊；二是希望读者和自己的朋友组织读书会，大家做共同的研究。这两个建议都印成传单，夹在每一本售出的书刊中。文化书社的业务日趋发达，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

在天津，周恩来领导了天津学生运动，并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它当时被人们称为“天津的曙光”、“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先后出版了一百几十期，每期发行 4000 份以上，成为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同年 9 月，周恩来和邓颖超、郭隆真等联络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觉悟》。

周恩来旅欧期间，经常和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通信联系，并在天津《益世报》、《新民益报》等报刊上发表了 100 多篇通讯，报道勤工俭学的情况和斗争、欧洲各国社会状况和工人运动，介绍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周恩来的指引下，大约半数以上的觉悟社社员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李达是中国早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1919 年五

四运动爆发后,李达虽在日本却密切注意着国内局势,并积极向国内投稿宣传社会主义。从1919年6月18日到7月3日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他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陈独秀与新思想》、《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12篇文章。此外,他从1918年秋返回日本到1920年夏回国以前这段时间,还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三本著作寄回国内发表,分别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当时国内还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情况下,这些书的影响很大。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把李达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列为学习文献之一,《唯物史观解说》重版了12次。

1920年夏,李达抱着实践马克思主义拯救中国的愿望,返回祖国。他一到上海就与陈独秀等共同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并主编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在此期间,李达还积极参与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在建党前夕,为了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线,他连续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主义还原》、《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系统地揭露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他通过论述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的主旨,指明建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他的这些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确起到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作用。他还创办和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该社原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其他9种。在一年

内,实际上出了 15 种,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工钱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和其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地传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新成立的党和革命人民,起了巨大作用。

此外,五四前后,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在北京,张太雷在北京和天津,贺昌在北京和山西,陈望道、李启汉、俞秀松、郭沫若及稍后的张仲实、沈志远、柯柏年、吴清友等在上海,方志敏、袁玉冰在江西,董必武、恽代英、陈潭秋、施洋在武汉,何叔衡、彭璜、夏明翰在湖南,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彭湃、阮啸仙、杨匏安在广东,杨闇公在四川,李子洲、魏野畴在陕西,以及其他当时的先进人士,都进行了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参加或领导了当地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他们大多是五四以后出现的许多进步社团和报刊的发起人、组织者和积极分子。这些社团的成员共同学习,共求进步,对中国的出路问题、社会的改造问题、青年的前途问题、人生观和世界观问题,以及教育理论、妇女解放劳动问题等等,都逐渐展开讨论和研究,世界局势和俄国革命问题更是大家所关心的。有的社团还和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经常到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正是这些众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的积极活动,才使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形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高潮。

在全国各地新成立的进步社团和进步报刊的宣传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据《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一书所附资料索引,从 1918 年 7 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开始,到 1922 年

底,《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少年中国》、《曙光》、《劳动界》、《共产党》、《广东群报》、《先驱》等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 237 篇,其中 1919 年 5 月以后发表的为 223 篇。在 1920 至 1922 年期间,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工钱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列宁的论著《过渡时代的经济》、《民族自决》、《俄罗斯的新问题》、《国家与革命》(部分)、《劳农俄国的建设事业》,以及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如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阶级斗争》和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也都有了中文译本。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思潮的论争

在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和互相撞击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像它在国际上的遭遇一样,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论争、诋毁、谩骂,可以说在国际上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也都被带进中国;此外,还有来自中国土生土长的封建主义者的攻击和军阀官僚政府的压制和迫害。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当它日益和新文化运动相结合,成为这个运动的主流并大力促进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它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严峻的斗争。

#### (一) 西方各种思潮进入中国

五四运动前后,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同时,西方各种思

潮也进入中国；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宣传的同时，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大谈起“社会主义”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更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特别是它对外侵略扩张和发动战争，对内由于贫富极端悬殊而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或多或少地看到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没落的一面。十月革命后蓬勃兴起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更引起了他们很大的思想震动，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不仅弱小的民族、弱小的国家对于强大的民族、强大的国家要求解放，即使贫困的阶级对于富有的阶级也有解放的要求。中国五四运动后，军阀反动政府的腐败、专横、卖国面目更加暴露，社会改造的呼声高涨，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中国的前途不能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了。于是，他们也谈论甚至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到处以社会主义相标榜。

当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谈论社会主义的。他们是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贩卖西方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以及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西方各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货色。

在中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中流行较早较广，而且影响较大的是无政府主义。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他们长期习惯于分散的落后的经济组织；近代中国的社会灾难深重，特别是连年军阀混战，更使小生产者处在贫困破产、朝不保夕的境地，

生活痛苦不堪。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种黑暗现实不满，他们向往并盼望的理想社会是没有贫穷、没有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又不愿甚至反对进行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阶级斗争，因此，最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早在20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被当作一种“社会主义”思潮，经由一些留学日本和法国的学生或反对清朝的流亡者介绍到中国。他们翻译若干小册子，还出版过一些刊物，以及组织社会主义讲习所。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又组织了“晦鸣学社”，出版了《晦鸣录》（后改名《民声》）和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到了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新思潮”和“社会主义”掩盖下，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北京大学就有实社、进化社、奋斗社等无政府主义组织，出版了《自由录》、《工人宝鉴》、《进化》、《奋斗》等刊物，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也有类似的团体和刊物。据统计，在五四时期出版的专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达70多种，当时的其他许多报刊上，也发表过不少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知识是很浅薄的，他们主要是贩卖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中国墨家的“兼爱”思想相提并论，把“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孔子的“大同”思想相提并论，把德国斯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和法国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糅合成他们的“奋斗主义”人生观，把外来的虚无思想和老庄的出世思想糅合成他们“虚无主义”的人生观，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演变为不饮酒、不食肉、不坐人力车等生活准则等等。以上说明他们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以及理论上的贫乏和无知。在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和权威的同时，无

政府主义者在《奋斗》1920年第1卷若干期上连续发表文章大肆宣扬“个人奋斗”，鼓吹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绝对的自由主义。

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反对清政府，在文化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因此曾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辛亥革命后，他们在宣传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政府时，也揭露过军阀政府的罪恶，表示要与之作殊死斗争。在五四时期社会思想大变革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和活动，他们的刊物也热烈地讨论过中国的社会改造和出路问题，当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给中国指出真正的出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许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逐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那些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人，开始了反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甚至把主要斗争锋芒转向攻击马克思主义。

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当时除无政府主义外，还流行着从日本介绍来的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工读主义和工学主义，以及合作主义等等。这些带有不同程度空想色彩的各种主义很迎合那些不满现实又企图逃避现实、逃避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的趣味，在当时也被当作是社会主义的流派而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

新村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幻想脱离现实社会另辟一块小天地，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相友爱的理想新社会。中国最早介绍新村主义的是周作人，他去日本参观过“新村”，并在1919年3月《新青年》上发表的《日本的新村》一文中予以介绍。接着，他在北京、天津发表演讲，在《新潮》、《晨报》副刊上

继续发表文章鼓吹，还组织了一个所谓“新村北京支部”，不仅进行宣传，而且还介绍人们到日本去参观“新村”。

周作人的鼓吹，在当时很吸引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这个问题，似乎是找到了一个改造中国社会的好办法。在1920年4月上海新人社出版的《新人》月刊的发刊词中，就表示通过发行这个月刊，征求同伴，募集新人，去组织新社会。说什么现在已用不着再在宣传社会主义上下功夫，“新村”绝不是“桃花源”、“避世庐”、“隐士窝”，而是“另立一个新社会的模型，以便世人仿制”。有些青年学生在新村主义的影响下，将自己的宿舍命名为“新村”、“平民村”、“大同村”、“友谊村”等，而且自订章程，共同从事一定的劳动，所得收入共同消费，提倡所谓“人的生活”等等。

新村主义的计划，说起来是美妙动听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鼓吹的“理想社会”一样，终究是乌托邦的空想。它不是引导人们面对现实和旧势力作斗争，而是引导人们脱离现实、逃避革命斗争，因而在政治上不能不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

五四前后，《新青年》、《国民》、《新社会》、《曙光》、《晨报》副刊等报刊都曾译载过托尔斯泰的一些小说和剧本，使他成为当时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无抵抗主义”或“对恶的不抵抗”也曾有人介绍，但影响不大，但他的“泛劳动主义”却在一些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托尔斯泰从人类的自然本性出发，认为人欲谋得衣食，就必须劳动。五四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的呼声空前高涨，泛劳动主义也就流传起



来。他们称赞托尔斯泰把土地分给农民，赞美他晚年过的勤劳、寡欲、斥“富”、排“惰”的生活，对于他极喜欢从事体力劳动更赞赏不已。应该说，这对于冲击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唯有读书高”，以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错误观念和不合理现象，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泛劳动主义者却又错误地把社会中所以有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区分，归结到是因为有些人不劳动，是因为有了劳心与劳力的分工制度，并幻想用和平教育的方法，使人人参加劳动，从而消灭劳心与劳力的差别、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差别、治者与被治者的差别，这正好反映了他们逃避阶级斗争的心理。

在新村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下，有些知识分子提倡起工读主义或工学主义来，企图通过使知识分子做工来打破劳力与劳心的差别，实现社会改造。当时以北京大学一部分人为主组成的著名的“工读互助团”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工学会”，就是主张和实践这个思想的组织。在谈到社会改造和革命问题时，工学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就更明显了。他们反对各国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他们主张和和乎乎地进行世界革命。他们的希望是：以工学主义改造中国，以工学主义改造世界。

北京工读互助团是成立最早、规模和影响也最大的一个工读主义团体。它是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支持下，由王光祈发起并募集经费，于1919年底正式成立的。他们幻想着如果工读互助团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他们希望将来各地的这类小组织能够联络起来，实行“小团体大联合”，这便是创造新社会。

工读互助团先后吸引了几十个要求进步的男女学生，成立了四个组，实行半工半读。他们在进入这个团体后，就宣告脱离家庭关系，脱离婚姻关系，脱离学校关系，在工读互助团内绝对实行共产。他们一面从事办食堂、洗衣、成衣、印刷、装订等营业，赚来的钱完全归团体公有，维持团员的生活，培养团员的劳动和互助习惯，一面分别在各校听课。这在当时几乎轰动了全国，武昌、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城市和浙江、广东等省份的许多青年学生，都纷纷照样组织起类似的组织。但是，工读互助团并没有按照创办者们的主观愿望发展，而是在几个月后就纷纷瓦解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薄弱的经济基础，收入很少，而开支却甚大，经济上困难重重难以维持；同时团员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与集体主义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宣告了带有空想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破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传播，那些真心要与工农结合改造社会的进步青年，抛弃了最后一点幻想，坚定了用革命的方式根本改造社会的决心。

在工读主义的轰动中，上海复旦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又提出了“合作主义”的主张作为改造社会的指针，并出版了一个《平民》周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极力鼓吹。但他们既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又极端害怕革命斗争，于是他们从资本主义的仓库中，拿起了具有调和色彩的合作主义，大肆鼓吹这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其实，合作运动是发生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早期工人运动中，合作社曾作为工人群众为摆脱商业资本剥削的经济斗争的形式出现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曾积极提倡，并把它作为实现新社会的“细胞”而做过实验，认为可以通过合作制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

会主义。马克思和列宁曾指出,这是毫无根据的梦想,是彻头彻尾的幻想。空想主义的实验也遭到了失败。

中国当时的合作主义者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认为上述失败是偶然的,认定这是预防过激手段的好办法。他们幻想用和平的方法达到将来世界大同的途径。这些无力的宣传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在鼓吹了几年后他们自己也吹不下去了。因为读者和观众不仅觉得没有趣味,有些人甚至于对它厌恶了。

上述这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反映了五四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中国现状的深刻不满和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同时也暴露了他们本身的弱点,即不懂社会发展规律,不敢面对现实,害怕和逃避阶级斗争,幻想用和平方法实现变革等等。这些从西方引进的社会主义思潮,尽管形形色色,解释不一,但它们本质上都是主观的、空想的,甚至有的是反动的,虽能喧嚣一时,但它们没有也不可能给中国的社会改造指出正确的道路。

五四以后,在遍及全国的“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呼声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仍然做着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美梦,继续从欧美贩来各种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和哲学思想,作为解决中国出路的药方。它们被贴上“新思想”甚至“社会主义”的标签进行贩卖。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有历史传统的。清朝末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曾发动过“戊戌变法”,试图通过君主立宪制来实现富国强兵。当时,严复曾经比较系统地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曾经翻译介绍过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对中国

思想界影响很大。但“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时，他们却在政治上沦为反动的保皇派，宣传“渐进”和“调和”的思想，提倡平息新旧两家之间的争论，主张从教育着手进行改革，反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斗争。五四时期，在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招牌下，新一代的改良主义者继续贩卖他们的货色。一些曾在日本和英美学政治、经济、法律的留学生主办的《太平洋》杂志，就是专门主张以英国式的宪政和议会制为楷模，来改革中国政治的刊物。他们大力鼓吹新旧逐步代谢的调和论，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

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那些留学过欧、美、日，熟悉西方文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到世界资本主义腐朽衰退的情况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他们也感到旧的资产阶级学说应付不了当前的危机，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武器。由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集团的研究系主办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在创刊号（1919年9月）的《宣言》与《第三种文明》两篇文章中，就哀叹：今天的世界不是以前的世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第二种文明（指资本主义）的许多根本性的弱点；而第三种文明（指社会主义）已经开始茁壮起来。于是他们要研究最新的思想。他们所说的最新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各色各样的现代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如杜威、罗素、柏格森、颌德（社会达尔文主义）、奥斯、爱尔乌特（反动社会学家）和倭铿（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等人的哲学、政治社会思想以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这些都被他们当作新思想，贩卖给中国人民。

五四时期，起劲地贩卖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主要有两个派别：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

他们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在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他们完全拜倒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面前，甚至主张“全盘西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和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阵营中的主要力量。另一派是以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他们是属于地主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受封建主义文化影响较深，其言论和主张要复杂得多。这两派的共同特点是：不仅大量介绍西方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而且十分重视并积极组织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来华讲学活动，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来影响中国思想界，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将中国人民引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路上去。

胡适是在留学美国的后期，追随杜威学习实用主义（又名实验主义），成为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是带着实用主义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因此十月革命后，差不多与李大钊等在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1919年初，胡适就连续发表了《不朽》和《实验主义》两文，系统地介绍实验主义的思想；在杜威来中国讲学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吹。随后，杜威在中国作了两年零两个月的巡回讲演，遍历11个省。他的讲演录被译成中文广泛地刊登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觉悟》、《学灯》等著名刊物及其他许多报纸上，其中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三大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等五种，曾被称为《杜威五大讲演录》，由北京《晨报》馆编印发行。在胡适等的吹捧和大力推销下，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统治了中国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界，流毒很广。

实用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在美国产生的一种

最反动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潮。创始人是皮耳士,后来由詹姆士和杜威加以发展,使它更适合于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实用主义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否认客观规律,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认为物质世界只存在于人的感觉经验里面,一切知识、科学都是主观的产物。科学理论的价值,不是由它反映现实生活的正确程度来决定,而完全是由这一理论提供的效用和利益来决定。因而凡是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实际效用的一切,在它看来都是“真理”。实用主义还宣扬庸俗的进化论,认为历史的发展只有缓慢的、一点一滴的进化,妄图以此来推行改良主义,取消革命斗争。它反对用革命的手段根本改造社会,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杜威的教育理论也是为他的改良主义哲学服务的。他在关于《平民教育》的讲演中,更直言不讳地供认,他之所以提倡平民教育,正是为了抵制布尔什维克主义。

但是,事实的发展与杜威、胡适等人的愿望相反,这些反动思想虽然在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留下了恶劣的影响,培植了一些毒草和烂果,却始终没有也不可能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传播。

胡适是打着“科学”和“民主”的旗号,公开地贩卖反动的实用主义;而梁启超和张东荪的研究系一派,则是在所谓研究“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偷运各式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以至修正主义。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涨,一直忧心忡忡。于是梁启超带着张君勱、蒋百里等去欧洲进行考察,而张东荪则在国内研究预防所谓“过激主义”的方法。梁启超等人1918年底去欧洲,发现欧洲在战后生产破坏、财政支绌、社会

混乱、人民贫困等状况，看到社会革命的潮流和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于是回国后写了《欧游心影录》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没落、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和普遍悲观的情绪。但是，他们却把希望寄托在新的唯心主义学派的创立与传播上；他们还企图把这些帝国主义时代的反动思想和中国封建文化糅合起来，创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张东荪也早就感觉到十月革命对中国和对全世界的巨大影响，从1919年1月起，便连续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研究预防“过激主义”的方法。但是，张东荪研究的许多预防设想，不仅未能阻挡住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而且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传播开来。这时，他也把自己伪装成“社会主义者”，高谈起“社会主义”来。1919年9月，张东荪、俞颂华等人用新学会名义，出版了《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标榜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他们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鼓吹自己的主张。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帽子上堆满了美妙动人的概念原则，将真正社会主义全部的阶级性、科学性和战斗性阉割得干干净净，于是他们谈论的“社会主义”就成为一个空洞含混、毫无生气，连剥削阶级也可以接受的文化思想和道德原则了。

张东荪等人竭力否认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他还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他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矛头是指向它的理论基础——唯物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定命主义”，然后加以否定。他们大肆宣扬新康德主义，妄图把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理

论当作“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来蒙蔽中国读者。当时正在德国的张君勱，拿刚刚借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之手扑灭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德国作范例，推销所谓德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俄国式的革命。这一切说明了他们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

正像胡适借吹捧杜威来贩卖实用主义一样，张东荪等也需要一位洋学者来装点门面，他们选中了继杜威来华讲学之后的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罗素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公开反对战争，并因此而两度入狱。大战结束后，他从战争的灾难看到资本主义的危机，积极倡导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它们的出路。抱着这种观点，1920年5月他随英国工人代表团访问苏俄。苏俄的现实不合他的口味，他成为一个“失望的游客”，回国后发表了许多攻击和诬蔑苏维埃政权的言论，获得各国反动派的青睐。于是他1920年10月来华，次年7月离去，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讲演。他讲演的内容中影响较大的是他对中国的所谓“忠告”。他主张：改良中国的方法，暂时不要搞社会主义，而应当先开发中国的财源；中国的教育应该从平民教育入手，使人民的知识增高，到那时再采用社会主义；若未到那种程度，像今日俄国大多数人民知识未发达，一旦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不免于失败。张东荪等对罗素的这个“忠告”奉为至宝，并借此攻击马克思主义，掀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罗素的谬论遭到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进步文化界的批评。当时《新青年》、《晨报》副刊详细转载了英文《苏俄》杂志的几篇批评罗素的文章，驳斥了他对苏俄的诬蔑，揭露了他的“和平主义”的虚伪性。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也批评了罗素在长沙的讲演，表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和俄国的道路。



陈独秀也写信给罗素，指责他的言论。《共产党》月刊明确指出：罗素来中国是由于中国的政客们想利用他出出风头，以扩张党势。在中国进步文化界的批评下，罗素不得不怀着“失望”的心情离开了中国。

张东荪和罗素等人的谬论，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日益蓬勃发展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面前所产生的本能恐惧以及妄想加以抵制的企图。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刊物《东方杂志》和《太平洋》杂志，以及由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掌握的新文化宣传刊物《新潮》，都表示了重重的忧虑和深深的恐惧，并研究如何应付社会主义的革命潮流。

但是，这些忧虑、畏惧和筹划应付等等，都无法阻挡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潮流对中国的影响。

在五四期间，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热心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幻想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认为这不失为救中国的一种好办法。他们反映了中国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埋头子学术研究，有的人在自己从事的学术领域也取得一些成绩，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反动控制和残酷掠夺下，他们的救国愿望却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实现。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自辛亥革命失败后，虽然仍保持着坚强的革命斗志和信念，但一时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他们还迷恋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不断在护法和恢复国会问题上，依靠南方和西南的军阀势力，同北洋军阀进行斗争。他们的政治纲领依然是旧的三民主义——旧的民主主义。这和五四时期人民大

众要求反帝反封建的呼声相比,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那时的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提出反对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这种旧三民主义被人们看成为一面为了夺取政府权力(即为了做官)而临时应用的旗帜,看成为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孙中山一直到护法运动失败后,才逐渐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孙中山受到很大鼓舞,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他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树立了榜样;五四运动使爱国青年和全国思想界空前活跃,影响极大。于是,他得出结论:中国国民党要取得革命成功,必须在思想上有所变化。当护法运动失败,他被迫离开广州来到上海后,即注意创办刊物,宣传革命的理论 and 主张。在他的指导下,戴季陶、沈玄庐等于1919年6月创办了《星期评论》;稍后他又直接领导出版了《建设》月刊;早在1915年创刊的中华革命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也在此时创办了《觉悟》副刊。这些刊物都积极参加了当时社会改造的讨论,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张。

《星期评论》在当时是以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而出名的。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形成了自己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并在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提出了民生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十月革命的胜利,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他热烈地同情苏俄,对列宁怀着极大的敬意。1918年他曾致电苏俄表示祝贺。《民国日报》也一直以友好态度介绍苏俄情况,《民国日报》和《星期评论》对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

言都有热烈的反应,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观点,和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原则区别的,他们只能从民主主义和民族平等的角度来看待和观察十月革命。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一直坚持自己的旧三民主义,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并认为三民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于中国。他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幻想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通过阶级调和来消灭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他也没有承认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这些观点在《星期评论》和《建设》上都有明显的反映。至于《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则由于《觉悟》编辑部与上海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有密切联系,所以在后者的影响下,逐渐把《觉悟》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从1920年起,《觉悟》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日益明确,同年底已经基本上肯定中国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改造的指导思想,知识分子应当到劳动人民群众中去。特别是它的文章比较短小,常常是通过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讨论,反映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到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最后终于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的转变过程,效果和影响都是很好的。

《星期评论》的主要撰稿人戴季陶、胡汉民、沈玄庐等也曾对社会主义和劳动问题进行过一些研究。他们从十月革命后的世界革命和工人运动高潮,特别是从中国工人的“六三”罢工运动中,感到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抬头,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看到这对资产阶级是一个“隐患”。因此,他们把自己打

扮成工人运动的同情支持者和工人利益的代言人,企图控制正在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使之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发展。在该刊物第3号的《访孙先生谈话》一文中,戴季陶赤裸裸地说明了自己的企图,他想拼命地调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此来麻痹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缓和阶级斗争。因此,《星期评论》将中国的工人运动限制在缩短工时、提高待遇、限制童工、男女同酬、组织工会自由等经济要求上,劝告他们不可带政治色彩。当然,戴季陶等人的调和改良,没有也不可能阻挡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星期评论》上大量登载世界工人运动和中国劳动运动情况的资料,倒在客观上起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作用。

戴季陶、胡汉民等实际上是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在他们的文章中虽加上了一些似乎是提倡社会主义和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却竭力回避和阻挠中国人民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而要中国人民走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

孙中山曾亲自拟定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后来编为《建国方略》第二部分:《物质建设》),发表在《建设》杂志上。这个计划也是贯彻他的民生主义的具体方案,规定了应当由国家经营的交通、冶金、开矿、水利、森林和大规模农垦等事业的发展规划。这个按照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精神制定的计划,表现了孙中山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的工业国的伟大理想,表现了他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也暴露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孙中山提出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是要各国用世界大战后过剩的生产力(指战时的机器、战时的生产组织与熟练的技工)来帮助中国开发实业。他

认为,如果各国的投资主要用于发展交通、水利、商港以及供以上部门使用的钢铁工业、农矿、森林等方面,那么,中国就会成为吸收经济的大海洋,不但能销售本国产品,也可以销售外国商品,而且各个工业国家,凡是资本有余的,中国能尽数吸收,结果世界上的商战可以永不复见。这是由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大同的幻想阻止他认识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和不能正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他为了争取外国人的同情和支持,特地用英文写成这一计划的原稿,以便在外国报纸上发表,并直接寄给外国的“名人”。《建设》在连载这一计划时,也陆续发表了一些外国人的复函,《建设》第一卷第1期上发表的美国商业部长的复信,就说明帝国主义者是根本不会支持的,他提出如何清付投资债务与利息等问题,因而他主张限制这一计划。这再一次证明:唯利是图的帝国主义者,是绝不会为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大同”等抛出一个铜子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要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终归是空中楼阁的幻想。抱有这种幻想的人们不可能找到拯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正确道路。

另外,当时北洋军阀反动政府为了追随国际帝国主义抵制十月革命的影响,敌视新生的苏联苏维埃政权,不仅和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军事协定,抵制而且一再电令中苏边界的驻军严加防范“过激主义”的传入,监视由苏联归国的华工。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们更加紧了镇压活动,多次发布命令,张贴告示,查禁“过激主义的鼓吹”,并派出密探侦缉“过激派”的活动。还有那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官僚、政客和封建余孽,也给宣传和鼓吹新思想的人戴上所谓“过激党”的帽子,用尽了“洪水猛兽”、“共产公妻”、“异端邪

说”之类的恶毒字眼来攻击信仰和宣传社会主义的进步人士和刊物。五四运动后不久,反动政府就以种种罪名,先后查封了《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浙江新潮》、《全国学生联合会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新社会》、《人道》、《新湖南》、《工读》、《醒世周刊》等进步刊物。1920年3月,北洋军阀反动政府又通令查禁83种所谓“过激派传播物”,其中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列宁事略》等。

反动派对新思想的攻击、诬蔑和镇压,遭到了先进人士的坚决反抗。李大钊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等文章中,猛烈抨击了反动派的诬蔑和迫害。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同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

## (二)四次大论战

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同胡适派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同研究系政客们的伪“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三次大论战。通过斗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传播,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3年,曾发生过一次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之间的争论,即科学与玄学的争论,他们在一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上都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因此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对这场争论也做了评价,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论点。以下是这四次大论战的简要情况:

### 1. 问题与主义之争

新文化运动阵营中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首先站出来公开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胡适在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时,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声言。十月革命后,当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先进分子中开始传播,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的胜利》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渐感到不安。他在1919年初连续发表了《不朽》和《实用主义》两文,公开揭起了实用主义的旗号,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在陈独秀被捕和李大钊被迫离京,他独揽了《每周评论》的编辑权后,改变了这一刊物的方向,更换了版式,取消了反映当时政治斗争的战斗文章和评论,删掉了《国内大事述评》和《国际大事述评》两栏,并以26、27两期的全部篇幅刊载“杜威演讲录”,大肆宣扬实用主义。在7月出版的31期上,抛出了他自己的“政治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在反对“空谈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提倡“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幌子下,反对社会革命,公开向马克思主义者发起了挑战。

李大钊读了胡适的这篇文章后,出于革命者的敏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立即写了著名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坚决的驳斥。他与胡适的文章针锋相对,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并且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能够在中国实现的,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做工具去打倒资本主义,在我们这个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社会主义做工具,去驱逐这一班官僚强盗。

李大钊驳斥了胡适把主义与问题割裂开来的手法,指出两者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两者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不能因为反动派的诬蔑和迫害,或者无耻政客假冒社会主义牌号,就放弃主义的

宣传。

李大钊还明确坚持中国问题应当根本解决的革命主张。他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阐述了经济制度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基础，并以十月革命为例说明：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而今则全部解决了。李大钊在中国要不要传播马克思主义，要不要进行革命的根本改造两个要害问题上，回答了实用主义的挑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传播。

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后，胡适又连续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自我辩解。这时他抛开了隐晦的手法，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

1920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明新文化运动发生和发展的根源，着重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有力地批判了胡适之流企图限制新文化运动的范围并把它纳入改良主义道路的妄想。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开始了公开的分裂。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积极地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新青年》编辑部迁往上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更加旗帜鲜明地宣传社会主义。胡适对此大为不满，连续写信给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攻击《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周刊的汉译本，要求把《新青年》迁回北京出版，并发表宣言“声明不谈政治”，否则就提出要《新青年》停办。他的这些无理要求，遭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的坚决反对与驳斥而未能实现。从此，胡适就从新文化运动中分裂出去了。在当时的许多



社团和刊物中，围绕着“主义”问题的争论，差不多都经历了这一分化过程。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右翼分子实际上接受了反动的国家主义，并组织了青年党，公开进行反共宣传，投入反动阵营的怀抱。

问题与主义之争，说明了新文化运动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在五四运动冲击下，已向人们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走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道路，还是走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妥协投降的改良主义道路。区分两者的关键就在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否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指导中国革命。在这场争论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进攻，并明确自己的立场，宣布自己的信仰，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传播。

## 2.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报刊上宣传和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苏俄列宁政府两次对华宣言，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更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向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相结合。这种形势使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得不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次争论是由反动的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发动的。还在五四运动前后，研究系分子就已经开始研究在中国预防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他们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积极贩卖西方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改良主义与修正主义思潮，但是这些都未能得逞。

于是他们就丢掉了“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公开鼓吹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宣传社会主义，反对进行社会主义运动。

张东荪等人是配合着罗素来华讲学挑起这场斗争的。罗素在华的讲演中，除了攻击十月革命、宣扬资本帝国主义、鼓吹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等外，他还特地谈到所谓“中国人到自由之路”的问题。他宣扬中国实业不发达，因而没有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在罗素的眼里，中国连他们所宣扬的伪“社会主义”也没有资格实行。张东荪发表的文章和讲话，实际上也是主张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却故意回避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还时而装作赞成社会主义的模样。他就是用这种虚伪手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社会主义运动的。

张东荪的讲话和文章一发表，立即受到进步舆论的指责。《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连续发表《评张东荪的“又一教训”》和《再评张东荪的“又一教训”》两文，上海《正报》也发表文章予以驳斥。陈独秀也连续发出给罗素和张东荪的两封信，对他们的谬论严加谴责，并将这些文章、信件连同张东荪的文章编辑在一起，题名《社会主义讨论》，发表在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8卷4号上，发动人们进行广泛的讨论和批判。

讨论展开后，参加者越来越多。张东荪等人除继续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短文为自己辩护外，还在他们主办的《改造》月刊上连续发表长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他们的反动谬论。他们还把矛头指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上。

张东荪完全抹杀了工农群众在中国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后，就把所谓“财阀”绅商阶级（即资产阶级）抬了出来，认为只有依靠这

个阶级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医治中国的“贫乏病”。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他们虽然为自己描绘了一幅发展资本主义的美妙图画，却没有也不可能去实现，最后不得不乞求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张东荪就殷切期望中国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军阀都可以“蜕化为财阀”，成为新兴的“绅商阶级”，并乞求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开发实业。如果照张东荪等人这样一套谬论发展下去，中国的前途绝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而是不折不扣的半封建半殖民主义。

当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达、陈独秀、李大钊、何孟雄、蔡和森、毛泽东等均先后发表重要文章予以驳斥。这些批判文章首先驳斥了张东荪等歪曲中国社会现状、诬蔑工农群众的谬论。有的批判文章运用具体材料，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指出农民中蕴藏着强大的革命潜力，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应当占有重要位置。

批判文章还着重驳斥了张东荪等人所谓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富国富民的谎言。他们指出，在国际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要想在中国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来竟存于世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根据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

批判文章还彻底揭穿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冒充社会主义的阶级调和等等改良主义货色。李达指出：只有联合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猛烈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权力，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一切资本和权利，将一切重要的生产资料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蔡和森也揭露张东荪等人宣扬的“社会主义”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与无产阶级的社会

革命毫无共同之处。

这场论战前后持续达一年之久，张东荪等人在被揭露批判后，只好求救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他主张研究中国的“同业公会”。但这立即受到进步舆论的驳斥。《新青年》指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这是自欺欺人的伪善者。此后，张东荪等人不得不抛掉“社会主义”的假面具，而公开投到反动派的阵营里去了。

这场论战除在报刊上进行外，当时一些进步社团内部也进行着类似的争论。例如1920年下半年，在新民学会会员中展开了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的热烈辩论。辩论先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中开始的，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人认为：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十月革命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并要先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但以萧子升为代表的少数人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的方法，并倾向于无政府式——普鲁东式——的“新”式革命。这两派都写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复信表示坚决支持蔡和森的意见，反对萧子升的主张。毛泽东还多次组织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讨论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赞成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当时在欧洲进行革命活动的周恩来，也关注并积极参加了这场争论。他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能接受那流毒西方的资本主义。各种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在欧美也已暴露了它

的无能。他驳斥了张东荪之流主张的由资本家开发实业的谬论。他还批判了改良主义的种种幻想,强调指出: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 3.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列宁曾深刻地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圈子。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

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俄罗斯人民的光辉榜样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在中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无政府主义思潮流传颇广。五四运动前后,他们在冲击封建思想和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中,曾起过一定程度的作用,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和刊物有所发展,无政府主义思潮随之继续泛滥。但由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论战中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深入传播时,无政府主义就日益暴露了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区声白等,将攻击的主要矛头针对马克思主义。至此,无政府主义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已不可避免了。

1920年2月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奋斗》第2号,公开打出

了《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谈政治》一文，明确地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批判了无政府主义。1920年11月，《共产党》月刊出版，刊物第1号至第5号具有社论性质的“短言”栏中，都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其他文章也都集中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并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以书信往来进行了三次辩论。为此，陈独秀在《新青年》9卷4号上开辟“讨论无政府主义”一栏，将这些信件予以公布。

无政府主义者最主要的是集中攻击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还极力鼓吹绝对平均主义，要求绝对自由，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他们丝毫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外，他们把平等曲解为绝对平均主义，因而在生产上反对任何集中，反对有计划的生产。在分配上，他们攻击和反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会生产力还未充分发展、产品还不十分丰富的情况下，主张立即实行按需分配，并以此指责布尔什维克革命不彻底。

无政府主义是以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的，因而它疯狂地宣扬极端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他们反对任何集中，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少数服从多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得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内有两派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以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去做，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种种谬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着重驳斥

了他们空谈“自由”、“正义”，而反对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抽象地反对一切强权的高调，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就不会成功。因为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除，非一时的暴动所能完成，至少要有比较长期的压制，要实行这种压制，必须将政权夺到无产阶级手中。因此共产主义者公开主张在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可能彻底，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实现。

批判文章也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生产和分配的谬论。他们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行不通的，这是完全站在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来看待自由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同样也在一些学校、社团和留学生中进行着。1920年间，蔡和森、王若飞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发起组织工学互助社时，就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争论。蔡和森在与毛泽东的通信中，也谈到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并着重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1922年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时，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更加尖锐。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出版了《工余》杂志，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诬蔑和攻击。旅欧支部出版的《少年》月刊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周恩来在《少年》上发表文章，批判了《工余》散布的种种谬论。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曾对无政府主义发生过兴趣或受到它的影响，但在进一步了解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

参加了实际革命斗争以后,就很快地抛弃了这种思想影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也曾进行过工人运动,如湖南劳工工会的创始人黄爱、庞人铨,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组织的劳工会不主张进行政治斗争,将经济斗争看得高于一切。为此,毛泽东在开展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时,曾对劳工会做了许多工作。在他的积极帮助和教育下,黄爱、庞人铨以及劳工会的多数成员都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容易受到貌似革命实质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使自己的革命热情走上错误的道路,因而马克思主义者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中不断取得的胜利,就帮助并团结了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走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使共产主义者的队伍更加纯洁,在思想理论上逐步提高,战斗力日益增强。

#### 4. 科学与玄学的争论

1923年,发生过一次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即科学派和玄学派)之间的争论,这场争论不仅在学术界,而且逐渐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和震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大部分都去过欧美,有的曾在西方留学,对西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他们的观点均受西方哲学家的影响,因此,这场争论也是中外文化思想交流中不容忽视的一页。

这场争论是在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勱、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玄学派之间进行的。

1923年2月,张君勱在清华大学作了《人生观》的讲演。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玄学与科学》一文,对张君勱展开了批评。于是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就开始了。“科学与玄学



的论战”又称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场论战的焦点起初是：玄学派认为科学再发达也解决不了人生观，科学派则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如果争论的内容仅仅限于人生观问题，限于学术性问题，那么，这场论战是不会引起社会上的注意的。但他们在论战中涉及到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而涉及到的一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问题，都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因而引起共产党人的注意。为了抵制和削弱他们的错误论点造成的影响，反对他们的政治主张，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这场论战也作了评论，对他们的一些荒谬和错误的论点进行了批判。

参加这场论战的所谓科学派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实际上科学与玄学这两派都属于唯心主义者，只是不同流派之间的论战。但是，由于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武器对他们进行了评论和批判，于是扩大了这场论战的影响。对这场论战进行评论和批判的陈独秀、瞿秋白等人都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参与论战的代表人物如胡适、梁启超等，当时在群众中也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同时在论战中涉及到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題，又是当时群众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因此这场论战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这场论战，双方都论述到中国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科学派主张用“全盘西化”走西方国家的道路；玄学派主张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维护旧政权，自上而下地改造，在发展工业上可以用西方国家的办法，但西方文化断不可取，一定要保持东方文化。他们的所谓东方文化，即孔孟之道再加宋明理学家程颐、朱熹提倡的理学。于是，这两派在相互责骂、相互攻击中逐渐暴露出他们的目的都是主

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不能听任他们用谬误的论点来麻痹群众、瓦解群众的斗志,因此给予评论、加以批判是理所当然的。

这场论战实际上是中外文化思想交流的反映。1921年出版的梁漱溟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被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后来的历史学家视为梁启超1919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一文和张君勱1923年所作《人生观》演讲的中介。许多人认为,梁漱溟的书、梁启超的文章和张君勱的演讲,一起构成了对新文化运动保守主义反应的浪潮。《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的几个月,就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和评论,一位西方传教士甚至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摘要。所以,这场论战既是中外文化相互冲击的产物,它又增进了中外文化界的相互了解。

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有一定的时代和历史背景。

从国际上看,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萧条,失业率很高,生活大幅度下降,罢工风潮此起彼伏,困难重重难以解脱;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社会党在一些国家的议会占了最大优势,形成了近代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面对这样的形势,人们找原因,寻出路。于是,各种各样的主张和思潮都纷纷出现。一些人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产生了怀疑,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于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随之出现。

在国内,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美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就是各帝

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具体表现。会议签订的所谓九国公约,实际上就是各帝国主义共同侵略中国的一个强盗协定。这样,使我国又重新回到若干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国内的封建军阀也在不同的帝国主义指使下,不断进行军阀战争。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的结果,使中国人民备受其苦,自然激起爱国知识分子寻求中国出路的更加迫切的愿望。一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受到十月革命影响的青年,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农革命运动日益发展,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了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大量发表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苏联的文章。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开办了上海大学,共产党人张太雷、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和肖楚女等都在该校任课,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这样就在思想文化战线上逐步确立和加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使思想领域更加活跃。以上就是这场论战发生的时代和历史背景。

下面介绍一下双方在论战中的主要论点。

论战伊始,张君勱在《清华周报》上发表了他的《人生观》讲演,宣传主观唯心主义,被人们称为“玄学鬼”。他认为人生观的特点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论理的、分析的、受因果律所支配的和相同的。因此,人生观就是漫无是非真伪的标准,无论科学如何发达,人生观问题的解决也决非科学所能为力。

张君勱对人生观的这些看法,实际就是宣扬意志万能、意志决定一切,否认人的意志是客观物质的反映,否认自然界和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当然科学不能简单地代替人生观,然而,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必须要以对客观世界有科学认识为基础。

张君勱的“自由意志”人生观,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他反对唯物主义。张君勱还进一步发挥梁启超的精神文明和东方文明的观点,规定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特点和内容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他认为:自孔孟以至宋明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的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的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其结果为物质文明,张君勱和梁启超都认为东方文明历来胜过西方文明。他们这样抬高精神文明和东方文明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复遭到新文化运动猛烈批判的“孔孟之道”的神圣地位。

张君勱的各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宣传,是为他的政治主张准备理论基础的。他主张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附庸。这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道路!从这些谬论中,即可看出张君勱之所以用人生观做文章的动机和目的。

张君勱的人生观讲演是1923年2月发表的,其实他的意见和主张在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里就已经提出了。这本书是梁启超等人在游历欧洲时陆续写成的,1920年3月在上海《时事新报》上陆续发表,后来收入《饮冰室合集》的节录仍有11万字左右。这是中国人对欧洲战后第一篇身历其境的观察和评论,书的内容以评论为主,由欧洲而联系中国。梁启超在这本书中继续坚持改良主义,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持否定态度,直到他的晚年,仍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

以上各点说明: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就是唯心主义者内

部的一场混战。正如进步刊物《文化批判》第二期(1928年2月15日)彭康撰写的《科学与人生观》一文中所指出的：“玄学鬼”张君勱、“科学神”丁文江一直到吴稚晖，都没有区别，只是蛇蝎一篓，你撞我，我冲你。但是，他们共同攻击的真正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陈独秀、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论战双方的唯心主义观点都进行了一定的批判。陈独秀指出：玄学派对于科学何以不能支配人生观的问题只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所谓“科学派”对于科学何以能支配人生观的问题却一个证据也没举出来。

陈独秀针对唯心主义否认自然界和社会都存在客观规律的论点说：“自然界及社会都有它的实际现象，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是客观存在，人们承认与否与它毫无关系。”陈独秀还特别指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预料资本主义必由发达而崩坏，崩坏后继之者必为社会主义。”

陈独秀认为，张君勱对人生观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并且明确指出：种种不同的人生态度，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找不出哪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

陈独秀对张君勱“思想者事实之母”的唯心主义命题，也进行了批判。他说：第一，先有了物质世界这个事实；第二，才有能思想的人这个事实；第三，又有了所思想的对象这个事实，然后思想才会发生。

陈独秀指出：丁文江等“科学派”的唯心主义的根底，仍和张君勱走的是一条道路。梁启超、张君勱把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归到

科学与物质文明,固然是十分糊涂,丁文江等把这个责任归到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身上,也离事实太远了。双方都没能正确理解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因为他们离开了物质的即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世界历史现象。陈独秀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瞿秋白在这场论战中写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他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有其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瞿秋白还正确地阐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关系,驳斥了张君勱的唯心主义的自由意志论。他指出:所谓自由就是人们对必然的了解而处置自如。自由不在于想象里能离开自然规律而独立,而是在于探悉其中的因果,并利用这些规律,加以有规划的行动,以达某种目的。这里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种人生观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存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产物。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延续了将近十年,对这场论战的评价和结论,共产主义者已明确给予了回答。它在客观上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促进中外思想文化交流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 第三章

# 外国文艺作品和文艺思潮的引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学革命的兴起。在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一场彻底反对封建旧文学的文学革命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要求。文学革命的兴起,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思想革命的深入发展,而且开创了以白话文为主体,以反映现实人生为主流的现代新型文学。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清末进行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时,曾十分重视文学在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和宣传新思想中的启蒙作用。他们积极提倡“俗文学”,号召进行“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重视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著作)。他们领导的维新变法政治运动虽然很快遭到失败,但他们倡导的思想启蒙和文学改良运动,仍获得蓬勃的发展,特别是创作和翻译小说,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根据当时收藏小说最多的《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所载,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共收进创作小说120种,翻译小说达400种。而实际状况,据阿英估计,创作小说的数字约两倍于涵芬楼所藏,而翻译小说的数字大概两倍于创作小

说。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学改良运动和他们在政治上维新变法的改良运动一样,并不想从根本上去批判和否定封建制度(特别是皇权统治)和封建文化思想,只是要求在一些领域进行一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它没有也不可能动摇封建文化思想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辛亥革命凭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号召,推翻了清朝政府,取消了帝制,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并未实现。相反,强大的封建旧势力、旧传统,陈腐僵化的封建旧文化不仅仍以各种新形式继续维护其统治地位,甚至对革命进行反攻、复辟、倒算。

辛亥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使中国一些先进的、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深刻地感受到新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向挂着儒家思想招牌的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思想发动了猛烈的冲击。急剧发展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兴起,一场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运动便蓬勃开展起来。正如世界上——特别是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成长发展的规律一样,资本主义要求国家的统一,要求语言文字的统一,要求人民群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要求文字和口语相接近。中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兴起的。

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这两篇发难文章,可说是文学革命的最初纲领,包括了文学革命从内容到形式两个方面的改革要求,在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



反响。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真正显示文学革命实绩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石。同月,《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标志着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在文坛正宗地位的斗争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接着,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进步刊物,差不多都使用白话文。白话文的巨大影响还波及到政治、教育、语言文字等领域,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取得了全面性的胜利。

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他们像对待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政治思想一样,明确认识到,在反对封建旧文学中,需要通过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来创建新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文学革命期间,出现了空前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热潮。它对中国新文学的兴起和发展,起了积极的先锋促进作用。

《新青年》开创了现代翻译文学的事业。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新潮》、《少年中国》、《晨报》副刊等,几乎都重视并致力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随后出现的专门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未名社、新月社、语丝社、沉钟社等,以及它们主办的文艺刊物,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差不多同样重视。他们团结、组织和培养了一大批翻译工作者(据统计五四时期出现的翻译工作者近200人),使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呈现出丰富多彩和繁荣昌盛的局面。

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有着与晚清翻译文学截然不同的鲜明特点。首先是翻译文学有着明确的目的,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是为了反对封建旧文学、旧道德,是从感时忧国、改造民族灵魂、改造社会

的目的出发,来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他们十分重视选择和介绍欧洲进步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批判了清末民初竞相译介侦探、黑幕、言情小说的弊端。特别是他们针对当时中国的国情,着重对俄国文学和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翻译介绍。这期间,俄国的以及欧洲各国、日本、印度的一些文学名著,都比较有系统地被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新文学,无论从思想倾向、结构和表现手法,都广泛地接受了这些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的积极影响。欧洲的进步文学,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的文学作品,哺育了我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

---

## 第一节 《新青年》的良好开端

《新青年》月刊是五四时期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它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原则,对外国文学的介绍采取积极的态度。它从一创刊,就开始了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的活动。它的主编陈独秀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又是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倡导者和组织者。随后参加《新青年》活动的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也都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并积极从事这方面的活动。

在《新青年》的第1卷第3、4期上,陈独秀就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介绍了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演变过程,是当时介绍

外国文学的一篇重要论著。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期的倡导文学革命主张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公开号召中国新文学要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的民主主义文学为榜样。

当时也在《新青年》工作的钱玄同在1917年11月20日给胡适的信中指出,中国要创造有价值的文学,“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作”。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谈及要获得创造新文学的方法时指出:“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并强调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不用古文,全用白话文翻译。

《新青年》对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开闢的态度,它率先译载了一些有影响的外国作家的作品,诸如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丹麦的安徒生,波兰的显克微支,瑞典的斯特林堡,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作品。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6期有计划有目的地刊出《易卜生号》,这是在报刊中系统介绍外国作家的开始。在这一专号里,胡适撰写了专门介绍“易卜生主义”的文章。他除了介绍易卜生坚持写实主义,暴露社会 and 家庭的丑恶,批判法律的不近人情、宗教的伪善、道德的欺饰等外,特别强调了易卜生主张个人须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须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的思想。易卜生是19世纪挪威著名的戏剧大师。他创作的戏剧的影响和意义并不限于文学艺术领域,他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特别是妇女解放问题,在思想政治领域中也引起了巨大震动。这个专号出版后,在当时中

国社会和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当时的新人没有一个不狂热地喜欢它,也几乎没有一个刊物不议论它。新文学运动初期在创作上大量出现“问题小说派”、“问题戏剧派”,是与这个影响分不开的。

五四前后,翻译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新青年》首发其端,随之而来的有《新潮》、《每周评论》、《晨报》第7版、《少年中国》、《小说月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新社会》以及《解放与改造》等报刊杂志,都成了发表翻译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据统计,自1918年到1923年仅介绍外国小说作家就达30多个国家的170余人,尽管也涉及到一些英美作家,但主要集中于俄国、法国、日本以及北欧的一些作家,其中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作家显得尤为突出。

五四时期的翻译作品,不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主要思想倾向是体现了民主主义或人道主义精神,是反强暴、反侵略、反奴役的爱国思想和抗争精神,特别是在那些探索人生、揭示人生疾苦、反映青年男女个性解放、描写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们的贫穷和苦难、表现亡国人民的屈辱和反抗以及反战等作品中更为突出。这些既符合五四时代革命斗争的需要,又为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和创作提供了借鉴。

随着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外国各种文艺思潮也大量涌进中国。新文学的兴起,没有新的文学思想的鼓动和指引,是很难战胜封建旧文学传统观念的阻碍而发展前进的。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从西方拿来了这些思想武器,进行新文学的倡导和对旧文

学的破坏。文学进化思想是他们寻找到的重要理论支柱,也是他们心目中较有影响的新文学观念。

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是抱着救亡图存、爱国御侮、思想启蒙、唤醒民众的崇高目的来进行文学革命的,因此,在文学革命的进程中,他们不断地批判“代圣贤立言”的封建文艺观,批判游戏人生、无病呻吟的消遣文学,积极鼓吹表现人生、为了人生反映社会、为社会的现实主义服务的文学观,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主流。

新文学运动初期倡导的这种“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思想,在稍后出现的第一个专门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活动中,得到更进一步完整和深刻的发展,使它成为我国新文化发展前进的主流。

---

## 第二节 鲁迅在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业绩

中国新文学的伟大旗手鲁迅在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中,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他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并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而结束。他曾经说过他开始文学活动,首先不是“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在他的全部文学活动中,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用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他一生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作家的作品,据初步统计有14个国家

100多位作家的作品,总数达300多万字。

1898年,18岁的鲁迅离开故乡到南京洋务新学堂学习。当时正值维新运动的高潮,维新派大力鼓吹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举国上下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热潮。青年鲁迅在思想上开始受到崭新的资产阶级启蒙教育。他和当时要求进步的中国人一样,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他从读严复的《天演论》起,几乎把严复翻译的作品都陆续购读。对于林纾的翻译作品,从《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起,他就随出随买。

1902年,鲁迅抱着救国救民的志愿赴日本留学。开始学医,他以为新的医学可以推动科学运动,可以救国。但不久他认识到,救国救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指国民)的精神。鲁迅从他当时已经和正在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优秀文学中,认识到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学医,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特别是更有意识地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活动。

鲁迅对于外国文学和文化的注意和兴趣是很广泛的。他早期翻译过雨果的《哀生》,高度评价过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易卜生等世界文化名人,也曾热心地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最为他热爱的,还是俄罗斯和东欧诸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以及英国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海涅,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积极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俄罗斯以及苏联作家的作品,在他翻译介绍的外国作家作品中占有特别的地位,在数量上约占他全部翻译作品的一半以上。

鲁迅的青年时代,正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他看到祖国的贫穷、落后,看到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看到人民的愚昧、无知。

他最初是以一个民族革命的志士从事文学活动的,因而他在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时,只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如何使被压迫民族起来反抗压迫者,如何使衰弱的民族从灭亡的边缘脱救出来,如何使落后的民族奋起直追,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就是要借外国的反抗黑暗统治的革命文学力量,推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旧思想、旧文化的斗争,并给中国新文学的成长提供借鉴。

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目的很明确。他是希望从翻译作品中,寻求和中国社会处境相似或相近的东西,以激发读者思想上的共鸣,增进人们改革社会和进行革命的决心。正因为如此,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格外受到鲁迅的注目。因为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他对当时翻译的一些《福尔摩斯包探案》和林琴南译的英国哈葛德写伦敦小姐的缠绵和非洲野蛮古怪的小说等消遣性的小说是不满意的。这也是鲁迅之所以要积极从事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一个原因。

鲁迅在翻译工作中,态度是非常审慎认真的,他主张要忠于原文,他反对一些人提出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观点。鲁迅认为:译得“信而不顺”,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却令人迷误,怎么想也不会懂。他还认为:中文的语法欠精密,词汇也不够,从外文直译开始可能看起来不习惯,但久而久之就感到平常了。例如日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已是极平常的。中文里的“罢工”这一字眼,本不是中文的,然而大家都已懂得

了。这种译法，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输入新的表现手法。一面尽量地输入，一面尽量地消化、吸收。鲁迅的这种翻译态度受到了瞿秋白、许寿裳和茅盾等人的赞赏。鲁迅在晚清时一改任意删改原文而开创的这种翻译新风，给了中国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以重大影响。他自己更是始终遵循，直到他的生命终结前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仍是力求保存原作的锋头。瞿秋白曾热情称赞他翻译的《毁灭》：“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

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战乱频仍、内忧外患、腐败黑暗、民不聊生。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大多是抱着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强烈愿望从事文学活动的。在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中，那种强大的批判旧社会的力量首先吸引着他们；但是，当时西欧各种流派的文学思潮也曾经影响着中国文坛。当时中国文坛主要的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迅为代表，以《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为主要力量的现实主义派；另一派是以郭沫若为代表，以创造社为核心力量的积极浪漫主义派。但不久，创造社的多数同人，也都转向了现实主义“为人生”的文艺主张。中国现实社会的要求，中国先进的文艺界人士改造中国社会的愿望，使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俄罗斯现实主义的文学成为他们最好的借鉴。

1925年，在鲁迅的大力支持和扶助下，一个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为主要任务的文学团体——未名社成立了。它以出版鲁迅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李霁野翻译的俄国作家安特列夫的《往星中》开始了自己的翻译文学活动。未名社的翻译文学活动，是在鲁迅的组织领导和亲自参与下开展起来的。李霁



野后来回忆说：“(鲁迅)先生因为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所以建议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出版社，只印我们自己的译作，稿件由他审阅和编辑。……未名社的工作从此开始了。”它的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等。

未名社成立后，做了许多切切实实的翻译、介绍工作，尤其是在翻译介绍俄国文学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未名社除出版鲁迅的译作外，还先后出版了韦素园译的《黄花集》、《外套》，曹靖华译的《白茶》、《蠢货》、《烟袋》、《第四十一》，李霁野译的《不幸的一群》、《往星中》、《黑假面人》，董秋斯译的《争自由的波浪》，任国桢译的《论苏俄的文艺理论论战》等近20种作品。未名社人数不多，但在鲁迅的领导和支持下，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中，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李霁野在回忆鲁迅的关怀时说：“鲁迅先生对未名社成员的培养，既有言教，又有身教。……他甘心自做泥土，在一片小小的园地(未名社)里，认真负责地培育这些未必能成为好花乔木的文艺嫩苗。他对未名社成员的翻译和创作，在看稿改稿、印刷出版、书面装帧，甚至代销委售方面，费去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先生在看了译稿后，在要斟酌修改的地方，总用小纸条夹记，当面和我们商量改定。”

鲁迅晚年，在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团结和领导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化界，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走狗、帮闲进行了英勇和坚决的斗争。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成为他斗争的武器之一。这时他翻译和介绍的重点，放在

苏联(和其他国家)革命文学作品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方面。

果戈理著的《死魂灵》是鲁迅一生翻译工作中最后的也是最高成就的一部译作。果戈理是鲁迅从青年时期就特别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鲁迅曾评价他“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憎恨反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他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直截了当地用了果戈理的同名作品的篇名《狂人日记》。他是在晚年带病工作的情况下翻译《死魂灵》的，他那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从他给友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说：“《死魂灵》很难译……真好像做苦工，……每译两章，好像生一场病。”《死魂灵》的翻译，不仅是鲁迅翻译工作中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典范。

1934年，在鲁迅和茅盾的组织领导下，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专门刊登翻译文学作品的刊物《译文》，鲁迅亲自编辑它的第一、二、三期（刊物由黄源出名编辑，以下各期鲁迅指点黄源进行编辑）。《译文》从创刊到停刊，虽总共不到三年，却先后发表了100多篇译作，特别是它有重点地出版了几期特刊：“高尔基逝世纪念特刊”、“罗曼·罗兰逝世纪念特刊”和“普希金纪念特刊”等，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鲁迅为《译文》的成长费尽心血，不但自己译稿，还邀请朋友译稿，不仅注意译稿的质量，还十分注意图文并茂，精心地为《译文》选配了许多插图和名贵木刻。

1935年，在鲁迅、蔡元培、茅盾等著名文化人士和作家的支持下，《世界文库》出版问世。这是由郑振铎主编的我国最早的一套有系统有计划地介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大型丛书，计划第一集陆

续刊行 60 到 80 册,每月发刊一册,每册大约 40 万字,包括外国古典及近代和现代各个时期的文学名著近 400 种。这个计划在当时被认为是“全国作家的总动员”、“1935 年的伟大工作”、“文学家技巧上修养的宝库”、“大众的文粮”。鲁迅、蔡元培、茅盾等 100 多人参加了编辑委员会。从 1935 年到 1936 年,它陆续刊行了苏俄、法、英、美、西班牙等 12 个国家的 100 多部文学名著,介绍了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塞万提斯、勃朗特、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司汤达、易卜生、海涅、哈代等名家的名作。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就是应《世界文库》编者之请而翻译的,并首先在《世界文库》丛书上发表。

鲁迅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奠基者,也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奠基者。他在翻译理论的建设 and 实践方面,在培养翻译人才和组织翻译队伍方面,都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鲁迅是主张“拿来主义”的,他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之后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他接着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化。”鲁迅自己正是这样,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逐步提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的战士。

鲁迅的作品也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在不少国家出版,日本出版了《鲁迅全集》,德国等国还有专门研究鲁迅的团体。日本的内山丸造等和鲁迅在许多文化交流活动中结成密友。综上所述,鲁迅在增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极为广泛的。

### 第三节 文学研究会的贡献

文学研究会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最早出现的新的文学团体，1921年4月由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他们将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1号起)作为自己的代用机关报(至1931年12月第22卷第12号止，不计号外，共出132期)，还陆续在上海、北京编辑了《文学旬刊》、《诗》月刊等刊物，出版丛书近百种。此外，在广州、宁波、郑州等地还设分会，在当地也出版刊物。

参加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很多，经过正式登记的会员有172人。除上面提到的发起人外，较重要的有冰心、朱自清、俞平伯、徐志摩等。鲁迅虽然没有正式入会，但他的主张与文学研究会的主张相近，他的作品也常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文学研究会宣言》是由周作人起草的。宣言称这一研究会的宗旨有三：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并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郑振铎起草的《文学研究会简章》，则进一步明确提出：“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建新文学为宗旨。”

文学研究会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

翻译和介绍,并特别强调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读者意义。茅盾认为:介绍西洋文学时,必须有所选择。他说:“凡是好的西洋文学都该介绍。……于理论上是很立得住的,只是不免不全合我们的目的,虽则现在对于‘艺术为艺术呢,艺术为人生’的问题尚没有完全解决,然而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我们是不承认的。西洋最好的文学其属于古代者,现在本地很少有人介绍,姑置不论;便是那属于近代的,如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人生装饰观’的著作,也不是篇篇可以介绍的。王尔德的‘艺术是最高的实体,人生不过是装饰’的思想,不能不说他是和现代精神相反;诸如此类的著作,我们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不太经济的事——于成就新文学运动的目的是不经济的。所以介绍时的选择是第一应得注意的。”

文学研究会十余年中可以说坚持了他们的初衷,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与本身的创作基本上是并重的,并且对于译介的重要意义不断加以强调。随后,《小说月报》又开辟了“文学的研究”栏,从各方面立论,更加强了对外国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研究介绍。它的“海外文坛消息”栏,先后发表了200多条消息,及时报道介绍了外国文坛的动向。

文学研究会的领导人,还经常提醒作家们不要轻视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郑振铎认为,重视创作而轻视翻译的结果,容易使出版界泛滥了无数平庸、无聊的幼稚作品,且容易使读者社会养成了喜欢易读的记账式的下等作品,而不喜欢高尚的纯艺术作品的习惯。他认为,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印度人的一首恋歌,被远在冰岛的冰岛人民读之,也如出于他们自己之口似的同样受感动。北欧

人作的一篇故事,不同种族不同习尚的日本人、中国人读之,也如北欧人一般的能了解、能赞赏。我们已在许多世界的名著里,见到在我们自己的名著里所不能见到的美的情绪、沸腾着的热情、现代人的苦闷,以及伟大的思想了。由此,他得出结论:我们现在应该分些创作的功夫,去注意到世界名著的介绍。

也许,正是由于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大力提倡及许多具有翻译能力的作家们的努力,中国读者有幸在二三十年代就阅读到许多世界著名的文学作品。

在文学研究会这样的重视和倡导下,它所属的刊物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方面,成绩空前,硕果累累。仅以《小说月报》为例,改革后11年中,据粗略统计,其中译载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占该刊内容的24%;外国文学译介,包括中外人士写的评论文章、外国作家及作品介绍、海外文坛消息等,占刊物的17%。二者相加,涉及外国文学内容的约占整个刊物内容的41%。

《小说月报》几乎每期都有关于外国文学的介绍,译载外国文学作品不仅占得篇幅多,而且涉及许多国家和许多作家的作品,据粗略统计,在132期刊物中,它译载过近40个国家的340余位作家的700多篇(或部)作品,其中有中国读者熟悉的俄国作家契诃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普希金,苏联的高尔基,英国的萧伯纳、王尔德、哈代、拜伦、雪莱,法国的莫泊桑、莫里哀、巴尔扎克、司汤达、罗曼·罗兰,日本的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印度的泰戈尔,美国的杰克·伦敦、马克·吐温、辛克莱,匈牙利的裴多菲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些犹太、南非、波希米亚等民族作家的作品。

·1921年9月出版的“俄国文学研究”是《小说月报》的首次号

外。内容有论文 24 篇,译作 29 篇,共 400 多页,约 30 余万字。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的《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以后八年之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共有 187 部,其中俄国的就有 65 部,占 1/3 强。这些作品很多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翻译的。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的耿济之,是我国最早和最著名的一位俄国文学的研究者和介绍者,同时也是一位工作时间最久、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为严肃的俄国文学翻译家。他 1918 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时,就开始练习翻译。1919 年与瞿秋白合译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1920 年与郑振铎合作从俄文翻译了《国际歌》,随后陆续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复活》、《艺术论》、《黑暗之势力》,屠格涅夫的剧本《村中之月》,果戈理的《疯人日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大雷雨》,契诃夫的《侯爵夫人》等。耿济之毕生致力于翻译、介绍和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工作,20 年代初期是他翻译活动最旺盛的时期,在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中,他是以翻译俄国作品特别是翻译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的作品而著称于世的。

1921 年 10 月 10 日,《小说月报》又在第 12 卷第 10 号出版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集中发表了北欧、东欧诸国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鲁迅大力支持它的出版,在上面发表了《近代捷克文学概观》等四篇译文,介绍了捷克、小俄罗斯、芬兰和保加利亚的文学。沈雁冰介绍了芬兰、新犹太、捷克、波兰、亚美尼亚、塞尔维亚等国的文学。

为欢迎泰戈尔来华而编辑出版的“泰戈尔号”(上、下),共译载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的小说、戏剧 12 篇,诗数十首,中外人士的译介文章 17 篇。如王统照的《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现》,

郑振铎《关于泰戈尔研究的四部书》，较全面地介绍了泰戈尔的思想；郑振铎、徐志摩等人还大量翻译了泰戈尔的作品，登在专号上。

1924年4月19日是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逝世100周年。《小说月报》出版了“拜伦纪念号”，刊登纪念文章28篇。郑振铎(署名西谛)在《诗人拜伦的百年祭》中说：我们不唯崇慕他伟大的诗歌，并且崇慕他伟大的豪爽的事迹……他的坦率精神，他的对于个人权威、个人自由的强固不屈的主张与他对于虚伪、庸俗的深恶痛绝。他的作品不久便有了极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注意。

同年4月，该刊第15卷号外为“法国文学研究”专号。1925年8、9月，《小说月报》还出版了“安徒生号”(上、下)。

1926年6月，为纪念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866—1944)60诞辰，《小说月报》出版了“罗曼·罗兰号”。

1927年7月和8月出版的《小说月报》，分别为“现代世界文学号”(上)、(下)，共刊登评论、翻译文章15篇，现代文学杂话和海外文学者会见记共18条，外国作家照片79幅。该专号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美国、日本、斯洛伐克、挪威、瑞典等国家近20年来的文学创作和文艺运动发展情况。

除了出版专号外，在《小说月报》上曾经重点介绍过的外国作家及其作品还有：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德国的霍普德曼，日本的芥川龙之介，法国的莫泊桑，挪威的包以尔。

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对每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进行了评介。



除了《小说月报》外，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文学周报》也出过一些介绍外国文学的专刊。如“安徒生专号”、“世界民间故事专号”、“托尔斯泰百年纪念专号”和“赤俄小说专号”等。

文学研究会编印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1921年至1935年共出版107部，其中大多数是在原刊物登载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除了7部是中国作家写外国的人和事外，其余100部中有翻译作品60部。这一数字进一步说明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对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重视程度及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60部作品，其中俄国和法国的作品占13部。

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大多数是五四文学革命中崭露头角的作家。他们接受过以往的文化教育，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修养；许多人还曾留学过日本或欧美，通晓一种或数种外国语言。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他们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或致力于创作，为我国现代新文学的成长壮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沈雁冰和郑振铎，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并先后出任《小说月报》的主编，他们在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活动中，实际上发挥着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他们为现代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更是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沈雁冰(1896—1981)，笔名茅盾，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译工作。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他一方面在《学生杂志》上发表文章，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开始阅读外国文学，特别是从1919年起广泛搜集俄罗斯文学书籍阅读，这使他思想上逐渐发生重大变化，从而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后来，他在回忆中说：“我们这一代人是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人像

我一样,从魏晋小说、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伸出头来,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者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 19 世纪的俄罗斯的古典文学。”

在关注俄国文学后不久,茅盾就写出了他第一篇论述俄国文学的文章《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他后来在谈到这篇文章时说:“当时正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传到中国,震撼中国各阶层的时刻,……我的这篇文章是试图从文学对社会思潮所起的影响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的一点尝试。”这个探讨虽然没有找出正确的答案,但从中可以看到茅盾对文学的社会作用的高度重视,明确地把文学和社会、政治的变动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这一思想是贯穿在他毕生的文学活动中。

茅盾是以大量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积极探讨新文学的思想理论而踏上中国文坛的。他一开始就自觉地把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改革社会、振兴中华、创建中国新文学等抱负结合起来。根据中国现实社会的需要,博采欧洲文艺思潮的长处,形成了具有自己思想特色的为人生的进化的新文学观。他同文学革命先驱们,特别是同鲁迅采取共同步调,在文学的理论建设上做出了突出的建树,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新文学向前发展。

由于目的明确,茅盾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中很重视选择。五四时期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可贵的是,在这些纷然杂陈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潮面前,茅盾没有菁芜不分,而是对它们作了有鉴别、有分析、有批判的译介,从中选择适合中国所用的加以介绍。

鲁迅曾说过“俄国(革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茅盾也说：“五四以后，外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对于中国文坛发生最大影响的是俄国革命文学。”茅盾首先注意到俄国文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以及为人生的文学思想，在这一点上他和鲁迅是十分接近的。在他们的倡导下，五四时期形成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一派，并成为我国新文学中的主流。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叶绍钧、冰心、王统照等人的初期创作，都受此影响。茅盾还很重视作品的艺术技巧。他认为，西洋人研究文学技术所得到的成绩，我们很可以或者一定要采用。我们用了别人的方法，加上自己的想象、情绪等等，结果可得到自己的好的创作。在这个意义上看来，翻译就像是手段，由这手段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自己的新文学。

介绍外国的文艺思潮，是茅盾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五四期间，他所写的研究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作家和文艺思潮的论文有将近 100 篇(包括“海外文坛消息”)。1920 年，他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就对西欧文学发表了简要的概述：“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梭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表现主义是梅德林开起头来，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主义；先是局促于前人的范围内，后来解放(卢梭是文学解放时代)；注重主观的描写；从主观到客观，又从客观变回主观，却已不是以前的主观；这期间进化的次序不是一步可以上天的。”他对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是用不偏颇的眼光解说它们的意义和本身的价值。尽管茅盾认为，浪漫派或写实派都不是真正理想的新文学，但根据当时中国文学进化的情况，他仍主张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文学。为了解决新文学运动中的问题，为了促进

中国文学的进步和发展,茅盾认真探索了欧洲文艺理论中的各种主义。他介绍过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表象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泰纳的艺术社会学、文学进化论等等。他说:“现在社会人心的迷惘,不是一味药所可医好,我们该同时走几条路。”但这些路都没有走得通的,因为这些文艺理论说到底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武库里的武器。及至1925年,在《论无产阶级艺术》中,茅盾便否定了以上看法,并尖锐地批判了罗曼·罗兰的“民众艺术”,他说:“究其极不过是有产阶级知识界的一种乌托邦思想而已”,“在我们这世界,‘全民众’将成为一个怎样可笑的名词?我们看见的是此一阶级彼一阶级,何尝有不分阶级的全民众?”这表明,他这时对外国文艺思潮的批判、取舍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尤其可贵的是,茅盾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报道和介绍更为重视。他坚信“赤化后的俄国,更能促进艺术的进步,滋培新艺术的产生”。他写过不少文章捍卫苏联社会主义文学,驳斥了一些人对它的诋毁。

1925年以后,茅盾进入创作的丰收阶段。他先后完成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蚀》的创作,30年代写成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名著《子夜》;与此同时,他仍继续积极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广泛,占他整个文学业绩的一半左右。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C. T.)、郭源新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社会改造。1919年12月,《新中国》月刊发表了他翻译的列宁著作《俄罗斯之政党》。1920年夏,他与耿济之共同翻译了《国际歌》歌词。1921年



早的有系统有计划地介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大型丛书,第1卷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他认为:“我们的工作,便是有计划的介绍和整理,将以最便利的方法,呈献世界的文学名著于一般读者之前。”郑振铎为文库第1集草拟的“外国之部”的目录,包括外国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及17、18、19世纪及其后各时期的文学名著近400种。

郑振铎一生的著述颇丰,在中外文化交流事业中的贡献是突出的。1958年10月,他在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殉难。

---

#### 第四节 创造社“异军突起”

创造社是1921年7月由当时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郑伯奇、张资平等人发起组成的。他们在国内都曾接受过封建的传统的文化教育,经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怀着爱国救民的理想,东渡求学。在日本,他们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文学思潮,特别向往于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期的“狂飙运动”。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参加了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活动。

在文学方面,创造社的主导思想是倾向浪漫主义的,它以热情奔放、雄杰伟美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唤起了中国青年反抗黑暗旧势力的激情,给封建旧文学观念以巨大的冲击,被当时中国文坛

誉为“异军突起”的一支新文学力量。

创造社是提倡创造,但比较侧重创作,并以此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他们在文学活动中,不像文学研究会公开宣称翻译与创作并重,甚至强调在新文学创建初期翻译比创作更为重要。但创造社的早期成员,都是在日本攻读理、工、医等学科的留学生,他们都通晓两种或两种以上外文,特别是他们都酷爱文学,对外国文学有强烈的爱好和相当的造诣。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他们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他们除进行创作外,西方文学(特别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中那些引起他们思想共鸣或引起他们极大兴趣的作品,他们也翻译介绍给国内。他们在从事创作的同时,也从事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或者说,正是引起他们兴趣和激动的西方文学作品,促使他们进行文学创作。创造社的发起人和主要代表郭沫若,就是在这期间,在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等人作品的影响下,促成了他的“诗的创作爆发期”,创作出以《女神》为代表的奠定中国新诗基础的大量诗作;而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对歌德的《浮士德》以及《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巨著的翻译。

由于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是倾向浪漫主义的,因此西方一些浪漫主义的文学名著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创造社的翻译活动,虽然不像文学研究会那样有目的和有计划,但在它的成员的积极努力下,成绩仍是显著的。例如,郭沫若 1921 年翻译、1922 年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部作品表现了德国 18 世纪“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它对自然的描绘和歌颂,对纯朴农民和天真儿童的赞美,对个人聪明才智的颂扬,对周围鄙陋环境的唾弃,感情洋溢,又带有个人反抗方式无力的伤感色

彩,正好反映了中国当时社会里觉醒的青年一代,迫切要求从封建桎梏下解脱出来,但又没有找到明确出路的心境,因而受到了青年读者普遍的欢迎,可以说在中国当时的青年中也卷起了一股“维特热”。例如它卷首的诗句——“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差不多当时的青年人都能背诵。出版这本书的上海泰东图书局从1922年到1932年就先后再版15次,以后,上海联合书店又再版7次,现代书店再版10次,可见它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创造社出版部出版的《创造社丛书》、《世界名著选》及《社会科学丛书》中收了很多外国作品。创造社还先后出版过18种刊物,其中最主要的有:《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月刊、《洪水》半月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上海《中华新报》副刊,每月刊行)等。创造社的这些刊物中,常有翻译作品刊载,特别是刊载评论和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的文章,以及讨论和研究翻译的文章。

创造社成员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中,更多的是凭个人的爱好和兴趣,不像文学研究会有比较明确的目的和选择,为此双方在1922年发生了一场论争。这场论争反映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文学团体,由于文学思想倾向不同,因而在对待如何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创造社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思想和实践中,喜欢歌德、海涅、拜伦、雪莱、济慈、惠特曼、雨果、罗曼·罗兰、泰戈尔、王尔德,以及斯宾诺莎、尼采、柏格森等,他们着重翻译介绍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同时也介绍过一些象征派、表现派、未来派的东西。他们翻译和介绍的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表达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



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当时中国反封建的民主斗争,所以也受到读者的欢迎。

在创造社的翻译和创作活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郭沫若。五四时期,他带着奔放的激情,从诗歌领域踏上中国文坛。随后,他杰出的创作实绩使他和鲁迅同时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和鲁迅,各自在不同的领域,都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壮大,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他青少年时期就对文学发生了兴趣,不仅读过《四书》、《五经》和许多中国古典文学著作,并且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学作品。林琴南译的小说,例如哈加德的《迦茵小传》、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使他深受感动,还有《莎氏乐府本事》(林译名为《英国诗人吟进燕语》)也使他很感兴趣。1914年初,郭沫若东渡日本留学,在科学救国的影响下,他放弃了自己的文学爱好,选读了医科。但日本学校教授外语,都选用文学作品做教材,这使他广泛接触到西欧文学、印度文学,并间接地接触到北欧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使他原想放弃的文学兴趣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在国内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终于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郭沫若开始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开始了他的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活动。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1921年出版的,他最早翻译的小说《茵梦湖》也在这一年诞生。从此,他在创作和翻译两个园地中同样地辛勤耕耘。下面是他20年代在翻译园地里的收获:

1921年,出版了德国托斯姆的《茵梦湖》。1922年,出版了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两本书在当时的读者中曾引起极大



1929年5月1日,《创造》季刊在上海出版。



的反响,加上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家和翻译家之一。

1924年,出版了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俄国屠格涅夫的《新时代》。郭沫若翻译河上肇这本书,引起了他自己思想上的极大变化。他当时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说:“我译完此书所得教益殊觉不鲜!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正是在此前后,创造社的老成员们逐渐扬弃了重主观、尚自我的浪漫主义文学观点,而提出了“革命文学”的主张。

1926年,出版了英国雪莱的《雪莱诗选》、高尔斯华绥的剧本《争斗》,爱尔兰作家约翰·沁孤的全部剧作《约翰·沁孤戏剧集》(包括六个剧本),以及德国霍普特曼的《异端》。雪莱是郭沫若青年时代最敬爱的诗人之一。他在写《雪莱的诗·小序》时,又一次谈到他在译雪莱的诗时的心情,他说:“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她的心声,我能和她共鸣,我和她结婚了,我和她合而为一了。她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她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

1927年,出版了《德国诗选》(与成仿吾合译),以及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剧本《法网》和《银匣》。

1928年,出版了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德国尼采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美国辛克莱的《石炭王》,以及《沫若译诗集》(包括印度伽里达诺诗1首,德国歌德诗12首,英国雪莱诗8首,俄国马雅可夫斯基诗3首)。

1929年,出版了美国辛克莱的《屠场》、《新俄诗选》。

1930年,出版了美国辛克莱的《煤油》。

从上列书目看,他的收获真是硕果累累,特别是其中有不少是戏剧作品。据不完全统计,郭沫若翻译的外国戏剧约11部,其中除德国席勒的《华伦斯坦》是1936年出版、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是在1947年出版的以外,其余都是在20年代翻译出版的。

外国戏剧作品对郭沫若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他自己说过,他早期创作的《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湘累》、《孤竹君之二子》等,就是受了歌德《浮士德》的影响而写成的。是他开始把西方“诗剧”这种文学体裁引进中国文坛。40年代,郭沫若有一个戏剧(特别是历史剧)创作的“爆发期”,写出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著名历史剧,这与他曾大量翻译并研究外国戏剧作品是有联系的。在历史剧中,借一段史影表现一个时代;借古人之口,说自己的话的表现方法,已经被他完全溶进了他创作的人物性格、情节和场景中,构成了自然而统一的艺术整体。

在郭沫若的翻译活动中,介绍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近代文学,是他最突出的贡献。他是我国最早、最热心、最全面地翻译介绍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译者,他不仅译了宏篇巨著《浮士德》,还翻译了歌德的许多诗歌、小说和戏剧,其中一些译作曾在中国读者中,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中,产生过很大影响。他也是歌德和德国文学的杰出研究者,对歌德和德国文学向中国读者进行中肯的介绍和评价。

郭沫若认为,凡是进步的文化,都是全人类共有的遗产,都应该正确地吸收。但他自己喜欢选择与时代和与自己思想相吻合的作品来进行翻译。他特别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正确的动机和高

度的责任感；对所翻译介绍的外国作家和作品，要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尤其是对作家所处的环境、时代的潮流，要给以彻底的考察；译者要有高度的思想水平，在语言文学方面要有广博深厚的修养，这样才能有驾驭作品的内容与语言的能力，做好翻译介绍的工作。他甚至提出“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的主张，以此来强调翻译的再创造的过程。他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就是要求自己这样去做的。著名翻译家楼适夷在评论他的译作时曾说：“我们读他的译作常常感到好像在读他自己的创作，似乎根本不存在两国文字的界限，没有移植的痕迹，因为他把原作的精神实质和艺术风格熔铸在自己的笔端，进行了思想与艺术的再创造。”

除郭沫若外，创造社早期成员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穆木天等在翻译文学领域，都有自己的贡献。田汉是我国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较早的译者之一。1922年他就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哈姆雷特》。从此，中国才开始有了以完整的剧本形式介绍莎士比亚戏剧。1924年，他又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个剧本并列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与此同时，他还翻译过英国王尔德的《沙乐美》等外国作家的作品。田汉的译作以剧本为多，特别是他译的《哈姆雷特》，在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穆木天也是早期创造社成员中译作较多的。他从20年代到40年代一直坚持翻译活动。其译作主要有：维洛德拉克的《商船“坚决号”》，法朗士的《蜜蜂》等。

成仿吾早期在创造社的文学活动，是侧重在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方面，他也翻译过不少文学作品，如雪莱的《哀歌》、歌德的《少

年与磨坊的小溪》、海涅的《幻景》；他还和郭沫若一起编译过《德国诗选》。他关于翻译的论述，特别是《论译诗》一文，代表着创造社对翻译的看法和主张。他强调译诗的结果应当是译出来的也是诗，并忠于原著的内容、情绪和诗形。

创造社早期成员中，郁达夫的译作虽然较少，但外国文学对他有过深刻的影响。他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回顾》中说：“和西洋文学的接触开始了，以后就急转直下，从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别国作家的作品上去”，其中他最喜爱的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他还称赞德国 19 世纪末的作家林道，说他的小说简练得非凡，他的小说的结构，同俄国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很像，是一种珠玉似的好作品。1928 年他就翻译并发表了林道的小说《幸福的摆》，郁达夫也翻译并发表了屠格涅夫的著名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珂德》、高尔基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哈夫洛克·埃利斯的《易卜生论》，还出版了他翻译的短篇小说集《小家之伍》。

---

## 第五节 新月派

新月派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因组织新月社，创办《新月》月刊而得名。

从 1923 年的“聚餐会”到 1924 年正式挂出“新月社”的牌子，由《晨报》副刊·诗镌到后期的《新月》月刊和《学文》杂志，历时 11

年。它的成员大都曾是英、美留学生，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和文艺思想、特别是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主张艺术美至高无上。他们的诗作和部分成员倡导的格律诗，在中国新诗形式的探索上，做出了一份贡献。

新月派既是一个文学流派，又是一个带有一定文化倾向的社交团体。

新月社组织很松散，其成员有作家、教授，也有政治界、实业界和金融界人物。其中知名人士有胡适、徐志摩、梁启超、张君勱、徐申如、黄子美、饶孟侃、叶公超、陈源、林语堂、王赓、张歆海、陈博生、余上沅、丁西林、凌叔华、林徽音、陆小曼等。

排练演出泰戈尔的名戏《齐特拉》和接待泰戈尔访华，是新月社成立前的一个重要活动。

1924年4月8日，在北京开了一个庆贺泰戈尔64岁寿辰大会。梁启超任大会主席，胡适致贺词，然后，由徐志摩等几名新月成员演出《齐特拉》。

泰戈尔访华，系徐志摩促成，以北京讲学社的名义发出的邀请。从1924年4月12日至5月19日，泰戈尔一行六人，有他的秘书恩厚之、葛玲姑娘、梵文学者克里达斯·艾格、美术家布斯先生、宗教学教授单先生，先后访问上海、南京、济南、北京、太原。

泰戈尔离华后不久，新月派俱乐部的牌子就正式挂出来了。

新月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文学流派，它在艺术上有其鲜明的特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新月派诗歌的主要艺术特征，就是所谓醇正、暗示、节制。所谓醇正，指艺术的完美，多数新月派诗人还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所谓暗示，这种艺术手段的运用，明显



地借鉴了 19 世纪西方的象征手法。他们的诗作,大都比较讲求意象的象征,而极少直抒胸臆。所谓节制,既包括了梁实秋所说的“想象”的节制,也包括了格律的节制。新月诗人的作品,除了有的长篇叙事诗而外,一般来说,大都写得很洗练,多系抒情小诗。它们一般不作过分的铺陈,着意匡正了新诗发展初期阶段那种过分的自由和散漫的弊端。在这一点上,新月诗人是一个贡献。当然,由于对格律的过分追求,反过来又是一种过分的约束,因而他们的主张不能为后世的诗人们所普遍接受。

新月派诗人众多,仅按陈梦家编的《新月诗选》所列的诗人就有 18 位。徐志摩始终是新月诗派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是这个诗派的主要代表者之一。

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1918 年离开北京大学赴美留学,1920 年转赴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1922 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

徐志摩在短短十年内,写下大量新诗,先后出版了四本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徐志摩自己说过:“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的人。纵观他的诗集,似乎可以这样说,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更多地表现了他对所谓“单纯信仰”的追求,在追求中也不乏具有积极意义的诗篇。不过,思想性不高。而后来的三部诗集,很少有积极意义的诗篇,却充满了“怀疑”和“颓废”的色彩,甚至在他的《秋虫》、《西窗》中诋毁革命文学,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茅盾认为“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的‘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

徐志摩的诗作的主要价值,是在艺术上为新诗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因素。

徐志摩深受英国 19 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使得卞之琳在《徐志摩诗重读志感》中说,徐志摩“的诗思、诗艺没有越出过 19 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徐志摩深受拜伦、雪莱、济慈的影响,徐志摩自己也说他的诗集《志摩的诗》,“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阼的泛滥”。

维多利亚王朝的诗风,在艺术表现上有明显的客观性质。徐志摩的《大帅》、《人变兽》等,都不作直接抒情,而有更多的客观描写成分。

徐志摩同哈代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他在英国会见过哈代,译过哈代的十多首诗,写过《汤麦斯哈代的诗》、《厌世的哈代》。哈代逝世后,他还写过一首题为《哈代》的诗。梁实秋曾以徐志摩的《这年头活着不易》为例,论及徐志摩所受哈代的影响,说:“哈代的小诗常常是一个小小的情节,平平淡淡,在结尾处缀上一个悲观的讽刺。这是哈代独特的作风,志摩颇能得其神韵。”这个论断比较中肯。哈代诗歌中的意象,常取自坟墓、死人、火车站等,徐志摩在这方面也受其影响。

徐志摩在借鉴西欧诗歌的技艺方面,并不生搬硬套。他为使诗歌艺术形式的尽可能完美做出了努力。

他的诗,在章法上比较整齐,并能在整齐中求多样。在体裁和格调上,也是多种多样的。他的诗,注意音组的整齐,韵律铿锵,富有节奏感,注意旋律美,音乐性强。在运用象征手法方面相当高明,很讲究意境美。有时用口语写诗,自然而和谐。他的诗作在艺术上

自成风格,独具匠心,具有借鉴作用。

## 第六节 美术方面

西洋美术(主要是绘画,以下简称“西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始于辛亥革命以后。当时,以教授西画为主的艺术学校纷纷出现,各种绘画社团纷起林立,远涉重洋出国学习西画的青年也越来越多,他们直接或间接受到西画的熏陶,向国内引进和介绍西画的理论和技法,介绍西画的各种流派和画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的西画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反对封建的旧传统、旧势力中,发挥了积极的革命作用。一批接受了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爱国青年画家也希望从西画的理论和实践中,找寻到一条摆脱封建束缚、拯救民族绘画危机的途径。

自清朝以来,中国画坛一直为“四王”(即清初画坛复古派的代表人物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翥)的复古画风所笼罩。当时虽有一些愤世嫉俗的遗民画家如石涛、朱耷、龚贤等与之相抗争,但未能打破复古派在画坛的统治地位。复古派墨守陈规,刻意模仿古人,使画坛呈现出衰败的景象。直至清代后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动荡不安,传统绘画才开始出现转机,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相继脱颖而出,他们广师徐渭、朱耷、李鲜等,强调独创,反对模拟,打破了晚清那种刻意模习、陈陈相因的复古局面,为中国画坛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我国最早出国学习西画的有李铁夫和李叔同。李铁夫 17 岁 (1887 年) 即赴英国伦敦美术学院, 学画 9 年, 其人物绘画曾获英国绘画竞赛第一名。后又入纽约美术学院学习, 于 1916 年加入国际画理学会, 入选作品 21 幅。他多年侨居国外, 曾追随和资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 但对国内画坛影响不大。李叔同 1905 年赴日本东京上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 1910 年学成回国, 在上海主编《太平洋画报》, 并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美术、音乐教师。李叔同对新兴的艺术运动充满了热情, 他是我国油画运动的先行者、将西洋画引进中国的开路先锋。他在美术教学中, 非常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 常以石膏模型、静物及人体写生, 培养了我国第一代的美术师资, 丰子恺、潘天寿、吴梦非、刘质平、李鸿梁等都曾是他的学生。但正当五四运动前夕的 1918 年, 他却突然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 遁入空门, 从而终止了他的艺术活动。但他毕竟为中国早期的新兴的美术和艺术教育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

五四前后中国西画运动的迅猛发展, 主要表现在兴办艺术教育团体的活动达到了高潮, 官办的、私立的艺术学校, 如雨后春笋蓬勃出现。据不完全统计, 到 1930 年以前已有 25 所, 其中比较著名的, 有私立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艺术大学、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中华艺术大学、立达学园美术科、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以及国立的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和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

辛亥革命前, 中国几乎没有专门的美术学校。辛亥革命后, 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他在反对和批判

封建教育的同时,就积极主张和提倡美术教育。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欲以美感教育来改良人的品质,以完成民主革命事业。蔡元培的主张,推动了五四前后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我国有名的三所公立美术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和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都是在他亲手培育下先后创办起来的。在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北大成立了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以及各种艺术的研究团体,并聘请当时社会名家到校施教。1917年底,徐悲鸿到北京后,被他聘为画法研究会导师,随后又保荐徐悲鸿公费赴法留学。1925年,林风眠从法国学成回国,蔡元培推荐他出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聘他为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派他负责筹建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蔡元培还大力支持刘海粟创办的私立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美术学校),并派刘海粟赴欧洲考察美术。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第一所专业美术学校,是1912年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它的创办人之一是当时年仅17岁的刘海粟。在刘海粟起草的办学宣言中宣称:“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奥。”刘海粟对蔡元培倡导的美育主张十分赞赏。1918年,他创办了以研究西洋画技法、色彩学与透视学,介绍西方新兴美术流派为主的《美术》杂志。杂志出版后,受到鲁迅的热情评价。

在上海图画美术院创办之后,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创办了上海艺术大学,唐粹庵(又名义精)、蒋兰圃创办了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颜文梁创办了苏州美术专科学校,陈抱一、丁衍镛创办了中华艺术大学,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创办了立达学园美术科,杨公托、万从木创办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等。在创办美术院校高潮的同

时,各种研究西洋绘画的社团组织也纷纷出现。除徐悲鸿、李毅士、吴法鼎、卫天霖、郑锦等参加活动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外,还有李叔同、柳亚子发起的文美会,乌始光、汪亚尘、俞寄凡、关良等发起的东方画会,颜文梁、扬左甸等发起的苏州画赛会,刘海粟、江小鹤、丁悚、王济远等发起的天马会,陈秋草、潘思同发起的白鹅画会,林风眠、林文铮、李超士、蔡威廉等发起的艺术运动社等。这些艺术学校和西画社团的活动,不仅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新兴美术事业的骨干力量,而且更加广泛地在我国传播了西洋绘画。

五四前后成长起来的中国新兴美术事业的这一批骨干,他们不仅学习并掌握了西洋绘画的理论和技法,而且还不断研究如何振兴中国美术,探索着中国新兴美术发展前进的道路,并在 20—30 年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幼年随父刻苦学画,并曾随父外出流浪,卖画谋生。1915 年,他离开家乡去上海,仍以卖画维持半工半读的生活。在上海,使他有观赏和临摹一些名家收藏的字画碑帖。他曾东渡日本留学半年,使他有广泛接触日本和欧洲的绘画艺术。1917 年底,他来到北京,应蔡元培之邀,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于是他有参观故宫博物院,欣赏大量古代文物珍品,开阔了眼界。当时他受到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北京大学的一些教师讨论救国救民之道和各自的抱负。他曾提出对待我国美术遗产和振兴我国美术的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在他带领画法研究会的学生参观故宫博物院时,他对学生们

说：“艺术应该追随时代向前发展，而固步自封、复古守旧都是大敌。依我看，如何在我国古代绘画的传统上吸取一些西方绘画的优秀技法，用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族绘画，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画家应做的努力。因此，我很希望有机会到欧洲去学习”。在罗瘿公、蔡元培的支持和帮助下，徐悲鸿终于获得公费留法的名额，抱着振兴中国美术的雄心壮志，于1919年3月底启程赴法。

徐悲鸿到巴黎后，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向历史画家弗拉孟、写实画家达仰学习绘画。巴黎各大博物馆的丰富藏品，以及艺术沙龙的各种展品，使他心情激动，他决定暂时不作国画，而专心致志研究观摩油画杰作。他在法国留学八年，学习异常刻苦努力，有时每天上课和作画达10个小时以上。他还曾去柏林两年，向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波夫请教；亦曾去比利时、瑞士、意大利，浏览和临摹古今名作。因此，他的绘画成绩优异。1927年他学成回国时，已有9幅画被法国全国美展选中。

徐悲鸿回国后，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同时积极开展美术创作和社会艺术活动。他曾担任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和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他在教学中，要求严格基本训练，强调素描、默写，使学生能够准确地、生动地描绘对象。他在教学和社会艺术活动中，十分注意发现和培养有绘画才能的青年，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吴作人、傅抱石、滑田友、吕斯白、王临乙等，都是在他的帮助或资助下，才有机会出国留学深造的。

在美术上，徐悲鸿是坚持写实主义道路的，反对过去绘画中的八股公式化，主张师法自然；对西方艺术，他反对形式主义和画商操纵。1929年，国民政府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全国美展，因展览中有

受西方现代派艺术影响的作品，他拒绝参展，并就展品中宣扬形式主义的作品，和徐志摩展开了论战。这次论战是我国西画运动史上第一次公开的不同艺术观点的争论，标志着我国西画运动从创作到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29年9月，在蔡元培的推荐下，徐悲鸿受聘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来到阔别十年的古都。他大胆破格聘请有高深造诣、有革新精神、当时处境十分孤立的老画家齐白石担任北平艺术学院教授，并亲自登门拜请。他的许多改革主张和措施，竟遭到复古保守派十分嚣张地破坏和反对，连聘请齐白石担任教授一事，也引起他们的非难。徐悲鸿只好辞职南归。

1930年，徐悲鸿完成了大幅油画《田横五百士》的创作。这是他回国后不久就开始构思并动手绘制的，内容取材于《史记》。画面突出表现了田横那“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这对当时那些趋炎附势于反动统治的人是无情的贬斥。他随后又构思大幅国画《九方皋》和巨幅油画《徯予后》。《九方皋》取材于《列子》中叙述的一个善于相马的人——九方皋的故事。徐悲鸿是善于画马的，他笔下的马都是奔放不羁，从不戴缰辮的，但这幅画上的这匹黑马却例外地戴上了缰辮。他对人说：“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者制。”《徯予后》取材于《书经》，叙说在夏桀暴虐的统治下，受苦的老百姓盼望商汤大军来解救他们。”这幅画构思和创作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他用此画为人民控诉，为国家呼吁。他创作的这三幅巨画和他的其他一些画作，显示出中国的西画运动以及中国的新兴的美术事业，已取得坚实的成就。



刘海粟(1896—1994),江苏常州人。6岁时就开始学清代画家恽南田的花鸟白描。14岁赴上海,入画家周湘主办的“布景传习所”学画。1912年,他17岁时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即上海美专前身),是我国新兴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19年他曾和陈师曾一起去日本考察美术与教育,出席过日本帝国美术院首次美展,和日本一些画家有过接触,回国后撰写了《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一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逃亡去日本。这次,他应《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在该社作了《石涛与后期印象派》的讲演。他从生活的提炼方式和作品的表现方法等几个方面,论证了石涛在二百多年前就发现了后期印象派塞尚等人后来所探索的奥秘。这篇讲演和他的另一篇论文《石涛的艺术及其艺术论》被译成日文,刊登在《新南画》和《书道画道》杂志上。他结识了日本画家桥本关雪、小室翠云等,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在《朝日新闻》社举办了他的画展。两天时间,展品被观众订购三分之二,有多幅作品被日本皇室购藏。

1929年2月,刘海粟启程赴欧洲考察学习。他在法国过着紧张的学习生活。他还与马蒂斯、毕加索、凡·东根、波纳尔等绘画大师相结识,并交流绘画经验。他参观访问过莫奈、凡·高和高更的故居,参观过几十家美术馆、博物馆和纪念馆。他临摹了许多名作。他自己还勤奋创作,他的作品在1929、1930年被选入巴黎秋季沙龙,并被邀请参加蒂勒里沙龙。1931年6月,巴黎克莱蒙画堂为他举办旅欧近作展览会,巴黎大学教授、汉学家路易·赖鲁阿为画展作序文,称赞刘海粟“是这样的一位中国艺术家,手持西洋画具,没有遗忘远近法,也不造作三分怪异,能在他的画面上,撷取他祖国

传统的精英,达到心与天游的境地”。法国政府用5千法郎购藏了他的《卢森堡之雪》,存放在亦特巴姆美术馆。

刘海粟的绘画注重于个性的发挥,无论是油画或国画都充分地展示着他特有的性格。他喜欢印象派大师莫奈、雷诺阿、西斯莱、塞尚、高更及凡高的作品,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能与他豪放的性格和火热的感情相合拍,他将这些名作的精神融会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他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力。所以在他绘画中那明亮的色调及“力”与“大”的特质,在当时欧洲绘画界是很难有人与他比肩的。

刘海粟20年代初即以油画家知名。20年代以后,他重新对国画发生兴趣。他的国画最擅长于山水。他于1923年所作的水墨画《九溪十八涧》,画面奔放恣肆,豁达壮阔,蹊径别开。郭沫若观后曾欣然题上有名的诗评:“艺术叛徒胆子大,别开蹊径作奇画。落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石涛老人对此应一笑,笑说吾道不孤了。”1924年刘海粟所作《言子墓》一画,则云水高寒,天风萧瑟。大画家吴昌硕老人见了称赞说:“一点不落俗套”,并谓“海粟画此有神助也”。

林风眠(1900—1991)出身于广东梅县的一个山村,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石匠,在民间算是雕刻艺术家。林风眠自幼受到民间艺术的熏陶。五四运动前夕,林风眠同许多到西方寻求真理的青年一样,踏上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航船。1920年,他进入迪戎国立美术学院,开始学习木炭人体素描。以后他转入国立美术学院,并进入最有权威的哥罗孟教授画室,学习素描和油画人体。半年后,一位对东方艺术有相当了解的院长杨西施看了林风眠的画,提醒林风眠:“你不要在这里学得过长,否则你就要变成学院派了”,“你到

巴黎各大博物馆去研究学习吧,尤其是东方博物馆,去学习中国人自己最宝贵而优秀的艺术传统,否则便是一种最大的错误”。院长的这一提示,在林风眠的艺术道路上起了关键作用。从此,他便流连于罗浮宫等大博物馆,从法国近代油画看到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的名作,从希腊的雕刻看到埃及的石雕与绘画,尤其为各博物馆收藏的中国艺术沉醉倾倒。他站在被西洋美术环绕着的另一个方位上体察认识中国的传统艺术,感受特别深刻,对中国画的艺术的理解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1924年,林风眠和道友林文铮、吴大羽、刘既漂、王代之、李金发等人,结成“海外艺术运动社”,以阿波罗精神为艺术旗帜,倡导人文主义思想,开始了向中国封建文化冲击的第一次试验。林风眠在他们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会上,展出了大幅油画《摸索》;在万国工艺博览会上展出了大幅中国画《生之恋》,表达了他对民主、科学和生命力的热切追求。此时,蔡元培正在法国访问,亲自主持了留学生在国外举办的第一个中国美术展览会的开幕式,称赞林风眠的画有哲理、有思想,并向这批青年宣讲他调和东西方艺术和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从此,蔡元培的美学思想便深深地埋入林风眠的心底。

1925年,林风眠回国,被蔡元培委任为国立北京艺专校长。由此,他倾全力于艺术教育与推行中西艺术的结合方面。他举办大规模的归国个人展,为《世界日报》撰文介绍西欧艺术现状和世界绘画名作。他的文章《东西艺术之前途》、《致全国艺术界书》的论述表达了他对国内艺术界的热切期望。1928年他到浙江省刚创办的西湖国立艺专任院长。他所任职的北平艺专和西湖艺专的教学,基本上都是按照他的改革思想进行的。特别是西湖艺专,曾以走新派路

线而闻名于—时，与北方的保守画派形成了抗衡之势。

林风眠的最大贡献是对传统中国画的革新。他从了解宋、元，深究汉、唐，以及研究广大的中国民间艺术入手，又透彻地探讨了西方美术，综合中西之长。他认为：中国自宋朝以后走上了临摹古人之路，画面逐渐枯竭，变成了“幽灵”；而西洋画，自文艺复兴后，发展到19世纪学院派手里，则变成了“木头”。要重新复苏，唯有以大自然为本，去发现、领略其中的本体。他首先在思想上拓开了绘画的境界与视野，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脉络，抛却狭隘的带有地方特色的艺术观。他强调艺术创作的意念，认为意念是艺术创作的主要方面，而形与色无非是发掘这一意念的锄头。所以，他的绘画主调色彩浓郁，线条流畅奔逸，用色用墨浓重大胆，一反近百年来的传统国画中注重于金石书法线条入画的风气。或受印象派的启示，他以视觉性即主观感受打破墨色的概念化；构图摒弃了传统的长条或横卷形式，皆成方形；并毫不留情地填满了传统国画中最讲究的“空白”，整个画面给人以浓重、饱满、厚实之感。他的画风近于壁画与年画，但又有汉画、油画、粉墨乃至瓷器画的韵味。他的绘画使人耳目—新，给画入以很大启迪。他是革新中国画的浪潮中最富有实践成效的创造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及西洋画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衰颓了的中国古老绘画受到巨大冲击，改革中国画的呼声日益强烈。首先提出“美术革命”的是吕徵和陈独秀。吕徵认为，应首先向人们阐明美术的范围与实质、中西美术的变迁与现状，使人们知道美术界的大趋向。陈独秀的观点更为具体鲜明，他认为，“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

写实精神……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不落古人窠臼……”这就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画应该怎样发展的大争论。

当时，强调中国画改革必须吸收西洋画法的“革新派”占有绝对优势。他们中许多人曾留学国外，是新兴美术运动的骨干力量。但在如何改革以及吸收西洋画法中的哪些东西，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中国画在轮廓、明暗、透视、色彩以及材料诸方面皆不及西洋画，主张以西画的方法和材料改革中国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改革的重点不在方法材料，而重在作者的主观情绪。林风眠提出调和东西方艺术，以西方艺术之长，调和吾人内部情绪上的需要，这样实现中国艺术的复兴。倪貽得也认为最重要的却是艺术态度之变更。他们受到中国古老文人画的影响，注重于情绪的表现，即作画的态度上。

“传统派”并不反对革新，只是主张保留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革新。金绍成在主持中国画学研究会期间，力主从唐、宋、元、明古画中研习笔法，以从清末画风中摆脱出来，造成新的中国画风。陈师曾认为，对传统要灵活一些，他在《文人画价值》一文中，对中国传统绘画作了精辟的阐释，并将中西绘画的优缺点进行了对比。他不反对吸取西洋画法，对主张以西画写实法等手段画国画，以及否定传统的理论持批判态度。

在争论中，也有一些人完全否定中国画，或者完全排斥西洋画，但这样的论调很少有人支持。当时，“革新派”在理论上占上风，但还缺少绘画实践，而“传统派”尽管缺乏适应新形势的理论，却有丰富的古老绘画的精华作为支柱，争论不可能获得具体结果。

中国的西画运动,特别是在美术教育中引进西画教育体制,在革新旧国画、发展新国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坚持在国画教学中,要采取一些西画的科学步骤,虽然在北平遭到保守势力的猛烈攻击,但他仍坚持美术教育必须以素描为基础,这就培养了一批从事新国画创作的人才。中国早期的西画家们,早在20年代就有意识地取法中国古老绘画的长处,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王悦之、张弦等油画家在这方面的探索富有成果。一些专事中国画创作的画家,也开始有意识地吸取西方绘画的营养,更加注重对生活的观察,追求一些新的艺术意境,采用一些新的艺术手法。齐白石、张大千、高剑父、赵望云等,就是这方面卓有成效的探索者。正是这样的努力和探索,为中国的绘画艺术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

## 第七节 电影方面

1896年8月11日,西方文明的最新产物——电影,首先在上海徐园的“又一村”放映,开始了电影在中国的传播。这时,距世界公认的电影誕生日——即法国人路易·卢米埃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正式公开放映电影的日子仅八个半月。当时,中国人称这个“新奇的玩意儿”为“西洋影戏”。时隔10年以后,西方电影逐渐在中国沿海和内地许多城市上映,为中国观众熟悉、接受和喜爱。当时放映的影片大多是美国、西班牙、法国片,间或也有英国和德

国片等等；内容由最初的纪录外国舞蹈、风光、魔术以及玩弄噱头逗人发笑的短片，过渡到有一定情节的滑稽片、歌舞片、爱情片、侦探片等。

电影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中国人尝试拍摄电影的念头。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院内，利用日光拍摄了京剧《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片断，完成了我国的第一部戏剧影片。

1912年，在美化洋行广告部任职的张石川被外商聘为拍摄影片的顾问。张石川邀请他在戏剧界的朋友郑正秋一起组织了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摄制影片的全部工作。他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和郑正秋联合导演的《难夫难妻》，内容是讥讽封建买卖婚姻的不合理。演员都是当时演文明戏的艺人，所有女角都由男艺人扮演。这部影片共四本，可放映近一个小时，在当时已算是很长的影片，于1913年9月在新新舞台首次公演。这是我国的第一部故事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胶片来源断绝，亚细亚影戏公司因此停业。

1913年美国影片商布拉斯基返回美国途经香港时，曾和黎民伟组建的华美影片公司合作，摄制了短片《庄子试妻》。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在片中扮演使女一角，成为我国第一位电影女演员。影片试映效果很好，即由布拉斯基带去美国放映，成为输往美国的第一部中国影片。

这个时期，我国也拍摄了一些较有意义的新闻短片。例如：由当时著名的杂技幻术家朱连奎和“美利公司”洋行共同拍摄的《武汉战争》，纪录了武昌新军辛亥起义后进攻和占领汉口、汉阳的几

次战斗；由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的“二次革命”时上海人民声讨袁世凯的《上海战争》等。这些新闻短片后来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1916年，美国胶片输入上海，使因胶片来源断绝而一度停顿了的摄制影片的活动，得以复苏。张石川即和一些人合作创办仙幻影片公司，拍摄了《黑籍冤魂》。由于影片故事动人，并着力揭露出鸦片造成的社会危害，公映后很受欢迎。

这时，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因为一个偶然的机，收买了一位来华拍片失败的美国商人的所有拍摄器材和胶片，于1911年开始兼营起电影事业，并为此专门成立了活动影戏部。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几位董事，如张元济、叶揆初、李拔可、王仙华等，已经看出电影的宣传教育作用，极力支持和赞助拍摄电影。

商务活动影戏部成立后，即开展了风景、时事、教育、古剧、新剧等五类影片的摄制。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古剧片。他们在1920年，邀请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拍摄了身段表情较多的昆曲《春香闹学》和古装歌舞剧《天女散花》。影片拍下了梅兰芳在剧中细微的面部表情和种种优美的舞蹈身段。摄影运用了特写镜头和叠印画面，摄制技术达到当时较高水平。两片在国内和海外放映，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20年代初，上海开始了我国第一批长故事片的摄制，这就是《阎瑞生》、《海誓》和《红粉骷髅》。《红粉骷髅》是根据一本法国侦探小说改编的，完全仿照外国这类影片的路子拍摄。这三部影片的拍摄和放映，结束了中国电影萌芽时期。

1922年前后，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兴旺繁荣的时期，这首先表现在电影制片公司的大量涌现。到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



天津、镇江、无锡、杭州、成都、汉口、厦门、汕头、广州、香港等地，已有电影公司 175 家，其中 141 家都在上海。这些制片公司空有其名而始终未曾拍出影片的不少。在 54 家有影片出品的公司中，拍完一部就关门的“一片公司”也不在少数。这个空前繁荣是畸形的。但在这畸形的现象中，也反映了中国电影不容忽视的发展和进步，有几家公司经营得颇具特色，引人注目，如“明星”、“新民”、“长城”、“神州”、“大中华百合”、“天一”等。这些公司的创办人，大都热心于中国电影事业，他们构成了 20 年代中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并使电影在作为一种赚钱生意的同时，开始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品种而成长，无论在理论、艺术、技术、制作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并培养了一批由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等专业人才组成的初具规模的电影工作者队伍。他们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922 年 3 月，张石川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任矜蘋等组建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星”）。

1923 年初，郑正秋编写出第一部长片正剧《孤儿救祖记》。这是一部家庭伦理故事片，写得有声有色，曲折动人，还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适合当时观众的欣赏习惯。演员的服装和布景摆设都是民族化的，在艺术上摆脱了对西方影片的因袭，颇具民族生活气息。1923 年底试映时，果然令人耳目一新，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影片。有的影片商以 8000 元巨资，购买南洋地区的放映权，明星公司也因此摆脱了经济困境。它的成功逐渐拓开了国产影片的新局面，造成了空前的国产影片运动。

1925 年，明星公司聘请戏剧家洪深为编剧顾问。洪深 1920 年

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参加明星公司的编导活动后，给公司带来了新的活力。他先后编导了《冯大少爷》、《早生贵子》等影片。在导演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写出剧本的人（在此以前拍片时还没有导演的分镜头剧本），他写出的剧本具体规定了字幕、表情、景物，乃至镜头的性质和数目，使导演更加完善和成熟。因而，他在五部片子中，描写了 37 个人物，每个人物能够个性完全独立，各不相混；五部片子的情节，又各有各的结构，没有人云亦云的俗套。这样，明星公司从 20 年代中期开始，声誉日隆，成为当时中国影坛首屈一指的制片公司。

明星公司创建两年后，由美国华侨和从法国回来的留学生创办的“长城画片公司”和“神州影片公司”继之而起。他们在影片制作上独树一帜，堪与明星公司分庭抗礼，被人们称为“长城派”与“神州派”。

1925 年底，由黎民伟在香港创办的民新公司也迁到上海。黎早年曾一度追随孙中山，拍摄过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纪录片。1924 年前后，为广州革命政府拍摄过不少新闻片和有关孙中山的新闻素材。他将这些素材在民新公司综合制成一部大型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共 9 本），其中包括：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情况，孙中山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将军检阅军队的情况，韶关誓师，孙中山发表演说情况（曾灌成蜡片录音随影片放映播放），以及孙中山北上和在北京逝世、出殡及追悼会情况等，被视为孙中山后期革命活动的一部优秀的极其珍贵的历史纪录片。

民新公司迁到上海后，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应聘参加了它的编导工作，并为它起草了一份《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宣言》，其中说

明：宗旨务求其纯正，出品务求其优美，通过影片，将中国固有的超迈的思想、纯洁的道德、敦厚的风俗介绍给欧美和祖国城乡各地。欧阳予倩为民新公司编写了《玉洁冰清》，编导了《三年以后》和《天涯歌女》等影片。他编导的《天涯歌女》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歌女李凌霄这一备受压迫，敢于反抗，很有骨气的妇女形象，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军阀的思想内容。

1925年，“大中华”和“百合”两公司合并改组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它以人才济济和组织有方而闻名，其实力仅次于明星公司。但它制作的影片大多是倾向欧化，或是宣扬封建意识。

与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欧化倾向相反的是邵醉翁弟兄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它标榜的是注意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为此，天一公司找到了以改编古典小说和民间传说、故事来拍摄电影的途径。1926年，它一连拍了《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等六部所谓古装片。

由于这些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加上观众早已厌烦了当时充塞电影市场的“社会片”、“伦理片”、“言情片”，因而天一公司这一批古装片在上海放映后，还是造成了不小的轰动，而且还打开了南洋市场。电影界的投机商人，也竞相拍摄起古装片来，当时在影坛竟掀起一股“古装片热”。

在“古装片热”激起的电影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明星公司的张石川从当时泛滥的武侠小说中找到一个拍摄的题材。他选中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并改编成《火烧红莲寺》进行摄制。他们利用电影特技，又借鉴传统戏法和魔术手法，加上动画技巧，把什么剑光斗法、腾云驾雾等场面搬上银幕。果然，影片在1928年5月正式公

映后,上海滩为之轰动,而且很快影响到全国其他城市,明星公司因此盈利较多,在影坛上又激起一股较“古装片热”更为泛滥的“武侠神怪片热”。

正当“古装片热”和“武侠神怪片热”把上海影坛搅得一片混乱时,在北方建立了庞大电影放映网的罗明佑,为解决国产片源问题,南下上海筹建自己的制片公司。1929年底他与民新公司合作摄制了孙瑜执导的《故都春梦》,放映后,在当时已经开始厌倦武侠神怪片的上海观众中,大受欢迎。1930年,他们又合并了大中华百合公司,正式组成了联华影业制片印刷公司,并提出了“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口号,作为自己的制片方针。接着,仍由孙瑜执导,摄制了他自己编写的《野草闲花》。随后又陆续推出《义雁情鸳》、《恋爱与义务》等片。在孙瑜导演的两部片子中,在分镜头、镜头处理和摄影技巧上确实做了很大努力,采用了象征、对比、叠印、序幕等当时罕见的新颖手法。在《野草闲花》中,还以一首俄罗斯民歌的曲调,填上《寻兄词》,作为影片主题歌,将这首歌灌制成了唱片,放映时随银幕的歌唱画面以唱机放出。联华公司的演员,也完全摆脱了文明戏那种装腔作势、扭捏作态的表演,做到比较朴实自然。它发现和培养了像阮玲玉、金焰等艺术造诣较高的新一代演员。联华公司的这批影片,就这样以其高雅和清新的格调,吸引了大量观众,被视为影坛上崛起的“新派”,与明星公司和天一公司,形成当时影坛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整个20年代,中国的电影事业就是在这样的混乱和曲折中成长起来,并逐渐进入比较成熟的时期。此时电影事业本身也迎来了划时代的变化,从默片时代开始进入有声电影的新时代。

当 20 年代初中国自己摄制影片刚刚起步,特别是在《孤儿救祖记》一片映出成功后,西方的一些商人,急于想在中国这一市场制作影片方面赚钱,1923 年,先后有法国人办的雷玛斯游艺公司拍摄了长故事片《孽海潮》,美国人办的亚美公司拍摄了《碎玉缘》,英国人办的光华影片公司拍摄了《青年镜》等,但由于这些影片质量低劣,引不起观众的兴趣和注意。这些资金不多的公司,很快就宣告关闭。

但是,西方有一家资金充足、实力雄厚的英美烟草公司,也想垄断中国电影事业,控制中国影片放映市场。1924 年,该公司在它的影片部设立了“中国董事部”,拍摄了喜剧短片《一块钱》和神怪片《神僧》。但由于这两部影片百般丑化和污辱中国人民,放映时引起观众极大愤慨,广大中国观众纷纷予以斥责。于是该公司改变策略,用收买影院的手法,威胁年轻的中国电影事业。到 1925 年 4 月,它在上海就收买或新建电影院五家,这些影院坚决拒放中国制作的影片,只放外国影片或外国人摄制的中国影片。“五卅”反帝运动爆发了,英美烟草公司所属各烟厂的工人也参加了斗争,它的影片部的制片活动被迫停止,收买来的影院也都先后停办。但“五卅”运动以后,该公司仍不甘心失败,其影片部又恢复了制片活动,拍了几部极为恶劣的滑稽片和古装片,均遭到观众的坚决抵制和舆论的同声斥责。1927 年,北伐战争发展到长江流域,在人民大革命中,该公司的烟草经营一落千丈,其影片部因无力支持而宣告解散,所有器材也都由天一影片公司收买,它的垄断中国电影事业的图谋终于宣告破产。

与此同时,20 年代年轻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电影,给中国电影

事业带来了新的经验和借鉴。但在中国公开放映的第一部苏联纪录影片是《列宁的葬仪》(当时片名叫《列宁出殡记》)。此片在苏联开始放映后仅一个多月,就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放映。当时曾轰动世界的著名苏联故事片《战舰波特金号》竟不能在中国公开放映,而首次放映是上海南国影剧社受苏联驻上海领事的委托,在1926年为招待上海文化艺术界才放映的。到1931年4月4日,上海才第一次公开放映苏联影片《成吉思汗后代》(即《亚洲风云》或《国魂》)。

这一时期,苏联的一些电影工作者还曾来中国拍片。首批来的是导演史涅伊吉洛夫和摄影师布留姆,他们是随1925年夏开辟的莫斯科至北京的远程航线的飞机来华的,并计划将沿途见闻摄制成一部影片。史涅伊吉洛夫后来回忆说:“我们是第一次拍摄中国,这次拍摄的态度是出于友谊和对这个正在为自由而英勇斗争的国家的无限尊重。……告诉人们关于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到上海时,正是“五卅”惨案不久。他们拍了许多关于工人、青年罢工、示威等斗争情况,还在一些密探的监视下,机智地拍下了停在黄浦江中的帝国主义军舰和外国商船。在广州,他们在革命政府的帮助下,顺利地拍下了革命军和革命政府的活动、黄埔军校的情形、省港大罢工的情景,以及工人、农民的劳动和城市、乡村的生活等。后来他们将这些素材制作成大型纪录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的革命战争》(共6本),1925年底在苏联放映,以后又送往西欧各国放映。

1927年,苏联电影导演雅可夫·布里奥赫也来到上海,拍摄了纪录片《上海纪事》(共5本)。影片纪录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工人纠察队的活动、帝国主义增兵租界及在租界周围赶筑工事的情景,也纪

记录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疯狂大屠杀的情景。影片中深刻的主题、清晰的结构和鲜明的对比，使它具有强烈的“形象化的政论”的色彩。影片于1928年在苏联上映。

## 第四章

# 五四前后赴国外学习的热潮

### 第一节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清朝末年留学生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播西方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建设，都起过重要作用。

最早倡导俭学的，是本世纪初在法国和英国留学的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人。他们当时受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实行一种“苦学”的生活。

辛亥革命后，他们抱着教育兴国、建国的思想，从法国回到国内。1912年初，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齐竺山等15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并设立留法俭学会预备学堂。当时担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此大力支持。同年6月，吴玉章、朱芾宣、黄复生等又发起组织四川俭学会，并在成都设立了留法预备学堂。



留法俭学会成立后,先后招收了三班学生共 80 余人,并于 1912 年 11 月和 1913 年 6 月分两批由陆路经西伯利亚去法国。正当他们计划着在五年内将 3000 名学生分批送往法国时,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遭到失败,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使得留法俭学会被迫完全停止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人力缺乏,先后从中国招去大批穷苦华工(约 15 万人)到法国工厂做工。蔡元培等人将主要工作放在华工的教育上。1915 年夏,在李石曾的协助下,他的豆腐公司的工人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为宗旨。李石曾并以俭学会的名义,接受了法国招工局的招工要求,条件是:华工与法国工人必须同工同酬,招收华工的各工厂必须为华工成立法语补习班,使华工达到以工兼学的目的。1916 年 3 月,在巴黎成立了专门的华工学校,蔡元培、李石曾等以及一些法国人士都曾去讲课。俭学会和勤工俭学会的活动,就成为当时旅法华人教育运动的主要内容。1916 年 6 月,中法两国文化教育界人士共同发起的,以发展中法两国之间的交谊,更加重视法国科学与精神的教育,力图发展中国的道德、知识、经济为宗旨的华法教育会,在巴黎正式成立。它除主持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华工学校等各项事务外,还编辑出版《旅欧杂志》半月刊,其目的是交换旅欧同人的知识,传布西方文化。这些做法在当时的华工和旅法学生中很受欢迎。

1916 年,袁世凯死后,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返回祖国,在北京恢复了留法俭学会和留法预备学校的活动,并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为经办全国赴法勤工俭学的总机关。

1917年到1918年,华法教育会在北京和保定开办了三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1917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进入了它辉煌的高潮。大批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先进青年积极加入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使得这个运动具有了与它当时的倡导者明显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这些青年向往的,已不仅仅是法兰西的文明,不再是只想去学习一些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憧憬的是俄国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借此机会到欧洲这个社会主义发源地去学习新思想,寻求改造黑暗社会、改造中国的方法。

1919年3月17日,由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89人,从上海乘轮船赴法。上海各界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和欢送仪式,新闻界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尔后,各地申请赴法勤工俭学人数达2000多人。

湖南和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当时开展得最好的。到1920年底,湖南赴法勤工俭学人数达到346人(其中新民学会会员18人),成为全国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已经43岁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也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他和葛健豪老人的事迹被新闻界传为美谈。

1918年春,由吴玉章领导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成都和重庆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分会和留法预备学校,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周维桢、冉钧、胡大智等,都是在预备学校毕业后赴法的。陈毅并以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成为四川省30名公费生之一。到1920年底,四川赴法勤工俭学人数已有378人。

由周恩来领导的天津学生爱国运动对留法勤工俭学一事极为关心和支持。1919年,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号召广大青年冲破封建枷锁,学习和研究世界新潮流,从中找出治本的办法。他还组织觉悟社社员,专门讨论过如何实行“亦工亦读”和“到民间去”的问题,并和部分觉悟社战友积极筹备赴法事宜,终于在1920年11月7日乘船赴法。

1919年到1920年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风靡全国,不仅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等省,连内地的山西、陕西、贵州、云南等省,青年学生都踊跃报名参加,成为我国现代又一次出国留学的高潮。据华法教育会1921年名册记载,这两年赴法的勤工俭学学生,总计包括18个省,达到1600多人,其中多系中学生,也有小学生、师范生、大专学校学生、留日学生、教师、工人、农场工作者、商人、各业职员、店员、医生、记者、南洋等地的华侨师生以及任职政界的人士和退伍军人等。

勤工俭学学生到达巴黎后,都由华法教育会接待和安排工作或学习。在开始阶段,他们态度较积极,安排也比较顺利。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有的先读书后工作,有的先工作后读书,有的半工半读。法国接纳他们就读的学校有30多所,以枫丹白露、蒙塔尔纪、沙多居里、刚恩、德勒、默伦、暮岚等公学入学人数最多,女生集中在蒙塔尔纪女校。他们在校主要补习法文。法国各地约有70多家工厂企业接纳了勤工俭学学生,以雷诺汽车工厂、圣太田列夫汽车工厂、勒阿弗尔·施乃德钢铁分厂、圣夏门沙丸冶炼制造厂、圣夏门炼钢厂、克鲁邹·施乃德钢铁总厂人数最多。

在旅法勤工俭学中,有一批人是国内五四运动中的领导骨干

和先进分子。他们到法国后，便在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法华工中组织各种社团，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成立较早、影响较大的社团，有李维汉、李富春等组织的工学世界社和赵世炎、李立三等组织的劳动学会。

工学世界社社章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并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为此，他们搜集了几百种书报杂志和小册子，如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法共的《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事评论》和共产国际出版的《妇女事》、《女权报》等报刊，由社员分头进行翻译和研究。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工学世界通讯社”，经常向国内各报刊发稿。

劳动学会是 1921 年初在巴黎成立的，不久移到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比较集中的克鲁邹。他们比较重视工人运动，赵世炎、李立三等经常利用工余时间，帮助克鲁邹的华工组织工会、华工俱乐部和工人夜校等。

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周恩来是 1920 年底到巴黎的。他一边学习法文，一边进行社会考察。1921 年春，英国 100 多万煤矿工人举行了震动全欧的总罢工。他闻讯后立即奔赴英伦三岛，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从 4 月 13 日到 6 月 20 日连续写出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等 16 篇通讯，向国内人民作了详尽的介绍。

旅法勤工俭学中先进分子的政治倾向引起法国当局的警觉。法国当局不愿看到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政治觉醒，中国的那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投机政客也没有料到，自然更不愿看到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这种政治觉醒。因此，1920年以后，勤工俭学运动进入困难重重的阶段。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波澜迭起，情况大变。这一年里勤工俭学学生备受艰辛，进行了三次大斗争，这就是“二·二八”运动，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进占里昂中法大学。

勤工俭学运动最辉煌的成果，就是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终于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救国救民的真理。1922年6月，统一的旅欧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诞生了。他们的最初领导人是赵世炎、周恩来和李维汉。

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旅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建立后，先后出版了《少年》月刊和《赤光》半月刊，大力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思想理论上取得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反动的国家主义派的胜利，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由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从1923年起，旅欧党团组织就有计划地分批选送骨干成员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到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内革命形势高涨，旅法党团组织就逐渐收缩工作，大批成员经海路或经苏联回国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

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 第二节 赴欧美、日本留学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赴国外留学也有了新的发展。

当时中国派遣留学生都是派往工业发达的国家,除法国外,美国和日本始终是留学生人数比较多的。

### 赴美留学

赴美留学的人数较多,与美国有条件地退还“庚子赔款”有密切联系。

在“庚子赔款”中,美国分得 3200 余万两银子,当时约合 2400 多万美元,利息还在外。美国官方为了维护在华的商业利益和种种权利,决定在形式上退还这笔赔款,但要用于兴办美方需要的文化教育事业,以培养中国青年成为亲美的人才。

1908 年 7 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通知清政府外务部,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中除去所谓“实应赔款”13655492.69 元外,剩下的 10785286.12 元,从 1909 年起至 1940 年止,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但要按照美方的规定将退款用于派遣留学生赴美留学。同年 7 月 14 日,清政府照会美国驻华公使“表示感谢”,并同意将退款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此后,美国政府与清政府商定,利用这笔钱,从 1909 年起的四年内由中国每年派遣

100 名学生赴美留学,从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遣 50 名,直到“赔款”退清。

为了统筹使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具体办理留美学生的选拔和派遣工作,清政府于 1909 年正式设立了专门机构——游美学务处。游美学务处的职责大致有以下几点:①专司选考留美学生;②按与美方协议,筹建游美肄业馆,作为中国青年赴美各高等学校深造的预科;③按与美方议定,在华盛顿建立游美学生监督处,负责管理中国学生。

清政府的游美学务处成立后,经过公开考试,从各地选拔学生赴美留学。自退款第一年起,至辛亥革命止,共派遣了第三批留学生。

这三次派遣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①选拔考试较为严格,考前要进行资格审查。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种,科目较多。以第一次考试为例,初试为国文、英文、中国历史、地理等科,复试科目为物理、化学、代数、几何、三角、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外国地理等。第二次考试的复试,考了数、理、化、西洋史及德文、法文、拉丁文等科目。第三次考试的步骤和方法都与前两次大体相同。由于考试比较严格,录取率很低。第一次报考有 603 人,录取仅 50 名;第二次报考有 400 余人,录取仅 70 人;第三次也只录取了 63 人。三次都没有达到中美双方商定的头五年每年要选派 100 名学生留美的要求。尽管考试较难,淘汰率较高,但是报名应考者仍较多,这是因为当时风气已开,留美成为一种时尚。②只招男生,不招女生。③学生大多来自国内沿海地区的教会学校或省立高等学堂,这与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有关,同时亦与当时留学生考试的科目多项要用英文作答,而恰好教会学校和一些省立高等学堂注重英文

教学,学生外语水平较高有关。④规定留学生年龄在20岁以下,但有一些人将年龄报小,不过这毕竟是少数。

这样的考试虽然不能说绝对公平,但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官僚政客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然而,尽管如此,在第一次考试时,腐败的清廷还是给贵族官僚子弟挤进了3个名额,他们也和47名考取的学生一同搭船赴美留学。

这三次考试一共录取183名留美学生,都是用“庚子赔款”派遣的。此外,地方各省也筹集资金向美国派留学生,各部也用官费选派留美学生,如交通部、外务部、海军部、教育部每年都进行挑选,再加上一些自费留美生和华侨子弟,于是留美学生的人数迅速增加。据统计,1911年去了650多人,和留日学生相比,留美生数量仍居第二位,但学业水平较高,绝大部分进行了严格挑选。自费留美生和华侨子弟,虽然免去了出国考试这一关,但也要经过美方严格的入学考试,如果不付出辛勤的脑力劳动,就休想坐进美国校园内舒适的课堂。这就为专业人才的成批涌现培植了根基。从思想倾向来看,留美生虽不如留日生激烈,但他们同样也不满清廷的腐朽统治,向往科学和民主。

游美学务处的另一项工作是资助已经在美国留学的自费生,目的是使他们能学成回国。从1909年起,游美学务处决定从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中拨出一部分给自费生。条件是:自费生要品行纯正,学业优秀,家境贫寒,并在美国大学本科读二年级。初定先资助50名,每名每年资助美金480元,每次以一年为限,最多不得超过三次。资助的范围虽不算广,但对自费留美这一做法确实是一个切实有力的促进。这也是当时出现留美高潮的一个因素。



游美学务处还以较大力量筹建了留美预备学校——游美肄业馆，所需经费也是从美方退还的“庚子赔款”中支出。目的在于先在国内招考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择其学业品行优良、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留学。以其中的 4/5 学习农、工、商、矿等学科，1/5 学习法、政、财、师范诸学科。

游美肄业馆的学生，除由游美学务处在北京直接招收一部分外，多数是由各省分别招考，但须送京复试合格后方能进馆学习。各省选送的名额是根据该省摊缴的“庚子赔款”的多少而定。例如江苏分摊的款额最多，可选送 26 名；云南、贵州、新疆、甘肃负担的“赔款”少，每省只有 2 名。游美学务处规定，学生入馆后，出路大致有三：①入馆培训三个月后，举行甄别考试，其学、行特优者，派遣赴美游学；②考试及格者，仍留馆继续提高；③确难造就者，即令退学。肄业馆招生时，分高等和中等两科，两科均各学 4 年，中等科毕业后可升入高等科。由于进馆的学生多派出的学生少，而且对派往美国的学生要使他们在美国能顺利就学，还要训练他们适应美国的学制和教学方法，尽快符合选送的条件。为达到此目的，像游美肄业馆这种机构已逐渐不能适应，所以，将肄业馆改为学堂，变成一所正规的留美预备学校。该校于 1911 年 4 月 29 日开学，定名为清华学堂。清华学堂正副监督由游美学务处总办与会办兼任，聘请了 18 名美籍教师，除中文外，所有大学预备课程均由美籍教师担任。此外，尚有几名美籍教师在中、高两科任教。清华学堂在教学上完全照搬美国学校的制度。

辛亥革命爆发后，多数学生因害怕战乱，回家躲避，加之清政府又挪用这一年度退还的“庚子赔款”来弥补军费，清华学堂的经

费来源遂告断绝,学校被迫停课。一些美籍教师乘机或去上海、青岛、大连等地,或去日本、朝鲜旅游观光。

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易名清华学校继续开办,归北洋政府外交部管辖。其主要任务仍然是通过一定时期的留美预备教育,向美国输送一定数量和规格的留学生。1917年10月,由外交部官员10人组成清华学校董事会。1920年2月,又由美国公使馆官员1人与外交部官员2人组成新的董事会。董事会完全把持了校务,清华师生对此十分不满,纷纷要求改组董事会。1928年4月,又组成9人董事会,但美国人仍占1/3。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大学,不再是留美预备学校,学校董事会取消,“庚子赔款”留美教育事宜由教育部统一规划,原来招收的留美预备生至1929年派送完毕。

据上所述,清华学校在中国留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它首开通过公开考试,大批选拔留美预备生的先例,成为中国正规化的留学预备教育的开端。

进入清华学校到搭船赴美要经过八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学习上较为系统而且要求严格、扎实,赴美后很少遇到大的困难,因此,清华留美生在美国享有盛誉。

留美生所学科目与留日生根本不同。留日学生的热门是文科,尤以法政最为时髦,而留美生绝大多数学习理、工、农、医,其中工程技术最吸引人。在留美学生中有一股持久不衰的自然科学热,其原因主要是:一受美国重视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影响。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英国国土小,物产有限,其强盛主要靠在世界范围内经商,以工业产品发展对外贸易;而美国幅员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其强盛主要是发挥其天然优势而大办各种工业、提高科学技

术。中国的地利形势,大致与美国相同而不同于英国。所以,留学美国的学生,多学专门工程。二是受“科学救国”思想的感召。武昌起义后,随着清政府的土崩瓦解和中华民国新政府的建立,大多数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共和已建立,余下的问题主要是建设。搞建设就要学科学,因而很自然地选择那些与建设关系最直接的工程学、农林、医学和物理、化学等。总之,留美学生与20世纪初期的留日学生产生了不同的思想认识。大部分留日生将留学和反清革命联系起来,大部分留美生将留学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导致了主攻科目的不同。

清华学校从1912年到1925年共派出853名留美学生,其中所学学科分类情况大致如下:工程占31.3%,理科占9.9%,商科占11%,农、医占10.5%,文、史、哲占7.2%,政法、教育、新闻占24.5%,军事占2.2%。

根据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1914年的规定,“庚子赔款”留美毕业生回国均须参加各项考试,取得任用资格。截至1924年止,清华学校留美生归国约62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如: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文学家闻一多、梁实秋、李健吾、林庚、钱钟书、吴组缃,电影戏剧家洪深、曹禺、张骏祥、孙瑜,哲学家金岳霖,人口学家马寅初,桥梁专家茅以升,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新闻工作者杨杏佛、罗隆基等。曾经担任大学校长、院长者有39人,他们中有北大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等。另据记载,1936年时,清华全校教师210余人中,有教授90人,他们绝大多数是留学美国的,其中2/3以上是清华派出的留美生。

“庚子赔款”留美毕业生对中国的教育、文化、工业和科学事业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教育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引进了西方进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改革旧学制，建立新学制。我国所实行的“六·三·三·四”学制，就是模仿美国的“六·三·三”制而来的，这个学制从1922年11月公布后，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实行。

对科学事业的影响，较之在教育方面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刻。旧中国的科学技术主要是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其中主要是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引进了原苏联的科学技术体系，但美国的科学技术体系对中国的影响仍然很大。

此外，我国大学众多学科的创建人大部分是留美学生，其中不少人对我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有些已成为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下面名单中有\*者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数学：\* 江泽涵、朱文鑫、陈茂康、赵访熊。

物理学：\* 周培源、\* 叶企孙、\* 朱扬华、\* 黄子卿、吴有训。

化学：\* 侯德榜、\* 杨石先、朱子清、孙承谔、庄长恭。

生物学：秉志、邓叔群、钱崇澍、陈焕镛、郑作新、高士其。

机械工程、建筑：茅以升、梁思成、庄前鼎。

天文、气象学：张钰哲、竺可桢。

水电、地质：张光斗、孟宪民、王庞佑。

航空、飞机制造：周厚坤。

生理学：张锡钧、蔡翘。

此外，还有一批社会科学家。如经济学家陈岱孙、历史学家陈翰笙、人口学家马寅初等。

还有一个客观事实必须肯定,即有一部分留美学生留在美国从事科学或其他工作,成为在美国甚至在国际上颇负盛名的学者,其中不少人对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和帮助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均发挥了很大作用。

### 赴日留学

现代中国留日学生的人数在全部留学生中始终占绝对多数,但具体数字在已见的材料中不尽相同。郭沫若于1955年12月8日在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讲演《中日文化之交流》时曾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最多时,一度曾有2万名。自1896年以来,数十年间,虽然没有精确统计,我推测恐怕前后应有30万人。”据日本实藤惠秀分析:“30万人这个数字似是每年在日留学人数累计的总和,实际在校的留学生数目应该只有总和的 $\frac{1}{3}$ 或 $\frac{1}{4}$ 。”根据实藤惠秀的说法,总数应为75000人至10万人。

据日本兴亚院的调查,中国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总数为11966名。有一种推算法,即实际留学生总数应为毕业生总数的3倍,再加上短期学习的,中国留日学生总数至少是5万人。不过,这是保守的估计,其他数字都比这个数字高。

据日本专门从事中国留日学生工作的日华学会编印的《日华学会20年史》(1939年版)中提到:“40年间,中国青年学生来日留学者无虑10万人。”这个数字与实藤惠秀对郭沫若所谈数字的分析比较接近。

综上所述,说明中国留日学生的人数是相当多的,它必然会促

进中日文化交流,在整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关于赴日本留学的情况以及对中日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在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已有较详细的介绍。但其中主要是介绍清末至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情况,本节着重介绍的是从辛亥革命直到五四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后若干年的情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留学生的人数时多时少,但总的趋势是在减少。为此引起日本官方和民间的重视,力图改变这一趋势。

辛亥革命前夕,留日学生数曾降到低谷。据日方记载:1909年夏天,曾经拥有5所分校,而为留学生教育重镇的日本宏文学院,首先被迫停办。接着1910年3月,经纬学堂也停办了。同年9月,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部亦随之关闭。东斌学堂、法政大学、东洋大学等校的留学生部都相继停办。到1912年,中国留学生人数降到1400人。当然,这与当时辛亥革命爆发,多数学生回国投入革命有关。

1913年至1914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又大量回升到5000人以上,仅次于日俄战争前后的最盛时期。原因是,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政局稍安,自费留学人数有了较大增长;另外,对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很多被派到日本留学,仅黄兴部下的留日学生就一度多达600名。

但是,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后,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正义愤慨和强烈反对,留日学生大举回国。

1916年袁世凯死去,这一年的留日学生人数又逐渐恢复到4000人以上。

1918年,日本为了打击新生的苏联,想与中国共同出兵西伯

利亚,便秘密地寻求中国北洋政府的合作。留日学生得此消息极为愤慨,于是组织救国团回国。

在这以后的几年,由于日本国内物价高涨,中国军阀兼并,各省留学生费用被挪作军费,加上中国青年留学欧美人数逐渐增多等原因,留日学生人数又大为减少。据日方出版的《留东外史补》所载:“1919年的留日学生数目较两三年前减少了八至九成,回国的学生中,十分之三四是为了表示排日,十分之五六是因军阀私斗而丧失留学公费。”据实藤惠秀说:“人数减少了八至九成的说法,恐也过甚其词,不过人数减少却是事实。私立成城学校的《留学生部沿革》也提到:‘……如1906年、1912年、1916年及1919年几次全体学生回国,都予学校经营者打击甚大。’也是证明。”

这一阶段留学生人数总的趋势是在减少,因而引起了日本官方和民间的重视和关心。据实藤惠秀的分析,引起官民重视的原因是:“①二十一条问题以来,两国国交恶化,留日学生都投身反对运动;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百物昂贵,导致留日学生人数激减;③热心于留日教育的人士积极起来。”

1918年3月20日,日本国会高桥本吉等5名议员向第40届国会提出《有关(对)中国人教育的建议案》,该议案除了提请日本政府应效法英美两国在中国办学外,还希望日本改变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待遇。该议案回顾1906、1907年,东京周围曾有中国留日学生1万人以上。当时,高桥刚从美国留学回国,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看到中国留日学生的待遇不如美国,不由得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同年3月23日,关和知等4名议员又另外提出《关于日中文化设施之建议案》。于是议长于3月26日,就这一问题任命头本之

贞、高桥本吉、关和知等 9 名议员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头本之贞任委员会主席。他们经过研究后，向议长提出报告，将上述两案合为一案处理，并提出下列 3 项要求：

1. 对中国留日学生之教育及待遇，提供更便利之设施；
2. 日中两国合作在中国设立高等教育之设施；
3. 为促进在中国修习日语，应谋求适当之方法。

这个新议案终于在议会上通过。这是日本将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问题的议案第一次提交国会上讨论并顺利通过。

1919 年 2 月，长期从事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的日本成城学校留学生部，获得日本实业家望月军四郎 50 万日元的捐款。因为望月访问美国时，目睹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甚为优待，使中国留美学生对美国产生好感，望月在慨叹日本官民忽视中国留日学生之状况后，以个人捐款的方式表达他的一番心意。后来成城学校于 1929 年至 1930 年间在砧村兴建中国留日学生的宿舍和校舍。

1920 年 7 月 19 日，在日本第 43 届国会中，由议员清水留三郎提议，而且得到小山松寿等 33 名议员同意的《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之质询书》中提出：“来日之中华民国留学生回国后，多成为排日论者，而留学美国之回国者多成为亲美论者，对此现状，政府将采取何种方针？”

1921 年 2 月 9 日，在日本第 44 届国会中，清水留三郎又得 30 名议员的同意，提出了相同的质询时附加了一些分析。

在同一届国会中，一宫房治郎议员也提出了《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教育之建议案》，除建议对中国留日学生改善多方面的待遇外，一宫议员说：“过去中国留日学生曾达数万之众，但有渐离我国



而转向欧美的倾向。”他说：美国正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由中国派留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制度，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又积极活动；伦敦亦有开办中英大学的计划；法国亦就招收中国留学生事，正与中国洽商之中。最后，他建议：日本政府也应有相当的措施，使该等学生安心留学于我国，或可更广招徕。这个提案经专责委员会研究后，于同年3月26日在国会获得通过。

在第45届国会中，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校长松本龟次郎及其他6名人士，因得议员一宫房治郎介绍，向国会提交了《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教育经费列入预算，并改善教育设施的请愿书》。该《请愿书》于1922年3月16日得到国会同意。

1923年3月，日本第46届国会又通过了政府建议的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1924年，日本外务省成立了对华文化事业部，该机构负责处理用“庚子赔款”资助包括给中国留学生学费补助等文化事业。但是中国留日学生拒绝接受。在同年6月26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认为这些补助，包藏着日本文化侵略野心。其后，中国全国教育联合会退还“庚子赔款”事宜委员会等11个团体，又发表共同宣言，主张处理日本退还“庚子赔款”的委员会中，中日两国应占有同等数量的委员，委员长要由中国入担任，否则不能接受。此事几经周折，最后达成只对320名留学生每人每月补助70日元学费的协定。

日本原来企图用“庚子赔款”以改善中国留日学生的对日感情，以增加中国留日学生的人数，但是，这个目的始终没有达到。

这一阶段的中国留日学生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早的留日学生是按照中国的洋务派和维新派的

主张和标准选派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清王朝或是在维护帝制的前提下实行改良主义。后来这一阶段的留日学生受革命影响较大，他们要求推翻清王朝，实行共和，推崇科学和民主，对寻求新的救国方案更为迫切。

当然，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思想并非从 1911 年突然产生，而是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开始，逐步发展形成的。最早的革命者是孙中山，他于 1895 年在广东省首次起义失败后，曾三次到日本，组织了同盟会。1907 年曾被日本政府下令离境。1914 年，他再次到日本，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在他周围结集了陈其美、戴天仇、居正、田桐等人。反对清王朝统治的大批流亡者和留日学生也追随他们，群集东京。辛亥革命时，留日学生起了很大作用。

《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以及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都曾经是留日学生。新文学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也都曾留学日本。

这一阶段留日学生中的先进分子还起了传播马列主义的作用。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社会主义思潮，日本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理论与思想的出版物以及各种文章，使留日学生最早接触和接受了马列主义。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有三个渠道：日本，欧洲（主要是法、英、德），苏联。其中，日本是最早的输入渠道。周恩来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

留日回国的中国学生，很多人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都起过领导作用或做出重要贡献。由于人数很多但资料不全，因此，现在列举部分有代表性

的人物：

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

成为中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有沈钧儒、黄炎培、程潜、陈叔通；

成为著名社会活动家的有郭沫若、何香凝、廖承志；

成为著名的有社会影响的文化界人士有鲁迅、成仿吾、田汉、欧阳予倩、周扬、夏衍；

在哲学界、经济界享有盛誉、对中国经济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有艾思奇；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外交方面，特别是对中日文化交流和友好工作方面担任要职和做出重大贡献的有陈辛仁、林林等；

成为中国国民党元老的有关孙中山、廖仲恺、居正、吴稚晖；

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担任要职的有蒋介石、阎锡山、何应钦、张群等；

另外也有少数人由于亲日，最后堕落到背叛国家民族利益成为汉奸的有汪精卫、周佛海等。

综上所述，赴日本留学生的绝大多数，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是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思想、新文化，对中国留日学生都有程度不同的重要影响。尽管日本帝国主义曾对中国发动了野蛮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留日学生的感情，破坏了中日两国间正常的文化交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永远破坏不了中日两国人民数千年来形成的历史性友谊和文化交流的成果。

### 第三节 赴苏联访问和学习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苏联，去苏联访问、学习。

#### 一、关于瞿秋白访问苏联

瞿秋白是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于1920年冬去莫斯科的。他是十月革命胜利后最早去苏联采访的中国记者。此前已经在研究和翻译俄国文学。瞿秋白去莫斯科的任务是了解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实况，研究共产主义，研究俄国共产党，研究俄罗斯文化，报道其真情。到莫斯科后，瞿秋白在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协助安排下，访问了苏维埃党政要人、文化界人士及普通群众，参观了工厂、机关和学校，做了大量社会调查，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寄回国内。他写的通讯涉及俄国革命、政党、经济、外交、社会、生活等很多方面。例如：《苏维埃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劳农政府之经济前途》、《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俄都记闻》、《赤俄之第四年》、《莫斯科之中俄外交》等40多篇通讯，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各个领域进行了系统的报道，使中国人民对俄国革命增加了新的了解。瞿秋白对苏联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常常写专题报道。如1921年3月8日俄国共产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他以《共产主义人间化》为题，连续报道大会的实况。同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

间，瞿秋白与列宁在走廊相遇交谈，列宁介绍几篇关于东方的材料给瞿秋白，还高兴地向瞿秋白解答报告中一些不清楚的问题。瞿秋白以《莫斯科的赤潮》为题报道了大会的实况。

瞿秋白在莫斯科的出现，很快引起苏联政界及各国外交界、新闻界的瞩目。法国经济调查委员兼外交代表史德勒博士和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的通讯记者亚尔史李葛、美国资本家房德列浦及《旅俄六周记》的作者朗塞，都先后与瞿秋白接触，谈论俄国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农民、民族及一些国际问题。

东方大学当时缺少通晓俄汉两种语言的翻译人才，瞿秋白应邀到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除讲授俄文外，还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工作。

瞿秋白 1928 年 7 月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曾过问中山大学发生的一些事，但由于与共产国际某些人的政见不一，1930 年被解职回国。

## 二、关于东方大学

东方大学是在苏联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下设的东方训练班基础上筹建起来的。东方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从苏俄东部各民族的劳动群众中培养政治干部”。但实际上，东方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所国际性学校。它不但招收苏联东部的劳动群众，而且招收中国、朝鲜、日本、印度、伊朗等国旅居俄国的侨民以及来自这些国家的进步青年。1922 年，东方大学专为外国学生设立了外国部。到 1923 年初，外国部已设有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和俄文七个班。到 1924 年年初，东方大学已经成为苏联规模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之一，在校学生一千多人，学生来自 62 个民族，而

来自国外的学生中,中国学生占有较大的比例。

从中国国内去东方大学最早的一批学生是 1927 年 6 月到达莫斯科的,他们当中有肖劲光、任弼时、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刘少奇、彭述之、罗亦农、卜士奇、吴芳、任作民、廖化平、谢文锦等。当时中国在各地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从国内选派学生去东方大学,不可能公开招生直接前去。他们都是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送,先送进上海外国语学社主要学习外文,然后再秘密安排前去苏联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了输送革命青年到苏联学习,于 1920 年 9 月创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1921 年 4 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这批学生中挑选了 20 多名团员分批赴苏学习。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差不多都在这时先后去苏联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1928 年春,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发生了请愿事件,主要是对学校当局的工作有意见。当时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和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访问苏联的向忠发、李震瀛进行调查了解,于 1928 年秋决定把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近 100 人转到中山大学学习。

### 三、关于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是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后进行民主革命的产物,也是苏联支援中国革命运动的一项成果。中山大学的出现形成了赴苏联学习的高潮。现将中山大学的情况介绍如下。

#### 1. 中山大学的由来

1925 年 3 月 12 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幸与世长辞。为了给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骨干,为了纪念这位为联俄联共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伟人,在孙中山逝世以后,苏联

政府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在莫斯科成立一所以孙中山先生命名的培养中国革命人才的学校。当时，担任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哈依尔·鲍罗廷，曾在广州欢送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集会上，阐述过中山大学创设的目的：“孙文大学的目的是要使一般学生了解中山先生的主义，去继续中山先生的工作，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现在许多留学生均不知道改造中国的方法，诸君由苏联回来，可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问题）只有革命的方法可以解决。所以全靠诸君本着革命党人的精神，为革命学说与经验去研究，将来回国后，便可用之以达到解放中国的目的。”

## 2. 学生的来源及学生的情况

中山大学的成立，为渴望奔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学习的有志青年提供了时机，因此，去苏联学习成为一种时尚。不但广大青年踊跃报考，积极争取去苏留学，一些国民党要人也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苏联。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叶楚傖的儿子叶楠、于右任的女儿于秀兰等，都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中山大学在广州第一次招考时，报考的学生有 1030 名，国民党选派的 147 名学生就是从中录选的，其他省市因为不能公开招考，都由共产党从各地秘密选派。

中山大学的学生由于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选派的，所以，学生有来自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各种人员。他们的社会经历、年龄结构、政治态度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差别。

中山大学自 1925 年 9 月成立到 1930 年停办，五年时间共招收四期学生。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国内，也有一部分来自国外的

华工和在法国以及西欧其他国家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来自国内的学生,在国共合作时期招收了两期。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并于同年7月声明断绝与中山大学的关系后,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学生实际上均由中国共产党选派。

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总人数为300余人,其中有邓小平、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伍修权、孙冶方、傅钟、沈志远、王明(陈绍禹)、蒋经国、冯洪国、叶楠、于秀兰、谷正纲、谷正鼎、郑介民、邓文仪等。

第二期学生中有秦邦宪(博古)、杨尚昆、李伯钊、张仲实、盛忠亮(盛岳)、李竹声等。

第三期学生中有一大批是在法国的华工。这期学生中有章汉夫、钱瑛、陈伯达、帅孟奇、陈昌浩等。

第四期学生中有来自东方大学的近100名学生。从国内去的有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如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何叔衡、夏曦、杨之华(瞿秋白夫人)、杨子烈(张国焘夫人)等。由于这些人年纪较大,经验丰富,不适合与年轻人同班学习,所以另编一个“特别班”,当时被戏称为“老头子班”。

以上四期学生总人数有1200余人,由于不断有学生毕业或虽未毕业但离校从事其他工作,所以在校学习的学生一般保持在500名左右。

### 3. 中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中山大学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学制为两年。从第三期开始,由于有大批工人出身的学生入校,他们的文化水平一般较低,需要通过预备班学习语文、算术、常识、地理、历史等基础课程,所以学制改为三年。



中山大学前期主要开设如下课程：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革命运动部分）、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学习《资本论》）、经济地理学、列宁主义（主要学习《论列宁主义基础》）、俄语。军事学习也是一门重要课程。学生还经常去军事院校参观，到兵营去打靶。

中山大学的后期随着办学宗旨的改变，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也相应作了一些改动。后期更注意马列主义教育，提出要利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来充实教学内容。考虑到很多学生回国后要做秘密工作，学校还帮助学生在学习纺纱、织布、木工、电工等专业。

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在苏联人民生活还很困难的时期，苏联政府对中国学生给予了特殊的照顾。

在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陈修良写道：“中山大学的学生在苏联留学期间的全部费用，由苏联方面支付。学生每日三餐都在学校的食堂用膳。每人每月发津贴费 20 卢布，衣服及日用品、洗衣、洗澡、理发、医药费等，均由学校供给，回国时还支付一笔美元，当翻译和有行政职务者另有工资，生活相当舒服。”

绝大多数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学生都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回国后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各种不同程度的贡献。

## 第五章

### “左联”与中外文化交流

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30年代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为核心,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和文化运动,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如果说,五四运动高举了文学革命的大旗,那末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则开辟了中国革命文学的道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质的飞跃,是五四以来文学革命的深入。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培养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文化队伍方面,都做出了辉煌的成就,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左联”为核心的这支队伍撒向全国,成为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革命文学和革命文化运动的中坚。

## 第一节 “左联”与中外文学交流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和领导下的一个文学群众团体，成立于1930年3月，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领导。顾名思义，它的活动应以文学和思想斗争为主，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围剿”，以及“左联”本身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将“左联”看成“半政党”性质的组织（或称之为“第二党”），并像白区地下党一样，花很大的精力去从事政治斗争，如游行示威、举行飞行集会、发传单、贴标语等，以致组织常遭敌人破坏。尽管如此，“左联”在鲁迅、茅盾等主将的领导下，采取在白色恐怖下利用各种合法与非法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化的“反围剿”斗争，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苏联和欧美进步文学作品，特别是创作出一批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使左翼文坛异彩纷呈，也使国民党反动派对“左联”进步文化的“围剿”不断破产。

###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五四时期为开端，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比较广泛的介绍和宣传，则始于“左联”。

从1928年到“左联”成立初期这段时间内，文艺界出现了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的高潮。据当时出版的《新思潮月刊》第2、3期合刊上的粗略统计，当时出版的马克思传记、马克思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就有46种，其他社会科学书籍有150多种。在文艺理论方面，1928年底开始出版陈望道主编的“文

艺理论小丛书”，内收苏联和日本的革命文学论文。翌年5月又陆续出版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其中有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苏联的《文艺政策》，冯雪峰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梅林的《文学评论》等书。鲁迅以后单独译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即《没有地址的信》）。这些著作，大部分都是从日本出版物中翻译的，因为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比较早。留日归来的夏衍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关于妇女问题的经典著作《妇女与社会主义》日文版译成中文，而且还翻译了日本人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和无产阶级作家的著作，如《欧洲文艺思潮论》、柯根的《伟大十年文学》、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和青特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等。

1930年以后，“左联”的机关刊物几乎每一期都有马列主义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介绍、解释的文章。当时直接翻译的马列论文学艺术的基本论著，就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译、《论文化的各种形态（科学、技术、艺术）的不平衡发展》，译名为《艺术形式之社会的前提条件》，载1930年《萌芽月刊》第1期；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法》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的摘译，译名为《马克思论出版的自由与检阅》，载《萌芽月刊》第5期；《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的信》（论现实主义、论巴尔扎克），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论文学·典型创造），载《译文》第1卷第4期；《恩格斯致爱因斯特的信》（论易卜生），载东京质文社的“文艺理论丛书”之六《作家论》；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载《拓荒者》第1卷第2期，译名

为《论新兴文学》；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的镜子》，载《文学新地》创刊号，等等。马列有关文艺的主要论著、言论，当时基本上已翻译介绍到中国。此外，还包括高尔基、拉法格、梅林等的一系列论文，以及从苏联、日本、法国、匈牙利等国文字翻译过来的阐释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专著和文章。

在“左联”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除鲁迅、冯雪峰、周起应（周扬）等外，特别应提到瞿秋白。在我国，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从1931至1933年间，他翻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不少文艺论著，同时还结合中国文艺运动的实际，编写了评价性的文艺论文。这些译著和论著，在1935年瞿秋白牺牲后，由鲁迅编辑成《海上述林》上下两厚册。《海上述林》收有瞿秋白1932年翻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和1933年翻译的《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组文章。这些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其中包括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列宁论托尔斯泰的两篇论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的镜子》、《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此外，他还翻译了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五篇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在论文集《现实》中，他还根据国外有关资料 and 个人的理解，并结合中国文艺运动和理论斗争的需要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早期的“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和《关于左拉》等6篇编译性文章。

瞿秋白编译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加上鲁迅等人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包括了文学与经济基础和其他上层建

筑、文艺与生活、文艺的特征和规律、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文艺批评与鉴赏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主要部分都已翻译过来，它们成为左翼文坛批判文艺理论上的超阶级论和主观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

许多进步书籍的传播，要有为它们服务的出版与发行工作。在这方面，先后有一些为宣传马列主义、出版进步文艺作品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五十年代出版社、作家书屋等，都为完成前述任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二）翻译了大量苏联和欧洲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

“左联”先后办了不少期刊，其中有以机关杂志名义出版的，如《萌芽月刊》（1930年1月创刊）、《拓荒》（1930年1月创刊）、《巴尔底山》（1930年创刊）、《世界文化》月刊（1930年9月创刊）、《前哨》——《文学报导》（1931年创刊）、《北斗》月刊（1931年9月创刊，丁玲主编）、《文学月报》（1932年6月创刊）、《新诗歌》等。这些刊物，由于受到国民党的查禁，寿命都不长，有的仅出一期就夭折了，有的一再改名，寿命最长的《北斗》也仅出了8期7本。

“左联”以其成员的个人名义创办的刊物，有：《无名文艺》（叶紫、陈企霞编，1933年6月创刊）、《文艺》（月刊，周文、刘月编，1933年10月创刊）、《春光》（月刊），庄启东、陈君冶编，1934年1月创刊）、《中华日报》副刊《动向》（聂绀弩编，1934年4月创刊）、《新语林》（半月刊，初为徐懋庸编，后为庄启东编，1934年7月创刊）、《译文》（月刊，初为鲁迅编，后由黄源接编，1934年9月创

刊)、《太白》(半月刊,陈望道主编,1934年9月创刊)、《新小说》(月刊,郑君平即郑伯奇编,1935年2月创刊)。

此外,还有进步人士办的实际上是“左联”的外围刊物,如《文学》,郑振铎、傅东华主编,鲁迅、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郑振铎、茅盾等10人为编委,由生活书店出版。

所有这些刊物,除发表创作、译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外,还刊载苏联和欧洲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如《萌芽月刊》上曾连载鲁迅翻译的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

这些刊物寿命最长、影响最大的要算郑振铎、傅东华出面任主编而由黄源助编的《文学》。该刊创刊于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停刊,前后持续4年时间。《文学》不属于“左联”领导,表面上是商业性刊物,实际上是左翼作家、进步作家驰骋的阵地。《文学》以创作为主,提倡现实主义,但也重视评论和翻译。观点是左倾的,但作者队伍广泛,容纳各方面的人士。编委成员的10人名单,使《文学》对外有了一层保护色。

《文学》创刊号有介绍法国散文家蒙田400周年生辰的纪念专栏,梁宗岱包办了 this 专栏,除有蒙田的评传外,还翻译了蒙田的《论哲学即是学死》。另外,刊登了曹靖华的《绥拉菲莫维支访问记》。绥拉菲莫维支是苏联著名长篇小说《铁流》的作者。

《文学》第2期为屠格涅夫逝世50周年纪念号,登载了大量的有关屠格涅夫的文章。

《文学》第3期的一个特点是正面地介绍苏联文学,这就是登在该期第一篇的周起应(周扬)的论文《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另

外还登了几幅莫斯科演出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的剧照以为配合。《红罂粟花》是苏联用中国革命的题材编排的第一个芭蕾舞剧，是苏联舞剧中的保留节目。

从《文学》第4期起，连载了耿济之翻译的高尔基的剧本《蒲雷曹夫》，曹靖华翻译了阿·托尔斯泰的《十月革命给了我一切》（第4期），狄莫写了《关于苏联文坛组织的消息》（第5期）和介绍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文章《响谷村中的人物》（第6期），以及由吴春迟译出的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底风格问题》（第6期）。

《文学》的稿件不断遭到国民党的大抽大砍，常使杂志脱期。为应付敌人的压迫，决定从第2卷第3期起连出四期专号，一期为翻译专号，一期为创作专号，一期为弱小民族专号，一期为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翻译专号（2卷3期）登载了译文21篇，分属英、法、俄、德、意、日、美、西班牙、比、荷、挪威和丹麦12个国家，包括小说、剧本、诗、散文。《文学》第2卷第5期是“弱小民族专号”，这一期除了胡愈之（署名化鲁）写的一篇论文《现世界弱小民族及其概况》和茅盾的一篇介绍《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署名冯夷）外，全是译文，共有18个弱小民族的短篇小说、诗和散文。以后各期，都有翻译作品，还有讨论翻译问题的文章。

由于《文学》连出两期外国文学专刊，对于作家的翻译热情是一个刺激。在鲁迅的建议下，由鲁迅、茅盾、黎烈文三人发起，出版了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译文》。1934年，《译文》创刊号出版，由于销路很好，创刊号一个月内就再版了4次，所以从第3期开始接受来稿。后来由于编辑署名问题，生活书店不同意继续发行，使



创刊达一年的《译文》停刊。1936年3月,由上海杂志公司接办复刊。《译文》出版期间,在鲁迅建议下编了一套“译文丛书”,由文化出版社出版。

1935年可以说是翻译年。在“翻译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郑振铎主编、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这是30年代继《译文》之后的又一大型介绍世界文学的刊物。它有一半篇幅选载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精品和不易见到的古本、孤本,另一半篇幅介绍外国文学名著。每月出版一巨册,40万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从外表看像一本厚厚的精装书。第一册上开始连载的外国名著有鲁迅译的《死魂灵》,傅东华译的《吉河德先生传》和黎烈文译的《冰岛渔夫》,后来各册上又有李霁野译的《简爱自传》、梵徵译的尼采名著《苏鲁支如此说》等等。至于一册或二册一次登完的名著作品就更多了。郑振铎的出版计划十分庞大,准备出若干集,每集又分若干册,而第一集就预计要出60至80册,这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空前的壮举。可惜这个伟大的计划只实行了一年,仅出了第一集的12册,就由于客观和主观的种种原因而中断了。

鲁迅在《世界文库》上连载的《死魂灵》译文,后出版单行本。周扬发表了评价文章《果戈理的〈死魂灵〉》(载1935年《文学》第4卷第4号),推荐鲁迅的译文。茅盾为《文库》翻译的欧洲著名作家的散文,一年后将它们结集出版,题名为《回忆、书简、杂记》。

在此期间,夏衍译了高尔基的《母亲》,曹靖华译了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谈起曹靖华翻译《铁流》的出版,鲁迅颇费了一番心血。1930年上半年,鲁迅与神州国光社签约,愿为该社组织翻译俄国新文艺作品的书稿,于是选出世界上早有定评的剧本和小说,约

好译者,名之为“现代文艺丛书”,其中有鲁迅约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后神州国光社因怕冒出版左翼作品的风险,遂将稿约作废。但鲁迅仍告曹靖华此书必将设法印出。为了译印出一部比较理想的中文译本,从作者传记、插图直到译注,鲁迅与曹靖华信札往来至少有20次。曹靖华译《铁流》和附录部分后,因开学上课在即,无暇将该书最主要的一篇涅拉陀夫写的长序译出,他写信告诉了鲁迅。当时鲁迅急着将该书印行出版,于是请瞿秋白以最快的速度、最流畅的译笔,译好了两万字的序文。所以,鲁迅说:“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按:即瞿秋白)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读者倘将这和附在卷末的《我怎样写铁流的》都仔细地研读几回,则不但对于本书的理解,就是对于创作、批评理论的理解,也有很大帮助的。”然而,待到这本书排校完毕只待付梓的时候,上海出版界竟没有一个书店敢于出版。怎么办?结果,鲁迅亲自拿出1000元现洋,用一个实际不存在的“三闲书屋”的名义,印了《毁灭》、《铁流》以及德国有名的青年木刻家凯尔·梅菲尔德为《士敏土》作的插图《士敏土之图》等三部书。大约于1931年11月间,在黑暗势力的横压下,通过日本友人的内山书店,将第一版的1000册《铁流》,一点一滴地渗透到读者中间。

此外还有一些著名翻译家,如叶君健、罗稷南、傅雷、朱生豪、丽尼、金人、梅益、林淡秋、董秋斯、戈宝权等,他们都有各种程度的重要贡献。

### (三)“左”倾文艺理论的影响及反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引进

#### 1. 昙花一现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左联”不仅在政治上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而且在文学创作思想上也受到外来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主要是引进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并据以创作了一些口号式的、贴标签式的苍白无力、说教的作品。

创作方法是作家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认识生活、反映生活、塑造形象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创作方法运用得正确与否,对文学能否健康发展关系极大。从“五四”到“左联”,在创作方法上经历过一个“之”字形的曲折道路。

五四时期,创作方法基本上有两股潮流:一是由《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当时亦称“写实主义”),鲁迅主要是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二是创造社倡导的浪漫主义,这可以郭沫若当时的诗歌创作为代表。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后,中国左翼文坛曾受苏联“拉普”(音译,“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简称)和日本“纳普”(音译,“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简称)的影响,提出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口号。这种创作方法既排斥现实主义,又排斥浪漫主义。如“拉普”对俄罗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宣称托尔斯泰、普希金等大师的文学都是贵族文学、资产阶级的文学。他们把浪漫主义笼统看作是唯心的、没落阶级的创作方法。“拉普”的重要成员法捷耶夫的口号是“打倒席勒”,把浪漫主义视为一种反动。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真实反映生活的创作和现实主义的理论遭到批判(如1928年前后

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争论的某些问题),而且连郭沫若本人也曾一度不敢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的作家。

“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比较系统的引进是1931年。何丹仁(冯雪峰)翻译了法捷耶夫的《创作方法论》(载1931年11月20日《北斗》第1卷第2期)。法捷耶夫认为“为了艺术文学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的斗争”,应该反对浪漫主义;作家应该掌握社会的本质,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并辩证地反映它、表现它;要彻底地、无情地剥去假面,“不是个人,而是团体”,“不是一个人,而是阶级”。瞿秋白也译介了法捷耶夫的另一篇论文《打倒席勒》的观点,然后说:“我们应当走上唯物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路线,应当深刻的认识客观的现实,应当抛弃一切自欺欺人的浪漫蒂克而正确反映伟大的斗争,只有这样方才能够真正帮助改造世界的事业。”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作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决议对浪漫主义作了最彻底的否定,明确要求所有左翼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论者”。这不仅指的世界观,也指创作方法,要用这观点来描写。据阳翰笙回忆,“左联”这个决议是贯彻萧三来信(此信传达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哈尔科夫会议精神)而作出的。1932年至1933年,在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在《北斗》举办的“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征文中,在“华汉三部曲”(阳翰笙《地泉》重版本)的几篇序言中,在瞿秋白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多篇论文中,瞿秋白、郑伯奇、穆木天、阳翰笙、田汉等都众口一词地提倡“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并把它视为克服初期普罗文学创作方法中的“革命浪漫蒂克”倾向的法宝;认为只有掌握它,才能实现作家世界观和创作的无产阶级化,才能产生伟大

的作品，才能走到大众化的路上去。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苏联的“拉普”以及“左联”的某些作家，混淆了文艺创作方法与哲学思维方法的区别，将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将认识现实的一般法则和形象地反映现实的艺术法则完全等同起来，过多地、不适当地强调理性作用，对文艺创作这种复杂、精细、带有强烈色彩的个人劳动，发布指令性的、强迫的法律，如此等等，这只能起破坏作用，绝对起不到促进作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对左翼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注重了写人物的阶级性和群像性，忽视了个性的刻画，从而在另一层次产生了公式化、概念化和脸谱化；为了反映生活本质，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表明作者的态度，往往硬给作品拖一条光明的尾巴，塞进一些政治说教，让人物充当自己的代言人。

“左联”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的系统批判，始于周起应（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

周扬的文章是根据苏联吉尔波丁的文章撰写的。这篇文章触及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要害。文章写作的背景是：1932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在清算“拉普”的功绩和错误的同时，重新开展了关于创作方法问题的讨论，批判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新的口号来代替它。

周的文章指出：“拉普”的指导者们不但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如“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这个口号，即其显例），而且在创作批评问题上也犯了这个同样的错误。

他们以“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个抽象的烦琐哲学的公式来作为衡量一切作家的作品的准绳。他们对于一个作品的评价,并不根据那个作品的客观真实性、现实主义和感动力量的多寡,而只是根据作者的主观态度如何,即作者的世界观(思想方法)是否和他们的相合。他们所提出的艺术的方法,简直就是关于创作问题的指令、宪法。结果,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斗争就变成对唯物辩证法的歪曲和与创作实践的脱离,成为对于作者的创造性和幻想的束缚和压迫。从这里,就发生了“拉普”和许多作家之间的隔阂乃至不和。他们对付这些作家,是不惜采取组织的处罚、叱责、命令等手段的。

从周扬的介绍可以看出,在文学创作上,“拉普”将行政命令代替了艺术自身的规律,以世界观代替创作方法,完全否定了艺术活动的特殊性。

周扬的文章从艺术的特殊性、创作活动的规律着眼,阐明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之间的复杂关系。周扬认为作家的世界观在创作中起主导作用是无疑的,但文学艺术作品并不需要作者在作品中直接表露自己的世界观,用恩格斯的话说,这种表露越隐蔽越好。作者的世界观“是通过艺术创造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表现出来的”;这特殊,就是形象思维,“若没形象,艺术就不能存在。单是政治的成熟的程度,理论的成熟的程度,是不能创造出艺术来的”。周扬认为,对作家的创作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作家已形成的世界观,而必须是对客观的现实的认识,是在一定时期他的社会的(阶级的)实践。

周扬总结“拉普”所倡导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实

质是：“虽然艺术的创造是和世界观分不开的，但假如忽视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依存关系看成直线的、单纯的，换句话说，就是把创作方法的问题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问题，却是一个决定的错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口号。这个口号实际上就是哲学上德波林主义在文学方面的反映。德波林派的特征是把特殊和一般分离，把感性和理性分离。这反映在文学方面，就是把辩证法的一般的命题绝对化，而忽视文学的特殊性质。‘拉普’文学上的行政手段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即使是苏联的“拉普”，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更不见他们说哪一部作品就是用这个创作方法写出来的典范作品。它于1929年提出，随着1932年苏共中央解散“拉普”，就开始受到批判，而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所代替。

## 2.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引进

1932年10月29日至11月30日，苏联作家组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大会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取代“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此后，中国左翼文坛上就陆续开始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933年，《艺术新闻》以《苏联文学的新口号》为题，最先向中国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接着，《国际每日文选》刊登了华西里珂夫斯基和吉尔波丁的论文，题目均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同年10月，《现代》3卷6期刊登森堡（任钧）翻译的华西里珂夫斯基的论文《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其中指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于艺术家,就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道路。”作者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强调,“真实性——正是对于一切艺术作品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同月任钧在报上发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质》。同年11月,周起应(周扬)根据吉尔波丁的文章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此后,吴寿迟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是动的,是彻头彻尾地积极的》。关于社会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也需要英雄主义,需要创造的抽象力和幻想,但真实性是基础;为了不使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走入狭隘的道路,必须使它与社会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作家协会,制定了作协章程。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吉尔波丁等在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写真实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此后,中国文坛介绍和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仍有发表,如企(周扬)的《现实的浪漫的》(1934年11月27日《申报·自由谈》),阐述了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了一些短文,介绍现实主义。《杂文》、《质文》也发表过一些有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论文。徐懋庸在《文艺思潮小史》中,列有新现实主义一节,对新现实主义作了概括的解释。

30年代中国文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引进情况,略如上述。综合起来,其观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动态系统,必须从发展中、从运动中、从变革中去看待事物,去反映生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写真实,具体的真实,历史的



真实,革命的真实。真实是有生命力的表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写出本质现象、本质的特征。所谓本质,就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就是阶级斗争,是人物的阶级性、事件的政治性、革命的党派性。要揭露黑暗、抨击腐朽、赞美新生事物、歌颂光明。要写出旧社会旧制度的必然灭亡,新社会新制度的不可战胜;可以写反复和曲折,写丑行和邪行,但总要揭示矛盾运动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但不排斥革命浪漫主义,而且应该包含革命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精神存在于任何社会生活中,你要写真实,要写本质,要塑造典型,就离不开革命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可以使生活耀眼,使人物生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有先进的世界观才能掌握。不懂唯物辩证法,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在眼花缭乱的生活现象面前,就认不清本质,在曲折复杂的运动中,就会六神无主,摸不清方向,就抓不住时代的主要内容以及哪一个阶级决定时代大合唱的主题。

#### (四)左翼作家的作品在国外

“左联”培养和造就了不少知名的作家。其中有20年代已经成名的老一辈作家如鲁迅、茅盾等,他们在左翼文学运动中,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了在国内外有深远影响的不朽作品,如鲁迅的杂文、茅盾的《子夜》等。年轻一代作家有丁玲、张天翼、柔石、殷夫、沙丁、叶紫、萧军等,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注意。

##### 1. 鲁迅的作品在国外

从20年代起,鲁迅的作品(首先是《阿Q正传》),就已经被译成外国文字。鲁迅在1931年3月3日写给《阿Q正传》日文译者山上正义(笔名林守仁)的信中曾这样说:“这个短篇系1921年12

月为一家报纸的‘开心话’栏所写。其后竟然出乎意料地被列为代表作而译成各国语言。”现在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有了《阿Q正传》的译本。

在英文和法文方面：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社乾用英文翻译的《阿Q正传》。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知道，梁社乾从1925年4月就开始和鲁迅通信，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到鲁迅的不少帮助。鲁迅还亲自为他校正了译稿，并指出了译文中两处可以商榷的地方。同年，敬隐渔用法文翻译的《阿Q正传》，经罗曼·罗兰的审阅和介绍，刊载在《欧罗巴》杂志的5月号 and 6月号上，而且得到罗曼·罗兰的高度评价。敬隐渔在1926年1月24日从法国里昂给鲁迅的信中曾说：“鲁迅先生，我不揣冒昧，把尊著《阿Q正传》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先生了。他很称赞。他说：‘《阿Q正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阿Q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罗曼·罗兰先生说要拿去登在他和他的朋友们办的杂志《欧罗巴》上。我译时未求同意，恕罪！……”1929年敬隐渔又将他翻译的《阿Q正传》连同《孔乙己》和《故乡》，收进他编译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在巴黎出版。接着英国人米尔斯又将这本小说从法文转译成英文，改名《阿Q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于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出版。1931年，鲁迅的散文诗《野草》由冯Y·S译成英文，鲁迅为《野草》英译本作了序。1932年北京的法文《北京新闻》社，还用法文出版过一本张奠亚翻译的《鲁迅小说选》。

在日文方面：1927年日本就有人翻译了鲁迅的《故乡》，发表在《大调和》杂志上。1928年井上红梅最先翻译了《阿Q正传》，发

表在《上海日日新闻》上。接着他又翻译了《呐喊》和《彷徨》两本小说集,于1932年用《鲁迅全集》的名义由改造社出版。鲁迅对他的译文是颇有意见的,如鲁迅在1932年11月7日写给增田涉的信中就说:“井上红梅氏翻译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并不同道。但他要译,也无可如何。……然书已译出,只好如此。”1931年是《阿Q正传》的日文译本出版最多的一年,先后有三种之多。先是在我国大连出版的1月号至5月号《满蒙》杂志上,连载了江阳翻译的《阿Q正传》。同年秋日本又出版了两种《阿Q正传》:一种是9月由白杨社出版的松浦珪山的译本,另一种是10月由四六书院出版的林守仁(山上正义的笔名)的译本。山上正义曾这样谈到自己的译本:“前几年在上海时,鲁迅就希望出版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的日文译本,笔者从广州就决心从事这项翻译,并在广州时就已在日本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了这个决心,两方面的愿望偶然不谋而合,于是笔者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完成了这项工作。”鲁迅对井上红梅的译本是不满意的,因此他曾为山上正义的译本作了“严密的校阅”,并亲自为译稿写了85条注释。1935年岩波书店出版了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其中除《故乡》和《孤独者》两篇译文出自佐藤春夫之手,其他各篇都是增田涉所译。同年增田涉在鲁迅亲自讲解和协助下翻译了《中国小说史略》(改名为《支那小说史》),由日本赛梭社(意译为汽笛社)出版。日本改造社在鲁迅逝世不到一周,就通过内山书店,约请茅盾、许广平等,并请内山完造、佐藤春夫共同担任编辑顾问,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合力编辑七大卷《大鲁迅全集》,于1937年出齐。这部全集第一次用日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鲁迅的作品,前两卷为小说作品,

三至五卷为杂文选译，第六卷为《中国小说史略》等，最后一卷为《两地书》、书简以及日记等。

在俄文方面：1929年出版了两种《阿Q正传》，一种是瓦西里耶夫(中文名王希礼)翻译的，由列宁格勒“激流”出版社出版，其中还收有《孔乙己》、《风波》、《故乡》等其他七篇小说。鲁迅曾应王希礼之请写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另一种是鲁迅说过的“无译者名”的，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此“无译者名”的译本，现经研究查明，是苏联的一位中国学者科金所译。

在世界语方面：1930年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了钟宪民翻译的《阿Q正传》的世界语译本。

此外，在鲁迅生前，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呼声》、《中国论坛》、《大陆周刊》、《民众论坛》和法文的《上海日报》，美国出版的《新群众》、《亚洲》杂志、《现代中国》，苏联出版的《国际文学》，日本出版的《改造》杂志，都译载过鲁迅的小说或杂文，其中有《狂人日记》、《药》、《端午节》、《肥皂》等小说和《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答国际文学社问》、《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写在深夜里》等文章。

还应该谈到的，就是从30年代初直到鲁迅逝世以前不久，鲁迅曾和两位美国的进步作家和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有着深厚的友谊。史沫特莱是1928年底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来到中国的。她和鲁迅相识之后经常来往，像鲁迅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写在深夜里》等文，或者是经由她的约请，或者是她翻译介绍发表在《新

群众》、《今日中国》和《中国呼声》等英文刊物上的。斯诺在1933年初和鲁迅相识，并着手翻译鲁迅的作品。他曾在1935年1月号的美国《亚洲》杂志写了一篇论鲁迅的文章《鲁迅——白话文的大师》。他还编译了一本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其中第一部分收了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离婚》等作品。这本小说集于1936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

还有鲁迅应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突克之请，为他翻译的小说选在1936年7月21日写了《捷克译本序》。这本用捷克文翻译的《呐喊》，选译了《阿Q正传》、《孔乙己》、《药》、《白光》、《风波》、《明天》、《狂人日记》、《故乡》等小说，于1937年12月在布拉格出版。

## 2. 茅盾的作品在国外

茅盾是“左联”的主将，在“左联”十年期间，他身体力行写了大量传世作品，确立了他在现代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文坛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不少作品被译成外文传播到世界各国。

作为中国的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茅盾反映出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不可能不引起世界各国艺术界的注意，并且先后被译成外文出版。

茅盾的作品最早被译成英文是由乔治·肯尼迪翻译的短篇小说《喜剧》，于1932年6月发表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上。两年后，这篇译文又在美国出版的英文《今日中国》上转载。稍后，王际真又将茅盾的《春蚕》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人伊鲁生主编的《当代》杂志上。在此期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威尔斯）编译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活的

中国》，其中翻译了茅盾的小说《泥泞》和《自杀》。美国作家和记者哈罗德·伊沙克(中文名字是伊罗生)在1934年编辑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草鞋脚》时，又选译了《春蚕》和《秋收》；茅盾为它写了自传。但这本书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74年才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苏联于1934年开始翻译茅盾的作品，在当年出版的第3、4期合刊的俄文《国际文学》上发表了涅克拉索夫翻译的《春蚕》，同年在《青年近卫军》第5期上发表了伊文翻译的《子夜》的片断《罢工之前》；1935年在《国际文学》上发表了普霍夫根据英文转译的《子夜》中的一章《暴动》，1936年哈尔科夫出版《中国》文学作品集又转载了这篇译文。1935年，列宁格勒的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辛君翻译的《动摇》，1937年，同一出版社又出版了鲁德曼、和夫合译的《子夜》。1944年鄂山荫翻译了《林家铺子》，收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里。

日本于1936年由第一书房出版了小田岳夫翻译的《动摇》和《追求》两部小说，题名为《大过渡期》。1937年山上正义翻译了短篇小说《水藻行》，发表在《改造》杂志上。1938年竹枝书房出版了小田岳夫翻译的《秋收》、《大泽乡》。1940年东城社出版了武田泰淳翻译的长篇小说《虹》，同年伊藤社出版了曹钦源翻译的《小巫》、《春蚕》。至于《子夜》在日本的翻译出版则是50年代开始以后的事，而且版本较多。

《子夜》的德文版，是1938年由德国的德累斯顿市威廉·海恩出版的。它的最早译者弗朗茨·库恩，当时是根据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的版本翻译的，书名改为《黄昏的上海》，这和茅盾为该书最

初定名的《夕阳》颇相近。

茅盾的著作至今已被译成世界上 20 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其中翻译最多的是长篇小说《子夜》、《虹》、《腐蚀》、三部曲《蚀》,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不少译本前都印有茅盾亲自撰写的自序。

现代世界各国都先后出现了不少茅盾著作的研究者,其中有不少人写了有关研究茅盾的专著。

### 3. “左联”新的进步青年作家的作品在国外

“左联”除鲁迅、茅盾这些负有盛名的作家外,还涌现出一批新的进步作家,如丁玲、柔石、张天翼等,他们的作品也传播到国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除选译五四以来老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林语堂的作品外,还选译了一部分新的进步青年作家的作品,如:《水》(丁玲)、《消息》(丁玲)、《狗》(巴金)、《柏子》(沈从文)、《阿娥》(孙席珍)、《在大连丸上》(田军,即萧军)、《第三枝枪》(田军)、《皈依》(萧乾)、《移行》(张天翼)、《日记》(佚名,即杨刚)、《法律外的航线》(沙汀)。

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柔石和张天翼的作品在国外的情况。

柔石是“左联”有作为的青年作家,是 1931 年 2 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左联”五烈士之一。他翻译方面的成绩比较显著,加入“左联”后,翻译的重点从原来的欧洲文学转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他翻译了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34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时书名改为《颓废》,译者署名赵璜),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文艺论文、卢那察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和苏联作家的一些短篇小说。

在创作方面,收获也很丰富,以1930年1月的《为奴隶的母亲》尤为出色。1934年,伦敦的马丁·劳伦斯书店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收入了柔石的这篇小说。1936年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将它列为除鲁迅以外的“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的首篇。《国际文学》法文版也转载了这篇小说。据萧三回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从《国际文学》法文版中读了这篇小说以后,曾写信给编辑说:“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动。”

张天翼是“左联”后期的一位有影响的新作家。他以现实主义文学为榜样,完全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的毛病,从生活中提炼思想,概括形象,写出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风格独特的作品。1932年,日本改造社编译一本《世界幽默全集》,增田涉负责编选中国部分的作品,他经鲁迅推荐,选入了张天翼的短篇小说《皮带》和《稀松的恋爱故事》。1933年,“左联”的朝鲜同志金湛然用世界语编译一部世界文学,张天翼的《面包线》被选入,并写有小传一份。

1935年,苏联哈尔科夫地方出版社出版了萧三选编的名为《中国》的俄文版中国短篇小说选,其中也收有张天翼的作品。

1939年,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除被翻译成日文外,还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受到极大的关心和重视。他的另一短篇小说《“新生”》在新加坡被学校采用为教材。

1946年,英国横跨大西洋艺术公司印行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集《中国短篇小说集》,由袁家骅和罗伯特·亨翻译了鲁迅等九位中国现代作家共11篇短篇小说,其中有张天翼的短篇小说《背脊与奶子》。该书在“前言”中还对张天翼和沈从文的创作作了比较分



析。

另据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1975 年出版的由吉布斯、李远成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目录》一书所载：自 1932 年至 1958 年，张天翼的作品被译成英文在欧美国家印行的就有：《仇恨》、《二十一个》、《春风》、《夏夜梦》、《笑》、《“新生”》、《中秋》、《华威先生》、《移行》、《老明的故事》、《路》、《背脊与奶子》、《度量》、《团员》、《大林和小林》共 15 篇；另有解放后张天翼的儿童文学作品《去看电影》、《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蓉生在家里》和《大灰狼》。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传播

30 年代领导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下面有三大支柱，即“左联”、“社联”和“剧联”。在文化、思想方面，除“左联”外，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下简称“社联”）。“左联”的工作重点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现代欧美进步文学，而“社联”则偏重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社联”冒着残酷的白色恐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新兴的社会科学运动，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 一、在新兴的社会科学运动中，“社联”应运而生

“社联”的成立，正处在中国介绍国际无产阶级理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1929年，即“社联”成立的前一年，从外国翻译的社会科学出版物已风行一时。当时出版的丛书有华兴书店的《中外研究学会丛书》、现代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南强书店的《新社会科学丛书》、北新书店的《近代社会科学名著译丛》、黎明书店的《社会科学大纲》、南华书店的《苏俄研究小丛书》等等。其他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的，除关于文艺理论的出版物外，还有李达、柯柏年、吴念慈、林伯修、画室、李伟森、李一氓、施复亮、施存统等人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波格达诺夫、河上肇、青野季吉等人的社会科学著作计150多种。从当时出版的社会科学书籍的书目中，可以看出其特点：一是新兴的社会科学的抬头，二是关于经济学的书籍占大多数，三是关于方法论尤其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类书籍的流行，四是关于对苏联的研究书籍和关于帝国主义的书籍占了不少的数目，五是关于历史方面如经济史、革命史、社会思想史等等也占了相当的数目。（见君素：《一九二九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原载《新思潮》第2、3期合刊，1930年1月）

“社联”成立于1930年5月，主席是邓初民。其纲领提出了五项主要任务：

（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

（二）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

（三）严厉地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

(四)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在目前要积极争取言论、出版、思想、集会等等的自由。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运动,方能扩大与深入。

“社联”参加者包括党内外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他们都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过理论文章,出版过理论著作和翻译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有些是在大学里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

## 二、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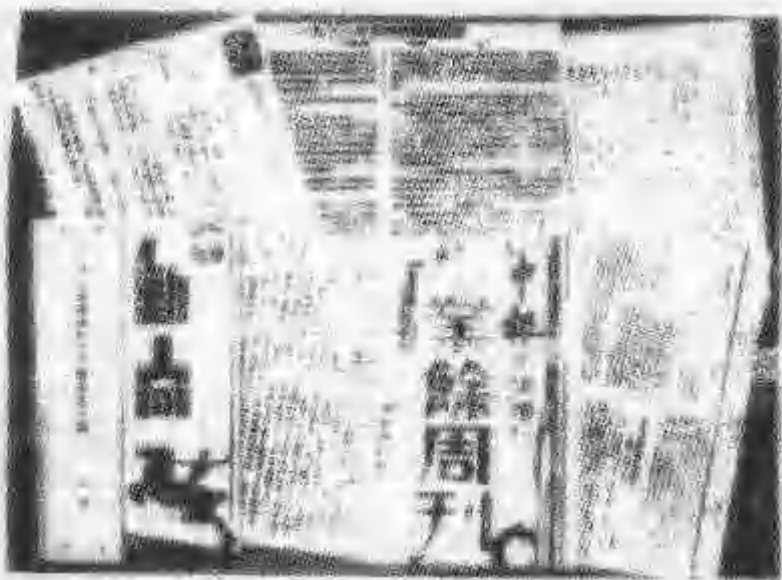
“社联”在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不少“社联”成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朱镜我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李一氓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论文选译》、杨贤江翻译的《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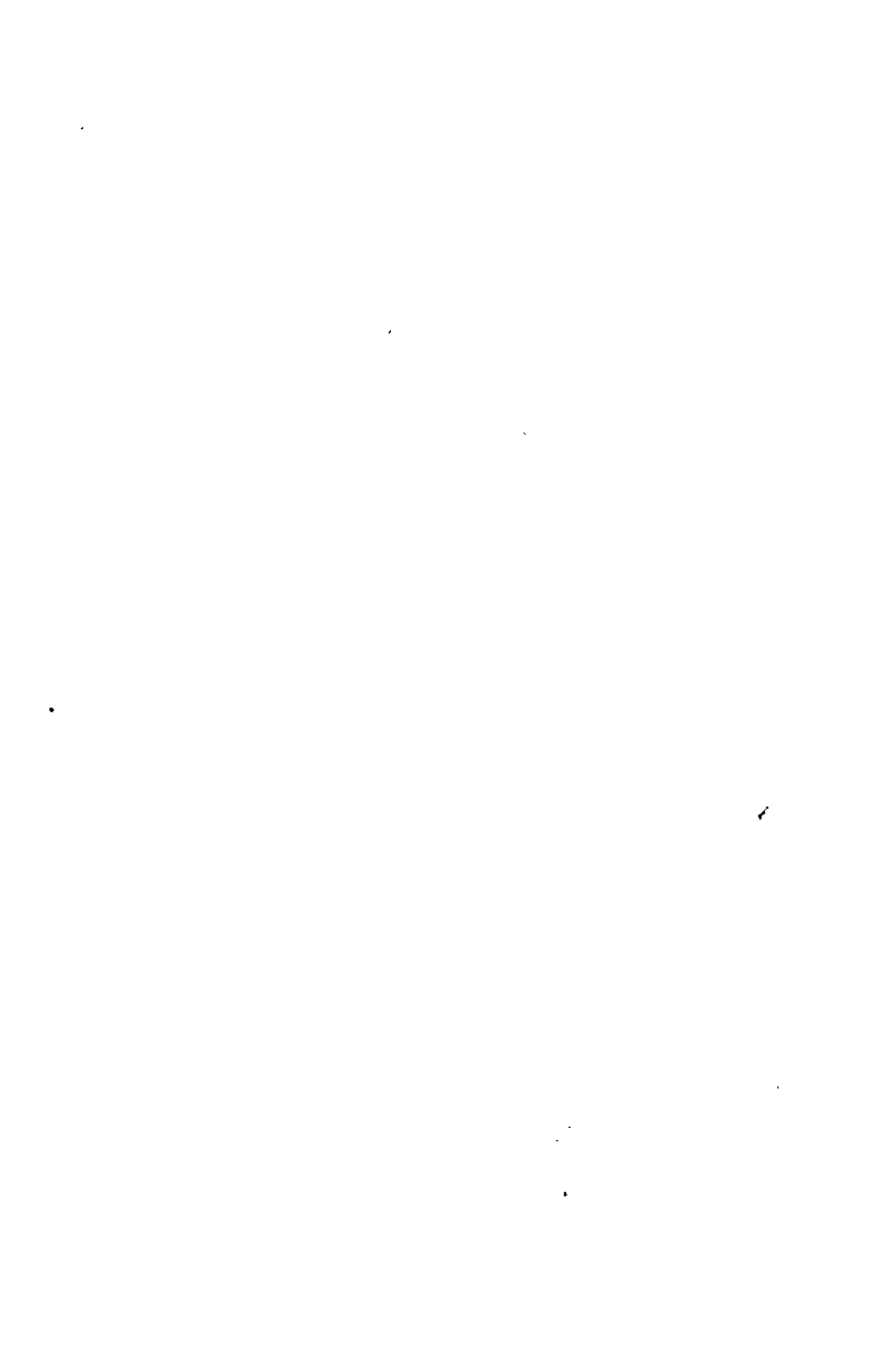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卖国政策,“社联”在白色恐怖下,办了许多刊物。1929年11月15日,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创办了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刊物——《新思潮》月刊(出至第7期即被迫停刊)。执笔的有柳岛生(杨贤江)、李一氓(李德谟)、朱镜我(谷荫)、郭沫若(杜荃)、吴黎平、潘东周、向省吾、彭康、王学文等,其中多数是“社联”的发起人和盟员。“社联”还出版了《社会科学讲座》



“社联”成立前后，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翻译出版了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

1934年，“左联”、“社联”的部分作家在《申报》、《中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情况及反对日本侵略的作品。





这一刊物，它的第1卷于1930年6月由光华书局出版，内容有：朱镜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吴黎平的《唯物史观》和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社会主义》、林伯修的《国家与法律》、王学文的《经济学》、柯柏年的《经济史底阶级性》、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副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该文共有4章，郭沫若选用了第3章的标题《经济学之方法》、潘东周的《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柳岛生翻译的《新兴教育的产生》、李德谟（即李一氓）翻译的列宁的《土地问题材料》，最后是朱镜我用“荫”的笔名编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献》（书目）。《社会科学讲座》只出了一期，即被查禁。由柯柏年（从“九·一八”到“一·二八”期间任“社联”宣传部长）主编的《研究》（“社联”的机关刊物），在1932年出版，也只出了一期便被查封。“社联”还出版了另一个机关刊物——《新文化》月刊，由沈志远出名主编，只出版了两期也被查封。由许涤新主编的《社会现象》周刊，是“社联”领导的刊物，第1期在1932年4月24日出版，出版了七期也被查封。

在“左联”主办的《文艺新闻》1931年被查封后，“文委”出版了一个综合性刊物——《社会生活周刊》，由夏衍和楼适夷代表“左联”、蔡馥生代表“社联”组成编辑小组，出版了十二三期被查封。接着“文委”又出版了一个综合性的月刊——《正路》，由“社联”盟员张耀华、蔡馥生任正副主编，参加写作的有杜国庠（笔名林素庵）、艾思奇、马纯古、许涤新等人，只出版了二期又被查封。

从1933年下半年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文委”及其领导下的各个革命团体，要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困难更多，于是便利用公开合法的刊物来发表文章。艾思奇以“李东明”的笔名，在《中华

日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章。张耀华、许涤新和邓拓等，利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和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半月刊，大约从1933年到1935年间，发表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文章。1934年艾思奇在《读书·生活》杂志上连载二十四期《大众哲学》(原题《哲学讲话》)。这是用通俗形式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普及到人民群众中的最早的尝试。《大众哲学》1935年结集出版，在1935—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大众哲学》成为进步青年必读的畅销书，全国解放前印行了32版。

### 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斗争

30年代初，伴随着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进行，在学术界开展了一场关于辩证法的论战。这场论战涉及到哲学的各个领域，而论战的核心则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

从1931年开始，以张东荪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派，陆续发表《认识论》、《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等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抛弃了康德哲学中朴素实在论的因素，提出了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上的“泛架构主义”，将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归结为没有物质内容的架构，并说“架构却不是能离开我们的认识”而存在的。在这里，一切物质都被消灭了，剩下来的只不过是一些神秘莫测的“架构”，而这种“架构”又离不开人们的认识，它就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抽象的精神概念。正是这种概念，构成了万物的最后根源。这是地道的唯心主义的哲学。

在认识论上，张东荪认为认识是由人们的精神范畴组成的，外界的客体和自我主体都是不可认识的。他将知识作为一种主观想象，否认了知识来源于实践以及理论的指导意义。他将唯心辩证法

和唯物辩证法混为一谈,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是在黑格尔的错误上“再加一些新的错误罢了”。张东荪否定辩证法几乎涉及到它的所有方面。在社会历史观上,他认为政治、法律、道德、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并列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对事实的一种改革”。他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亦决不能实行于中国”。

以叶青为代表的托洛茨基派,也参加了这场论战。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主要是建立在苏联 20 年代的新机械论的基础上,并把它推向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用以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自称是新唯物论的拥护者,而宣扬的却是“哲学消灭论”。他制造了一个宗教—哲学—科学依次取代的图式,认为哲学“已是宗教之续”,这样一来,“哲学的本土没有了”。叶青歪曲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他说“研究动应该从静起。只有理解了静,才能理解动”。在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上,他主张“外铄”说,认为“中国历史底发展在这里显然是外铄的”。在历史观上,他提出“生产工具论”,混淆了生产力的概念,说什么“兽力、风力、水力、电力”等都是生产力。叶青在宣传他的哲学主张时常常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因此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对于张东荪、叶青等所宣扬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有力的驳斥。“社联”成员邓方特(邓拓)首先批判了张东荪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他指出,辩证法是客观的,它之所以从联系中和对立中去把握事物,就是因为客观事物本来就是联系的和对立统一的。他还说:“主观律只是已认识的客观律”,这种“主观律和客观律的一致”,“就是科学的真理”。从而坚持了辩证法的客观



性,驳斥了唯心论对辩证法的歪曲。

张东荪与叶青都将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混为一谈,否认两者的本质区别。对此,艾思奇指出,新唯物论是通过在黑格尔的批判与改造,才成为“划时代的新哲学”。由黑格尔到新唯物论,是不但要破壳,连内容也得经过一番成熟的改造才行,否则“决不会有新生命”。在批判叶青的“哲学消灭论”时,艾思奇说,新唯物论“保持着独立的领域和对象”,“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运动变化的总法则”。

在运动与静止的关系上,艾思奇说,叶青根本不懂得绝对和相对的道理,“静止只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其本质仍然是运动的”。

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叶青在内因、外因问题上的“机械交叉观点”,指出:这种观点“只能形成叶青式的折衷主义”,“内因是基础,是本质,是发展的必然性的决定的原因”。从而坚持了内外因问题上的正确观点。

在唯物史观上,马克思主义者还批驳了唯心论者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上的“技术决定论”。

通过这一批判,澄清了唯心主义者造成的理论混乱,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洁性,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

### 第三节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电影小组、音乐小组及其对外活动

在 30 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中,戏剧、电影、音乐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特别是电影有广泛的群众性,所产生的影响也更大,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也是如此。

#### (一)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以下简称“剧联”)

剧联于 1931 年 1 月成立。它的成立经历了上海艺术剧社、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中国左翼剧团联盟等阶段。

上海艺术剧社成立于 1929 年 11 月。基本成员有郑伯奇、陶晶荪、冯乃超、沈学成(叶沉)、沈西苓、夏衍、许幸之、屈文(司徒慧敏)、朱光、余怀(莞尔)、石凌鹤、舒怡、龚冰卢、邱韵铎等,还有一批革命青年和中华艺术大学的学生,如刘卞(刘保罗)、陈劲生、陈波儿、王莹、李声韵、易杰、唐晴初等等。在成立大会上一致推选郑伯奇为社长,沈西苓负责导演,许幸之负责美工,冯乃超和夏衍负责宣传。

上海艺术剧社成立后很快就筹备演出。考虑到演剧不同于写小说,要公开在群众面前上演,而且上海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还要审查剧本,所以,第一次公演,采用了政治色彩不太明显,但也坚持一定政治方向的外国剧本。下列三个剧本都是翻译的外国剧本:一、法国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二、德国弥尔顿的《炭坑夫》(矿工),三、美国辛克莱的《梁上君子》。演出经费是同人捐助的。

1936年1月6日首次公演,连续三天。演出的效果很好。当时和左联有联系的几位外国进步记者,如美国的史沫特莱、日本的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都在上海的外文报刊上给上海艺术剧社作了宣传。上海艺术剧社第二次公演的剧目有两个:一是冯乃超创作的《阿珍》,二是日本村山知义根据德国小说家雷马克原作改编的《西线无战事》。《西线无战事》共三幕十一场。为了解决换景的难题,借到了一家日本人经营的有转台装置的“上海演艺馆”。这次演出,打破了话剧界旧传统的影响和束缚,采用了国外的一些新手法,例如《西线无战事》开幕之前先放映了一段欧战的电影(这是从外国电影拷贝中翻印出来的),同时用字幕作了说明,使用灯光“暗转”,音响的效果也做得很好。上海艺术剧社演剧的艺术水平虽然不高,但崭新的内容,不能不震动上海的戏剧工作者,引起了他们对新兴戏剧的注意;又由于德、日、美驻上海进步记者的宣传,艺术剧社成为当时国际上有名的革命剧团。上海艺术剧社第二次公演后不久,很快就遭到上海工部局的仇视,于是在1930年4月28日查封了该社社址,并查抄了该社主办的中华艺术大学。

上海艺术剧社被查封后,由田汉、应云卫发起,用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的名义,发表了《为艺术剧社被查封告国人书》,提出了“我们要得到文化运动的自由,我们要得到戏剧运动的自由”的响亮口号。艺术剧社被查封,引起了国际革命戏剧团体、文学团体的抗议,当时莫斯科的《国际文学》和美国的《新群众》都发表了抗议书。当时正兴起的进步戏剧运动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不久,南国社在中央大戏院演出了田汉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话剧,“借外国故事来发挥革命感情影响中国现实”。

《卡门》的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但《告国人书》和《卡门》的演出，又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围剿”，《卡门》被勒令停演。接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正式宣布南国社为反动团体而予以查封。

1930年8月1日，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正式改组为“中国左翼剧团联盟”。不久，1931年1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又改为由个人参加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左翼戏剧运动强调演剧是“所谓一种政治的辅助工作。所以是武器底艺术！斗争艺术！”“剧联”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1931年9月通过）突出强调将革命戏剧深入工农群众，以独立（即由“剧联”独立表演）、辅助（即辅助群众表演）、联合（即与群众联合表演）三种方式积极开展工人、学生、农民的演剧活动；创作内容强调暴露地主资产阶级与反动派的罪恶，从各种斗争中指出政治出路；组织“戏剧讲习班”，加强戏剧理论建设，开展理论斗争等。“剧联”于1930年冬成立了由田汉等人指导下的基于剧团——大道剧社，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广泛开展革命演剧活动。当时形成了三个演剧系统：一是学校演剧。大道剧社成员遍布于上海各学校剧团，领导全市各大中学校的戏剧演出活动。二是工人演剧。“剧联”动员基于剧团到工人中演出，通过赤色工会，组织工人观看，取得良好效果。三是“剧联”之外的业余剧社先后演剧。1933年，“剧联”全力支持戏剧协社公演苏联革命戏剧《怒吼吧，中国！》，这一演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大道剧社先后演出过《梁上君子》、《雪地皇冠》、《阿来城姑娘》、《马迪迦》（即《第四十一个》）、《洪水》、《街头人》等剧。其中《马迪迦》这个多幕剧，是安娥改译的苏联剧本。

“剧联”在全国有许多分盟：南通分盟、北平分盟、汉口分盟、广州分盟、南京分盟、杭州剧联小组、青岛剧联小组、“剧联”音乐小组，扩大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

自从瞿秋白到上海领导左翼文化工作以后，使“剧联”在当时情况下摆脱了不少“左”倾的指导思想与做法。“剧联”开始以“灰色”外装在正规的、公开的剧场演出。1935年，“剧联”联络一些有社会影响的进步剧人，组成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这一大型的完全公开的剧团，在戏剧艺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业余剧人剧团先后由赵丹、金山等演出了外国名剧《娜拉》、《大雷雨》等。

## （二）电影小组

有声电影传入中国后，1930年3月，中共领导的《艺术》月刊曾开展讨论，沈端先、洪灵菲、孟超等支持有声电影，并希望它“能替新兴的社会做一个很好的（宣传）工具”，从而揭开了中共领导电影运动的序幕。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广大群众的爱国抗日情绪高涨，电影观众要求各影片公司摄制抗日影片，而对老一套的武打、言情、伦理片失去了兴趣。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又给予上海电影业以沉重的打击，大批电影公司破产，幸存的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所有这一切，迫使一些影片公司探寻新的出路，开始寻求左翼艺术界的支持。如当时拍片最多的明星公司智囊人物洪深，就向明星公司的“三巨头”（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提出了“转变方向”，请几个左翼作家来当顾问的建议。后经“文委”（由瞿秋白主持）讨论，同意派沈端先、钱杏邨、郑伯奇去明星电影公司当顾问，时间是在1932年5月。同年秋，田汉（陈瑜）也被聘为联华影片公

司编剧。为了要在荒凉而又荆棘丛生的电影园地上去建立一个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立足点和逐渐发展的基地，夏衍等三人与洪深、田汉、阳翰笙商量，想出一些为进步电影奠定基础的方案。这就是：一、通过当时在报刊上已有的戏剧评论队伍，把重点逐渐转到电影评论，批判反动的外国电影和宣传封建礼教、黄色低级的国产电影，为进步电影鸣锣开道；二、把当时在话剧界已经初露头角的、有进步思想的导演、演员，通过不同的渠道，输送到电影界去，培养新人，扩大阵地；三、翻译和介绍外国（在当时主要是苏联）进步电影理论和电影文学剧本，来提高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思想艺术水平。

上述三项工作中，做得最成功的是影评工作。当时在上海，除了地下发行的党刊外，没有一家自己掌握的报纸。因此，要发表影评，非在公开合法的大报上争取版面而不可。于是，便通过各种渠道，先后把上海各大报的副刊争取过来，在副刊上开辟了影评园地。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影评，经“文委”同意，1932年7月，先在“剧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影评小组”。这是一个党领导的松散的群众组织，通过茶话会、座谈会等形式欢迎影评工作者自由参加。由于它是公开的、合法的团体，所以参加的人很多，接触的面很广，《申报》的“电影特刊”、《时事新报》的“电影时报”、《晨报》的“每日电影”、《中华日报》的“电影新地”、《民报》的“电影与戏剧”，几乎全部为这个小组所掌握。另外，还争取到《新闻报》的“艺海”、《中华日报》的“银座”、《大晚报》的“剪影”、《大美晚报》的“文化街”等。主要的影评作者有王尘无、石凌鹤、鲁思、毛羽、舒湮、李之华等，夏衍、郑伯奇、陈鲤庭、沈西苓、施谊（孙师毅）、于伶（尤竞）、宋之的、聂耳也写了不少影评。这个组织成立得最早，持续得最久（“八·一三”

抗战后大部分进步文艺工作者离开上海,这个组织的不少人还留在“孤岛”继续工作),也可以说斗争得最剧烈。这支队伍不仅为进步电影扫清了道路,而且为左翼文化挣脱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束缚,树立了一个榜样。

为了把广大的电影工作者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1933年2月9日,电影界的群众组织——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标志着在党的领导下的电影界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了扩大这个统一战线,电影文化协会还在《明星月报》上对电影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和具体任务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讨论,明确了电影创作的根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在左翼电影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电影工作的领导,1933年3月,成立了“文委”直辖的“电影小组”,成员是:夏衍、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夏衍为组长。

“影评小组”和“电影小组”,占领了上海所有大报的电影副刊,开始有计划地批判反动电影、介绍苏联电影理论和苏联电影。1932年6月,年轻的共产党员、电影评论家王尘无,首先在上海《时报》的“电影时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电影在苏联》的文章,第一次介绍了列宁关于“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的论点,第一次在中国传播了苏共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电影的决议。同年夏衍和郑伯奇用黄子布和席耐芳的化名又译介了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和《电影脚本论》,连载于上海《晨报》的“每日电影”副刊上,后来并出版了单行本。1933年9月,上海《申报》本埠增刊的《电影专刊》,刊载了卢荻从保尔庭斯基著的《列

宁与电影》一书中摘译的题为《列宁的电影论》的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列宁关于电影的言论。1932年2月16日,上海大戏院公映了苏联有声电影片《生路》。当时,《晨报》的“每日电影”副刊为这部影片刊登了8篇评论和14篇短文。洪深、席耐芳在《〈生路〉详评》一文中称赞苏联影片公开首映为“新艺术的登场”,认为“在中国电影史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因为它“可以给中国电影界指出一条正当的出路”。结合影片的上映,1933年6月,夏衍还以丁谦平的笔名,翻译《生路》的摄制台本。这是我国翻译的第一个苏联电影剧本,连载在《明星月报》上。继《生路》之后,上海又放映了苏联影片《迎展计划》(即《重逢》)、《金山》等片。通过对这些苏联影片的观摩,有人认为这是“发现了电影艺术的新天地”,并把苏联影片中某些艺术手法,亲切地称为“苏联镜头”。《民报》的电影副刊“影坛”上先后发表过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陈鲤庭译)和《电影剧本论》(金光州译)、《苏联的电影》(章泯译述)、《苏联电影事业》(袁文殊译述)、《苏联电影最初十年史略》(鲁思译述)、《苏联电影十五年》(陈鲤庭译)、《苏联的新闻文献电影和科学教育电影》(赵铭彝译)、《苏联影话》(作者韦勃)、《苏联电影》专栏(未名、鲁思、肖崇素、许幸之等)、《苏联电影艺术史》(陈鲤庭译)和《苏联电影发展史略》(陈鲤庭译)等等。此外,《影坛》还对当时公开放映的苏联电影如《雪耻》、《爱与敌》、《傀儡》、《狂风暴雨》(即《大雷雨》)、《抵抗》、《北极探险记》(即《车留斯肯号破冰船》)、《齐天乐》(即《快乐的人们》)、《夏伯阳》、《铁马》、《无国游民》、《冰天雪地》和《马戏团》等等,都以大量篇幅发表影评予以推荐。执笔者有恭鲁(欧阳山)、一舟(宋之的)、成之(赵铭彝)、舒非(袁文殊)、贺光(章泯)、柯萍(鲁



思)、苏戈(朱崇彬)、静文(姜敬舆)和严郁尊(林林)等。当时上海各个报纸上的副刊阵地,几乎都介绍过苏联电影事业和传播苏联电影艺术的文章。据统计,单在《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上,1933年内,共发表了55篇介绍苏联电影的文章。另外,还使用各种形式,如杂文、影评、打油诗、漫画等等,对反动派提出的所谓“软性电影”——“给眼睛吃冰淇淋,让心灵坐沙发椅”进行猛烈批评。

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揭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农村中的阶级对立和斗争,反映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革命要求和愿望。其代表作有《狂流》(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春蚕》(茅盾原著,夏衍改编,程步高导演)、《盐潮》(楼适夷原作,郑伯奇、阿英分场剧本,徐欣夫导演)、《渔光曲》(蔡楚生编导)。其中蔡楚生于1934年编导的《渔光曲》是反映这方面现实的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创造了连映84天的空前卖座纪录。影片《渔光曲》的主题歌《渔光曲》(安娥作词,任光作曲),随着影片的上演,也很快地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成为当时传遍全国、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之一。1935年2月,《渔光曲》参加了苏联电影工作者俱乐部为纪念苏联电影国有化15周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在这个有着31个国家的代表和影片参加的电影节上,《渔光曲》获得了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

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汉奸投降派的丑恶嘴脸,表现反帝爱国主题,也是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劫后桃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大路》(孙瑜编导)、《逃亡》(阳翰笙编剧,岳枫导演)、《香草美人》(马文源编写,洪深修改,陈铿然导演)。

抨击半殖民地的中国都市社会的黑暗与糜烂,探求妇女的解放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路,也是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新女性》(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桃李劫》(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导),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虽然还处于幼年时期,但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为旗帜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奋然而前行”,开拓了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道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文化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 (三)音乐小组

以“左联”为首的革命文化战线建立后,在思想、理论、组织等方面的一系列建设,以及热情地介绍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革命文艺(包括音乐),对左翼音乐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如1932年9月出版的周起应(即周扬)翻译的《苏联的音乐》(美国,佛里门著),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音乐的发展和意义作了具体的、概要的介绍。这本书是我国最早的系统介绍苏联音乐发展的一部著作,在“译后记”中,译者还向革命音乐家提出要创造出具有无产阶级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新音乐的号召。另外,在郑导乐(即沙梅)和谢韵心(即章泯)所编的《音乐与戏剧》中也较早地提出了如何建设革命音乐事业的问题。上述种种活动都为左翼音乐运动的建立和发展做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1933年,任光、安娥、聂耳、张曙等在上海成立了名为“苏联之友社”的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会”)。1934年春,以肖声(肖之亮)、聂耳、任光、张曙、吕骥、安娥、王芝泉(王为一)等又在“剧联”

内成立了一个“音乐小组”。通过《母性之光》、《渔光曲》、《桃李劫》、《大路》、《新女性》、《风云儿女》、《逃亡》等进步电影的放映以及《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回春之曲》、《洪水》、《复活》等活报剧、舞台剧的演出,不少新创作出的革命歌曲和抒情歌曲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产生了广泛的群众影响。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新女性》,任光的《渔光曲》,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等等,在救亡运动中曾风靡全国。一些歌曲如《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为了刻画斗争中的青年和革命群众,大胆地吸取了外国革命音乐的长处。俄罗斯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还为《义勇军进行曲》写了伴奏。阿甫夏洛穆夫20年代就来到中国,毕生致力于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和创作,是一位非常热爱中国民族音乐的外籍作曲家。他对30年代中国救亡歌咏活动十分支持,他和贺绿汀、吕骥等左翼音乐工作者都有交往。

为了加强和推动正在高涨中的救亡歌咏运动,“音乐小组”的聂耳、吕骥等,1935年5月又组织了“业余合唱团”,并大力支持当时由爱国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民众歌咏会”。

为了进一步推进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在“剧联”“音乐小组”停止工作后,即由孙师毅出面成立了一个成员比较广泛的“歌词曲作者联谊会”(或称“歌曲作者协会”),参加者除了吕骥、任光、张曙等人外,又增加了贺绿汀、周巍峙、孙慎、孟波、麦新、沙梅、江定仙、刘雪庵、周钢鸣、任钧、塞克、龙沫勋以及刚从法国回来不久的冼星海等。后来,吕骥、麦新等还组织了另一个人数较少的“歌曲研究会”,定期进行有关创作的讨论和音乐的学习,以创作出群众

所需要的新歌曲。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孟波曲)、《保卫马德里》(麦新词,吕骥曲),就是在“歌曲研究会”成立后产生的。为了从外国优秀作家的作品中学习新的技巧,提高创作能力,他们还介绍外国进步歌曲作品。例如《青年战歌》(苏,达维登科作曲)、《青年歌》(舍赫特作曲)和《五一歌》(美国歌曲)、《士兵歌》(匈,斯沙堡作曲)、《祖国进行曲》、《快乐的人们》(苏,杜那耶夫斯基作曲)等,都经过“业余合唱团”的演唱加以推广。

---

#### 第四节 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 与中外美术交流

左翼美术家联盟(以下简称“美联”)成立于1930年7月。它在“文总”的领导下,特别是在鲁迅的直接指导下,在开展新兴美术运动、介绍外国革命美术作品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

##### (一)“美联”的成立及其活动

1927年至1928年,鲁迅翻译了《近代美术史潮论》(板垣鹰穗著),这是介绍到我国的第一部较系统介绍近代美术(从法国革命起)发展情况的著作。此后,鲁迅又翻译了《苏俄文艺政策》(藏原、外村辑)、《文艺批评》(卢那察尔斯基著)和两部《艺术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著)。这些著作作为左翼美术运动的发轫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1930年2月间,还在“美联”未成立前,由上海各美术学校的部分师生和社会上的进步美术青年叶沉(沈西苓)、王一榴、汤琳(汤晓开)、刘露、周熙(江丰)、张谔、陈烟桥、施春瘦、许幸之等发起、组织了“时代美术社”。它实际上是“美联”的前身。

1930年7月,继“左联”、“剧联”成立之后,“美联”在上海宣布成立。

“美联”的成立,标志着左翼美术运动的发展和加强。从此,“美联”即成为左翼和新兴美术运动的核心。

谈到“美联”的活动,特别要介绍一下“一八艺社”的成长。“一八艺社”是“美联”公开活动的美术团体。它的成长是与鲁迅的指导和扶助分不开的。鲁迅是一位少有的木刻爱好者和收藏者,当他得知“一八艺社”热心木刻创作后,就托冯雪峰赠送给“一八艺社”几本外文绘画书,表示对它的关心和支持。

1931年6月,鲁迅为沪、杭两地“一八艺社”在上海举办的展览会,写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1931年8月,鲁迅请了一位日本美术教师内山嘉吉,为中国木刻青年开办一个木刻讲习会。由“一八艺社”负责组织工作。讲课余时间,用来观摩鲁迅每天带来的一包各国的版画作品,主讲是鲁迅自己。据当年参加讲习会的江丰回忆,观摩了三次。一次是观摩日本浮世绘版画和现代版画,说明近代兴起的“创作木刻”与古法木刻,在做法上和艺术效果上不同的特点。内山嘉吉补充谈了日本浮世绘的历史发展情况及其精致的刻印技法。一次是介绍作风秀丽的英国木刻。还有一次是鲁迅带来刚从德国托人买来的凯绥·珂勒惠支夫人的代表作——《农民战争》七幅铜版组画作观

摩。这组版画,是作者签名的10份中的1份。尔后鲁迅又送“一八艺社”外国版图书八册;还向日本内山书店提议寄售日本木刻刀,以供我国木刻者使用。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一八艺社”为战火所毁。不久又重新成立“春地画社”,并招收学员教以绘画和世界语。为配合上海我党组织发起的“红五月”宣传活动,“美联”决定从上海、杭州两地征集木刻和油画、漫画等作品,用“春地美术研究所”的名义举行美术展览会。为了充实展览会的内容,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大家一致赞成鲁迅的提议,将鲁迅与德国汉堡嘉夫人合办的、6月初旬在上海瀛寰图书公司展览过的德国当代名家的版画共五六十幅一起展出,其中就有鲁迅珍藏的凯绥·珂勒惠支夫人的《农民战争》。

“春地画社”被破坏后,几个没有被捕的会员立刻成立了“野风画会”。1933年春,“野风画会”因经济不能维持停办。但以后又相继成立了“大地画会”、“上海绘画研究会”、“铁马版画社”、“MK木刻社”、“涛空画会”、“野穗社”、“未名木刻社”、“上海木刻者协会”等。1935年和1936年还组织了两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特别是第二次展览会,尤为成功。上海以及全国各地外国人主办的报纸和刊物,十之八九都介绍了展览会的作品。

“美联”从事的木刻运动到了1933—1935年间,在不断冲破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过程中,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以上海为中心,战线日益扩大,木刻团体遍及全国各地,木刻的质量也日见优良。鲁迅指出它“现在不但已得到中国读者的同情,并且也渐渐的到了跨出世界去的第一步了”(《木刻纪程小引》)。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少的木刻青年奔向延安,一部分人

散布在敌人的后方，一部分人散布在西南各大城市如重庆、桂林等，广泛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6月12日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曾出版一本会刊《全国木刻选》，篇幅较多，内容相当充实。

### （三）鲁迅热心介绍外国美术作品

鲁迅是中国左翼美术运动的实际组织者与指导者。鲁迅对外国美术作品的介绍，是他致力于美术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一面倡导新兴木刻，一面整理和发扬中国古代美术遗产，同时还介绍外国美术作品。鲁迅对这项工作很热心。正如他自己所说：“至于我，创作是不会的，但介绍翻印之类，只要能力所及，也还干下去。”他平时喜欢搜集一些外国美术复制品，一碰见有好的画册或拓页之类，便好像发现珍品似的，不惜以重价把它收买下来，而且迫不及待地想把它翻印出去，将艺术欣赏的喜悦得以分给旁人，更能使一般对艺术有兴趣的青年从中获得教益。

从1929—1931年三年中，鲁迅自费出版了6本画册，其中有：德国革命版画家梅斐尔德所作的《士敏土之图》和《艺苑朝华》五辑（《近代木刻画选》两册、《新俄画选》、《比亚兹来画选》和《森谷虹儿画选》）。他出版这些画集的目的，正如他自己为《艺苑朝华》所写的广告所说：“虽然材力很小，但要介绍些国外的艺术品到中国来，也选印中国先前被人忘却的还能复生的图案之类。有时是重提旧时而今日可以利用的遗产，有时是发掘现在中国时行艺术家的在国外的祖坟，有时是引入世界的灿烂的新作。”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中（1933—1936），又继续编印（自费或代编选）的外国美术作品画册就有5种，如比利时名画家麦绥莱勒的《一个人的受难》、《引

玉集》、《死魂灵百图》、《苏联版画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引玉集》是鲁迅编选自1931年以来收集的苏联版画，它比起《新俄画选》来更加丰富，差不多把当时苏联有名的木刻家的作品全都介绍给中国读者了。为了收集这些作品，他曾多次与苏联木刻家、美术批评家通讯，并多次寄去中国的宣纸或画集赠给苏联版画家，换来了一批木刻作品，他说这是“抛砖引玉”，因而编成了苏联版画《引玉集》和《拈花集》（后来未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中所收版画，是鲁迅用重金托史沫特莱购买来的。他在序文中说：“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1936年2月，“中苏文化协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文艺社”共同主办“苏联版画展览会”。后来，鲁迅从展品中选出159幅编印成《苏联版画集》。他在序文中说：“单就版画而论，使我们看起来，它不像法国木刻的多为纤美，也不像德国木刻的多为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此外，鲁迅还有已计划或已编妥而未出版的画集，有：《法国插画选集》、《英国插画选集》、《俄国插画选集》、《希腊瓶画选集》、《罗丹雕刻选集》、《E·蒙克版画》、《麦绥莱勒漫画集》、《拈花集》、《葛饰北斋画选》和《近代木刻选集》第3、4辑等共11册之多。

为了使革命美术的启蒙运动扩大影响，鲁迅不顾任何艰难，从1930—1933年三年中先后举行珍藏外国版画展览会三次，又协助



举办了从“俄法书籍插图展览会”、“苏联版画展览会”和协助“全国木刻展览会”。鲁迅自己所主办的展览会，从资料搜集、会场布置、作品装璜，以至于通知熟人和作说明等等，无不亲自动手。

鲁迅不仅热心向国内介绍外国的美术作品，他还努力把中国的革命美术作品介绍到国外去。

1934年，鲁迅出版了一本《木刻纪程》，这是中国木刻青年习作的选集。鲁迅曾寄了数本给一位亡命在苏联的德国美术批评家保罗·埃菲格尔，请他批评。这位批评家在接到后不久即复信，赞许几张技术较优的人像和风景画。

30年代初，鲁迅寄赠日本友人内山嘉吉以求批评的68幅中国木刻。1947年2月3日，中国旅日艺术家借到了内山嘉吉所藏的这批中国初期木刻作品，在神户举办了“中国新兴木刻作品展”。这是鲁迅倡导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以来，中国现代版画在日本第一次公开展出。展出为期一周，参观者十分踊跃。闭幕后在大阪、京都、东京举办了巡回展。由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出版了200部纪念本的《中国初期木刻集》，扉页上印着：“献给中国新兴木刻导师鲁迅先生”。这是在日本出版的第一本中国现代木刻集，也是在海外第一次纪念木刻导师鲁迅的出版物。

## 第五节 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 与中外世界语交流

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以下简称“语联”)于1931年12月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为胡愈之和楼适夷。当时胡愈之刚以世界语者身分访问欧洲回国。楼适夷则刚从日本回国不久,在旅日期间他同日本革命世界语活动有过接触。除胡、楼两位外,参加“语联”的还有叶籁士、乐嘉煊、陈世德、张企程、肖聪等,稍后有胡绳、霍应人、何增禧等以及其他一些青年。

### (一)“语联”成立前的中国世界语运动

“语联”成立前,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已有数十年的历史。

世界语是波兰的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在1881年创造的,目的是为了给各民族提供一种简单易学、便于平等交往的国际辅助语,以此消除彼此的隔阂,结束人类流血和厮杀的历史,实现世界和平。

早在20世纪初,世界语就在中国传播。据老作家巴金回忆,柴门霍夫的和平主义思想及其世界语最初是被当作无政府主义的一支介绍到中国来的。所以,在最初学习、传播世界语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批传导者有日本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世界语者大杉荣的弟子刘师培、张继,随后掀起波澜的是在中国早期社会革命中名震一时的中国社会党人。中国社会党成立于1911年底,该党领袖陈翼龙说:“社会党以世界为目的,必使人类同至于真正自由平等、真正博爱之域。”因此,他们宣传世

界语无异于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世界语实际上是他们在斗争中所选择、推崇的理想之一。这些以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为救国之道的善良青年们,设立法律出版社,编印《生计杂志》,公开向封建势力宣战,鼓吹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在当时很有影响。根据袁世凯政府的有关资料记载,中国社会党成立一年后就发展党员 50 余万,建立机关 400 余处,其中有设在北平的世界语学会和平民学校。平民学校是一所小学,首创男女学生兼收。少年的邓颖超曾在这里随她当教师的母亲(中国社会党党员)住读。当时住读生活的情景,如在饭桌上听母亲和同事谈论世界大同以及陈翼龙讲演等,邓颖超晚年时还记忆犹新。中国社会党很快就引起了封建势力的仇视。1913 年 8 月,年仅 28 岁的陈翼龙被袁世凯政府枪杀,中国社会党及其在中国传播开来的世界语也随遭厄运。

1915 年《新青年》创刊。次年 11 月,不少著名学者参加该刊关于世界语的讨论,胡适等人持反对意见,但赞成世界语的人占多数。鲁迅认为,“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早年,中国的有识之士为传播世界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沉重的代价,被鲁迅喻之为“盗取天火”。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世界语学会、福州世界语团、天津世界语学校、成都世界语俱乐部、佛山世界语陈列所、广州和上海的世界语学会相继成立。这些世界语团体,或举办世界语学习班,或开设函授学校,或出版刊物,或编译世界语读物,各有成就,其中成绩最大者要算胡愈之、巴金、陈兆瑛、索非等人组织的上海世界语学会。这个学会举办世界语函授学校,建立世界语图书馆,以后又创办了《绿光》杂志。这一杂志出版时间长达十余年,对 20 年代的中国世

界语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

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积极将世界语引入教育界。1917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决定将世界语列入该校选修课。1921年,他以教育总长的身份在全国第七届教育联合会上,提议将世界语正式列入师范学校的课程。1922年,他邀请俄国著名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大讲授世界语。以后,北大成立世界语研究会,蔡元培亲自兼任会长。1923年,他同吴稚晖、陈声树等人一起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1924年,蔡元培代表中国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16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中国著名的老一辈世界语者胡愈之在中国推广世界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胡愈之1913年学习世界语,对柴门霍夫的和平主义十分赞同,1914年曾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世界语和世界和平》。1928年1月,他流亡到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

在1928年到1930年的旅欧期间,胡愈之始终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出现。法国的世界语者为他安排食宿,帮助他学习法文和参加世界语活动(包括参加在匈牙利和英国举行的国际世界语大会)。1930年后,在离开法国回国途经柏林时,他访问了“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主义者》的编辑部。1931年1月27日至2月7日,胡愈之依靠莫斯科世界语者的帮助在莫斯科游览了7天。回国以后,他写了一本近6万字的《莫斯科印象记》,最初在国民党办的《社会与教育》杂志上发表。1931年8月,《莫斯科印象记》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到第二年10月,就出了五版。它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透进一缕希望之光,同时也是第一次使

中国各阶层人民,特别是青年对世界语及其实用性产生了兴趣和信任,掀起了 30 年代中国世界语学习的热潮。

## (二)“语联”的成立使中国世界语运动进入一个新时期

“语联”成立后在国内参加了“文总”并接受它的领导,在国际上参加了“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世界语者国际”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际世界语组织,它在欧、美、亚洲很多国家中都有支部,总部设在当时工人运动最为发达的德国柏林。

“语联”成立时,为了掩人耳目,曾经改头换面地以“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的名义在左翼刊物《文艺新闻》上发表过一条成立的消息。但它终究是一个地下组织,无法进行公开活动。后来,便利用世界语本身并无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世界语运动内部本身也并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这些特点,合法地进行活动。首先,为了引起公众对世界语的兴趣,于 1932 年 12 月以中国世界语函授学社的名义举办了一次公开的世界语展览会。在开幕那天还在上海的大报上刊登了醒目的广告。配合这次展览,世界语刊物《世界》创刊号也赶印出来了,并在展览会上与读者见面。展览会获意外的成功,参观人数达 1000 余人,绝大多数是没有学过世界语的年轻人。此时,成立一个群众性的世界语团体的条件已经成熟。1933 年 1 月 22 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正式成立。虽然名义上它只是一个地方性组织,实际上却在全国各地都有会员,因而起着全国性团体的作用。上海世协成立后,经常开办世界语讲习班,每次开班都在《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上刊登招生广告。那时来参加学习的青年为数不少。据 1933 年统计,“世协”有会员 424 人。此外,还开办了世界语书店,除了出售一般的世界语出版物外,也经销有革

命内容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等的世界语译本。那时在“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领导下有一个名为“革命世界语书籍合作出版社”的出版机构,专门出版革命的理论 and 文艺书籍。上海世界语书店就从它那里进口这些书,同另外进口的一些马列主义原版书一起出售,这就为国内世界语者开辟了一条接触革命思想的渠道。

1933年9月10日,由“语联”领导的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举行第二次大会,在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全中国世界语者的意志,因而很快就成了那时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战斗纲领,而每期封面上印有这个口号的《世界》也就成了全国世界语者的一面旗帜。

“语联”办的《世界》虽然是一份完全公开的刊物,但是它的进步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例如,日本革命世界语作家绿川英子为《世界》所写的有关日本情况的文章就很有战斗性。1933年,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受国际反战大会的委托打算率领一个调查团到中国,在上海与宋庆龄一起召开一个有各国代表参加的反战大会。“语联”就以巴比塞是世界语的积极支持者以及世界语一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为由,在《世界》上发表了一系列欢迎巴比塞、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文章。后来因帝国主义者的破坏,使巴比塞未能成行,但这些文章是有影响的。希特勒上台以后,“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遭到破坏,《世界》上就用世界语提出了“打倒法西斯”的口号。

《世界》在它的副刊“文学”版上用世界语转载了若干中国的文学作品,其中有鲁迅的《黑暗中国的文学界的现状》、《野草》中的

《题辞》和《这样的战士》，郭沫若的《女神》和《橄榄》中的若干诗篇，艾芜的《南国之夜》和《用左手行礼的兵士》。古典文学方面有中国古代寓言和轶事（选自《列子》、《韩非子》、《战国策》等古典作品），杜甫的《石壕吏》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日本的秋田雨雀为《世界》写了《回忆爱罗先珂》，记述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世界语者爱罗先珂两度去日本的情景。日本革命世界语作家绿川英子为《世界》写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现状》和一篇从日文译出的散文。1933年3、4月合刊的《世界》上，还发表了乌克兰作家古兹米契的《我们乌克兰作家是怎样描写中国的？》。

1936年9、10月合刊的《世界》第一版上，发表了鲁迅给《世界》的一封信，并在第二版上刊登了随信附来的《答〈世界〉社》这篇著名短文。文中写道：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间也早得很，怕有20来年了吧。但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它可以互相介绍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

那时“语联”是受国际革命世界语作家协会的委托向中国作家征询对世界语的意见。同期发表的还有唐弢、伯韩、周木斋、徐懋庸、张天翼、聂绀弩等几位作家应征的短文。

“语联”当时在国际上的联系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同“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有通信联系，而且同“国际”在一些国家的支部经常通信联系。“语联”的国际工作除了通信联络外，主要是编印一份中国国际世界语通讯稿。

在“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的领导下，很多国家的革命世界语组织都出版一份新闻稿，名为“无产阶级世界语通讯”。“语联”成立以后不久，就办起了这样一份通讯。那时中共在上海有一份向国内外发行的英文通讯稿，名为“工农通讯”，它经常报道有关中国苏区、中国工农红军以及中国革命斗争各方面的情况。这是“中国国际世界语通讯”编辑稿件材料的主要来源。此外，还从那时由外国人在上海主办的进步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以及一些公开的中文报刊上选编一些稿件。中国国际世界语通讯开始用手写复印，后来则用打字机打在蜡纸上油印。“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中国国际世界语通讯改为铅印公开出版，取名为《中国怒吼》。1936年至1937年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怒吼》每10天出版一期，分发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由于当时国外的报刊，即使是革命的报刊，很难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因此中国国际世界语通讯是相当受欢迎的。它的一些稿件不仅被转载在国外的革命世界语刊物上，而且还被译成各国文字刊登在各国的革命报刊上。例如德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红旗》和法共的《人道报》都译载中国国际世界语通讯上的材料。苏联的一些地方报纸和工厂里的墙报也把中国国际世界语通讯上的材料译成俄文或其他民族的文字刊登出来。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同盟》则往往把中国国际世界语通讯上的一些重要稿件译成日文油印成单页在群众中散发。

另外，“语联”也从“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主义者》以及各国的世界语通讯稿上选择一些文章译成中文在《世界知识》、《申报》星期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世界知识》刊登过一篇米丘林的文章，就是由叶籁士从苏联寄来的世界语材料上编译



出来的。关于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的斗争,也译过不少材料。

在《中国怒吼》公开出版后不久,世界语国际通讯刊物《无线电》在北平创刊。该刊经常向国外报道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受到国际世界语界的重视。

### (三)推广拉丁化新文字

从1933年冬季起,“语联”担负起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引进、宣传和推广拉丁化新文字。

瞿秋白在20年代末就开始研究汉字改革问题,当时他在苏联。1929年,瞿秋白起草《中国拉丁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在这个草案的基础上,经中苏两国学者的研究讨论(中国方面参加的有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用来在侨居苏联的10万华工中扫盲,效果很好。

1933年,当时在苏联的萧爱梅(即萧三)写了一篇《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被译成世界语登在国际革命世界语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新阶段》上。那时“左联”办的公开刊物《文学月报》上正在讨论大众文艺问题,宋阳(瞿秋白)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一文中提出了用罗马字(即拉丁字母)拼音的问题。这引起了当时在汉口的世界语者焦风(方善镜)的注意,把萧三的那篇文章译出,由中外出版公司以《国际每日文选》第12号出版。与此同时,上海《大晚报》登了塔斯社一条电讯:“海参崴苏联企业中之中国工人1500人,已在学习用拉丁字母阅读并书写中国文字。该新字母为苏联语言学家所创制,最近才供诸实用。平均言之,练习三个月即能识字。目前海参崴华侨之驱除文盲工作,进行异常迅速。”

萧三的文章和塔斯社的电讯,引起了“语联”的注意,便在

1933年9月号的《世界》上登出了一条用世界语写的启事,要求苏联世界语者向中国提供有关中国新文字的资料。同年年底,就开始收到苏联寄来的资料。乌克兰语言学教授依萨霍夫还寄来了用世界语写的论文《苏联各民族文字拉丁化和汉语书法拉丁化》,并把它译成中文在《世界》上发表。接着又陆续收到在苏联出版的有关新文字的文件、方案、写法规则、课本、字典、检字、读物和文艺作品,还有全部用新文字编印的《拥护新文字六日报》。

当时上海文化界的陈望道等为了反击国民党提倡文言、读经的复古运动,发动了一场大众语的讨论。“语联”的成员参加了这个讨论,并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只有实行新文字,才是大众语的正确解决办法。这个主张立即得到鲁迅的热烈支持。鲁迅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用极大的热情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这方面的文章有《答曹聚仁先生信》、《门外文谈》、《汉字和拉丁化》、《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论新文字》。

1935年8月,“语联”出版《SIN WENZ》(新文字),由叶籁士和王鹭如(王益)担任编辑出版工作,这是国内第一个宣传和讨论新文字问题的半公开刊物,共出了七期。1936年改出《中国语言》,由胡绳编辑,出了几期也停了。1937年1月,新知书店出版《语文》月刊,由叶籁士编辑。这是一个宣传、讨论汉字改革和国际语问题的公开刊物,共出了七期,到抗战爆发停刊。《语文》除发表有关汉字改革和国际语的理论文章外,还组织了一次关于通俗化问题的讨论。在《语文》上曾经发表过日本斋藤秀一的文章《日本的汉字限制》。斋藤是日本共产党员、世界语者,大学毕业后回乡当教师,积极提倡日文拉丁化,并热心支持中国的拉丁化运动。他曾出版过介

绍中国汉字改革的著作,并在日本为中国拉丁化运动募捐,因而遭到日本当局的迫害。

1936年初,“文总”通知所属各联盟解散,也通知了“语联”。“语联”没有执行这一个决定,因为当时对外国宣传要加强,不能中断;要对“世界语者国际”、对几十个国家的兄弟组织负责,不能就这样解散。一直到上海沦陷为孤岛,继续工作已不可能,“语联”才告结束,并决定一部分成员到大后方继续工作。

---

## 第六节 东京“左联”分盟的活动

### (一)东京“左联”分盟前期的文化活动

1930年“左联”在上海成立后,“左联”成员华蒂(叶以群)从国内去东京,与任钧、谢冰莹等商量成立一个东京“左联”分盟,一是便于与国内“左联”取得经常联系、互通消息,以免与国内文坛疏远、隔绝;二是便于与日本的革命文学组织“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及其所属进步作家取得联系。于是在征得国内“左联”负责人同意后,东京“左联”分盟就成立了(以下简称分盟)。成员除华蒂等以外,还有胡风、聂绀弩等十余人。

分盟成立不久,即迅速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取得了联系。此后,他们经常邀请分盟成员参加他们的一些会议。分盟成员在会上向他们介绍了中国进步文艺界的现状及其斗争情况等,很受他们的欢迎。同时,分盟成员还把从国内寄来的左翼刊物,如《拓

荒者》、《文艺新闻》等赠送给他们。

稍后,分盟成员还参加了他们所属的诗人集会,出席的有森山启、上野壮夫等。他们在会上讨论有关诗歌的一些问题,并朗诵他们自己所写的作品。任钧与华蒂也在会上发言,介绍中国当时革命诗歌运动的进展情况,任钧还将自己写的一首题为《我听见了飞机的爆音》(曾在国内《北斗》上发表过)译成日文在会上朗诵。后来这首诗被发表在他们所办的诗刊上,并与日本诗人们的作品一同被编进一本以反侵略为主题的诗集里。

分盟成员还分别访问了秋田雨雀、小林多喜二、德永直、村山知义、森山启、中野重治、洼川稻子等等具有代表性的、活跃在当时日本左翼文坛的知名作家。如秋田雨雀是老一代的进步作家之一,曾访问过苏联。他的作品早就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小林多喜二写过著名的《蟹工船》,该书在日本出版后不久就被译成中文,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欢迎。他是当时日本共产党的党员作家,担任过党内的高级职务,1933年2月被捕后,很快被日本警察杀害。德永直是个印刷工人出身的作家,写过著名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这部长篇也曾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村山知义是个剧作家,曾写过许多剧本,其中有一部取材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名为《胜利的记录》,该剧写成后曾在东京上演。森山启和中野重治都是诗人,洼川稻子是女小说家,他(她)们的作品都曾先后被译成中文,对于中国当时的读者并不陌生。分盟成员华蒂、任钧等访问上述作家后,曾分别写过一些“访问记”,在当时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如1931年11月9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35号曾刊出他们所写的访问村山知义的记录。后来又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一部分。

华蒂等人在东京“左联”分盟的活动只有一年左右，“九·一八”事变后，华蒂、任钧、谢冰莹等先后离日回国，分盟也就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 （二）东京“左联”分盟后期的文化活动

1933年前后，从上海、北平到东京的中国文化界青年逐渐增多。他们于1933年12月，将停顿了两年的东京“左联”分盟重新恢复起来。恢复后的分盟成员有20余人，参加分盟组织的杂志社、剧社的同人则更多一些。分盟的负责人是林焕平、魏猛克、陈辛仁、孟式钧、林林等。在任白戈到东京前，由魏猛克同周起应保持与上海“左联”的联系。以后在东京成立“文总”，领导东京“左联”、“社联”、“剧联”等团体，任白戈、林为梁任“文总”书记。

东京“左联”分盟以主要精力办了几种杂志，如《东流》、《杂文》（后改名为《质文》）、《诗歌》。鲁迅生前曾在信里指出：“‘左联’东京支盟办了几个杂志，很不错，1935—1936年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左翼作家的文章无处发表，有些就拿到东京发表去了。”

《东流》月刊创办于1934年8月，编委有林焕平、欧阳凡海、陈斐琴、林为梁、陈一言等。《东流》在东京编辑，由上海杂志公司印刷发行，是以小说、散文为主的文艺刊物。1936年停办（何月不明）。它注意介绍外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先后登有鲁迅的文章《妥斯退夫斯基》（译自日本杂志《文艺》2月号）、日本米川正夫《妥斯退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上的位置》的译文、邢桐华研究托尔斯泰的文章《安娜加列尼娜的构思和思想》，另外还请秋田雨雀写了一篇《创作技术问题》，转载有林林译的德永直的短篇小说《不灭的光辉》、中条百合子的素描《将到东京一点钟》。当时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对此

刊物非常支持,1935年10月他在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的讲演——《中日文化的交流》就登载在这个杂志上,他因东京上演的《雷雨》而写的《关于曹禺的〈雷雨〉》一文也登在这个杂志上。郭沫若还为《东流》写了历史小说《贾长沙痛哭》。

1935年5月,东京“左联”分盟主办的又一个杂志《杂文》月刊创刊。《杂文》的具体编辑工作由魏猛克、陈辛仁负责,孟式钧、任白戈、杜宣参加编委会。魏猛克和陈辛仁曾担任东京“左联”分盟干事会的干事,《杂文》每期的主要内容都在干事会上讨论过。《杂文》在东京印刷,由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发行。

《杂文》组织了一次关于文学遗产的讨论。那时苏联文艺理论界提出古典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矛盾的问题,日本文艺理论界也有人提出继承文学遗产不是学古典作家的反历史的思想意识,而是学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综合形式。《杂文》社内研究文艺理论的同人为此进行了讨论,并访问了日本文艺理论家高冲阳造。高冲所主张的学习古典作家的艺术综合形式,是包括语言、样式、处理方法(包括取材、人物类型塑造等)在内的。《杂文》社同人讨论后,认为单说学习艺术综合形式和单说学习认识方法都有片面性,应该是学习古典作家从认识到艺术表现过程的优点、长处。为此,沈其薰、孟式钧、陈辛仁等都写了有关文学遗产的文章,解释这种说法。后来,还就这个问题向秋田雨雀请教。

《杂文》出版到第3期就被国民党反动政府禁止,日本当局也和国民党互相配合,向《杂文》提出严厉警告。日本警方还对《杂文》、《东流》一些写稿人和编辑进行搜查、传讯警告。《杂文》从第4期起,遵照郭沫若的提议,改名为《质文》,郭沫若亲自为它书写刊

名,仍在东京印刷,寄回国内发行。但出至第4期又被迫停刊。后来只好到上海出版,但仅出1期,又遭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止。

《质文》每期都有郭沫若写的2篇到3篇文章。《质文》体裁多样,页数比《杂文》多2倍,更重要的是译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论文。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逝世,《质文》编出了纪念特辑,郭沫若带头写了《人文界的日蚀》的纪念文章。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质文》又编辑了追悼专辑。郭沫若写了以《民族的杰作》为题的文章,并代表《质文》社同仁手书哀悼鲁迅的挽联。

回顾《杂文》社活动期间,正当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会议之后,那次会议批判了过去“拉普”的一些文艺理论和宗派主义的文艺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口号,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东京“左联”分盟和《杂文》社的同人,感到这对中国新兴文艺是很好的借鉴,因此在1935年就决定译出一系列马列主义的和当代苏联的文艺理论丛书,于是提出文艺理论丛书第1辑10册的题目,并请示了郭沫若,他竭力支持。这套文艺理论丛书的作者及译者是:《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卡尔·马克思著,郭沫若译)、《现实与典型》(罗森达尔著,张香山译)、《现实主义论》(吉尔波丁著,辛人译)、《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罗森达尔著,孟克译)、《文学论》(高尔基著,林林译)、《作家论》(恩格斯著,陈北鸥译)、《批评论》(倍斯巴洛夫著,辛人译)、《科学的世界文学观》(西尔列尔著,任白戈译)、《艺术史的问题》(高漱、甘粕著,辛苑译)、《文化拥护》(纪德等著,邢桐华译)。这套丛书在出版的“缘起”中说:作家应该把握住科学的理论,以认识和表现社会主义的现实;理论也应该以现实和作品去丰富它的内容。过去介绍过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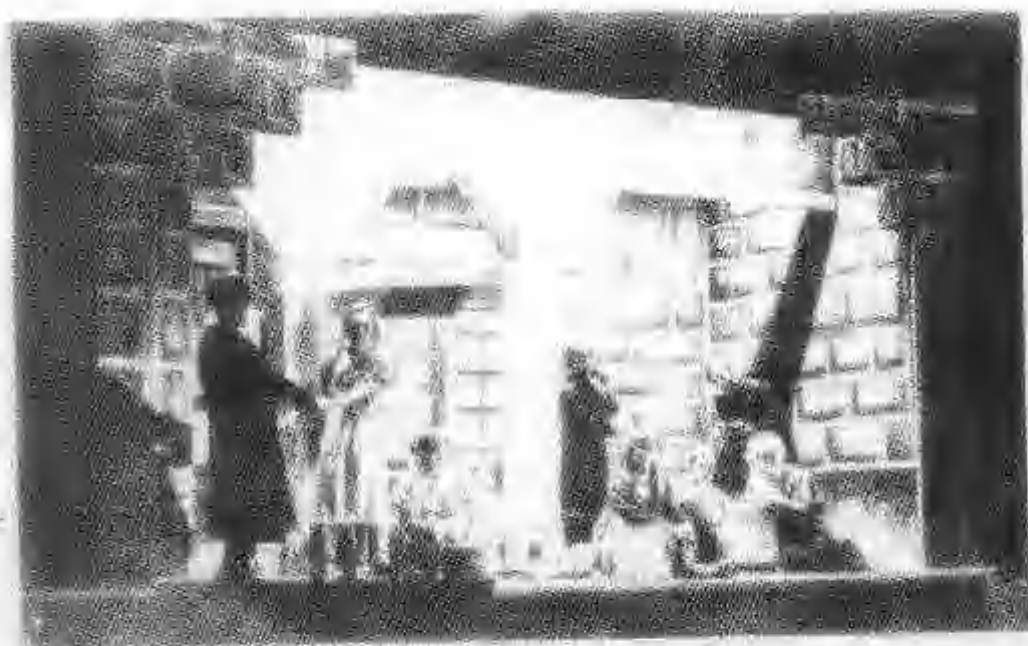
1935年,东京“左联”分盟《杂文》社同人合影。



东京“左联”分盟《质文》社同人和郭沫若(前排中)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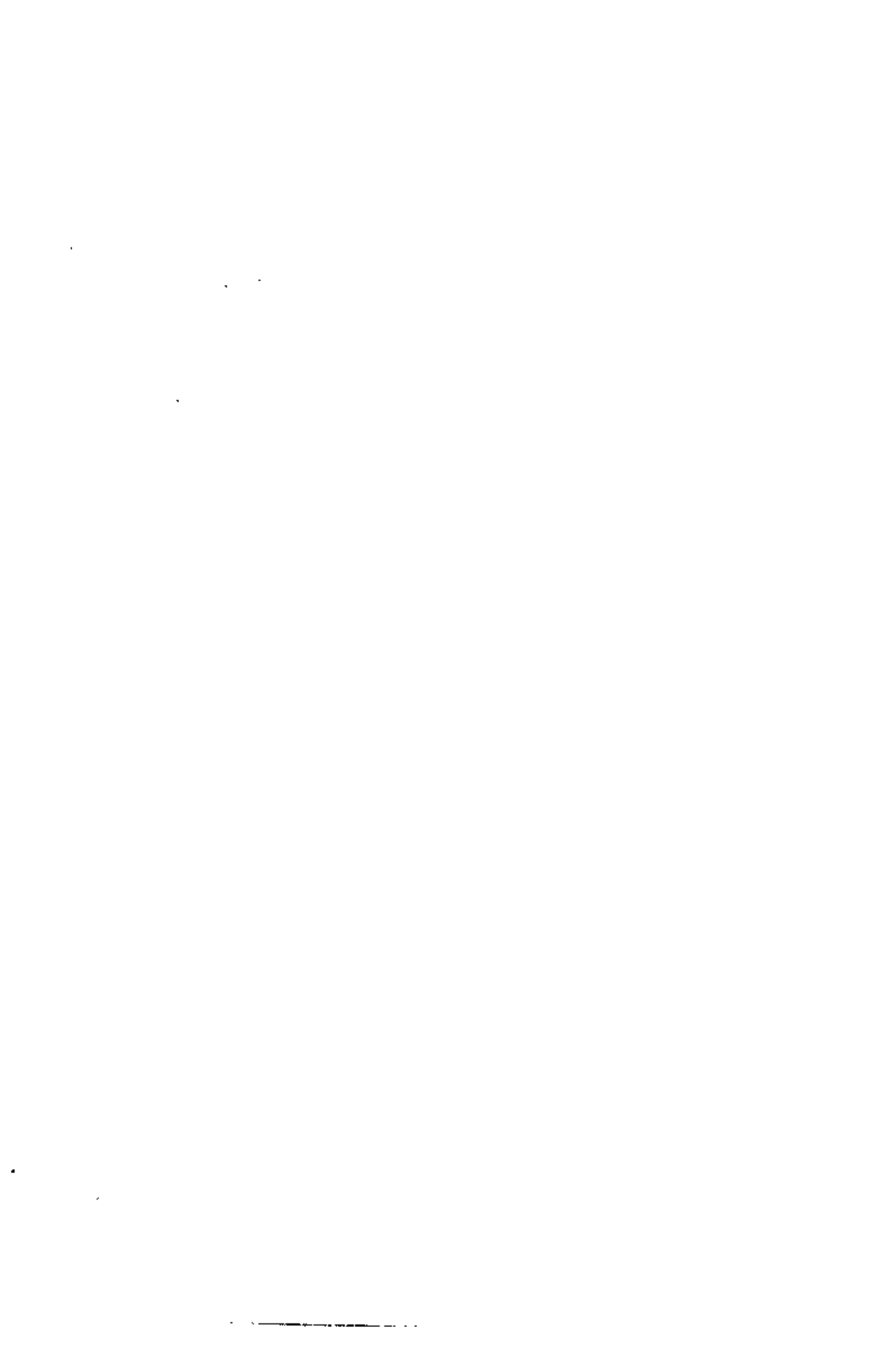




三十年代留学东京左翼  
活动分子演出《复活》剧照。



三十年代留学东京的左翼团体演出后与日本左翼  
作家秋田雨雀(前二排右起第十人)等合影。



基、费理契、梅林格诸人的文艺理论,现阶段的文艺理论又有新的发展,因此有引进研究的必要。这套文艺理论丛书的译稿于1936年1月带到上海,由光明书店先后出版。

东京“左联”分盟还出版诗刊《东京诗歌》,在东京印刷,由蒲风、林林、林蒂、雷石榆、陈子谷、陈紫秋、魏晋、蔡北华、戴何勿等参加写作。这个刊物的主要内容,除诗作外还发表一些诗论,同时介绍德国诗人海涅、美国诗人惠特曼和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别林纳依等人的诗作。另外还出版了东京《诗歌》丛书之一,蒲风的长篇小说诗《六月流火》,还有陈子谷的《宇宙之歌》。

这时在东京的留学生组成的文艺团体,除了3个刊物(《杂文》、《东流》、《诗歌》)外,还有3个戏剧团体:戏剧座谈会、留学生戏剧学会和国际戏剧协会。戏剧座谈会的成员是任白戈、杜宣、吴天、凤子、李珂等。留学生戏剧学会的成员是陈北鸥、梁梦回(即梁延武)、田丰等。国际戏剧协会的成员是陈斐琴、吴剑声、叶文津等。戏剧座谈会在东京上演了曹禺的《雷雨》和田汉的《洪水》等话剧,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引起良好的反应。演出得到日本左翼剧作家秋田雨雀和藤森成吉的热情支持。

除东京“左联”分盟的活动外,社会科学、世界语等方面也有座谈会的组织和刊物。社会科学座谈会的主要成员有林为梁、宫亦民、陈健、李云扬、梁威林、苏曼、周如博、侯甸等。户坂润主编的刊物《唯物论研究》,用日文发表过在中国国内未能发表的文章。何干之的一本关于中国社会史的书稿也是由原稿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的。世界语组织的主要成员有陈健、丁克、陈学诗、陈紫秋、刘仁、苏曼、侯甸、杨克毅、蔡冷枫等,他们当时与日本友人秋田雨雀、中垣

---

虎二郎、伊东三郎、绿川英子、伊藤中正、和野间勇以及日本世界语学会的冈本、三宅等人都有联系。

## 第六章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1927年,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篡夺了革命政权,为了巩固他的资产阶级专政,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的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以下简称国统区)的左翼文化运动也疯狂地展开了“围剿”,将进步的中外文化交流视作洪水猛兽,肆意摧残,严重阻挠了国统区文化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但是,尽管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由于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蹙,左翼文化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以及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发展,使中外文化交流无论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比过去有很大提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这个时期,“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7—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 第一节 国统区的中外文化交流

### 一、文学

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在国统区声誉最高、地位最重要的是左翼作家鲁迅和茅盾,他们的小说、杂文及其在国外的影响,已在第五章介绍。本章着重介绍老舍、巴金、李劫人和盛成的情况。

老舍(1899—1966),1924年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汉语教师。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他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其中他最爱读的是狄更斯、乌德豪司与哲扣布的。在英期间,他写下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6)、《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老舍旅居英国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胜利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因此他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

1930年3月,老舍回到祖国,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大学任教,讲授《文学概论》、《欧洲文艺界思潮》、《外国文学史》等课程。课余继续创作小说。这期间的创作有长篇《猫城记》(1932)、《离婚》(1933)、《牛天赐传》(1937)、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短篇小说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

这个时期他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0年代《骆驼祥子》译成英文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在美国,《骆驼祥子》是畅销书,1945年选入每月读书会书目。除英文外,还有日、朝、法、德、意、瑞士、西班牙、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瑞典、俄、拉脱维亚、哈萨克等外文译本。

老舍的创作,受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更与中国传统的民间文艺有深切的联系。后来又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族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所以备受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国际的影响。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研究老舍的论文和著作。

巴金(1904~ ),在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广泛传播的热烈气氛中,他接受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也从克鲁泡特金《告少年》、廖抗夫《夜未央》和爱玛·高德曼的文章中,受到了无政府思想的影响。1925年,巴金中学毕业后在上海养病,参加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同时翻译了克鲁泡特金《面包略取》等无政府主义著作,并在《学灯》、《民钟》、《洪水》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一直到20年代末,他以很大的兴趣和精力从事这方面的文字工作,成为这种社会思潮的一名热情的宣传者。



1927年2月,巴金到法国留学,更广泛地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义思想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俄国虚无党人的主张和行动也使他深受鼓舞。1927年8月,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抗议,处死被巴金奉为“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工人樊塞蒂,更使他感到震惊。在极度的痛苦与矛盾中,巴金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

《灭亡》于1929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他又创作了《灭亡》的续篇《新生》。1931年至1935年巴金完成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同一时期,巴金还写了中篇小说《砂丁》、《萌芽》(后改名为《雪》),着重反映矿工的苦难与斗争,寄托作者对被压迫工人的深切同情。

巴金在这一时期的创作高峰是1931年写的《家》。《家》与后来创作的《春》、《秋》合起来称“激流三部曲”。

巴金在旧中国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写下400多万字的作品,一直在读者中广为流传;一部分作品已译成英、俄、日、法等十余种外文,受到国外读者的欢迎。他还从世界语、英、法、俄等六种外文书籍中,翻译了屠格涅夫、赫尔岑、高尔基、王尔德等人的作品。

国外对巴金的评论和研究,有法国明兴礼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美国奥尔格·朗、内森·K·茅和苏联尼科尔斯卡娅等人的专著。日本发表过饭冢朗、立间祥介、常石茂、岛田恭子编写的多种巴金年谱。

李劫人(1891—1962),四川成都人。1919年底,李劫人到法国勤工俭学,学习和研究法国文学,以很大的精力从事译作。留法期

间,他为国内的报刊写散文和通讯,并创作了日记体中篇小说《同情》。回国后,1925至1933年间,他一面在大学任教,一面翻译和改译了一些法国文学作品,创作了十余篇短篇小说,其中《编辑室的风波》曾被茅盾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从1935年5月至1937年6月,李劫人陆续写成三部各自成篇而又具有连续性的长篇历史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这三部小说被郭沫若称之为“小说的近代史”。

李劫人又是一位勤奋的翻译家,从1921年至1949年,翻译法国长、短篇小说和剧本20余种。主要有莫泊桑的《人心》,都德的《小东西》、《达哈士孔的狒狒》、卜勒浮斯特的《妇人书筒》,福楼拜的《马丹波娃利》、《萨朗波》,埃德蒙·德·龚古尔的《女郎爱里沙》,法莱士的《文明人》,维克多·马尔格里特的《单身姑娘》,罗曼·罗兰的《彼得与露西》,左拉的《梦》(合译)。

## 二、话剧

### 1. 话剧的传入和发展

话剧是20世纪初从欧洲移植到中国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话剧传入中国后,许多老一辈作家如田汉、欧阳予倩、丁西林、熊佛西等做了许多工作,写了不少好的作品,为话剧开拓了一条新路。但真正能够在中国话剧史上开一代新风,使人耳目一新的剧作,还是曹禺的《雷雨》。曹禺的《雷雨》、《日出》标志着30年代中国话剧的最高成就。下面着重介绍曹禺30年代的剧作及其在国外的影响。

### 2. 30年代曹禺的话剧创作

曹禺(1910—1996),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攻

西方语言文学。在此期间,他曾被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鲁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所深深吸引,也曾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十分着迷,还非常喜欢契克夫、奥尔尼等人的剧作。所有这些作家都给他后来的戏剧创作以影响,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提高了他的艺术表现力。1933年,大学行将毕业时,曹禺根据少年时代的生活积累,借助多年学习欧洲戏剧艺术所掌握的技巧,写出了他的处女作《雷雨》。这部作品由巴金推荐,1934年7月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雷雨》的问世,使中国有了足资同世界优秀剧作相媲美的话剧作品,它是中国话剧艺术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1935年4月,《雷雨》首次在日本东京演出。当时在日本的两位关注中国文坛的青年学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看过《雷雨》剧本后,深深为之感动,便带着《文学季刊》一起去找左翼文学青年杜宣,在一起热烈讨论起来,一致认为《雷雨》虽受到欧洲古代命运悲剧和近代易卜生的影响很大,但它是中国的,是戏剧创作上的重要收获。于是便决定把《雷雨》搬上东京舞台。杜宣找了吴天、刘汝醴来一起担任导演。

1935年4月27日、28日、29日,《雷雨》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首次公演。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得到了日本左翼戏剧家秋田雨雀的帮助。

1936年1月,《雷雨》日译本由日本汽笛社出版。1981年8月,影山三郎在《悲剧喜剧》(370—373期)上发表连载文章,回忆《雷雨》日译本产生的过程。《雷雨》在东京演出后,影山三郎在《东大新闻》上发表一篇介绍《雷雨》的文章,很快在中国留学生中传开,并由此结识了郑振铎,两人出于对翻译的共同爱好,决定把《雷雨》译

成日文。与此同时,日本左翼戏剧家秋田雨雀从影山三郎介绍《雷雨》的文章中得知中国留学生公演新剧的消息,便说以后有再演出的消息,务必通知他。这话传到影山的耳中,使他们得到很大的鼓励。《雷雨》于1935年10月12日、13日第二次公演,邀请了秋田雨雀观看。后来,影山将《雷雨》译稿送秋田雨雀审阅。四五天后,秋田雨雀寄来了“已读完”的明信片,并很快给汽笛社的三上於菟吉写了明信片:“非常好,请出书。”就这样,《雷雨》日译本很快由汽笛社出版了。秋田雨雀不但支持《雷雨》的出版,并且在即将出书前在《汽笛新刊月报》(1936年1月19日第7号)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悲剧〈雷雨〉的出版》一文。

继日译本《雷雨》问世,英译本《雷雨》也由姚辛农(姚克)翻译出来,刊登在1936年10月出版的《天下》英文月刊上。姚辛农在英译本序言中称赞曹禺是中国剧坛升起的一颗新星。1937年初,美国著名戏剧家、耶鲁大学教授亚历山大·迪安来华考察中国戏剧,在南京访问曹禺,曹禺把英译本赠送给迪安教授,受到迪安的热情赞许。

1935年,曹禺又完成了四幕话剧《日出》。

《日出》的发表,引起的反响较之《雷雨》更为热烈,更为迅速。当时由萧乾负责《大公报》文艺副刊栏,他独具卓识,以很大的气魄,组织国内著名的作家笔谈《日出》,选择了最好的时间,正是1937年元旦即将来临之际,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出笔谈文章。参加讨论的还有燕京大学美籍教授谢迪克等。谢迪克的意见尤其引人注目,他对《日出》评价很高:“《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不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

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日出》获得了《大公报》的文艺奖。

《雷雨》和《日出》的相继问世，震动了当时的剧坛，也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表明他是一个有才能、有特点的戏剧家。

此后，曹禺又创作了《原野》(1936年)、《蜕变》(1940年)、《北京人》(1940年)、《家》(1942年，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等有影响的剧作。

曹禺的剧作先后多次被搬上外国舞台。日本早就演出过曹禺的剧作，曹禺的剧作在日本翻译出版的亦较多。

在中国话剧艺术发展和成熟期，李健吾、陈白尘、袁牧之、熊佛西也都创作出了一批较好的话剧，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 三、京剧

20年代和30年代是中国京剧高度成熟和非常兴盛的时期，并跻身世界戏剧艺术之林，其中造诣最深和向海外传播贡献最大的杰出代表是梅兰芳。

梅兰芳(1894—1961)，诞生于一个名伶世家。8岁开始学戏，10岁登台，14岁正式搭班演出，在北京崭露头角。1913年和1914年秋，两次到上海演出后名噪南北，并且引起日、美、英等国观众的关注。1915年后致力于创演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以及整理并演出京、昆传统剧目，大胆革新，至20年代初逐渐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梅派”。

梅兰芳又是向海外传播京剧艺术的先驱者。他的表演艺术受到国外广大观众热烈的欢迎和文艺界的高度评价。通过他的努力，不仅使京剧艺术跻身世界戏剧之林，而且也使外国戏剧家从中受

到启迪。

访问日本：

1919年4月梅兰芳率领剧团29人离京赴日，同年5月1日至12日在东京帝国剧场演出12场，剧目为《天女散花》、《御碑亭》、《黛玉葬花》、《虹霓关》和《贵妃醉酒》。在东京演出成功后，又赴大阪演出两场，剧目为《思凡》、《御碑亭》、《琴挑》、《天女散花》。随后又应神户华侨兴办学校筹募基金之约赴该市演出3场。

关于京剧艺术，日本评论家写了不少文章，大多认为京剧的规范朴素大方，特有的形式美和象征美，要比写实的戏剧更为鲜明，更带有本质性。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狩野君山、滨田青陵和戏剧家青木正儿也纷纷著文介绍中国古典戏剧的源流演变和梅兰芳的艺术创造，并由汇文堂书店辑为《品梅记》行世。当时北京的报章报道说：“彼都士女空巷争看，名公巨卿多有投高纾赠之雅。名优竞效其舞态，谓之梅舞。”

昆曲《思凡》一折，尤其获得日本戏剧舞蹈家的高度赞誉。《思凡》是一出唱做并重的歌舞剧。它描写尼姑赵色空，不愿过孤寂的日子，决心逃下山来，脱离佛门，追求美好的自由生活。她大胆激奋地唱出了“奴把袈裟扯破，埋了藏经，丢了木鱼，丢了饶钹”的心声，反封建色彩异常浓烈。色空手执拂尘，身段动作十分优美，载歌载舞，从容自然。日本著名舞蹈家藤荫静枝，看得如醉如痴，决心把《思凡》搬到日本舞台上。1921年由日本著名剧作家福地信世改编，藤荫静枝演出的《思凡》公演了，它正符合日本大正时期（1921—1926）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因之公演后引起很大反响，有

人要骂倒，有人则热烈欢迎，给日本的新舞蹈运动以巨大影响，藤荫静枝因此被称为新舞蹈运动的觉醒者。

1924年10月，东京帝国剧场因遭关东大地震破坏后重新修复，再次邀请梅兰芳赴日演出，以举行隆重的开幕式。梅兰芳遂应邀在帝国剧场演出15场，剧目是《麻姑献寿》、《廉锦枫》、《红线盗盒》、《奇双会》、《审头刺汤》、《虹霓关》、《御碑亭》、《黛玉葬花》和《贵妃醉酒》。

梅兰芳后来又在大阪和京都演出6场。当时大阪市的小阪电影制片厂还为梅兰芳拍摄了《红线盗盒》、《廉锦枫》和《虹霓关》三剧的片断，在日本各地放映。日本蓄音器商会还为梅兰芳录制了5张唱片（包括《红线盗盒》、《御碑亭》、《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廉锦枫》和《六月雪》的唱段），在日本出售。

访问美国：

梅兰芳早在20年代初就有意将京剧艺术介绍给美国人民，同时也想借机考察一下西方戏剧情况。两次访日的演出成功，增强了他的信心，经过七八年的艰辛筹备，终于在1929年冬率领梅剧团24人赴美演出。他带去的剧目有《汾河湾》、《虹霓关》、《廉锦枫》、《贵妃醉酒》、《打渔杀家》、《春香闹学》、《刺虎》、《天女散花》和《霸王别姬》，以及剑舞（《红线盗盒》）、杯盘舞（《麻姑献寿》）、羽舞（《醉酒》）、镰舞（《嫦娥奔月》）、袖舞（《上元夫人》）等舞蹈节目，同时由齐如山、刘天华等执笔编写了《中国京剧的组织》、《梅兰芳》、《梅兰芳歌谱集》等著作，并译成英文，附上各种图片及中英文对照的文字说明，全面地向美国观众和艺术界介绍中国京剧和梅兰芳的表演艺术。

去美访问演出的准备工作非常认真细致。仅以曲谱介绍一项，即可见其一斑。为了使美国听众对京剧有谱可循，于是请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将要演出的《霸王别姬》、《贵妃醉酒》、《黛玉葬花》等剧目的唱腔谱成五线谱。刘天华非常认真，他请梅兰芳的琴师徐兰源、马宝明将戏曲唱腔先谱成工尺字，然后再翻成五线谱。为了准确，刘天华对照五线谱听徐兰源拉琴、马宝明吹笛进行核对，然后刘天华按五线谱拉胡琴请徐、马二位细听并进行订正，再请梅兰芳把戏文唱出来，刘天华按唱腔变化进一步更改，改后由刘天华拉胡琴给梅兰芳听，不妥之处再改。如此反复认真校正，用了半年多时间，终于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京剧五线谱《梅兰芳歌曲谱》。

梅兰芳去美前，在上海的告别演说中明白表示：“若至美国，中西鸿沟，便已划然。兰芳不惭，颇有宏愿，冀中西戏剧艺术，至少有接触之机会，故此遣预备之物品，其最重要者，即以中国戏剧为一根本之说明。”他的美国之行，十分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愿望。

1930年初梅剧团在纽约首演后，旋赴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和檀香山等城市演出，历时半年之久。斯达克·扬等美国著名剧评家纷纷撰文予以介绍和赞扬。美国学术界也非常重视梅兰芳的访问演出，许多大学校长和教授前往剧场观剧。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等校均邀请梅兰芳去作有关京剧的学术报告。南加州大学和波摩拿学院为表彰梅兰芳介绍东方艺术、联络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沟通世界文化所尽的力量，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卓别林、范朋克等著名电影明星和其他艺术家都与梅兰芳交流艺术经验，并结下了深厚友谊。

总之，梅兰芳访美演出，使西方各界人士亲眼目睹了富有高水



平的文学艺术价值的京剧,诚如 R·D·斯金南所说:“梅兰芳的艺术无疑超越了东西方之间所存在的障碍。”一扫自 18 世纪以来某些西方作者在评论中国戏曲时所发表的错误观点和带有偏见的谬论。

访问苏联:

1935 年 2 月,梅兰芳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率领梅剧团 23 人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进行演出访问,受到超过日、美之行的欢迎和更高的评价。当时苏联成立了一个接待委员会,成员包括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梅耶荷德、泰伊洛夫和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等人。梅兰芳带去了《打渔杀家》、《汾河湾》、《刺虎》、《宇宙锋》、《虹霓关》、《贵妃醉酒》,以及《红线盗盒》中的剑舞、《西施》中的羽舞、《麻姑献寿》中的袖舞、《木兰从军》中的戟舞、《思凡》中的拂尘舞、《抗金兵》中的戎装舞等节目。整个演出期间,京剧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甚至马路上的孩子,看到衣冠整洁的中国人走过,都会喊一声“梅兰芳”,足见其影响之大。

苏联评论家发表了许多文章,指出梅兰芳多方面的才能,并强调他在发展中国戏剧艺术方面的巨大贡献,称他为“中国京剧的改革者”、“永远是勇敢的、真正的革新者,面同时又继承了伟大的传统”。《工人与戏剧》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梅兰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应被视为苏中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新的里程碑”。

30 年代借鉴西方戏剧经验进行京剧改革的,还有与梅兰芳齐名的程砚秋。

程砚秋(1904—1958),6 岁学艺,11 岁登台,13 岁倒嗓,处于极端困顿的境地。其后在诗人罗瘦公的帮助下,从师名伶王瑶卿、

梅兰芳等刻苦学艺,并广泛涉猎古典文学等多种艺术,演技突飞猛进,日见成熟。1922年10月赴上海演出,一唱而大红沪上并驰誉南北。其后独辟蹊径,奋力创演新戏,奋斗十余年,终于在30年代初形成独步一时、风采卓异的表演艺术风格,世称“程派”,与梅兰芳齐名。

1932年1月,程砚秋断然中止正值盛期的演出,舍弃巨额收入,赴欧洲游学和考察西方音乐戏剧。1933年4月归国后,出版发表了《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全面报告他在西欧考察戏剧的经历和西欧戏剧的现状与趋势,并联系中国戏曲艺术的改革进行对比借鉴,正式向全国戏曲界提出19条有关戏曲改革的具体建议,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他的戏剧观和艺术见解。

西欧归来后,程砚秋对自己创演的剧目不断进行筛选和提炼,《荒山泪》、《春闺梦》、《青霜剑》等剧目在不断提炼中列为保留剧目反复上演。尤其是1934年10月28日首演于北平“中和园”的《亡蜀鉴》,切时地传达出爱国主义和亡国之痛,使“九·一八”事变后的北平社会和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抗战爆发后,程砚秋多次坚拒日伪胁迫他演唱“义务戏”。1943年秋后归隐北平郊区青龙桥,直至抗战胜利才重返舞台。

#### 四、美术

在艺术领域西方化的倾向中,美术首当其冲,尤其在学校课堂教育中,引进西洋美术,对传统的中国画进行改革,立下光辉业绩的,首推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

##### 1. 徐悲鸿

如第三章中所述,徐悲鸿虽然远涉重洋去攻习油画,但他回国

后则把主要精力放在艺术教育与改良中国画方面。“改良中国画”，这是他早就立下的宏愿。当他一踏上欧洲的土地时，便撰文提出了“中国画改良论”。他认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已极矣”，必须改良之。

徐悲鸿不仅在改良中国画和创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体系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他又是热心向西方传播中国美术文化的开拓者。1933年1月，徐悲鸿应法国国立美术馆邀请前往巴黎举办中国画展。他带了数百幅近代中国绘画，其中有他自己的作品和收藏，有当代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代表了中国近代绘画的各种流派。

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于1933年5月10日在巴黎国立美术馆正式开幕。开幕式上有法国各界人士3000多人前来参观和祝贺。展览期间，展览目录印制了三版，观众达3万人以上。此外，英国、西班牙甚至美洲一些国家，也都有文章介绍和报道，足见中国绘画在欧洲和美洲所引起的强烈震动。展览闭幕后，法国购藏中国画15幅，有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高奇峰、王一亭、经子渊、陈树人、汪亚尘、吕凤子、张书旗、郑曼青等人的作品，并在法国国立美术馆辟专室陈列。

接着，比利时邀请徐悲鸿前往举办徐悲鸿个人画展。在那里，徐悲鸿的作品受到比利时人民的高度赞扬。

不久，又应意大利邀请，在米兰举办了“中国近代绘画展览”。意全国报刊一致赞扬中国绘画艺术的精湛技艺和伟大成就，并把画展盛况拍摄成电影，在全国放映。一家报纸评论说：“这是继马可·波罗之后，中意文化交流的又一高潮。”

随后，德国柏林美术会邀请徐悲鸿举行他个人的作品展览。柏林美术会全体会员举行公宴欢迎徐悲鸿。画展期间，柏林的报刊、杂志有 50 多种开辟专栏介绍和评论徐悲鸿的作品。他们的评价很高，推崇备至。接着，徐悲鸿又应邀到法兰克福举办个人作品展览，隆重的开幕式由法兰克福大学校长主持，并由法兰克福市举行公宴表示欢迎。画展历时两周闭幕。许多观众纷纷要求延期。

在德国展出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又邀请徐悲鸿赴苏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1934 年 5 月 1 日，画展在莫斯科的历史博物馆开幕，在开幕式上，徐悲鸿应苏方要求为观众作了一次画马的现场表演。开幕当天，观众挤满了艺术大厅，苏联骑兵元帅布琼尼也兴致勃勃地出席。布琼尼素有爱马之癖，他挤在观众之中，全神贯注地看着徐悲鸿当场画马。只见徐悲鸿从容地吮笔理纸，行笔走墨，挥洒自如，转眼工夫，一匹势不可挡的奔马便跃然纸上。整个艺术大厅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布琼尼激动得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急忙拨开前面的观众，大踏步走到徐悲鸿面前，先向他行一个军礼，然后恳求说：“徐先生，就将这匹马送给我吧，否则我会发疯的！”徐悲鸿被布琼尼如此诚恳而幽默的话逗笑了，欣然点头，并落了款将“奔马”赠予布琼尼。

展览期间，徐悲鸿应邀到苏联美术协会、美术院校等处讲演，并与苏联著名画家涅斯切洛夫、版画家克拉甫钦科等交换作品，苏联著名雕刻家梅尔庆洛夫还将亲手制作的列宁面模赠予徐悲鸿。

莫斯科画展完毕，画展在列宁格勒最大的隐居博物馆举行。在列宁格勒，徐悲鸿结识了苏联著名汉学家亚列塞耶夫，他专门研究中国古汉语，曾把中国人都很难读懂的《易经》译成俄文。徐悲鸿还

在列宁格勒结识了老画家李洛夫。他还访问了苏联老一辈画家中艺术最卓越的涅斯切洛夫。

徐悲鸿于1934年8月17日回到上海。他带回了极珍贵的列宁和托尔斯泰的面模，也带回了很多西方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们的美术复制品颁赠给学生们，其中有大量的俄罗斯巡回派艺术大师列宾、苏里科夫等人的作品复制品，如《伊凡杀子》、《扎波罗热哥萨克给苏丹王写信》、《近卫军临刑的早晨》、《贵族莫洛卓娃》等等。徐悲鸿是第一位将俄罗斯巡回派的作品介绍给中国美术界的画家。

徐悲鸿离开苏联前，曾建议苏联艺术家到中国举办展览。他的建议促成了1935年在南京和上海举办苏联版画展览。他为展览会撰写的序言说：“艺术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反映和民族思想的表征。……世界各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和互相友好的感情应当从文化交流开始。”

1940年春，徐悲鸿应印度诗哲泰戈尔之邀请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泰戈尔是印度文学泰斗，也是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在文学、音乐、绘画等方面都有成就。他是近代印中文化交流的开拓者。1924年4月至5月，泰戈尔应邀来中国作学术讲演并访问北京、上海等地，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成为印中人民友好交流的一段佳话。回国后，他除了宣传印中友好外，还在他主办的国际大学里创立了研究中国文化的专门机构——中国学院和全印最大的中文图书馆。徐悲鸿在国际大学所在地——圣蒂尼克坦，和泰戈尔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在印度，徐悲鸿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以取得印度人民的同情和了解。他在那里除了给国际大学的美术学

院讲课和从事社交活动外,还为国际大学的许多学生以及一些民间艺人画了速写,如《鼓者》、《琴师》等等;他还为泰戈尔画了十多幅素描、速写、油画以及中国画的肖像。

1940年2月17日,印度圣雄甘地访问圣蒂尼克坦。泰戈尔亲自将徐悲鸿介绍给甘地,并建议举办徐悲鸿个人的画展。徐悲鸿在拥挤的人群中,以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便为甘地画了一幅速写像,甘地高兴地在画上签了名。那天晚上,徐悲鸿参加了泰戈尔和甘地在广场上举行的祈祷。

徐悲鸿画展先后在圣蒂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两地举行。泰戈尔亲自为画展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徐悲鸿的作品。

1940年11月,徐悲鸿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向泰戈尔辞行。泰戈尔说:“我希望你行前,能为我选画。”泰戈尔60余岁才开始作画,到80岁时已作画2000余幅。他的绘画曾在巴黎、伦敦、莫斯科举办展览,脍炙人口。于是,徐悲鸿与国际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南达拉尔·鲍斯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将泰戈尔2000余幅作品一一检视,挑选出精品300余幅,最精者70余幅,交国际大学出版。

1940年11月,徐悲鸿告别印度,应吉隆坡、檳榔屿、怡保三地华侨的邀请前往举办为祖国抗战捐款的筹赈画展。1941年在上述三地先后举办的画展受到当地人民和爱国华侨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华侨以买到徐悲鸿的作品为荣。他把画展筹得的巨款,全部献给了祖国。

## 2. 刘海粟

刘海粟十分关心对外宣传中国文化。他曾说服中国驻法公使,拟邀请一些中国留学生筹组旅法艺术协会,在欧洲各国举行画展。

但因国内反动政府的反应冷淡,未能实现。他的作品《卢森堡之雪》被法国政府购藏后,引起德国人的兴趣。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邀请他去讲学。他的讲学获得很大成功。柏林学术界邀请刘海粟去柏林商谈向德国介绍中国艺术事宜。刘海粟在德国会见了德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绘画艺术,并当场挥毫示范。双方初步商定1934年在德国举办中国画展。为此,刘海粟中断了在法国的考察学习,返回国内筹备画展。在蔡元培、叶恭绰等社会名流大力支持和推动下,中国政府终于认可了这次展览,并聘请蔡元培和叶恭绰为筹委会正副主席,刘海粟、徐悲鸿、陈树人为常委。在美术界的支持下,筹委会选定了现代作品400余件、近代作品200余件赴德展览。

1933年底,刘海粟又赴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并印编《柏林人文学术馆所藏中国现代名画录》。此后,又在荷兰、瑞士、法、英等国的十多个城市巡回展览,震动全欧,使欧洲人了解中国艺术尚在不断前进。刘海粟除主持画展外,并作学术讲演,阐述“中国画与诗书”、“中国画中的六法论”等,生动而广泛地宣传中国传统艺术的特点。1933年至1934年刘海粟第二次欧游期间,他的中国画《三千蟠桃》、油画《西湖之秋》为法国国家画院所购藏,中国画《松鹰》、《葫芦》、《扁舟吟兴》也为德国柏林人文博物馆购藏。英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士·泌宁教授评论说:“刘海粟先生于中国水墨、西欧油画之法,均造诣深邃,足与近代欧洲诸大师并驾,其个人佳作,富丽精雅,迥然不同凡响。”

1934年1月,中国绘画展览在柏林市普鲁士美术馆正式开幕。刘海粟向国外宣传中国文化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展出期

间,盛况出乎预料。法国、荷兰、瑞士、捷克、西班牙等国以及德国莱茵河流域的各省都纷纷要求中国绘画展览能去展出。刘海粟电请国内扩大到欧洲各地展出,但得到的回答却是立即回国。他不计毁誉,不计个人得失,自己承担后果,继续在欧洲各地展出。在柏林,他还去看望了著名女版画家珂勒惠支,当时她正遭受纳粹分子的迫害,对中国客人来访,感到格外亲切。

柏林展出期间,观众达5万多人次,各地报刊发表的评论、报道和介绍文章达500多篇。柏林美术院还特辟中国名画厅,根据美术院的要求留下了17幅作品及部分纸笔长期陈列。柏林展览会结束后,刘海粟带着展品,先后到汉堡、杜赛尔多夫、海牙、阿姆斯特丹、日内瓦、伯尔尼、布拉格、巴塞罗那等地巡回展出,并应邀作了《中国绘画之变迁》、《何谓气韵》、《中国画家之思想与生活》、《中国画与诗书》、《中国画之精神要素》、《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等讲演。第二年春天,画展移到英国伦敦展出。大英博物馆馆长罗兰史·泌宁为展览会写的序文说,西方认为“中国两千年来流传不绝的艺术,在今日已成为绝响”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泰晤士报》也为展览会的成功发表社论说:“在欧洲人的眼光中,以为中国的现状仅仅是军阀捣乱、经济破坏、盗匪绑票、政治黑暗,以及天灾、饥饿等等,而忘记了中国人民是一个世界上最有文化的民族,是有着灿烂文化的古国之一。”

### 3. 张大千

张大千主张学画先临古仿古,而后走自己的路。所以开始时,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临仿石涛的作品上。1927年开始,他便“放眼江天外”了。他欲从大自然中吸取创作的灵感,八年间三度登临黄山。



30年代登临黄山的画人很多,但以大千为开路先锋,故有“黄山画派始祖”之称。除黄山外,张大千还历游华山、峨嵋、青城、三峡等名山大川。“昔年惟恐其不入,今则惟恐其不出”,他像石涛一样,师古而不泥古,“搜尽奇峰打草稿”,领略造化真谛,“集传统精英和生活灵秀于一炉”,一跃成为山水传神的高手。1933年,应罗家伦、徐悲鸿之邀,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但受不了一点拘束的他,仅干了一年就辞职。

1933年张大千的作品第一次由徐悲鸿携带出国,先后在巴黎、莫斯科展出。徐悲鸿称赞其画“实在令欧人向往”,“为国人脸上增光”,“故其(作品)《金荷》(被购)藏于巴黎,《江南春色》(被购)藏于莫斯科博物馆”。抗战期间,张大千两次去敦煌,用两年七个月时间研究和临摹魏、晋、隋、唐、五代绘画真迹;又深入青海、西藏内地作写山之行;抗战胜利后,为研究阿旃陀佛教壁画又去印度,并应邀在印度讲学和办画展。

张大千后期所创泼墨山水是其一生绘画的另一高峰,在海内外影响较大。他在古代泼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当代和西方审美因素,创作出既有传统神韵又有现代美的别具一格的泼墨山水。

## 五、电影

### 1. 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

20年代,中国电影有了比较快的发展。1925年前后,全国各地成立的电影公司多达175家,其中仅上海就有141家。当时中国影片在海外的最大市场是南洋一带,观众主要是南洋各埠聚集的华侨。

从1926年开始,以武侠为主流的国产片再度占领南洋市场,

徐琴芳、邬丽珠等武侠明星的名字在南洋风靡一时。30年代以后，一些反映阶级矛盾的优秀影片陆续进入南洋市场，《城市之夜》、《母性之光》等片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母性之光》在菲律宾马尼拉放映时，剧院还特地加上影片插曲的幻灯字幕，让观众的心情随着聂耳作曲的歌声一起振奋起伏。该片放映达一周之久，满座牌天天挂起，在马尼拉可谓盛极一时。

在国产片进入南洋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在艰难地进入欧美市场。1928年，民新影片公司出品的《西厢记》，以其浓厚的民族风格率先步入英美等国，当地新闻界相继发表文章，予以好评。

1934年，蔡楚生导演、“联华”摄制的《渔光曲》在上海连映48天，打破了国产片的上映记录。当时在上海访问的法国作家联合会副会长德化勒，以重金率先购得该片的全欧放映权，并制作了法文拷贝运往欧洲放映。1935年，《渔光曲》还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奖影片。其他如“联华”电影制片厂的《三个摩登女性》、“明星”电影制片厂的《姊妹花》都相继销往美国放映，但都因宣传不力，在营业上遭到失败。1936年，美国派拉蒙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购得了“联华”的《天伦》在美国的放映权，他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将影片按照美国人的欣赏习惯重新剪辑，另行配音，并将片名改为《中国之歌》。然后在宣传上也下了一番功夫，除了制作大量海报、广告以外，在开映的前一天，还由美国最负盛名的《纽约时报》出面，请当时在美国的中国著名文学家林语堂写了一篇名为《中国与电影事业》的宣传文章。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国之歌》于1936年11月9日在美国首映时，果然引起很大轰动，成为当时的一件盛事。

## 2. 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欧洲

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 30 年代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展览会的情况。

1935 年 2 月,苏联在莫斯科举行国际电影展览会。有 31 个国家的代表和影片参加。中国的“明星”、“联华”、“艺华”、“电通”4 家影片公司选了 8 部影片,由编剧、导演、摄影、制片、演员等 7 人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其中演员代表仅胡蝶一人。参加的 8 部影片是:《姊妹花》(“明星”出品,胡蝶主演)、《空谷兰》(“明星”出品,胡蝶主演)、《春蚕》(“明星”出品)、《重婚》(“明星”出品,胡蝶主演)、《渔光曲》(“联华”出品,王人美主演)、《大路》(“联华”出品,金焰主演)、《女人》(“艺华”出品)、《桃李劫》(“电通”出品,袁牧之、陈波儿主演)。在影展上,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受到了热烈欢迎,获得了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奖的影片。当时评委会对它作了如下评价:“联华影业公司的蔡楚生卓越地勇敢地把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优秀品质作了现实主义的描写。”

胡蝶主演的《姊妹花》、《空谷兰》亦在影展上受到了欢迎。

莫斯科电影展览会结束后,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了列宁格勒;以后又到德国参加国际电影会议,游览了柏林,并在德国放映了《空谷兰》。访德后,代表团又访问了巴黎、伦敦、日内瓦、罗马。访问伦敦时,也放映了《姊妹花》、《空谷兰》。代表团归国后,《姊妹花》、《空谷兰》曾在日内瓦公演,盛况空前,瑞士以及北欧诸国的华侨都驱车前来观看,有的竟是全家出动。

在访问伦敦期间,代表团还观看了旅英华侨熊式一改编的《王宝钏》的演出。熊式一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久为欧美文人所推崇。

他长期侨居国外,对介绍中国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宝钏》就是中国的京剧《红鬃烈马》。熊式一把它译成英文在英国公演,演出非常成功。该剧连演二年,卖座仍然不衰。1936年,又应邀到纽约演出。

## 六、音乐

### 1. 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播

西学东渐,新式学堂的出现和音乐课程的设立,在学校中逐渐购置风琴和使用五线谱来歌唱音乐作品。中国人从日本翻译各种钢琴、簧风琴的练习曲,并在1919年出版了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风琴教科书》。

辛亥革命后,俄国(1917年后是苏联)、英国、意大利的一些流动音乐团体曾在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演出,使中国观众能够直接欣赏西方的歌剧、声乐和其他乐器作品。1914年,北京创立的“中西音乐会”是成立最早的西乐团体,目的在于改良中国的戏曲音乐,并在中国传统戏剧音乐中引进西方音乐。此后,蔡元培倡导“以美育代宗教”,十分注重艺术教育,以美化心灵、陶冶性情,从此音乐和美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自1919年起,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许多爱好音乐的教师、学生,纷纷建立起各种新的音乐社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刘海粟、姜丹书等人发起的“中华美育会”,以及后来由柯政和、刘天华等人发起的“北京爱美乐社”和“国乐改进社”。这些社团对于介绍、传授现代音乐的知识和技能,培养音乐专业人才,以及活跃城市知识分子的音乐生活,做了不少启蒙和奠基工作。

不久,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科(1920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年)以及上海专科师范学校的音乐科(1920年成立,1922年改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等等。后来,在北京又成立了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1926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音乐系和上海大学的音乐系等。1927年在上海又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规模比较大、制度比较健全的独立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些音乐教育机构的办学方针,主要都是参照欧美的音乐教育体制,以传授西洋音乐知识和技能为其主要的教育内容。

随着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播,这时期各种音乐杂志以及报刊上,对于怎样建立我国的民族新音乐以及怎样对待传统的音乐遗产和民间音乐,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主张“以西乐为师”,走“西化”的道路。持这一派见解的人,对于民族音乐以及整个民族文化的认识,是比较强调它的落后和不科学的一面,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不一定对民族音乐都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当时我国音乐界中影响较大的一派。第二类认为只有中国古代礼乐是最高的音乐,因此他们主张“复兴国乐”。对于西洋音乐,他们有些人不敢公开反对,而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利用西乐作为手段,以达到其复兴国乐的目的。对于民间音乐,他们中的多数比较鄙视。显然,这种主张同当时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是相对立的。这两类见解的基本矛盾主要集中在如何正确对待中乐和西乐的关系上。

## 2. 中国现代音乐的开拓者

五四时期至 30 年代音乐理论研究造诣比较深的有王光祈、肖友梅、丰子恺、赵元任、黎锦晖等人。

王光祈(1891—1936),1920 年赴德国学习德文和政治经济学,1923 年后转学音乐,1934 年在柏林大学以《中国古代的歌剧》一文获音乐博士学位。1936 年病逝于柏林。在德期间,他除了写作和翻译了大量有关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方面的文章和资料外,还完成出版了 20 种音乐论著以及用德、英等文字编写的许多有关研究和介绍中外音乐的文章。

王光祈的音乐理论研究范围比较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和《翻译琴谱之研究》等著作。在介绍西洋音乐理论和技术理论方面,他也做了不少工作,如编写《西洋制谱学提要》(即作曲法)等十几种专门著作。王光祈的这些理论著作对当时人们系统地认识欧洲音乐文化及其理论,对促进人们重视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研究我国的民族遗产,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在中西音乐的交流上,他的许多著作向欧洲人打开了中国音乐的窗口,同时也对中国音乐的革新作了乐理上的处理研究。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位在音乐领域中努力进行探索的理论家。

肖友梅(1884—1940),1901 年赴日本学习钢琴,1910 年 10 月赴德就读于莱比锡音乐学院,并在莱比锡大学研究教育。1920 年回国后,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科任教。1927 年北京各艺术学校被军阀政府勒令停办后,肖友梅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校——国立音乐学院(后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并长期担任该

校校长。为了专业音乐教育和普通音乐教育的需要,他十分关心音乐教材的建设,编写了《普通乐学》、《和声纲要》、《新学制唱歌教科书》、《钢琴教科书》、《小提琴教科书》、《风琴教科书》等教材以及《古今中西音阶概论》、《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论》(即中国古代音乐史)、《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等论著。这些著作对当时音乐教育的普及提高,都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丰子恺(1898—1975),1914年入杭州省立第一师范,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自1926年开始,他从事有关音乐理论的编译工作,曾先后出版了《音乐入门》(1926)、《生活与音乐》(1929)、《音乐的听法》(1930)、《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1931)、《音乐的常识》(1935)等十多种著作。他的这些著作,对音乐理论知识的通俗化,在当时有十分广泛的影响。他的这些著作大多是根据日本的田边尚雄、门马直卫等人的通俗音乐论著编译而成的。丰子恺著作最突出的优点是善于用流利的文笔、浅显而又比较形象的语言,来阐述音乐史以及音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丰子恺的著作在当时曾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欢迎,对现代音乐知识的普及起了不小的作用。

赵元任(1892—1982)是我国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但对音乐也有相当的专业修养和创作才能。他利用业余时间一共写了近百首歌曲、一些合唱曲和一些钢琴小品等。他在现代音乐中国化方面做出了贡献。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音乐中,除了存在与世界音乐相共同的一些特点外,必须有它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国性”)都是值得加以保存与发展的。他在和声“中国化”方面进行了探索。例如在他的《海韵》、《教我如何不想他》、《上山》等作品

里,在和声的处理上,都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作曲家。

黎锦晖(1891—1967),1916年以后参加北京大学音乐团,并在那里学习西洋音乐。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因致力于改革普通音乐教育和推广国语的活动,才把自己的热情和关注投入于儿童歌舞音乐创作。当时,在儿童歌舞这个音乐领域里,以黎锦晖的作品影响最大。黎锦晖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由他自己编写脚本和歌词。他善于通过儿童的生活,抓住儿童的心理特点和兴趣选择题材,构思情节。例如在《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作品里,以人格化了的自然景物,向儿童述说了大自然的美丽和小动物的可爱;在《月明之夜》里则通过嫦娥下凡的故事宣传人间生活要比神仙世界更加幸福,启发儿童反对封建迷信;在《神仙妹妹》、《小羊救母》等作品中则表达了只要勇敢、机智、团结就能以弱胜强的思想;在《小小画家》里则批判了封建的反科学的教育制度,宣传了个性解放的思想。黎锦晖的作品大多数文字通俗易懂,情节的发展适合儿童的理解力,音乐语言比较简练、生动、明快,因此,他的儿童歌舞音乐当时曾迅速广泛流行于全国大小城市,对当时中小学的音乐有很大的影响。

### 3. 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建立和发展

我国现代的专业音乐教育,从五四时期开始建立,到30年代前后,出现了较为完善的、独立的音乐学院或音乐专科学校。上海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是师资力量较强、教学制度最正规、办学成果最突出的一所,在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引进西方音乐文化、培养我国音乐人才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冼星海、张曙、吕驥、贺绿汀、江定仙、喻宜萱、丁善德等一大批优秀音乐家,都曾在该校受过



专业教育。此外,马思聪、陈洪等于1932年春在广州筹办了广州音乐学院,设立钢琴、大提琴、小提琴、声乐等科目。这一时期附设性的音乐教育机构,如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燕京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学校中的音乐系,中央大学音乐系等,也在办学规模和教学质量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音乐教育的发展,提高了音乐的表演和欣赏水平,活跃了城市音乐生活,音乐院校举办的综合性音乐会增多,并出现了独唱、独奏、重奏音乐会。我国的歌唱家,如尚应能、喻宜萱、郎毓秀、蔡绍序、斯义桂、盛家伦等,演唱的歌曲被灌成唱片,扩大了流传范围。中国创作的曲目在音乐会上的比重增加,外籍音乐家在华演出活动也日趋频繁,这些迹象显示出30年代中国音乐艺术的新的生机。

## 七、舞蹈

20年代至30年代,国统区的大中城市,一方面是外国芭蕾舞、舞厅舞开始在小范围内流传,另一方面是中国的黄色歌舞盛行。新舞蹈艺术的疆场上,只有少数人在孤军作战。吴晓邦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吴晓邦1906年出生在江苏省太仓。1929年春,东渡留学日本,先在东京学习小提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大隈会堂看到了早稻田大学学生创作表演的舞蹈《群鬼》。这一舞蹈表现了吸血鬼、饿死鬼、冤死鬼等各寻出路,实际上是影射不同阶层人物的生活,揭露日本现实社会的黑暗。舞蹈深刻地表现了人们的内心世界,也深深触动了吴晓邦,从此他决心献身于舞蹈事业。

他曾先后两次入东京高田雅夫舞蹈研究所学习舞蹈,受到较

系统的芭蕾技巧训练,接受了现代舞的新艺术观念。1932年初,他短期逗留上海,办了半年的“晓邦舞蹈学校”,这是上海第一所舞蹈学校。1935年春,吴晓邦第二次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又办了“晓邦舞蹈研究所”,招收以电影演员、歌舞团员为主的少量学员。与此同时,他还为上海乐剧训练所教舞蹈和排练。

1935年9月,吴晓邦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作品发表会”,演出了《送葬》、《浦江之夜》、《傀儡》、《和平幻想》、《吟游诗人》、《小丑》、《爱的悲哀》等11个独舞节目,基本上是他在学生时期的习作。其中《浦江之夜》和《送葬》,都表现了劳动人民在苦难中的挣扎和对光明与新生的追求。《傀儡》吸取了木偶的动作姿态,影射听从日本操纵的“满洲国”傀儡皇帝,实质上抨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因而也受到观众欢迎。这些新舞蹈尽管艺术上还不成熟,也尚未被多数群众理解,但显示了吴晓邦的革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为了进一步学习现代舞,吴晓邦于1935年10月第三次赴日。他在东京找到了以前的两位日本同学——江口隆战和宫操子,这两位同学曾到德国师从现代舞蹈家拉班的学生魏格曼,他们两人回日本后开办了暑期现代舞讲习会,吴晓邦就在这一讲习会内学习了三周,受到巨大影响,对现代舞的理解更深入了一步。1936年10月吴回国后,在上海再度开办“晓邦舞蹈研究所”,并于1937年4月在上海卡尔登戏院举行“第二次舞蹈新作品发表会”,创作表演了《懊恼的解说》、《奇梦》、《拜金主义》等现代舞蹈。这些舞蹈打破了古典舞蹈程式,用新形式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黑暗的现实和人民的深重苦难,揭露了腐朽社会中被扭曲的心灵。这些作品的演出在观众中反响强烈,引起文艺界的注目。

##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的对外文化交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设苏维埃(工农兵)革命根据地的道路。至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大小不同的几十个革命根据地。除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外,其他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以及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本节重点介绍革命根据地的对外文化交流。

### 一、苏区的新闻出版工作

#### 1. 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宣传机构——“中国工人通信社”

“中国工人通信社”(亦称“工农通信社”)于1930年10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它是党中央领导的第一个具有国际性的新闻通信社,曾向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发出新闻稿,发稿时间前后长达五年。

“中国工人通信社”成立时,李一氓受中央宣传部委托,召集林电岩、董我愉、朱伯琛、冯达等开会,确定林电岩为负责人,社址设在上海林电岩的住处——上海静安寺路大中里。从这时起,开始了“中国工人通信社”的采编、翻译、打字、油印及秘密发行工作。直到1935年7月中旬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宣传部长、“中国工人

通信社”负责人董维健被捕才结束长达五年的发稿工作。

“中国工人通信社”的主要任务是以中、英两种文字向国内外秘密发行《中国工人通信稿》。中文数量较少，一般是用复写纸复写七八份，供党领导的革命报刊发表。像《红旗日报》、《红旗周报》、上海《斗争》、苏区《斗争》以及《红色中华》等都发表过它的稿件。发往国外的通信稿是用英文打字油印的，每期油印 80—100 份，由负责秘密发行工作的朱伯琛按中宣部事先拟定的地址寄往苏联、共产国际、日、美、英、法、德、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革命或进步刊物，再由对方转译成本国文字加以发表。同时，英文通信稿还设法转交给以伊罗生名义在华创办的英文《中国论坛》上发表。此外，胡绳、叶籁士、张企程等主办的《无产者世界语通信》也经常采用“中国工人通信社”发来的材料，其中常有关于苏区人民革命斗争的消息报道。1933 年以后，由于“中国工人通信社”人员有的被捕或他调，潘企之除采编、翻译稿件外，几乎承担了全部打字和发行工作。据日本《无产阶级科学资料月报》1931 年 6·7 号、8·9 号、10 号、12 号发表的《中国工人通信稿》目录记载，1931 年 3 月 31 日至 9 月 29 日，“中国工人通信社”共发出英文《中国工人通信稿》63 期（其中包括 5 期特刊）；1931 年 7 月至 1932 年 3 月日本《无产阶级科学》杂志全文发表的《中国工人通信稿》有 15 篇之多。

“中国工人通信社”发往国内外的中、英文《中国工人通信稿》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面极广，有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及革命团体发出的文件、宣言、电函，有关红军和苏区斗争方面的报道，有关白区（指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斗争方面的稿件。“中国工人通信社”对国内外的发稿情况表明，30 年代初期，“中国工人

通信社”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它对打破敌人对我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起到了良好作用。

关于参加过“中国工人通信社”工作的人员的情况，据史料记载，先后共有11人。他们是林电岩、董我愉、朱镜我、朱伯琛、冯达（后叛变）、董维健、潘企之、应修人、许邦和、李少石，还有任中央宣传部机关并担任“内部交通”工作的葛琴，她也担任过“中国工人通信社”与中宣部的联络工作。其中，林电岩、朱镜我、董维健曾先后担任过“中国工人通信社”不同时期的负责人。

“中国工人通信社”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它从1930年10月成立，到1935年7月结束，一直以秘密方式活动于上海，由于受到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以及“左”倾思潮的影响，不可避免地犯有宣传和鼓吹“武装保卫苏联”、“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城市中心”，甚至“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错误，以致最后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一起丧失了自己存在的客观条件。

## 二、革命根据地的通讯社和报刊

在1927—1937年间，革命根据地的通讯社和出版的报刊共35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报。

红色中华通讯社（以下简称“红中社”）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诞生。当时“红中社”的任务是：1. 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通讯稿及苏联塔斯社的英文广播；2. 编辑出版《参考消息》；3. 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4. 每天对外广播新闻电讯，有时也发英文稿。为了及时而迅速地传播新闻电讯，“红中

社”一开始便采用无线电收发报装置收发新闻,促进了红军无线电讯事业的发展。“红中社”的电讯器材,是中央红军直接提供的。1931年1月6日,“红中社”利用这些器材,在江西省宁都县的小布建立了第一个电台。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红中社”以CSR的呼号(“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广播”一词的英文缩写),向外播发了这个消息,使得外界第一次有可能了解到苏区和红军的情况。大会通过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劳动法》、《土地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便成为“红中社”向外广播的首批新闻稿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还翻译成英文,于1931年11月8日向外播发。1933年春,由于电讯业务的发展,“红中社”新闻电台正式成立。于是在全国各个被国民党分割的革命根据地之间架起一座“空中桥梁”,这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粉碎敌人在地面上的新闻封锁、促进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北上长征,“红中社”停止对外播发新闻稿,但抄收国内外新闻通讯的工作并未中断。各支红军的新闻电台也仍坚持抄收国内外新闻。1935年冬天,红四军长征到四川省雅安附近时,原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过“红中社”报务员的夏岳,又接受了专门抄收国内外新闻的任务。夏岳等人经过努力不仅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陕北“红中社”的新闻,而且也收到了外国通讯社的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的电讯广播。按照上级指示,夏岳将抄收的外语新闻全部送到红四军中的“保卫局”,由当时被张国焘关押的三个人译成中文。其中有一名叫何柳华(即廖承志)的,能翻译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新闻,为长征中的“新闻电台”做了很

多工作。

1936年12月，廖承志到达陕北保安，被分配到“红中社”工作。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主持召开了“红中社”工作会议，决定把“红中社”的工作分为两部分：外电部分由廖承志负责，国内报道由何仲华负责。

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红中社”也随之迁至延安城内。同年1月29日“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每天抄收美、英及日本通讯社的外文电讯，数量日益增多。廖承志一人不仅负责翻译全部外电，而且又负担了编辑新华社广播稿件的任务。1937年2月6日《新中华报》（1937年1月前原名《红色中华》报）刊载的新华社稿《德、意、日成立军事密约》，为至今所见到的新华社最早的一条国际消息。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新华社的翻译和编辑业务，实际上仅廖承志一人承担。当时，新华社是党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的主要渠道，毛泽东每两三天就要到新华社来一次，每次总是细心询问廖承志有些什么重要国际消息。1937年4月，廖承志调离新华社，参加党中央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的编辑工作。廖承志在新华社工作三个月期间，正是“红中社”在陕北恢复工作的初期，也是从“红中社”过渡到新华社的时期，这一时期人员少（只有3人），各方面条件又差，困难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廖承志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新华社的重任。

下面介绍《红色中华》报。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在瑞金创刊。它和“红中社”是同一个组织机构，“红中社”兼任该报和通讯社的工作。编辑部的成员，既编报纸，

又编文字广播稿件。社、报、电台一家，实行领导动手一职多能。

《红色中华》报创刊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级的报纸曾办过4种。第一是《红旗》。它于1928年11月20日秘密创刊于上海，由李立三主编。后来在敌人残酷镇压、人力财力奇缺的情况下，1930年被迫停刊。第二是《上海报》，它是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报，其前身是《白话报》。《白话报》遭到敌人查封后遂以《上海报》名义出版，以后又改为《天声》、《晨光》和《沪江日报》继续出版。《沪江日报》在帝国主义镇压下坚持两个多月，1927年7月改名为《海上日报》，11月12日又恢复为《上海报》。这份报纸一直坚持到1930年8月才告结束。第三是《红旗日报》，它是1930年8月15日由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与江苏省委机关报《上海报》合并而成的。1930年9月26日深夜，敌人破获了正在印刷中的《红旗日报》，并逮捕了十几名革命者。1931年3月9日，《红旗日报》改名为《群众日报》继续出版。第四是《实话》，它是5日刊的《红旗日报》的副刊，是《红旗日报》辅助性的理论刊物。

《红色中华》报的创办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在中央根据地出版。《红色中华》报在瑞金时是铅印四开报纸，每期最少出两版，一般出四版到八版，最多加印到十版。初期销售数不到1万份，后来经过改组，发展了一批通讯员，增加了地方消息的报道，改进了版面，报纸的销售数量增加到4万余份，超过当时《大公报》的销售量。《红色中华》报创刊时是周刊，从1933年2月4日起改为三日刊，以后又改为二日刊。《红色中华》报的内容有社论、时评、要闻、专电、中央根据地的消息、红色区域建设、工农通讯、工农民主法庭等栏目。从第72期起还增加了文艺副刊《赤焰》，不定期出版。经



常出版“号外”，及时报道红军的重大捷报。《红色中华》报还常发表文艺批评方面的文章。长征前夕，1934年10月出版了《红色中华》报第240期，这是它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最后一期。

《红色中华》报的后期是在陕北出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红色中华》报于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复刊时的物质条件比在中央根据地时更差，只好改为油印出版。每逢三、六、九出四开一张，后来增加到一张半或两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色中华》报于1937年1月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

在革命根据地内，随着红军队伍的不断壮大，各军区、军团都有自己的报纸，目前有实物或有遗迹可查的共30多种。其中销售数量最多、刊期最长的是《红星报》。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红星报》于1931年11月7日与《红色中华》报同一天在江西创刊。初期由邓小平任主编，遵义会议后由陆定一任主编。《红星报》是不定期出版的报纸，刊期间隔的时间，最短两天，最长15天。报纸的篇幅是四开四版，有特殊情况时出八版，有重大捷报还出“号外”。《红星报》每期销量1.73万份。《红星报》在长征途中坚持出版。

中央根据地具有特色的报刊还有《青年实话》和《斗争》周刊以及《实话》报。《青年实话》创刊于1931年7月，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起初是半月刊，后来改为旬刊、周刊。它实际上是1923年10月创刊的《中国青年》杂志的继续。销售量每期2.8万份。

《斗争》周刊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1933年创刊,主要刊载中共中央的决议、指示和中央负责人的文章。销售量每期至少2.7万份。

《实话》报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1932年创刊。1932年11月20日出版的《实话》第10期刊载了苏区中央局《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斗争的决议》。这一决议揭露了“李顿调查团”报告的实质:这是国际强盗分赃集团——国际联盟最公开、最无耻的文件,企图结成帝国主义强盗(包括日本)的统一战线来瓜分中国,扩大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国际共管,而且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实行“满洲自治”,组织新的傀儡政权。

### 三、苏区的图书出版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立以后,曾先后开办过新青年社(1920—1927年)、广州人民出版社(1921—1922年)、平民书社(1923—1927年)、中国青年社、上海书店(1923—1927年)、无产阶级书店(1928年后)、华兴书店(1929—1931年)、启阳书店(又名春耕书店、春阳书店,1931—1932年)以及北方人民出版社(1931年)等出版机构,出版了许多普及马列主义的读物,对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起了重要作用。苏区的出版机构继承了这些出版机构的优良传统,在印刷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印行了不少出版物。

极据不完全统计,苏区(主要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图书共98种。第一类是教科书,共29种,大部分是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编印的,用来供工农和士兵识字、小学教育、干部教育之用。其中有《识字课本》(1931年)、《看图书课本》(1931年)、《青年平民读本》(1932年)、《群众课本》(1932年)、《工农课本》(1933年)、《初

级国语课本》(1933年)、《列宁小学国语课本》(1932年)、《算学常识》(1933年)、《理化常识》(1934年)、《地理常识》等。

第二类是一般图书,计69种。内容有党团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经济知识、军事知识等等。编印单位有苏区中央局、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苏区出版局、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军学校等。主要图书有:《共产党和共产党员》(1931年)、《苏区团的建设和我们的任务》(1933年)、《政治工作》(1932年)、《政治工作讲授大纲》(1933年)、《苏维埃政权》(1931年)、《苏维埃政权讲授大纲》(1933年)、《苏维埃法浅说》(1932年)、《苏维埃的文化教育》(1932年)、《马克思主义浅说》(1930年)、《社会主义浅说》(1930年)、《列宁主义问题》(1934年)、《斯大林论列宁》(1933年)、《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1933年)、《社会进化史》(1932年)、《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1932年)、《论内外线作战法》(1931年)、《游击战术讲授提纲》(1934年)、《军事问答》(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步兵操典》(1932年)、《步枪的研究》(1934年)、《德译战术讲授录》(1933年)、《劳动问题讲授提纲》(1933年)、《财政问题讲授提纲》(1933年)、《土地问题讲授提纲》(1934年)等等。

#### 四、苏区的戏剧

苏区的戏剧(主要是话剧)搞得有声有色,在短短几年里,创作和演出了一大批有生命力的剧作。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本来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它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很快生根、发育、成长,一是经过了30年代国统区左翼戏剧运动的实践,二是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革命根据地的戏剧活动为创造有中国特色的话剧提供了

有益的经验。

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没有专门的戏剧组织,但各部队都建立了宣传队,稍后又建立了俱乐部。

当时虽然还没有专业的戏剧作家和演员,但许多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都热衷于戏剧活动,经常和宣传队员们一起创作剧本,同台演出。闽西根据地在省委书记邓发和军区司令员肖劲光的参与和倡导下,先后组织演出了沙可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创作的话剧《明天》和李伯钊根据苏联话剧故事改编的多幕话剧《骑兵歌》。后者由邓发主演,连演十多天欲罢不能,足见其演出受到群众极其热烈的欢迎。在当时困难条件下,这样的中外文化交流是难能可贵的。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演出了李伯钊根据美国斯托夫人的小说《黑奴吁天录》改编的话剧《农奴》,获得好评。

1931年12月,以红军学校的戏剧爱好者为骨干,成立了“八一剧团”,赵品三任团长。后来在“八一剧团”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工农剧社总社,下设立蓝衫团(后改名为苏维埃剧团)和蓝衫团学校(后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由李伯钊担任团长和校长。各省、县都相继成立了剧团,有的区乡也成立了剧团。

苏区的戏剧创作,主要是工农兵群众的集体创作。革命根据地初建时期的剧本,大多是反映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军事斗争是当时群众“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也是苏区戏剧的重大主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配合“九·一八”事变后斗争形势的需要,苏区舞台上演出了许多抗日反帝的

戏剧。

在苏区的戏剧作品中,还有一部分是以城市工人运动为题材的,丰富了苏区戏剧的内容,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 五、苏区的舞蹈

革命根据地的舞蹈,作为一种宣传、教育的武器而受到重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高尔基戏剧学校课程的内容,除戏剧、音乐以外,还有舞蹈、柔软体操和形体训练等。舞蹈课的教员有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等,其中李伯钊、刘月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过苏联的革命舞蹈。讲授苏联革命舞蹈是高尔基戏剧学校舞蹈课程的重要内容。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该校为苏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舞蹈文艺人才,并创作、改编和介绍了大量革命歌舞。苏区的革命歌舞,虽因战争环境险恶而未得到较大的发展和流传,但在部队和群众中孕育了中国新舞蹈艺术的种子。

苏区的新舞蹈主要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创作舞蹈。苏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打垮了地主阶级,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他们迫切希望用舞蹈艺术来反映他们的斗争和劳动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如苏区的军民在粉碎了敌人第四次“围剿”后,为了庆贺战斗胜利,创作了《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等舞剧。高尔基戏剧学校的文艺工作者还以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历史为题材,创作了讴歌布尔什维克领导苏联人民革命成功的歌舞活报《纪念十月革命》、纪念1884年美国芝加哥工人运动的歌舞活报《五一》,以及反映我国1925年五卅惨案历史的歌舞活报《五卅》等,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第二个来源是民间舞蹈。在赣南、闽西等地苏区流传着许多民

间舞蹈,在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挖掘整理下获得了新生,服务于现实。

第三个来源是外来舞蹈。20年代李伯钊、沙可夫、刘月华等一批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习,同时接触了苏联的民间舞蹈及其他国家的进步舞蹈。美国现代派舞蹈家邓肯的以革命为题材的舞蹈《马赛曲》、《国际歌舞》等,曾使他们耳目一新。在《国际歌舞》中邓肯身着红色舞衣,象征革命红旗,一群穿戴各国服饰的演员从地上缓缓而起,迎着红旗前进。这种明快的现代舞蹈风格极大地启发和影响了中国留学生,他们把外国舞蹈带回祖国。如李伯钊曾为苏区表演《国际歌舞》,教红军战士、工人、农民跳苏联《农民舞》、《海军舞》、《陆军舞》、《空军舞》、《工人舞》、《乌克兰舞》等。苏区军民中迅速出现舞蹈热,极大地推动了苏区群众性舞蹈活动。当时在苏区流行的外国进步舞蹈《叮铃舞》、《网军舞》、《黑人舞》等,都被红军士兵和工农群众接受,广为流传。在红军长征途中,这些外来舞蹈与创作舞蹈一样,极大地鼓舞着红军的士气。

## 六、苏区的美术及主要美术家

在国统区左翼新兴木刻运动兴起的同时,苏区美术也以它特有的面貌发展着。它深深扎根于工农群众之中,是真正革命化、大众化的无产阶级的艺术。

苏区的美术工作,也和当时的戏剧活动一样,是先从部队开始,再从部队到人民群众中广泛展开的。当时美术活动的主要形式有壁画、标语画、传单画、插图、画报等等。

此外,还有一种类似标语画的彩色画,它是画在纸上,然后再贴在墙上的宣传画。

另外,当时散发的宣言、传单也经常附有图画。当时凡是报纸、刊物、书籍、教科书都是字画相间、图文并茂。如《红色中华》,几乎每期都有插画。这些插画有单独的漫画、宣传画,也有连续的组画。其中有些独幅画,后来收录在《革命画集》里出版了。

1931年后,苏区出版登载绘画的刊物达30多种。如《苏区文艺》、《红色中华》、《红星画报》、《瞄准画报》、《选举运动画报》、《春荒斗争画报》、《青年实话画报》等。在这些刊物上,每期都有专门画页、文字插页。有独幅漫画或宣传画,也有连续性的组画,其中许多画报是为了便于张贴和散发,以单页出版的。在内容上也各有特色。其中发行较广的是《红星画报》。

《红星画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每期约10页左右,石印印刷,用红、蓝、绿、赭等色套印。内容有革命领袖介绍、军事常识、卫生常识、军事形势图、识字课本等等,都配有丰富的插图。

1930年10月,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红色中华》出版了一本《革命画集》,共选载作品50幅,有着强烈的政治鼓动性。在画册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了发展革命美术的主张,并对所选作品作了评价。

苏区的美术组织相当活跃,他们于广州起义六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了工农美术社,1936年成立的中华文协会中专门设立了漫画组,第四方面军还成立了木刻工厂。这些组织是苏区美术工作的核心,是推动苏区美术发展的主要力量。

苏区的美术作品(包括刊物发表的)大多不署名,现在所能知道的美术工作人员有:温涛、黄亚光、布鲁、廖承志、朱光、王亦明、

黄镇、黄奇彦、农尚智、胡然、赵品三、笃宣、苏明等。

### 第三节 盛成在法国创作的传记文学《我的母亲》

盛成(1899— )，江苏仪征人。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后考入长辛店铁路部门服务，并从事工人运动。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曾任中国学生工人联合会主席，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等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一些斗争活动，并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24年得高等理学硕士学位。1928年任巴黎大学讲师。是年用法文写成传记文学《我的母亲》。此书震动法国文坛，驰誉世界，使他一举成为世界名人。报刊竞相报道，一些国家请他讲演、剪彩、会见读者。土耳其总统凯米尔、埃及国王邀请他去访问。戴高乐因此书结识盛成，两人结下了真挚的友谊。《世界名人录》两次列入盛成并登其照片。

在《我的母亲》中，作者娓娓地叙述他一家的故事，行云流水般地夹进中国社会的种种事件，把读者引入自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巨幅画卷中去。诸如督军之争权、袁世凯之奸诈、那拉氏之残酷，以及对一些史实根源的探索、革命潮汐涨落的解释、千年礼法装成道貌岸然的外貌，凡此种种，读者都可以从这扇洞开的中国封建家庭大门之内，从围绕在作者母亲的许多生命的阴影下，看到种种磷磷的闪光。考虑到外国读者的特点，许多细节



的描写,也都充满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如周围家人的生死存亡、各种礼仪的规定、各种细小摆设的象征,以及端阳龙舟竞渡,江上凭吊屈原、铃箏交错的纸鹞高飞于山头等等,无不写得妙笔生花,为异国读者所倾倒,使读者从一个一个动听的故事中,不知不觉地看到了一个浓缩的中国社会。

《我的母亲》问世后,世界文化名人罗曼·罗兰、居里夫人、萧伯纳、罗素、梅特林、纪德等均给予高度评价。执法国文坛牛耳、惜墨如金、一字千金的大文豪瓦乃西为之作了万言长序。各种文字译本继法文本后接踵问世。几十个国家的报纸以 20 多种文字报道、评价此书。一时间形成了一个以盛成的《我的母亲》为中心的中国热。

盛成在海外享有殊荣。西方的盛成崇拜者、研究者组成“盛成文友会”。盛成归国后,该会至今仍照常活动。在西方,以中国作家、学者命名社团,每周进行研究活动的情况,是罕见的。1985 年,法国驻华大使代表密特朗总统将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证书和勋章授予盛成。

盛成通晓多门外语,国学造诣精深,著作甚丰。除了《我的母亲》(法文版),主要还有《母亲与我》(法文版)、《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意国留踪记》、《巴黎忆语》、《东西南北中》等纪实文学及散文集。诗集有《秋心美人》(法文)、《狂年吼》(法文)、《老觚新酿集》(法文)。译著有法译中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村教士》,中译法的《老残游记》。

#### 第四节 郭沫若流亡日本与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由于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郭沫若于1928年流亡到日本,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中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在10年(1928—1938)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郭沫若由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实际革命家转而研究中国历史。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研究分析中国历史,从而有助于认清中国的社会现状及其发展,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当时关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是一片空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而且他认为这种研究又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化”,说明马克思所总结的社会发展规律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从而使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普遍的真理。为了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他在初到日本的半年时间里,集中精力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历史科学著作。稍后,他还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为他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郭沫若在着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异常艰难,除了严重的政治压迫,还有沉重的家庭牵累。同时,手头没

有可供研究的资料,又无力购买,所以在开始进行研究的数月内,他几乎每天都要从市川住地前往东京的东洋文库,阅读库中所藏的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他分秒必争,废寝忘食,有时发着高烧也不肯中断。郭沫若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著作,都是由他亲笔书写影印出版的,耗费了作者大量的心血。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甲骨文和金石文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但超过了前人,而且超出同时代人之上。在将近10年中,郭沫若关于中国古史研究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

-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册,1930年3月上海联合书店出版;
- 《甲骨文字研究》2册,1931年5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2册,1931年6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 《汤盘孔鼎之扬榷》1册,1931年6月北平燕京大学出版;
- 《两周金文辞大系》1册,1932年1月日本文求堂出版;
- 《金文丛考》4册,1932年8月日本文求堂出版;
- 《金文余释之余》1册,1932年11月日本文求堂出版;
- 《卜辞通纂》4册,1933年5月日本文求堂出版;
- 《古代铭刻汇考四种》3册,1933年12月日本文求堂出版;
- 《古代铭刻汇考续篇》1册,1934年5月日本文求堂出版;
-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5册,1935年3月日本文求堂出版;
-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3册,1935年8月日本文求堂出版;
- 《先秦天道观之进展》1册,1936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殷契粹编》5册,1937年5月日本文求堂出版。

除上列14种外,还有于1936年写就,至1939年才得以出版的《石鼓文研究》1种。

这些著作都是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分析中国古史、古文字的成果，不仅数量甚多，而且内容充实，富有创见，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在国内外的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恩来曾经指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做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十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十年内，他的著译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许多真实。”这是对郭沫若海外10年历史研究工作的最中肯的评价。毛泽东也热情赞扬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有益于中国人民。据许广平回忆，鲁迅看了郭沫若的古史考证、金文甲骨文研究，十分赞赏，说他“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

郭沫若海外10年所写的15种历史著作，其中有9种在日本出版，他对于甲骨文和金石铭文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诚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日译者藤枝丈夫所说：“王国维、罗振玉、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沫若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

郭沫若流亡日本以后，由于身受日本刑士、宪兵的监视，行动极不自由，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只能闭门从事古史研究，根本无法参加社会活动，也很少与人交往。但是他对一些上门

约稿、求教的青年，还是热诚接待。他不仅常为中国左联东京分盟的刊物《杂文》、《东流》、《诗歌》等撰稿，而且为一些青年修改稿件、写序，扶持青年作者的成长。他为左联作家丘东平反映苏区的作品写《东平的眉目》评论，为张天虚的作品、陈子鹄的诗歌写序文，为周而复的诗集《夜行集》和苏夫的诗集《红痣》写序，为支持曹禺的话剧《雷雨》在东京演出，撰文予以高度的评价。

1935年10月5日，郭沫若应邀到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为留日青年讲话，这是他流亡日本以来所作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到会近千人。他的讲题是《中日文化之交流》，以大量生动的历史事例，论证了中日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是从中国流到日本，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是从日本流到中国。前者在日本收到了很大的成功，后者在中国则是失败了。”他具体分析了近百年来中国接受外来文化失败的原因，认为并不是由于中国是什么劣等的民族，而是由于上层人们的守旧和外族入侵造成的。但坚信中华民族确是优秀的民族，应该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努力创造出更高级的新文化！在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日子里，他的讲演极大地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的文学创作，除写一些自叙传，如《我的幼年》（1928年）、《反正前后》（1929年）、《黑猫》（1930年）、《创造十年》（1932年）、《创造十年续编》（1937年）、《北伐途次》（1933年）等外，由于环境的恶劣，只写了几篇历史小说，并以《豕蹄》为名，于1936年10月由上海不二书店出版。

## 第五节 巴黎的《救国时报》

1935年5月红军长征时,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留法学生的名义在巴黎出版了《救国报》。该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李立三、廖焕星、陈潭秋等人。他们先在莫斯科组稿、编辑和排版,航寄巴黎,然后在巴黎印刷成报,再向海内外发行。

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曾以明显的位置登载在《救国报》上。

1935年7月,吴玉章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他去巴黎扩大《救国报》的发行工作,以加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宣传。1935年11月,吴玉章到达巴黎时,正值法国政府出于政治原因命令《救国报》停刊。后经研究请示,将《救国报》改称《救国时报》。《救国时报》以吴玉章为发行人兼主编,其余工作人员几乎全为中国留法学生。1936年吴玉章奉命回莫斯科,吴克坚(李琨)接替了吴玉章在法国的工作。

《救国时报》是中共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和其他对外报道的机关报。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创刊号上即明确地提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条件下,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对外,建立全民救国的联合战线。它发表了许多论文,刊载了许多中共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文章,不断地报道国内

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情况,并经常揭露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它为推动中国抗战做了不少工作。此外,它还经常发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论文、演讲词,不断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救国时报》连载了陈云记述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后在莫斯科出了单行本)。为了使这本书能在海内外广为流行,陈云化名“廉臣”,假托自己原是国民党军医,后来被红军俘虏,参加了长征,亦即随军西行。他以生动活泼的文笔,记述了自己在长征中的见闻。

由于《救国时报》的言论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要求,所以它拥有广泛的读者,成为海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喜读的报纸。它的发行数量增加很快,从创刊时仅销售5000份,不到一年就增至2万份。它在国外的发行范围,遍及欧洲、美洲和亚洲的43个国家,拥有9600多个订户。在国内行销约1万余份,不仅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也有它的读者。

《救国时报》的言论反映了海内外同胞的要求和心声,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称道。

1936年2月11日,一位新加坡读者给《救国时报》来信说:“这边——马来亚的华侨对于贵报的态度表示非常欢迎,凡是读过贵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代表全军捐出国币1300

元给《救国时报》，并且致函该报：“你们关于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登载独多，使我们全体士兵看到后，抗日杀贼的意志愈益坚决兴奋。”该军司令部还向全军将士设法介绍《救国时报》的报道，并且下命令要求各部队认真阅读和讨论《救国时报》。抗联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等也都分别捐款或者写信支持和赞颂这家报纸。

《救国时报》在发行上，由于国内外反动派的刁难检查，报纸常被扣留，订户及发行代办处往往收不到。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进步的抗日书刊检查最严，报纸往国内发行极不容易。为此，不得不想更多的办法。上海生活书店有一位职员到了巴黎，他手头有《新生周刊》的订户名单及住址，当时《新生周刊》已被查封，《救国时报》便利用它的订户名单及住址邮寄报纸，使报纸在国内广为流传。

《救国时报》出版半年，便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虽有读者源源捐助，仍然难解燃眉之急。1938年2月10日该报出版到第152期，终以“兹因祖国抗战方殷，本报同人全体返国参战”为由而“暂时停刊”。它从创刊到停刊共两年零两个月。



## 第七章

# 30年代和40年代国际文化人士对增进中外文化交流所起的杰出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要力量，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还有一批从事革命宣传的工作者，在大革命的前线撤退下来以后，来到上海，在文化战线上与国民党相对抗。中国革命进入了深入发展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在对革命根据地大肆进行封锁和军事“围剿”的同时，对革命文化运动也进行疯狂的“围剿”。他们竭力调动其舆论工具，污蔑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为“匪徒”、“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俄国的代理人”。而大部分西方观察家无法进入革命根据地了解真实情况。在革命根据地内，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通讯设备条件的限制，要向外报道真实情况有重重困难；在国统区，以“左联”为代表的进步力量的活动，也同样受到通讯条件的限制和国民党的种种迫害。

为了打破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和国统区革命文化斗争的封锁与“围剿”，中国共产党人千方百计结交了一些同情中国革命、进步

事业的外国朋友，利用他们所掌握的或能联系的舆论工具，将国共两党斗争的真相以及我方的观点、政策对外传播出去。如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以前，我党地下组织在上海结交了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史沫特莱、日本《朝日新闻》社驻上海特派员尾崎秀实、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中国记者山上正义等，通过他们的新闻报道和他们所联系的舆论阵地，直接或间接地报道了国统区的文化斗争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又如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访问了陕北，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揭示了一个正在剧痛中新生的伟大中国的真实形象。此后，相继访问陕北“红色区域”的有史沫特莱，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英国记者詹姆斯·芒罗·贝特兰，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他们从不同角度写出了忠实报道中国“红色区域”的不朽之作，对于世人了解红色中国起了巨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一批又一批的外国记者、作家来到延安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撰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和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日常生活。这些作品对国际舆论和世界人民认识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政权发动内战，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解放区又处于国民党的封锁中，但形势根快改观，许多外国记者、作家又通过多种渠道来到解放区，进行深入的采访和写作，揭示了人民必胜的真理。

外国友人到解放区采访,都经过许多危险和障碍。他们的作品是他们生命和热血的结晶,也是他们坚强的意志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的写照。斯诺谈到他1936年陕北之行的冒险时写道:“……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实的真相,只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没有比这个更值得了。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汉斯·希伯在山东根据地坚持在 frontline 随军采访,遭到敌人伏击,在突围中执枪战斗,壮烈牺牲。史沫特莱、斯特朗、卡尔逊、贝尔登等都在炮火连天中随军采访和写作。有的友人如史沫特莱、斯诺、谢伟思等,为坚持真理,还受到美国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和打击。

---

## 第一节 中共取得国际友人的支持 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通过“左联”)结交了一些同情我国进步事业的外国朋友。例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从1929年初到1941年,先后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的身份,长期在中国深入生活,进行采访和写作。1929年初秋到1930年,她在当时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陈翰笙和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任消防处督察员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的帮助下,深入农村和街道工厂

体验生活,写出了多篇反映中国社会严重不公正的通讯报道。1933年,她将这些作品汇集出版,书名为《中国人的命运》。

史沫特莱在上海同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些成员的接触中,印象最深的是鲁迅和茅盾,她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0年9月,当鲁迅50岁诞辰时,她冒着危险租用荷兰人开设的餐厅,供左翼文化人士为鲁迅祝寿。她当天还为鲁迅照了一张坐在藤椅上的照片,写了文字说明,寄给美国《新群众》杂志发表。

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的交往也比较密切。她曾协助宋庆龄处理信件,写讲演稿,特别是有关反帝大同盟方面的(宋庆龄是这个同盟的执行人员之一,史沫特莱认识这个同盟的一些领导人如印度的尼赫鲁等)。1931年,史沫特莱参与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同盟的主席是宋庆龄,副主席是蔡元培。在该同盟中,史沫特莱与林语堂负责英文出版的通讯报道工作。

1931年2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杀害了李伟森(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五位左翼作家。当时的中央文委和“左联”决定请鲁迅和茅盾草拟一份就杀害作家、艺术家的事件告西方作家的呼吁书。呼吁书在茅盾的协助下由史沫特莱和尾崎秀实译成英文带往纽约、柏林、莫斯科等地。呼吁书在1931年6月号的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刊登,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给中国国民党发了几百封抗议信和电报。呼吁书的日文本则由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翻译,而且很快在日本文艺杂志上发表,与呼吁书同时发表的还有鲁迅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山上正义还建议,编辑出版一本《五烈士作品选集》。这本选集为了便于在日本发行,决定把山上正义译的《阿Q正传》

放在书的前面,后面加上五烈士的作品,书名只写鲁迅《阿Q正传》,书后再印上五烈士的遗像和悼念他们的献词。尾崎秀实用白川次郎的笔名在卷首写了《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上的现状》(文中还引有“左联”的呼吁书),抗议国民党疯狂的白色恐怖,指出这本译著是日中两国的进步文化人士合作编成的。这本书在1931年10月由东京四六书院出版,列入《国际无产阶级文学丛书》。书脊上印有鲁迅著,林守仁(山上正义的笔名)译。

为悼念被国民党杀害的“左联”五烈士,鲁迅还写了《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托史沫特莱译成英文寄往美国《新群众》杂志发表,将国民党迫害中国进步文艺界的罪行公之于全世界。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1936年春节后,史沫特莱将此消息告诉鲁迅,并建议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鲁迅将拟好的贺电交史沫特莱寄往巴黎,再转寄莫斯科,发往陕北。

史沫特莱非常向往苏区(国际文化人士称之为“红色中国”或“红色区域”),但无法前去。她保护过许多从江西苏区来上海的共产党人,为他们藏匿文件,帮助他们治病,并向他们了解苏区的情况。其中最著名的是红十军初期的军长周建屏,还有一位是陈赓将军。她利用了解到的材料写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又名《中国红色风暴》),内容是1927年至1932年间,中国人民为谋求统一、团结、和平奋斗救中国,在中共领导下,以工农红军做先锋,同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投靠帝国主义镇压国内进步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派奋起作战,成立中华苏维埃的建军史诗。这本书于1934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以后在西方陆续出版。

1932年初,在史沫特莱的协助下,美国记者哈罗德·伊沙克(中文名字为伊罗生)创立了英文周刊《中国论坛》。伊沙克很年轻,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21岁时以美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上海大美晚报》、《大陆报》的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工作。后来受了史沫特莱的影响,思想进步很快,以后又通过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结识了宋庆龄。《中国论坛》创刊号上一开始就登载了“左联”五烈士的照片和纪念五烈士殉难一周年的报道文字,以后又发表了五烈士的作品,另外还发表了鲁迅、茅盾、丁玲、应修人、楼适夷等左翼作家的作品。1933年1月10日,当时被作为政治犯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了一封《北平政治犯的黑暗生活》的信件,很快就登在《中国论坛》2卷1期上。1933年7月14日,《中国论坛》2卷8期上登了一则短文——《钩名单》,即传说中的蓝衣社黑名单的抄本,共列56人,其中有杨杏佛、鲁迅、茅盾、胡愈之等。据《中国论坛》的编者按说,这是一个匿名者寄来的,黑名单的签发日期正是杨杏佛被刺前三天。《中国论坛》上最受人注意的是一篇长文《国民党反动的五年》(1932年5月),由史沫特莱和伊沙克合编,此文详尽地控诉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立即引起了国民党书刊检查部门的注意,并在上海的外国官方圈子里引起了震惊。后来由于史沫特莱与伊沙克在办刊方针上有分歧,《中国论坛》于1934年初停刊。《中国论坛》创办为时两年,出刊39期,它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文化专制,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给予中国革命民主力量以强有力的支持,成为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份值得纪念的革命刊物。

《中国论坛》停刊后,宋庆龄交给史沫特莱一项任务,物色适当的人在上海编辑出版一本新杂志以代替《中国论坛》。由于史沫特莱的竭力要求,美共总书记白劳德派遣了他的秘书格雷斯·格拉尼奇和她的丈夫曼尼来中国编辑《中国呼声》。《中国呼声》于1936年6月15日创刊,1937年11月15日停刊,共出版了30期。它忠实报道了七七事变前后中国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反对日本侵略华北的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救国会七君子被捕等等。

在30年代初期,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鲁迅的热情支持下,编译了一本《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以此反对国民党对革命文化运动的“围剿”。

1928年,斯诺刚刚大学毕业,来到大洋彼岸完全陌生的中国,想寻找“中国的魅力”。第一年,他在上海等大城市被所谓“太平盛世”的假象所迷惑,误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过去,国家已经统一;但幸运的是,他很快走向中国的最底层,离开上海来到居住着80%人口的中国内地,省、县、农村,一幕幕场面,一个个人物,使他日趋完整地认识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幅幅黑暗景象。他说,他在底层的这些经历“决定性地塑造了我的一生”。特别是他把在内蒙古拉萨亲眼目睹的饥荒惨状——这场饥荒夺去了500多万中国人的生命以后,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觉醒点。”

斯诺与他的妻子海伦·福斯特为编译《活的中国》,费了不少心血。此书在1931年着手编辑,前后用了五年时间,1936年在伦敦出版。这是一本反映“现代中国创作界是在怎样活动着的书籍”。这项工作使斯诺逐渐接触到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使他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在这条道路上,指引着他的是鲁迅。他首

先着手编译鲁迅的作品,然后编译五四以来其他作家的作品,其重点放在左翼新进作家的作品上。斯诺把鲁迅的7篇作品单独编在一起,作为全书的第一部分,并撰写了《鲁迅生平》,放在第一部分的前面。第二部分是中國其他作家——茅盾、郁达夫、郭沫若、巴金、丁玲、柔石、沈从文、孙席珍、田军(萧军)、张天翼、沙汀以及萧乾、杨刚等13位作家的17篇作品。第三部分是海伦以尼姆·威尔士的笔名写的《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文,作为书的附录。该书的封面印有鲁迅的相片。另外卷首还写了一段十分动人的献词:

献给宋庆龄

她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地的精神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1937年2月6日,他给当时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的信里曾这样写道:“我深切感谢你对《活的中国》的评语。我编这本书,不是因为我感到自己有资格这样做……而是因为看来没有旁的人来做这件事。这样一本书可以提供必要的背景,使西方人能对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获得起码的了解。”此书也是斯诺反对国民党的表示。他编译的作品,其作者都敌视国民党反动集团,他们的作品都被国民党查禁。蓝衣社囚禁丁玲等人;1931年国民党枪杀了5名左翼作家,其中包括柔石,斯诺翻译了他的《为奴隶的母亲》。所以斯诺回答约翰逊大使说:“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事——在某些方面可能知道得太多了,以致当局不再对我客气了。这样一些事,你如果追究得很深,就不能不产生同情心,而对一个外国记者



来说,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产生感情,可能是走向灾难的开始。”

## 第二节 斯诺夫妇、史沫特莱等采 写了一批揭示“红色中 国”真相的经典性著作

### 一、30年代斯诺夫妇在中国的采访活动和《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的诞生

突破对中国“红色区域”的封锁,将其真相首先向世界报道的是斯诺。

从30年代开始,斯诺一直同情中国进步势力,他写的报道总能触及蒋介石集团神经最敏感的地方。

1931年长江发生历史上最大的水灾,200万人死亡,2500万人流离失所。斯诺乘小艇赶到灾区,有一天他在扬州就见到有十多条船载运4000只棺材进港。斯诺报道水灾的文章中指责国民党政府冷漠无情,没有认真组织救济,却在内部争吵不休,在这个时代的任何地方,这都可算是最突出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借口,强占了沈阳,并在24小时内控制了整个辽东半岛。斯诺急速奔赴齐齐哈尔,准备报道急剧变化的事件。但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全部被日本侵占。斯诺曾这样评说:“满洲政府的出现产生一种变幻不定的情景,也许不应该存在,但从道义上更应该深思,难道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夺取另

一国的土地、财产和政权，仅仅因为这个国家的原政府是令人绝望的无能。”

1932年1月18日，日本又在上海制造流血事件。日本以在中国管辖的闸北区死了一名闯入的日本僧侣为借口，提出最后通牒。内容包括逮捕杀害日本僧侣的凶手，解散反对日本的团体和停止抵制日货等，并限定1月28日前答复。离限定答复最后通牒还有4小时，国民党官员通知日方，准备接受最后通牒的全部要求。日本海军上将盐泽又提出全部中国军队在子夜前必须撤离闸北地区，并将这一要求当晚11时30分以信函送交上海市长，而此时日军正进入攻击阵地。斯诺赶到闸北，见到前进的日军，并见到他们枪杀的第一个中国士兵。斯诺就此事发出的报道，作为独家新闻登载在《芝加哥日报》和《纽约太阳报》的第一版上。斯诺用了一个戏剧性的标题：“鲜血染红今晚上海街头”。斯诺在将近5个星期中，为了不断及时取得头条新闻，来回通过战地。事件结束后，斯诺得出结论，中国的问题出在政府当局而不是人民。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反对日本企图吞并华北5省（冀、鲁、晋、察、绥）的学生运动。斯诺作为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老师，事先得到信息，并帮助学生们将《告民众书》中的9点要求译成英文广播稿。斯诺跟随学生游行队伍前进，看到了国民党的防暴警察和宪兵如何镇压示威者。由于斯诺在游行之前得到了学生领袖们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当晚他就给《纽约太阳报》发了独家电讯，电讯是这样报道游行队伍的：“此地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示威，起因是抗议日本强占华北领土的阴谋。学生运动常常改变中国历史，它是革命的。”

1935年末,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驻北平的美国武官史迪威上校对中国红军抗击蒋介石“围剿”的成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一次坦率地对斯诺说:“蒋称红军是土匪,也许是的,但是土匪也罢,不是土匪也罢,反正他们是游击战争的能手。我不知道他们宣传些什么,但是我看到他们已有克敌制胜的指挥官了。我指的是那些不仅对士兵说‘你们冲啊!’而是说‘跟着来’的指挥官。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而且有很多这样的指挥官,那就够日本人受的了,就可以将日本人送上西天了。”

但是斯诺与史迪威都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样子。他们甚至不敢肯定,红军的领导们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九年的中国内战使“红色中国”变成了“未知之地”。于是斯诺向《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秘密提议,让他突破对陕北共产党控制区周围的封锁,进入“红色区域”。两家报纸都赞助他的计划。于是,他就到上海拜访宋庆龄,请她向共产党推荐。1936年春斯诺回到北平,宋庆龄与北平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这位教授给了斯诺一封致毛泽东主席的介绍信,还告诉他同西安中共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1936年6月,正当蒋介石宣布将对陕北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时,斯诺同美国医生马海德踏上了访问陕北“红色区域”的旅程。

斯诺与马海德到了西安,由中共中央派人沿路联系帮助,终于冲破重重封锁,克服各种困难,进入了“红色区域”。周恩来首先来到边境会见了,并为他的采访作了周到的安排。接着,斯诺作为第一个外国记者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对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进行了第一手采访。毛泽东亲自在窑洞里与斯诺谈了许多个夜晚,向他详细介绍了红军的成长过程,解释了中国共产



1933年，斯诺在察北前线。



党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揭开了当时世界上红色中国这一“最大的谜”。

斯诺还去甘肃、宁夏访问西征前线的红军。他头戴军帽，身着军装，骑着战马，从陕北到陇东，从黄河西岸到六盘山东麓，从后方的窑洞到与白军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行程千余里。他参观部队，访问学校，考察工厂、村庄；他观看表演，参加集会，发表演说，登台唱歌，并与边区军民一同参加篮球，乒乓球比赛。

经过四个月的采访，1936年10月底，斯诺回到了北平。回到北平后的第三天，美联社发了一则电讯说：“斯诺已落入‘赤匪’之手，他利用笔记本报道他们的情况时，被捕并枪决。”北平的外国记者和美、英的报纸编辑纷纷查询斯诺神秘之死。但九小时后，斯诺出现在美国大使馆，并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他的陕北之行的主要事实。接着斯诺发出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英国《每日先驱报》在几周中以头版发表斯诺的系列报道，同时配以评论和照片。美国的《生活》杂志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出人意外，出1000美元使用斯诺拍摄的照片，连续两期用11页篇幅刊登了其中的41张。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亚洲》、《美亚》、《新共和》、《太平洋事务》等报刊，陆续发表了斯诺写的一组文章，共30多篇。有趣的是，为争夺发表这组文章的专有权，美国的《纽约太阳报》和《时代报》竟吵得不可开交。

1937年7月下旬，斯诺在北平郊外的炮声中完成了他的书稿《红星照耀中国》。这本有400页的书稿记录了斯诺在中国“红色区域”的所见所闻，介绍和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目标和政策。斯诺的报道既客观又生动，有十分明确的针对性。在开头一章“一

些未获解答的问题”中，他列举了一连串当时全世界都在关心的问题。通过四个月的实地考察，他对所提的问题作了尽可能的解答。这些解答，在帮助外国人了解正在兴起的“红色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公司出版。这本书很快成了左派图书俱乐部的畅销书，出版不到几星期，就销售10万多册；到同年12月，已连续出了五版。1938年1月，美国兰登出版社也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该出版社原来担心事态迅速发展内容会过时，结果出版后大受欢迎，立即成为美国有关远东的小说作品以外的最畅销书。在发表的100多篇书评中，没有一篇持否定态度，它们都极力赞扬这本书。美国著名作家塔奇曼指出，它“开天辟地，首次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刻画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描述了他们的信念、目标和生活，极大地鼓舞了30年代那些惧怕抵抗法西斯的人们”。美国著名新闻记者白修德评论说：“《红星照耀中国》是经典性报告文学的一个样板。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说：“在人们政治上陷人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

还在伦敦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前，斯诺在上海收到了出版社寄来的样书，被当时在上海工作的胡愈之发现。他一口气将书读完，不胜欣喜，认为它确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他征得地下党组织的同意，立即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中文版。1938年2月，中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复社”的名义在上海出版。整个翻译

出版工作前后只用了一个多月。为了避开日本方面的检查和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破坏,原书名改成较隐晦的《西行漫记》。第一版出版没几天,立即销售一空,接着出二版、三版、四版……。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甚至香港以及东南亚的华人居住区,也争先恐后出版了《西行漫记》的无数翻印本。

乘着反法西斯的硝烟烈火,《红星照耀中国》不胫而走,风靡世界,陆续被译成法、德、意、西班牙、葡、日、蒙、瑞典、荷兰、哈萨克、希伯莱、塞尔维亚等语言文字,在全球流传。“中国的斯诺”成为各国反法西斯战士的著名人物。

1939年9月,斯诺第二次访问陕北时,毛泽东在干部会上亲自把斯诺介绍给大家,并且说:斯诺的《西行漫记》是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

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飞回重庆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斯诺从新四军的后方联络官廖承志处得到这次事变的详细情况。尽管斯诺写的消息绝对不可能通过重庆的新闻检查,因为重庆的官员矢口否认他的报道有任何根据,他还是通过香港发出了多则电讯,揭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真相。为此国民党政府取消了斯诺驻中国记者的特权。

继斯诺之后,他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又去陕北红色区域进行了访问。

海伦是一位美国著名记者、作家,1933—1937年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通讯员兼书刊评论员。1937年与友人在北平创办《民主》杂志。她和斯诺一样,是30年代远东最活跃的外国记者之一。



她于1937年4月到达西安,机智而勇敢地摆脱国民党的监视与禁锢,深夜逃出西安,实现了秘密访问红色中国的愿望。在历时四个月的访问中,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访问了斯诺1936年未能访问的人和事,为后来的写作搜集了大量材料。她自己曾说,1937年延安之行是她“一生中的里程碑”。海伦的延安之行,写成了《红色中华内幕》(中文版书名叫《续西行漫记》),1939年由美国双日——多兰书店出版。这本书详细而生动地反映了陕北根据地的革命面貌,热情赞扬了解放的人民为自己的革命目标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正如她在书的前言中所说,中共“实现了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新天地”。海伦的这本书,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对于当时各国人士了解红色中国起了巨大的作用。

海伦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和写作有关中国的书。她所著甚丰,其中有《革命生涯·传记》(1938)、《中国的妇女》(1938)、《续西行漫记》(1939)、《中国为民主奠基》(1941)、《红色尘土》(1952)、《延安笔记》(1962)等。

## 二、史沫特莱、贝特兰写出《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等名著

紧接着斯诺进入陕北的,是史沫特莱。

1936年9月中旬,史沫特莱接受她在上海曾保护过的红军干部、当时在张学良司令部任参谋的刘鼎的邀请,来到西安休息和写作。这里不仅有一个比较进步的环境,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吸引力——长征后红军新的基地就在一百华里以外。两个月后(即同年12月12日),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西安事

变”，目的是为了逼蒋抗日。为了澄清事实真相，在很多天的夜晚，史沫特莱在张学良司令部里用英语进行40分钟的广播。她概要地阐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并报道了她与这场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会见。当上海按预定安排收到她的广播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当时除南京国民党发表的敌视张学良、杨虎城及诬蔑共产党的官方公报外，史沫特莱的报道是唯一来自西安的真实情况。

西安的广播，使史沫特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从此以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而闻名。1937年1月初，美国报纸在头版用轰动一时的下列标题对她造谣：“她背后有庞大的军队”，“美国姑娘，赤色危险人物”，“美国妇女帮助中国人叛乱”。美联社曾在很长的一篇背景介绍中，异想天开地说史沫特莱“从前的一个美国农村姑娘将成为千万黄皮肤人的‘白肤’女皇”。

史沫特莱的新闻广播，后来得到了年轻的新西兰人詹姆斯·芒罗·贝特兰的协助，史沫特莱的形象因此也得到改善。贝特兰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为了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于1936年初到达北平，并担任英国《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他结识了斯诺等人。西安事变的消息震动了贝特兰，他决心打破新闻封锁，要到西安看个究竟。他与一位东北的朋友一起，历尽艰辛，用了11天时间，最终于1936年12月27日到达西安，这一天正是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的第二天，至1937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的当晚离开。不久他写出了反映西安事变的报告文学。原著1937年在英国出版时名为《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的真相》；1938年，此书美国版改名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兵变》。1939年上海译报图书部印行的中译本书名为《中国的新生》。1937年8月至10月，他在

延安和山西前线访问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毛泽东和他的谈话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篇名是《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从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他又去山西访问八路军。1939年他写成的《华北前线》一书在英国出版。同年出版此书的美国版，易名为《没有被征服的人：在华北战斗农民中间一年惊险生活的日记》。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收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总部——延安送来的一封正式邀请她去延安访问的信件。这是她等待多年的访问苏区的极好机会。

1937年1月12日，史沫特莱趁西安事变后的混乱状态，坐着红军护送的一辆卡车，悄悄越过了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她用了三天时间走了120华里崎岖不平的山路后，才在三原县的杜里镇第一次见到了红军，那是红一方面军总部的驻地。红一方面军的军团长左权是史沫特莱在上海掩护过的一位红军老干部，他热烈欢迎她的到来。在欢迎的人群中还有她的老朋友、从国民党南京监狱中逃出来的丁玲。延安特派丁玲到此护送她去延安。她在杜里镇停留了两个星期，用了不少时间访问了贺龙和彭德怀。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描述了她对彭德怀和贺龙的最初印象。

史沫特莱抵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先后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个人前来欢迎她的有陈赓、刘鼎以及她在上海掩护过或在西安共过事的同志，一年以前经她劝说来到西北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以及曾在西安帮助过她的王炳南与王的德国夫人王安娜。

毛泽东常与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吴光伟在窑洞里谈话，并一起吃便饭，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他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毛泽

东朗诵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低吟自己的诗作。

到4月份,史沫特莱制定了一个较长的计划,其中最重大的一项是写农民出身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的传记。史沫特莱认为:中国人口十分之八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者向全世界谈自己的经历。如果朱德把身世告诉她,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阶级所最关心的事情。史沫特莱定期长时间地采访朱德。他们混合使用汉语、德语和英语,遇到难点就求助于吴光伟、马海德和黄华。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朱德动身到前线去。不久史沫特莱也上了前线,在山西战场观察朱德达一年之久,这为日后写朱德传记积累了大量材料。40年代中期,她移居纽约附近的德耶庄,着手朱德传记的写作,直到她1950年逝世前,这本书才撰写修改完成,书名为《伟大的道路》。这部书倾注了史沫特莱的全部心血。它不仅记录了朱德60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这本书具有独特的风格。作者把自己置身于书中,并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调,刻画了一个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逼真地记述了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事迹。

1937年9月,史沫特莱离开延安经西安到达五台山八路军朱德司令部。以后的三个月,史沫特莱不畏艰险,白天深入前线和八路军、游击队在一起,夜晚便把所得的材料用打字机整理出来,这就是第二年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在反击》一书。其中记

下了史沫特莱从 1936 年西安事变到 1938 年抗日战争初期在华北地区的生活经历,主要反映当时华北地区抗日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史沫特莱到八路军总部不久,便开始和朱德制定对中印关系前景很重要的一项计划。为了给中国抗战寻找医疗援助,1937 年 11 月 23 日史沫特莱给领导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尼赫鲁写了一封信,接着朱德在 11 月 26 日也写信去,两人都提到了八路军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军队给养和医药。他们呼吁范围广泛的支持。尼赫鲁很快作出了反应,他们公开了这些信,开始募集资金,并重提早些时候印度国民大会讨论过的关于向中国派遣医疗队的问题。1938 年夏天,一个由爱德华大夫为队长的包括五名医生和较好装备的医疗队已经组成,准备出发来中国。1938 年 10 月他们到达汉口时,受到史沫特莱的迎接,帮助他们作出了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医疗工作的最后决定。五位医生中的一位柯棣华大夫决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留在中国。他在八路军中服务,牺牲的前一年与一名中国女护士结了婚。该医疗队取得了巨大成功,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的一个重要象征。

1938 年 11 月到 1940 年 4 月,史沫特莱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邀通讯员的身份,身着戎装,来往于武汉东段的长江南北山区(包括湖南、湖北、安徽和河南四省的广阔山区),大部分时间用于采访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她的采访是外国记者(包括斯诺和杰克·贝尔登在内)对中国战区历时最长的采访。在《中国的战歌》(1943 年)这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最佳报道之一的书中,史沫特莱详细论述了这 18 个月的经历。战争和革命是她的主题,她通过对战斗中日本人的凶残和中国人的英雄气概

等一系列有声有色的叙述,对主题作了广阔的故事性的描写。为了唤起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斗争的同情,史沫特莱有意识地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抗日目标的一致性。例如,她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抨击,给予亲蒋介石的桂系军队首领李宗仁及其广西部队的赞扬和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赞扬几乎一样多。

从历史的观点看,《中国的战歌》的最大优点是描述了战争在中国农村引起的社会变革。史沫特莱亲眼看到了农村妇女怎样组织起来在军事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怎样通过群众性的教育运动进行扫盲,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怎样将民主措施引入乡村政治,成为动员抗日的的一个主要部分。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些变化,使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无法恢复对中国农村旧有的独裁专制。

---

### 第三节 抗战期间外国人士对 抗日根据地的报道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局势发生巨变,中国进行全面抗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沉重打击法西斯侵略者的主战场之一,因而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和支持。反动势力虽然仍千方百计进行封锁和限制,但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阻止外国人进入延安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在武汉领导长江局期间对统一战

线工作的积极开展,中共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后迁往重庆),接触了大批外国人士,并且安排他们到延安等地工作、考察或采访。

一批又一批的专业记者、作家以及人数更多的政治家、外交人员、军事人员、医生、护士、教授、社会福利工作者、摄影师等外国人士来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山东、皖南等根据地或游击区。他们不仅表达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友谊,帮助中国抗战,而且还为世人留下了丰硕的作品。无论是专业作家还是非专业作家,在这个期间都撰写并出版了大量的报告文学、通讯、日记、书信、小说、散文、诗歌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和日常生活,题材多样,风格各异,有着很强的真实性,成为时代的记录和历史的镜子。

在这些著作中,重要的除了上节中已提到的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击》(1939)、《中国的战歌》(1943)和贝特兰的《华北前线》(1940)、斯诺的《为亚洲而战》外,还有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1940)、鹿地亘的《叛逆者之歌》、艾泼斯坦的《人民之战》(1939)和《中国未完成的革命》(1947)、福尔曼的《北行漫记》(1945)、班威廉和克兰尔的《新西行漫记》(1948)、斯坦因的《红色中国在挑战》(1945)、白修德和贾安娜的《中国的惊雷》(1946)等,此外还有尤里斯·伊文思拍摄的抗战记录片《四万万人民》。这些作品向全世界真实地、客观地报道与描写了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群众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表达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展现了中国革命在大风大浪中造就出来的一批革命领袖的风采。这对影响国际舆论和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特别是认识抗日根据地的业绩,产生过极大的

作用,为我们最终赢得抗战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 一、斯特朗两次访华:《人类的五分之一》等名著的诞生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斯特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访华:一次是1938年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的高潮时期;另一次是1940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抗日统一战线开始破裂的时期。

1937年末,斯特朗继1925年、1927年访问中国后,第三次来到中国。她从武汉坐火车到山西临汾,然后换乘一辆由卡车改成的东歪西倒的轿车,经过许多山路和峡谷,在一个村落里访问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以及他的部下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朱德向斯特朗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是持久战,以及实行这一战略的策略与措施。以后斯特朗用10天的时间穿梭于战斗激烈的敌后各条战线之间,睡在当地老乡的土炕上。她对于八路军官兵之间的平等相待,尤其是“他们之间的同志感情”感到惊奇。她以极大的求知欲,甘当他们的小学生,听有关游击战术和著名战例的故事,学习怎样使一支军队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方法。

斯特朗从八路军回到武汉后,她访问了周恩来。周肯定了中共信守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的一些实力派的破坏活动,表示了他的不安。斯特朗还会见了邓颖超,从她那里了解到长征中如何组织和教育妇女的问题。她还就妇女问题采访了女学生、纺织女工、女作家以及一群“歌女”和过去的“夜总会的舞女”。

斯特朗将这次所采访的材料写成《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讴歌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不屈不挠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并坚信中国的抗战必胜。



1940年末,斯特朗又来到重庆对中国作第四次访问。这时正处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夜。国民党已召开了以“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斗争”为主题的五中全会。她一到重庆就采访了从中国南部八个省旅行六个月刚刚回来的艾黎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斯·卡尔逊。她还找到了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向他了解新四军的背景情况。

斯特朗此次在重庆的活动是以几个晚上的时间采访当时任八路军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周向她详细介绍有关蒋介石的部队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武装冲突的情况。在过去的两年中,这种冲突不断加剧,集中表现在1939年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除一直企图占领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地方外,还武装封锁了八路军的住地。周恩来还证实了国民党将领积极与日本合作,蒋介石还签署命令,要新四军离开长江流域,转移到黄河以北。这个命令对新四军来说,如果兑现,实际上意味着自杀。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新四军一直是从上海伸延到长江流域其他地区进行小部队行动,以抗击日军。这些部队大多完全依靠当地人民的支持才能生存;所以,如果他们撤退,就得不到保护。在最后一次采访结束前,周恩来交给斯特朗一篇26页的文章和其他文件,作为她了解情况的辅助材料。

斯特朗乘船返回美国后,很快证实,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军队集中8万多人包围袭击了正在经皖南泾县茂林山区北调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在长江以南的近1万人的新四军,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为了澄清事实,斯特朗设法将自己所掌握的情报的主要内容

告诉了美国国务院和负责援助蒋介石政权的美国财政部。但结果是她写的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无处发表,只能将她的材料提供给她《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朋友约瑟夫·巴恩斯,后者也只能用她本人的名义发表一篇报道。报道很快在纽约报纸上以大标题登出:蒋介石不再统治一个统一的中国,不再指挥统一的军队。后来,斯特朗在《美亚》杂志上发表了更详细的报道。

## 二、伊文思和他拍摄的记录片《四万万人民》

荷兰进步电影艺术家尤里斯·伊文思,1938年1月来到中国拍摄了反映中国抗日事迹的记录片《四万万人民》。国民党当局阻挠伊文思拍片,还派人监视他,防止他与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接触。周恩来专门到旅馆去看他,并写信给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厅长的郭沫若,请三厅支持伊文思拍片。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刁难和阻挠,伊文思无法实现去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拍片的心愿。当他得知袁牧之要去延安拍片的消息后,慨然以自己的埃摩摄影机和胶片相赠。这一举动充分体现了这位进步电影艺术家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也表达了国际革命电影工作者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殷切希望。

## 三、汉斯·希伯为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而英勇牺牲

德国共产党员、著名记者汉斯·希伯,1925年来上海,后又到广州,参加中国人民革命。自1926年起至1927年5月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任总政治部出版的英语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四·一二”政变后辞去工作,回到欧洲。1928年2月他在柏林以“亚细亚人”为笔名出版《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德文版)一书。1932年秋,他再来上海,仍以“亚细亚人”为笔名,在德文

期刊《世界舞台》、英文期刊《太平洋事务》和《美亚评论》上连续发表有关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

1938年希伯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协助下到达延安,毛泽东会见了。1939年2、3月间,他又到皖南泾县云岭采访了新四军军部。“皖南事变”发生后,希伯在《美亚评论》上先后发表了《叶挺将军传》和《中国的内部摩擦有利于日本》等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歌颂新四军的抗日业绩。不久,他与夫人秋迪一起前往苏北采访刚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他会见了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刘少奇、粟裕等,写了一部约八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写了《在日本战线后面的新四军》等报道。1941年9月,希伯到达山东滨海地区一一五师驻地,访问了当地军政领导人罗荣桓等,先后写出了通讯《在日本占领区的旅行》和《八路军在山东》、《为收复山东而斗争》两个专题报道。此外,还修改、充实了在苏北时撰写的书稿。1941年11月初,日本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希伯与抗日军民一起参加反“扫荡”战斗,同时写战地报道。11月30日晨在东蒙群山中的大青山在与敌人激烈的遭遇战中,希伯表现英勇,不幸牺牲,时年44岁。

#### 四、反战作家鹿地亘、绿川英子在华的活动

日本著名反战作家鹿地亘,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因遭日本政府迫害,秘密逃亡中国,不久加入中国抗日斗争行列。1938年在武汉参加以郭沫若为首的第三厅,从事对外宣传工作。武汉失守后,经周恩来安排他到桂林,以“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代言人的身份开展反战宣传活动。仅在1938年至1939年,他先后在各方面举行的座谈会上,作过题为《日本总动员方案》、《中日战争

的现阶段》、《第二期抗战中应注意三点》和《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团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战演讲。同时，他为桂林出版的报刊撰写了《何谓东亚协同体》、《日本法西斯蒂长期建设论的批判》、《日本当前几个严重问题》、《一封公开信》等反战文章。鹿地亘曾亲自在桂林组织“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演出队，并创作反战话剧《三兄弟》，为日本被俘士兵和桂林观众演出，影响很大。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特为此剧的演出召开座谈会，桂林《救亡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座谈记录和夏衍的短文《我推荐这个剧本》。鹿地亘长途跋涉深入到湖南常德附近的日本俘虏收容所，对日本士兵进行反战思想工作。他将看到和了解到的日本士兵思家厌战情绪及在俘虏收容所的见闻，写成长篇报告文学《和平村记》，在《救亡日报》上连载，引起中外舆论界的注意。鹿地亘亲自带领一支反战工作队，在作战前线向日本士兵喊话。他将这时期以前对日本士兵作反战宣传的艰苦情景写成报告文学《我们七个人》，于1943年由夏衍译成中文在桂林印行。鹿地亘1946年返回日本后，一直从事研究和介绍中国文学的工作。

日本世界语者绿川英子，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夕，与未婚夫中国留学生刘仁秘密离开东京来到中国。此前，她已在东京结识世界语者、著名作家叶君健，并在上海“语联”主办的刊物《世界》上发表文章，报道日本人民为争取民主权利所进行的斗争。“七七”事变爆发后，她便积极投入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对外宣传工作。经三厅厅长郭沫若的推荐，她到国民党的广播电台，作反战宣传。她用地道的日本语向在中国的日本侵略军进行广播，引起了侵略军头目的恐慌和恼怒，也引起了日本士兵的深思和反省。抗战胜

利后,绿川英子不幸逝世。她留下了用世界语写的两部文学著作——《在战斗的中国》和《暴风雨中的私语》,记录了她与中国人民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斗友谊。

### 五、中外记者团访问陕甘宁边区,以及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和白修德、贾安娜的《中国的惊雷》

1941年至1943年间,陕甘宁边区和其他一些抗日根据地再度遭到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当时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连续掀起三次反共高潮,把陕甘宁边区包围得水泄不通,许多外国友人、记者、作家被隔绝在外边不能进去。后来,由于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以及同盟国施加的影响,终于迫使国民党让步,允许一批中外记者在重庆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于1944年6月到陕甘宁边区采访。记者团共21人,其中外国记者仅6人,中国记者9人,还有国民党官方指派的两个领导人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来的4人。这6名外国记者是:斯坦因(美联社)、艾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社、《纽约时报》)、福尔曼(合众社)、武道(路透社)、夏南汉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和普金科(塔斯社)。记者团在延安访问了一个多月。1944年7月12日,记者团中的全体中国记者及外国记者夏南汗神甫离开延安,其余外国记者或留在延安,或赴晋绥抗日根据地访问。除了这次有组织的采访活动,也还有一些记者先后深入到各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如美国《时代》周刊的白修德等。这些外国记者都写出了忠实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和著作,如福尔曼的《北行漫记》、斯坦因的《红色中国在挑战》、艾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白修德和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等。下面着重介绍福尔曼和他的著作《北行漫

记》及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

福尔曼 1930 年就来到中国，曾三次访问西藏，于 1935 年写成《被禁止通行的西藏》一书。1937 年“七七”事变前夕，他前往陕北访问了红军部队，见过彭德怀、贺龙等红军高级将领。《北行漫记》一书，是作者从延安到晋绥抗日根据地，深入抗日前线和后方，对八路军广大官兵、民兵组织、乡村经济组织、人民的生产生活、基层政权建设、文化教育、医药卫生以及日本战俘和他们自己的组织——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等各个方面进行仔细考察而作的真实记录。全书记叙了作者每到一地的所见所闻，他为根据地内艰苦抗战、军民团结、政治民主的生动事迹所折服，这也就无情地揭穿了国民党政府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所散布的种种谎言和欺骗宣传。正如福尔曼 1944 年 9 月 1 日在晋绥第八军分区驻地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所说的：“我们知道边区以外有些人过去告诉我们的不对的。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被捉住的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是害怕并恨八路军的，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拥护八路军的。现在最好的一个证明，即你们都有武器。如果人民怕八路军，或八路军怕人民，八路军就不会给人民枪械。在这次参观中，最使我感动的，是人民都武装起来，正打击着中国、美国共同的敌人——日本。……你们虽然用的是旧武器，但也能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这次战争证明了最要紧的不是武器而是精神，在中国已证明了光武器还不行，精神更重要。这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就能

打垮敌人。”

《中国的惊雷》的作者白修德，是美国的著名记者、作家。1939年4月，白修德在23岁时被派到重庆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一住就是六年。他曾任国民党宣传处英文编辑顾问。1939年9月，他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到山西敌后游击区采访。1943年河南发生严重灾荒，白修德亲临灾区采访而写成的纪实文章在《时代》周刊上发表，向西方最先披露河南灾区200万人死于饥饿，300万人濒临死亡。随后又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了《人吃人的河南灾区》一章。他认为，河南悲剧的产生“是国民党暴政所造成的恶果”。这使国民党政府受到很大的震动。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立即找她的老朋友、《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鲁斯，要求他立刻将白修德召回。

1944年他到达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

《中国的惊雷》另一位作者贾安娜，1941年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宣传员来到重庆。1944年至1945年再度来华任《时代》周刊政治记者。

《中国的惊雷》(又名《中国暴风雨》)对当时美国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生动具体的事实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其报道极富内幕性。它在“史迪威事件内幕”、“美国想在中国干吗?”、“身为枪铳的赫尔利大使”的一些章节里，深刻揭露了美蒋互相勾结反共而又有矛盾的许多内幕新闻，尖锐地批评了赫尔利、马歇尔执行扶蒋反共的美国对华政策。它一针见血地说：“在中国人民的眼中，中国内战是美国所造成的。”该书将国统区的政治与延

安的政治、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对比。它认为：“延安首先是一个电机工厂，这在历史上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延安是一支壮大的力量，他们能够打败日本人，并治理好这个国家”。作者对延安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评价是：“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他们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什么，而且完全懂得将这些疾苦转化为行动，使农民成为他们的基本力量。”“虽然他们都被认为是中坚人物，但他们依然在群众中广泛地发扬民主，并且为自己定下了一种模范规则来配合他们的职位。”至于对蒋介石，白修德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刻画了蒋的为人和其倒行逆施的反革命行径后，用三句话来概括他对蒋介石的认识过程：“开始我尊重他。以后我为他惋惜。最后我鄙视他。”对于延安的政治民主，作者写道：“共产党人经常地进行整风，他们总是用一面放大镜在那里检验着自己的过失。他们痛击着自己的胸膛以保证自己改进，他们为自己的过错而悲哀和忏悔。”“在各地（指中共领导的地区）这种行政上的批评自由形成了中国农民从未有过的最民主的政治制度。”作者把国民党同共产党进行鲜明对比后作出结论说：“至今为止，共产党是光耀四射的。在国民党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访问中共地区的人士似乎是逃脱了国民党的压迫，进入到光明的地区。”

《中国的惊雷》1946年在美国出版后，获得广泛的好评。《纽约人》杂志评论说：“本书叙述了许多人物（包括令人惊讶的对已故的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的重新评价），但基本上是写中国人民和他们苦难的种种历史原因的。这是一本好书。”H. S. 海沃德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著文说：“这是关于中国的最好的书籍之一



……,对中国发生的事作了仔细的、可读的、准确的叙述。”《纽约时报》发表费正清评论说:“这本鲜明、锐利、真实的书,会有广大的读者。”当时美国的“每月新书俱乐部”立即将这本书介绍给它的百万会员。

斯诺在为《中国的惊雷》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说:“这本书是一本精湛的报告文学,也可以说是一部东亚战争史略。”

## 六、美国官员卡尔逊、谢伟思的报道:《中国的双星》、《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这里再介绍一下美国官员埃文斯·卡尔逊和杰克·谢伟思怎样认识和介绍中国的。

卡尔逊上校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他曾三次来华。1937年第三次来华时,在上海美国海军武官处工作。他受斯诺的启发,决心亲赴抗日前线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视察八路军的作战情况。他在周恩来的帮助和亲自安排下,巡游北方,以后又在中国南方八个省旅行了六个月。卡尔逊在考察晋察冀边区和延安时,以美国总统罗斯福密使的身份,曾与毛泽东进行长谈,并会晤了中共其他一些领导人和几乎所有在华北的八路军将领,集中探讨和实地考察了八路军实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及其政治工作。他认为八路军的游击战是使日军装备优势得不到发挥的很有效的作战方式;认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是这支军队所以能克服一切困难,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关键。他十分赞赏中共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在根据地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民主改革。卡尔逊断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生气勃勃、最进步的政治组织。他公开发表演说,撰写文章表达

他所见中国的真相,甚至建议美国学习中共的游击战。其见解与美国海军军部不合,军部命令他不得在公共场合发表讲话并立即回国。他为了能继续自由地发言和写作,毅然辞掉服务了23年的军职。在1939年至1940年他先后应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及《美亚》杂志的约请,撰写了大量有关中日战争的论著,为美国人民深入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获准重返前线,他仿照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组建了一支海军陆战队近战兵这样一种独特组织。罗斯福支持他的计划,并提升他为将军。1942年,卡尔逊仿照八路军在敌后的奇袭战术率美海军陆战队袭击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因取得出色战果而声名大震。他三次因卓越战功获海军十字勋章,成为太平洋海战中的传奇式英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卡尔逊退休,被推选为美国民间进步组织“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的主席。他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严厉指责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他发表声明说:“目前局势的一大悲剧,就是美国已成为鼓励中国国民党顽固反动派进行内战的一个主要因素。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目的是想消灭中国唯一有组织的集团。这个集团曾替人民伸张正义,并使人民能有享受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基本权利的机会。”他说:“美军一天留在中国,美国一天以金钱和军用品供给南京政府,则把持着该政府的反动分子一天不会采取决定的行动组织真正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只有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才能保证和平及民主改革。”

卡尔逊第三次访问中国后,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的双星》,描述了他访问延安和八路军前线部队的经过。在其中,他发现

了中国共产党人是一批献身崇高事业的爱国者。另一本书是《中国的陆军：组织和军事效率》。

由于蒋介石一再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和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迫于舆论压力，几乎与中外记者团到陕甘宁边区采访的同时，1944年7月，美国派了以戴维·D·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抗战期间曾任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的谢伟思是观察组的成员之一。在延安考察期间，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写了许多全面反映中共领导抗战实况的报告（共计80余篇），记载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他多次的重要谈话。这些报告集中反映了中共当时对国内重大问题的政策主张，为美国官方了解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他还多次提出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切合时宜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报告也就是40年后收集在《在中国失掉的机会》一书中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篇章。

谢伟思当时的政策建议曾得到美驻华大使馆全体政务官员的签名赞同。此事惹怒了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他立即召谢回国。1945年6月，谢伟思因将自己的文件借给《美亚》杂志的编辑杰菲，受到联邦调查局诬陷，不久谢被停职，并曾与另外5人以“间谍活动”罪被逮捕。经过6年的调查，到1951年证明他“无罪”，但仍被免职，直到1957年才复职。

1974年，埃谢里克教授（周瑞德）将谢伟思1941—1945年间的报告及备忘录等编辑成《在中国失掉的机会》一书予以出版。

##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外国人士 对解放区的报道

抗战结束以后,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虽然解放区基本上处于被封锁、被进攻的战火弥漫之中,但形势很快改观,许多外国友人、记者、作家通过各种渠道来到解放区,有的随着解放军奔赴前线,有的深入农村,进行采访和写作。他们写出了一批真实反映解放区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如斯特朗的关于毛泽东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伊沙贝尔·柯鲁克和大卫·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1948)、韩丁的《翻身》(1948)、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描写解放区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几部大著,以及伊沙贝尔·格兰姆的《中国解放区战俘营采访录》、西蒙诺夫随军南下采访写的《战斗着的中国》(1950)、严斐德的《中国胜利了》(1949)等书。

### 一、斯特朗第五次访华:与毛泽东讨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访问中国。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但蒋介石正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打全面内战。斯特朗乘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飞机,从北京到达延安,然后到张家口、邯郸附近武安地区的刘伯承司令部,接着到东北哈尔滨、齐齐哈尔,再返回延安,先后用了一年多时间。

1946年8月6日上午,斯特朗在延安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在讨论美苏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时,斯特朗记起广岛遭原子弹轰炸一周年的日子已到,便问道:“难道美国就不能直接从他们在英国、冲绳和中国的基地上使用原子弹袭击苏联吗?”毛泽东回答:“的确,这些基地可以用来进攻苏联,但是首当其冲受美国压迫的不是俄国人,而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这些国家不同意,他们会起来反抗的。”毛指出:“美国反动派只不过是纸老虎。……纸老虎装得像是一头凶恶的野兽”,“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从长远观点看问题,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

以后几个星期,斯特朗走遍了整个延安,与各界人士交谈。她还向党的领导人作了关于中国式共产主义的采访。陆定一用三天多时间向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强调其带有独特的中国特征。刘少奇对中国革命具有中国特征的说法,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刘少奇告诉斯特朗,毛泽东使农民参加到革命中来,已将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态改变成亚洲形态”。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种大胆的论述,这种论述对苏联向其他共产党发号施令的权力是一种挑战。他希望斯特朗将这些看法带到外部世界去,或许还能说服美国区分共产主义的不同形态。在谈话结束时,刘少奇引用毛泽东的一个论断,对于那种不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盲目追随他人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他们的那些教条主义是毫无用处的,比牛粪还不如,因为牛粪可以肥田,而教条却不行。”

斯特朗离开延安去访问其他解放区的前夕,又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继续上次谈话的重点。自从上次谈话以后,美国又给

了蒋介石近十亿美元的战争物资。这表明“美帝国主义分子已经作出抉择,要通过蒋介石使中国沦为殖民地”。毛泽东这样估计,如果美国人所需要的东西,蒋介石办不到,那么美国人就可能直接干涉。但是,那将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沉重负担,因为他们越来越不得不帮助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维持局面,摩天大楼更高了,但是基础更小了。”毛泽东认为:“原子弹诞生之日就是美帝国主义走向灭亡之时……因为帝国主义依靠的是原子弹而不是人民……凡是依靠人民的都要求和平。”他接着分析了唯技术论的危险性:“谁依靠原子弹,谁就希望战争。这样,帝国主义和人民之间的对立就越来越严重。原子弹不会毁灭人民,结局只能是人民毁灭原子弹。”

1946年10月底,斯特朗到东北、张家口、青岛等地旅行后回到延安。她约见了因国共和谈破裂刚从南京返回的周恩来。周恩来把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告诉她,如果延安受到进攻就准备放弃。中央认为:蒋介石的进攻很可能使他的战线拉得太长。解放军不会再回到游击战中去,只要等到国民党战线太长而无法防御就可以了。

进入冬天,斯特朗写出了关于“纸老虎”那次谈话及“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交给陆定一作政治校正。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那篇文章尤其令人振奋:这是外国人第一次认真重视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贡献。文章被译成中文,由好几位党的高级干部加以审定,然后再译成英文,斯特朗离开延安后即可直接发表。

1947年1月底,斯特朗又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正式谈话。国民党已经开始向延安推进,中共撤离延安的计划正在拟定。在谈话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用数字向她介绍解放战争的形

势,表示一定会取得胜利。毛泽东对她说,“蒋介石开始狗急跳墙了,所以他攻占张家口和烟台,现在又准备进攻延安,他一定要把军队开进这座城市。这里不是战略要地,也不是经济中心。他要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这样就可以向全国宣布‘共产党完蛋了’。这样他们就觉得放心了。但是即使我们撤出延安,战斗还是照样进行。如果你问,保住延安和撤出延安哪个好?那还是保卫好。但如果撤离了,那也没有什么。”

撤出延安的工作在其后的一周里展开了。斯特朗离开延安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与她作了一次临别谈话。最后他又谈到原子弹,“原子弹算完了,无知的人们都还在谈论它,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使用原子弹了,在日本的爆炸毁掉了原子弹本身,因为全世界都起来反对它。原子能将交给人民使用,但原子弹已经寿终正寝了。”

1947年2月14日,斯特朗离开延安经北平到上海。在上海,由于斯特朗最近的旅行和接触的一切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提供更多饶有趣味的消息,于是她成了人们尤其是外国记者们注意的中心。她有时会到记者酒吧来向人们讲述共产党军事战略发展的情况。上海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中心,有许多国家的代表都对共产党有一种好奇心理,很快,他们都来找斯特朗。她写的文章及她所讲的一切,被发回到印度、东南亚、菲律宾、日本乃至欧洲。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来信要求同她谈谈延安。

1947年5月,斯特朗将她在中国解放区所见到的情况写成一本书,取名为《明天的中国》,印度的一家出版商第一个接受了她这本书的出版。

1948年,斯特朗从美国又来到苏联,决定再访中国。她得知,

中国的解放战争不需要两年时间就可以取得胜利。从苏联进入中国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需要获得苏联的签证,但拖了四个月未有结果。1949年2月14日,她突然被苏联当局逮捕。五天后,苏联又以“间谍”的罪名,将她从苏联经波兰驱逐出境。直到六年之后的1955年2月,苏联才宣布撤销对她的指控,并说“指控是无根据的”。在此期间,她在美国受尽冷遇,申诉无门,处境十分艰难。此后,又经过三年的斗争,才获得美国的出境签证。1958年9月,72岁的斯特朗终于经莫斯科来到北京定居,直到1970年她去世。

## 二、描写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几部名著:《中国震撼世界》、《十里店》、《翻身》等

解放战争期间,继斯特朗去解放区采访、写作的外国人士还有伊沙贝尔·柯鲁克和大卫·柯鲁克夫妇、韩丁、杰克·贝尔登、伊沙贝尔·格兰姆、西蒙诺夫等,他们都写出了具有历史价值的著作。

伊沙贝尔·柯鲁克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后,于1938年到中国四川和西藏等地进行了大量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考察工作直到1942年。大卫·柯鲁克是英共党员,1938年曾来中国。1947年,柯鲁克带着英共的介绍信,与伊沙贝尔一起,为调查研究中国土地改革等情况重返中国,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十里店村(今河北省武安县内)。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他们深入群众,做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搜集了丰富的素材,并不分昼夜地勤奋整理写作,于1949—1950年写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一书。此书在英国和美国先后出版,在国外很有影响,被英国许多社会学教师定为学生的必读书。



韩丁 1945 年来中国，为美国战时情报部做宣传研究工作。在重庆他会见了正在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主席，交谈了农业等问题。1946 年间韩丁作为拖拉机技师，随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在华机构又来到中国，被派往河北南部解放区负责一项发展计划。1947 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在全世界结束后，韩丁应聘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教授英语，同时到离校最近的张庄，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土改。他深入群众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素材，并同张庄干部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丁根据亲身参加张庄土改的见闻和感受，于 1948 年写成了巨著《翻身》。

杰克·贝尔登，是美国的著名记者、作家。1933 年至 1942 年曾在中国呆了九年。贝尔登到过中国沿海城市和内地，到过日本占领区，目睹不少战争场面。作为战地记者，他写过不少报道和通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内战爆发。为报道这场战争，贝尔登于 1946 年 12 月再次到达中国。1946 年除夕，他从天津进入北平，在学生们反独裁、争民主、求解放的精神激励下，贝尔登决定去解放区。后来，他与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同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津机构协商，冒充他们的成员，冒着种种危险，进入华北解放区，在刘伯承等人的支持下，对解放区和中国革命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和了解，写成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初版于美国。此书记载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大众为建立新中国展开大决战的磅礴气势和攻无不克的战斗意志，揭示了反动派必然垮台的命运。这部作品被西方有识之士誉为有关中国革命的又一部经典性著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本身也“震撼了世界”。

---

美国记者伊沙贝尔·格兰姆，多年在国民党统治区采访。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山东《大众日报》等处工作。解放后留居中国，在新华社工作，50年代初逝世。她写了《中国解放区战俘营采访录》等许多精彩的采访报道。

## 第八章

#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抗日战争的烽火,唤醒了中华民族,一切爱国的进步的中华儿女,投入了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国的文化界、新闻界在抗战中配合军事战线形成了又一条重要战线。还在抗日战争前,爱国的进步的文化界、新闻界就曾努力奔走呼号,为着实现全国团结,抵御日本的野蛮侵略,发挥了很大的号召和推动作用。文化界在抗战前一个时期存在的其他争论,在客观上被掩盖起来。在抗日战争爆发、面临国家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下,发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一切文化宣传活动自然集中于宣传抗战这一中心。爱国的进步的作家、新闻工作者,以自己手中的笔为武器,在延安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沦陷前后的上海、香港以及东南亚,通过办通讯社、办广播、办报刊、搞文学创作和其他各种服务于抗战的文艺宣传形式,以大众化、通俗化的内容,有效地、集中、迅速、普遍地动员人民大众,宣传民族的危机,挽救民族的危亡,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和各种欺骗宣传,激发起全民族高度的抗战热情,坚持持久抗战,坚定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对外宣传中国的抗战，宣传如何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和物质援助，以有利于抗战。通过间接和直接的对外宣传和思想、文化交流，彻底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与暴行，引起世界进步人士的正义感和给予道义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援。同时，通过中外进步人士和各种组织，交流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提高抗战胜利的信心。人们还记得1938年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上号召全世界人民抵制日本，援助中国。人们还知道当时国际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杜威，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罗素，法国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署名的通电，吁请一切国家的人民组织起来，自动抵制日货，不卖和不装运军火原料给日本。印度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以极大的义愤多次以书信、电报、谈话、诗稿等形式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这些号召、吁请和发出义愤的声音像火炬一样照遍了全世界，同时也温暖了中华民族的心，鼓舞着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救国、争取胜利的信心。人们也不会忘记当时爱好和平的人民，如苏联、美国及其他国家人民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爱国华侨，对抗战救国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援。人们同样不会忘记世界许多国家的进步作家、新闻工作者纷纷来到中国抗日根据地和后方，对中国抗战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对中外文化交流和国际舆论界产生了积极的、重要的影响。

## 第一节 延安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

### 一、延安新华社的对外发稿与接受国内外电讯

新华社是新型的人民的通讯社。它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崛起和发展,打破了国民党中央社对新闻发布权的长期垄断。它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哨,代表了人民大众和全民族的利益,为挽救祖国危亡而呐喊。它报道事实,传播真理,褒贬是非,与国民党中央社的虚假报道和欺骗宣传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在国际、国内赢得了信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新华社的前身是1931年创办于中央苏区瑞金的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与当时的《红色中华》报是同一个组织机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实现后,《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红中社改为新华社。

在改名《新中华报》、新华社以前,《红色中华》报、红中社的国际国内消息来源是靠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部分新闻电讯(后来抄收全部),其中一部分重要新闻刊载报端,另一部分则印成《参考消息》(后曾改名为《今日新闻》),供中共中央及党政军各单位参考。改名为《新中华报》、新华社以后,除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全部电讯外,并增抄日本同盟社的消息。1937年1月,开始用新华社的名义,发布国际国内重要新闻,其中以介绍陕北根据地建设的新闻为主,其数量约占整个新闻数量的1/3以上。《新中华报》1937年1月第一次出刊,登载了新华社播发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

稿，标题是《和平解决有望，前线无大动作，红军力求和平》。这是以新华社名义发表的第一篇新闻稿。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随着国内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扩大，新华社的任务也逐渐增加，不仅发布的新闻数量，而且发稿的内容与发稿的对象也逐渐扩大，除经常发布中共中央文件和根据地新闻外，还转发《新中华报》、《解放周刊》的社论、评论和论文摘要；除向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报纸供稿外，还向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副刊和香港地区的进步报纸寄发特稿。这时新闻的来源也逐渐扩大了，有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的新华社记者、通讯员采写的新闻。抄收各国通讯社电讯的范围也比较广泛，其中有德国海通社，英国路透社，意大利斯蒂芬尼社，法国哈瓦斯社，美国美联社、合众社，苏联塔斯社等通讯社的电讯。所抄收的电讯，经过翻译、编写、播发，迅速地反映了国际上政治、军事斗争情况，使被封锁的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能够较快地从更多方面了解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及其发展。同时，国统区和沦陷区的不少群众通过新华社播发的国际国内新闻，逐渐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从1937年开始，陆续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新华社分社，成为由新华社统一指挥的通讯网。它们为新华社采访当地的新闻和抄收新华社播发的电讯，在宣传上发挥了愈来愈明显的作用。凡带全国性、全党、全军性质的电讯，均集中于新华社发布。全国性电讯发布的统一，是新华社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对推动解放区新闻事业的发展，搞好国际国内宣传起了积极作用。

193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改变《新中华报》与新华社那种既出

报纸又发布新闻的组织形式,使新华社成为单独的组织机构。这时的新华社不仅有翻译部门,而且有编辑、采访部门,设置了通讯科,有通讯记者和分社组织,还有印刷机构。它的业务,除收集和发布人民所需要的新闻,并起着中共中央喉舌的作用外,对于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能经常地、及时地反映,搜集国内外信息,撰写评论、文章,成为中共中央指挥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工具之一。

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新华社的宣传工作。他经常为新华社修改和撰写评论和消息。他的文章都紧密结合现实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有力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独裁政策和内战阴谋,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嬉笑怒骂不拘一格,达到了扣人心弦的宣传效果。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形势也及时撰文指出其发展前途。例如: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后,他及时撰文指出欧洲战争性质的变化,说明苏德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1942年10月1日,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了伟大胜利后,他又及时撰写了《红军的伟大胜利》一文,深刻分析了这次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明确指出这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他科学地预言斯大林格勒一役对于希特勒,有如滑铁卢之于拿破仑,是希特勒等法西斯分子灭亡的决定点。当时苏德战争还在激烈进行,德国法西斯的气焰还很嚣张,国内外不少人迷惑于法西斯的武力,对战争前途持悲观消极态度,这篇社论有如振聋发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的士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事

迹,都是通过新华社传播到大后方,传播到全中国和国外许多地区的。同时,通过新华社报道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情况,报道了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等情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粉碎敌人封锁、巩固革命根据地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有力地驳斥了国内外敌人的造谣污蔑,使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建设的成就,从而逐渐将希望寄托在延安和中国共产党身上。

1941年5月,为便于宣传工作的相互配合,密切合作,提高宣传时效,新华社由杨家岭搬回清凉山,与《解放日报》社住地在一起,同属博古为首的编委会统一领导。博古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社社长。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新闻日益重要,特别是苏德战争的前途尤为世人关注,国际电讯的抄收任务随之更加繁重。为了加强新华社的领导,提高外文的翻译质量,同年秋,中共中央将精通英文的吴文焘调到新华社任副社长,主持新华社的日常工作;并抽调一批外文较好的干部充实了新华社的翻译力量,在新华社翻译科内设立英文翻译组、日文翻译组和中文译电组。翻译科内建立起严格的译、审、校对制度,使翻译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也为新华社以外文直接对国际宣传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4年8月新华社成立了英文部,充实了英语干部和领导力量,并请中国人民的朋友艾泼斯坦传授如何向国外进行宣传报道的经验。还聘请英国驻华使馆文化处的官员、后来的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为英文改稿专家。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于同年9月1日正式用英文对外广播,定向旧金山,每天播两次,每次一个半至两个



小时,约相当于中文 2000—3000 字。这就是新华社对外广播的开始。从此,新华社增加了新的传播渠道,能用英文直接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中国抗战及根据地建设的真实情况以及其他重要新闻。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新华社对国内外广播和接受国内外电讯的任务又有了新的发展。

## 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共创办的第一座语言广播电台

新华广播电台是 1940 年底在延安建立并开始广播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从报刊、文字广播又迈入语言广播的阶段。无线电广播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大大加强了反法西斯的抗日宣传。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重要文告和国际、国内重要新闻,《新中华报》社论、《解放周刊》重要论文都得以及时的对外传播。另外还有名人讲演、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文艺节目、抗日歌曲等的广播。当时广播对象主要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兼顾国统区的听众;还试办了对日本侵略军的日语广播。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不久,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封锁这一事件的真相,并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电波从空中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于 1941 年 1 月 23 日,向全国人民反复广播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的《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和声讨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新四军的反共卖国罪行。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用广播这个先进的宣传工具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同年 5 月 1 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

准,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21条,这是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文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曾反复广播。

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由于无线电器材补充困难,发射机发生严重故障无法保证正常播音,不得不暂时中断广播。

1945年8月中旬,在抗日战争的胜利声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了播音。当时正是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因而,恢复播音的第一天播送的是延安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朱德总司令18月10日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进军命令。并每天报道各地人民武装胜利进军和受降的消息;同时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制止内战,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次恢复广播的效果很好,各地都反映听得清楚,大大地鼓舞了人民,鼓舞了士气,在国内外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1940年建台起到建国前,一直是新华社的一个组成部分。重要的广播稿件是由新华社的口语广播组的编排人员负责编辑提供。随着形势的发展,编排工作越来越多。当时工作很紧张,7个编辑人员每天要编13000字左右的广播稿,而且一定要在下午两点钟以前编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艰辛中发展起来,从政治、思想、业务训练和干部培养方面积极为迎接全国胜利,发展人民的广播事业创造了条件。

### 三、在延安出版的第一本外文刊物——《中国通讯》

1941年3月在延安,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出版了一种用英、俄、法三种外文油印的独特刊物《中国通讯》。它是在中共领导

的抗日根据地内用外文出版的第一本对外宣传刊物。

为了更好地向国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斗争事迹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中央宣传部于1940年10月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由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主持,吴文焘任秘书,邀请在延安的外籍朋友和懂外文的干部如马海德(美国人)、巴苏华(印度人)、王大才(印尼人,原名阿里阿汗)、黄正光(越南人)、毕道文(印尼人)和中国的萧三、陈述等举行座谈会,研究对外宣传问题,决定办一本用外文进行对外宣传的刊物,取名为《中国通讯》,稿件由大家分别撰写,具体工作由吴文焘负责。

《中国通讯》每月出一期,每期登载五六篇文章。第一期于1941年3月出版,是皖南事变报道专辑,共五篇文章。社论是马海德写的(英文),报道是吴文焘写的(英文),其余三篇分别由萧三(俄文)、巴苏华(英文)、黄正光(法文)执笔。以后各期,每期刊登五六篇不等,每篇文章均署姓名。因为撰稿人中会英文的比较多,故刊物里用英文写的文章占多数。当时一些外国朋友由八路军从北平营救出来,经晋察冀边区转到延安,他们也写了一些文章登在这一刊物上。他们文章的内容主要是感谢八路军,谈沿途的抗日情景、边区人民的抗日情绪,揭露日寇的残暴等。刊物也经常将各根据地的通讯、特写材料改写成英文刊登,有时也用英文写一些关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报道,例如曾报道过陕甘宁边区模范监狱的情况。

这本刊物为小32开,英俄法三种文字,用蜡纸刻成。由于当时敌人封锁,发行渠道困难,每期用毛边纸,油印200份左右。1941

年8月起,由新华社接办,改为英文刊物,用打字机打印,份数略为减少。

《中国通讯》深受外国朋友的欢迎。这本刊物的发行主要是由内部交通带到重庆,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散发给外国记者,再由他们转发到国外。据当时担任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的艾泼斯坦(1979年夏季至1988年10月曾任《中国建设》总编辑)回忆说:他当时在重庆曾收集过一套《中国通讯》,除引用它登的文章向国外宣传外,现在一直把它当做文物加以保存。宋庆龄当时在香港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重庆设有办事处,她(他)们曾多次从《中国通讯》内选出一些文章刊登在“保卫中国同盟”出版的刊物上,进行对外宣传,扩大了影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发行日益困难,纸张油墨也很匮乏,《中国通讯》被迫停刊。这个刊物共出版了十多期,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在对外宣传抗日,增进国外进步人士对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根据地真实情况的了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

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抗日战争时期,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中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从延安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从国统区到沦陷区,都有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一些重要著作还有较好的校正本。

1938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解放出版社,这是抗日战争中在延安设立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它以大量编辑出版马克思列宁

主义经典著作和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著作而著称。它印行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和《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使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得以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1938年和1940年还先后出版了马、恩、列、斯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都是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革命运动的重要文献。1939年1月，延安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出版了5卷《斯大林选集》，编译了斯大林重要著作59篇，全书共1768页。这一选集后来多次翻印流传。当时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之一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1938年在莫斯科出版后，193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就出版了中文译本，1939年及1940年在中国也先后出版了两种译本。

1941年，在战斗频繁的太行山地区，《新华日报》华北馆翻印了3000册《斯大林选集》。由于敌人封锁，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全书是用粉红色、绿色、黄色、白色等各色油光纸单面印刷，折成双页装订起来的。

1941年，斯大林的重要著作《列宁主义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先后出版了三种版本（新时代出版社、解放社、中国出版社）广泛流传。为了指导抗日战争，在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下，还翻译了一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如《两个策略》、《马克思通讯选集》、《左派幼稚病》等书，这些著作当时曾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刊载。1942年，中共中央采取整风运动的方法，在全党范围内进行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在毛泽东提出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号召下，延安又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以便全党有计划地普遍学习。

中共中央特别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质量，对上述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是经过多次校正的。为此，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作出《关于1943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出必须提高翻译质量，并决定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翻译、校阅上述经典著作。

抗战期间，在国统区的武汉和重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创办出版社，出版和发行革命书刊。主要有1938年在武汉创办的中国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抗战书籍，如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反对派》、《国家与革命》等。从上海迁到武汉的读书出版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出版了20多种有关抗战的书籍。该社由武汉撤退到重庆后，还出版了郭大力和王亚南合译的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1939年，在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秘密颁布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其中规定了削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力量的各种阴谋手段和一系列禁书、焚书的法令，以扼杀革命进步的出版事业，同时还规定了迫害革命出版工作者的办法。但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书店和出版社，以及其他进步书店、出版社的革命进步出版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在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中，仍大量出版了《费尔巴赫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国的农民革命》、《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斯大林言论选集》、《论反对派》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在武汉由中共出版的《群众》周刊(后撤退到重庆)和在上海苏商的《时代》杂志上也刊载了斯大林的著作、命令和演说,如《论红军的二个特点》、《1941年7月3日斯大林的演说词》等等。

随着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仅在延安解放社和各根据地新华书店都更加大量地继续出版,而且国统区的一些革命的和进步的出版工作者也千方百计与国民党更加疯狂的迫害作斗争,继续坚持出版了不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使马列主义思想在全国广泛传播,有力地影响和指导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胜利发展。

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中,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也流传到中国。这些著作有《关于列宁主义问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5周年纪念》等,其中还有斯大林的名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

---

## 第二节 国民党统治区

### 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在重庆

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193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抗战初期在武汉建立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当时南方局的领导成员是周恩来、博古(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等,周恩来为南方局书记。他们都以中

共代表团或国民参政员的公开身分同国民党中央当局和外国各方面人士接触。南方局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渠道,通过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和影响的各种群众团体、学术机构、学校阵地、新闻报刊,通过小说、戏剧、诗歌、音乐、美术等文艺创作及演出活动,通过南方局领导人的讲演、谈话、文章和与各界人士及外国人士的广泛接触、交往等,对国统区人民和国际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思想、文化交流活动。

重庆当时作为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聚会地。据1943年10月底重庆国民党政府官方统计数字,当时仅常驻重庆的外国人就有1129人,其中英国人最多,有329人;其次是美国,有168人;苏联有163人。这些外国人员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商业、医务、教育、新闻等各方面人员,而较多者是外交、军政方面的人员。至于外国有关方面的临时使者、世界知名人士和国际群众团体的人员来重庆者更为数众多。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来重庆访问的人士十分频繁,从未间断过。他们中有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有文职人员和职业军人,有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及医务人员等。

周恩来同上述各方面外国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思想、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发展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周恩来通过当时《新华日报》和有关刊物,发表了大量文章,还利用公开身分和群众集会发表了很多谈话和讲演,着重宣传全国团结抗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战场的情况,使广



大外国人士了解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是争取抗日斗争最后胜利的可靠保证。

为了发展和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更多的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除主持南方局的领导工作日夜操劳外，还尽可能地抽时间利用各种场合和形式，广泛地接触外国人士，特别是英美人士，直接和他们会晤，诚恳坦率地交谈，共同讨论世界大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以增进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主张有较全面的了解。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所接触、会晤和交往的外国人士中，上自国家的副总统和各驻华使节，下至一般记者和普通士兵。其中有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理，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以及他的继任者、中国战区总司令魏德迈，美国总统代表威尔斯基，美国总统派来担任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美军总部代司令兰诺，美国海军武官肯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国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包瑞德等人；还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及其继任者薛穆，大使馆秘书赫戈登，武官哈密士和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人；还有美国著名作家斯特朗、记者福尔曼、爱泼斯坦、白修德和新西兰进步作家艾黎，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及池田幸子等人；还有国际援华医疗队罗马尼亚大夫杨固，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大夫及美国驻华 14 航空队总部的青年士兵海曼、贝尔、埃德尔曼等人。

周恩来在同外国人士的接触和交往中，总是从实际出发，针对各种对象的不同情况，坚持充分地说理，详尽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并用大量的事实材料向他们介绍敌后抗日战

场的斗争情况,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阴谋降日反共的卑劣行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他们对中国抗日斗争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1942年2月间,周恩来应邀出席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离华赴苏任职的告别宴会。卡尔在华任职期间,非常钦佩周恩来,认为周恩来是重庆最有智慧的人。当卡尔被任命为驻苏大使时,他拒绝蒋介石为他饯行,而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度过了他在重庆的最后一个夜晚。他在宴会上同周恩来进行了友好交谈,并将英军缴获的一把德国军刀赠给周恩来留作纪念。周恩来也将新四军缴获的一把日本军刀赠给卡尔。《新华日报》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发表了《惜别卡尔大使》的社论,对卡尔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予以赞赏。

周恩来在同外国人士接触和交往时,总是愿意“开门见山”,坦诚相见,而且寻找共同点。多次被周恩来会见过的谢伟思,曾这样描述当年与周恩来的交往,他说:“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深入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凡是亲自会见过周恩来的人几乎都不会忘记他,他身上焕发着一种吸引人的力量。”

1938年10月7日,周恩来在武汉时曾经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全体成员。当他得知队员柯棣华仅28岁时,便对柯棣华说:“你还可以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更多的工作。”柯棣华深受鼓舞。他们先在武汉、宜昌、重庆工作近半年后,便于1939年1

月22日离重庆赴延安。后来,当周恩来在重庆惊悉柯棣华于1942年12月9日积劳病逝的消息时,还特地致信慰问柯棣华的家属。后来,周恩来在延安还亲切地接见了柯棣华的亲属郭庆兰和他们幼小的儿子印华。1943年6月2日,印度医疗队巴苏大夫离开延安回国经过重庆时,周恩来在红岩村会见了她,并和她共进午餐,亲切交谈,广泛地讨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形势。周恩来还热情赞扬印度大夫们的国际献身精神。新中国建立后,巴苏大夫等在很长一段时间还在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合作而奔忙着。

1940年12月23日,周恩来在重庆的沈钧儒寓所中会见了第四次来中国访问的美国著名作家斯特朗,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向她介绍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向中共军队发起进攻;而中共军队正在敌后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解放区的土地不断扩大等真实情况,并预示更大事件将接踵而至,让她等待通知,再撰文发表。她返回美国后,中国发生了皖南事变。不久,她在纽约收到了一封信,告知她说:“你现在可以把你知道的情况公开发表了。”同时,随信还附给她一个文件,那就是中共中央关于重新组织新四军,继续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定。于是,她便撰写文章,在纽约各报发表了周恩来向她介绍的全部事实材料,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袭击新四军的罪行,这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使世界人民认清了事件的真相,对中国内部的问题有了更深入一步的了解。

1941年3月,周恩来在重庆热情地会见了国际援华医疗队罗马尼亚杨固大夫等人,杨固大夫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受罗马

尼亚人民委托,随国际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的。皖南事变后,杨固大夫和其他两位国际友人冲破国民党特务的种种阻挠,从贵阳到达重庆向周恩来报告工作情况,并提出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参加战斗的请求。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在今天的工作岗位上,就能影响国民党的士兵抗日,我现在不就是在这里工作吗?这是党派遣我在这里工作的,是革命的需要。”不久杨固大夫得到罗共中央的指示也是这个意思,他们就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去做。后来,周恩来还派王炳南与他们联系,他们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帮助下,克服了许多困难,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了许多工作。

周恩来给接触和交往过的外国人士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他们给予周恩来以崇高的评价。正如王安娜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在世界各国中,没有人不知道周恩来的事迹。即使是出身、国籍、政治信仰不同的诸色人等,周恩来对他们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官和名作家、老资格的记者都一致认为:周恩来的敏锐干练,还有他的幽默和讽刺,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铭记不忘。”前美国陆军上校包瑞德在回忆录中谈到对周恩来的印象时说:“那时,我简直就完全相信他是超群出众的人,但如果那时我事先还不知道这一点,那么听到他的回答之后,也就完全知道他的聪明机智了。”美国女作家盖尔荷恩在回忆她和前夫海明威两人 1941 年重庆之行中访问周恩来的情景时说:“我们听他谈话听得如醉如痴……他坐在那间毫无装饰的小房子里,穿着极为普通的衣着,而他本人就是一个人物。我们认为周是一个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一位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的话,那末未来就是他们

的。”其他还有许多外国友好人士也都写过一些记述或回忆周恩来事迹的文章,而且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周恩来的敬仰和钦佩之情。

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周恩来广泛接触外国人士,坚持不懈地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各国人民特别是当时的盟国人民在了解到中国抗日斗争的真实情况后,他们不仅从道义上、舆论上,而且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八年抗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里,不仅有千千万万的中国英雄儿女,同时还有很多国际友人,其中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柯棣华大夫,德国记者希伯,朝鲜的义勇军战士,日本的在华反战同盟盟员,苏联、美国的空军驾驶员等。另外,通过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组织,中国人民先后得到当时不少盟国(主要是英、美等国)援华救济团体和个人捐赠的钱款和医疗器械等物资;还得到很多人员的支援,如来华的国际医疗队、印度医疗队等;日本友人冈野进及其率领的大批人员在华协助八路军进行瓦解敌军和号召日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等工作,朝鲜独立同盟也派来大批人员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所有这一切援助,中国人民是永记不忘,也永远铭记着周恩来对外国人士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所做的杰出贡献。

周恩来在广泛接触国内外人士的过程中,总是坦诚相见,得到了对方的信任和理解。他善于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团结抗战寓于广交朋友的工作过程中,而且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一个完整体系,融合了他本人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丰富的斗争经

验,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品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形成他个人的独特风格,使人感到亲切,给人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 二、《新华日报》的时事评论与国际宣传

《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唯一能公开出版并向全国发行的大型报纸。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从事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群众运动,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主张,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力舆论工具。其最高发行量达5万份左右,这在当时国统区的日报中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

《新华日报》向全国和全世界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打击敌军、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失地、解放当地人民的情况。

《新华日报》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不只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世界性的。当时,重庆集中了许多国家的外交、军事、新闻、文化界人士,中国的抗日战争已为世界许多国家所瞩目。但当时延安与重庆的交通线不仅不能畅通,而且国民党还千方百计地限制、封锁,所以驻重庆的外国通讯社、报纸记者以及其他外国人士主要是通过《新华日报》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变化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新华日报》起到了其他中共中央机关报所不能代替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新华日报》的历史,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祖国的自由独立,而同时是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人类幸福。这就决定了国际报道在《新华日报》的整个宣传内

容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抗日战争期间,该报每年发表社论总数的1/3是有关国际问题的。1942年,《新华日报》在改版以后,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从事国际报道的编、译、写作班子,由章汉夫负责。国际言论的主要作者是章汉夫、乔冠华、石西民、熊复、张友渔、吴敏(杨放之)等,并加强了国际版编辑的力量,加强了国际综合报道、国际述评和时评。“综合报道”是改版后的成果之一,编者把国际消息汇总并重新编写,加以分析、议论,给读者以完整、深刻的印象。“国际述评”栏每两周发表一次,于恬(乔冠华的笔名)的述评,共发表60余篇,43万余字。这些国际述评论述了这一时期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向国统区人民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写出了国际形势变动的前因后果及未来的发展趋向,而且十分注意突出国际主义精神,坚持正确的立场和宣传方针。世界一些国家的人士很注意这方面的报道,他们从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多方面予以研究。例如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7日晚,《新华日报》得到这一消息后,次日详细报道了这一新闻,并同时发表了题为《从原子炸弹所想起的》时评,其中指出:“本来应该是为人类生活的幸福而服务的科学,竟用在如此惨烈的破坏和杀伤性的武器内。我们相信全人类——特别是全世界献身于科学的学者们,一定会有很深刻的感慨的。”“把这种能量应用于建设性的动力和平工业生产的时候,人类文明必然会有划时代的改进。可是今天,不幸这个足以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发明,却初试锋芒于杀人盈万的战阵中了。”最后呼吁:“让科学属于人民,让科学的成果作为保卫和平和造福人类的工具。”《新华日报》所表明态度,使日本人民非常感动。中国人民长期受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遭受到的沉重苦难和巨大牺牲,是文字语言难以形容的。但是,在日本人民被原子弹大量杀伤时,首先向他们表示同情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此时,日本军阀还没有放下杀戮中国人民的屠刀,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宣布无条件投降,因此,一切有良知的日本人一直感念不忘。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井上清在他1965年写成的《战后日本史》一书中,特别提到了这件事,书中写道:“关于投掷原子弹问题,在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最艰苦战争的中国,蒋介石政府对此事竟是欢迎的;但是,唯有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广岛刚刚投下原子弹的8月8日的‘时评’里,虽然承认原子弹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但对原子弹无区别地大量杀伤和平居民感到悲痛,并认为科学的成果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用于和平和人民的幸福,人类智慧的最高成果应该由全世界全体爱好和平的人民保持、使用和驾驭。像原子弹这样的武器应由联合国的安理会加以管理。字里行间对于美国使用原子弹表示了反对。”美国著名新闻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评论。此书首先于1955年在日本以日文出版发行。她在书中是这样记述的:“8月6日,并不是军事目标的广岛被美国飞机投了原子弹,转眼化为废墟。过了两天,另外一枚原子弹又摧毁了长崎。重庆的新闻界只有一家报纸——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认清了这一事件的意义。这家报纸在8月7日抗议轰炸广岛时说:‘战争的目的是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人民。……科学的成就应该有助于人类进步,而不是毁灭人类。’”(原文如此)

《新华日报》在国际上的影响是很大的。这里所举的只是其中



一例。

《新华日报》国际宣传的新闻来源和国内报道的新闻来源一样，曾受到很多限制和封锁。这种新闻检查与反新闻检查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有时是相当激烈的。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就采取各种办法封锁新闻，其中办法之一是垄断新闻。除了苏联的塔斯社以外，国民党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通讯社（如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合众社、国际社、美联社，法国的哈瓦斯社，德国的海通社等）的发稿权，全部用高价垄断下来。这些通讯社在中国不再发稿，而由国民党中央社选发有利于国民党的电讯，形成了只有中央社独家新闻的局面。所有报纸都得被它垄断，各报除了自己记者采访到的新闻外，只有采用中央社的消息。《新华日报》面临必须冲破这种新闻垄断和封锁的困难局面。

《新华日报》开辟新闻来源的办法，一是派记者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到战地直接进行采访，取得第一手资料，进行真实情况的报道；二是加强对国内外报刊资料的收集、翻译与研究，以便为编辑部提供许多新闻报道线索。后面这一点特别对进行国际宣传起到很大的作用。当时不少精通外语的人士（如戈宝权、任以沛、朱世纶、张企程、李江川等）都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们利用外国的报刊杂志（当时主要是英文和俄文的，如英国的《工人日报》、《劳动月刊》、《经济学者》，美国的《新群众》、《民族周刊》，苏联的《莫斯科新闻》、《真理报》，以及共产国际出版的英文《国际通讯》等），以及旅居国外的爱国人士航寄的剪报，编写了许多国际新闻与通讯，翻译了许多最新的著名外国作家的作品。《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还是共产国际所办“宇宙通讯社”的记者，他经常亲自翻译国际问题的文

章。当时,对于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报道,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评论,都是作为国际新闻的重点来处理的。《新华日报》不仅译载英、法、美等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人道报》、《新群众》等报刊上的新闻文章,还译载外国资产阶级报纸上的通讯和评论,对那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大事,经常发表一些特稿。比如,对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新华日报》除1938年7月31日发表中共中央给西共中央和人民阵线政府对西班牙人民两年中取得的成就的致敬电外,还大量采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以鼓舞国内人民;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除编译外国报刊的专稿外,还有驻欧洲特约记者克柔的《巴黎通讯》,揭露佛朗哥叛军在占领地区的暴行。另外还译载季米特洛夫的评论和爱伦堡的通讯。《新华日报》1942年秋开始就南斯拉夫的游击战,连续刊载一些来稿,介绍南斯拉夫人民在南共领导下,给希特勒、墨索里尼在东欧巴尔干的统治以沉重打击的情况,铁托的译名首见于《新华日报》,沿用至今。译稿中有铁托著的《南斯拉夫人民军的成长》、西蒙诺夫访问铁托的通讯。特别是在南斯拉夫游击队中生活很久的美国记者舒兹倍克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血泪中成长的人民军》这一长篇通讯,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铁托领导下成长的过程,作了翔实的报道。《新华日报》译载后,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延安《解放日报》也曾全文转载。美国《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报刊所载有关南斯拉夫解放战争的通讯,《新华日报》译载的也不少。从1943年春开始,《新华日报》参照从外国报刊上翻译过来的对要求早日开辟第二战场的呼吁,发表了很多专稿,到1944年几乎每月都有这方面的专稿;有些国际新闻,除直接翻译苏联、

英、美通讯社的消息外，还从外国报刊上译载英美人士批评中国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治腐败，希望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文章。

另外在《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上，将世界上反对法西斯、宣扬民主的精彩短篇小说、剧本和诗歌、散文等介绍到中国来。这类翻译作品在副刊上占有不少分量，戈宝权编译了不少好作品。还有其他一些翻译名家和一般作者，如郑林曦加工改译的一篇通讯《给未来的孩子》，是一位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写给妻子腹中胎儿的一封信，他所写的反对德、意法西斯斗争的英勇事迹和爱国、革命热情感人至深。1943年2月23日《新华副刊》发表这篇通讯后，曾轰动一时，引起广大读者热情的反响。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新华日报》对世界语报道的重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进步的世界语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左翼文化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做了不少工作。世界语的作用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新华日报》在它的版面上经常出现有关世界语的报道和文章。例如1938年，这方面的材料就有17篇，在同年12月份，除了在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80诞辰（12月15日）登有两篇纪念文章外，还在12月29日的第四版上登出世界语专刊，其中有中国世界语先驱胡愈之的文章，题为《纪念国际语理论家柴门霍夫》；作家端木蕻良写的文章，题为《世界语和科学》；萧红写的文章，题为《我之读世界语》。日本进步世界语作家绿川英子所作的《致全球世界语同志——纪念柴门霍夫80寿辰》一文也登在这个专刊上。同时在《新华日报》上还翻译刊登一些世界语的国际通讯，1938年8月份的第四版上翻译刊登了两篇这样的通讯，

一篇是《苏联儿童们寄给中国世界语同志的信》(张企程译),另一篇为《一位捷克兄弟的来信》(陈原译)。此外还有由世界语翻译成汉语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绿川英子的文章,其中有《代用品时代——战时日本的剪影》和《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三八”国际妇女节感言》(这两篇文章现已编入绿川英子文集《绿色的五月》)。

对于国内的一些重大问题及时向世界宣传,这是《新华日报》报道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如1939年初,汪精卫投降日本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阴谋牺牲中国,企图制造“东方慕尼黑”;而蒋介石利用所谓“曲线救国”的反动谬论,将国民党90万军队投到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的怀抱,因此国内危机四伏。此时《新华日报》迅速运用外国资产阶级报刊上的有关材料,配合社论、短评,及时予以彻底揭露。又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贯腐败无能的丑态,以及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准备打内战的罪恶阴谋,当时英、美的许多报刊都表示忧虑,《新华日报》及时地经常刊登这方面的文章、新闻、资料和评论,使国内外迅速了解时局的危机,令蒋介石极为头痛。特别是1945年下半年,英、美进步人士同情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进步,反对内战,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太阳报》,英国的《伦敦世界新闻》、《经济学家》、《新政治家》等报刊,大量发表评论和通讯,谴责蒋介石政府。《新华日报》每过几天就译载一篇,有时用“本报特讯”、“本报专稿”等形式发表。

《新华日报》开辟新闻来源是在没有一名驻外记者的情况下,凭借塔斯社和其他通讯社的有关资料,编写成国外专电,在时间的迅速和内容的真实性上,与驻外记者所发专电相比毫不逊色。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日本投降后,英、美、法等国大使馆的新闻

处以及有些外国通讯社(如路透社、合众社等)在国统区直接发稿,《新华日报》立即选择有用的、抢先翻译出来,供新闻版选用。《新华日报》的这一特点,在广阔的面和纵深的点上都具有使人们非及时阅读不可的吸引力,从而也展示了它在国统区的报刊中所特有的影响力。

《新华日报》的根本任务是及时地、正确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起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喉舌,除了加强新闻报道和办好各项专栏外,主要用社论、代论(周恩来写的最多)、专论、短评等形式开展时事评论,以阐明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等许多为人们所关心的重大问题的主张,分析战局的发展及应采取的战略战术,议论各种重要事件,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因此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 三、夏衍与《救亡日报》

《救亡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报纸。该报先在上海、广州,继而在桂林出版发行,它在重庆公开以中国共产党身分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朋友,揭露敌人,唤起人民群众的抗日激情和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等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该报1937年8月24日创刊于上海,1937年11月21日上海沦陷后的第二天停刊,1938年1月在广州复刊。上海沦陷后,大批文化工作者和救亡青年都撤退到武汉和广州,而广州又是一个对外、特别是对东南亚华侨宣传团结抗战的重要基地,所以《救亡日报》

又进一步承担了对外、主要对东南亚华侨的宣传任务。1938年10月,广州沦陷。1939年1月10日,该报在桂林复刊。当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国民党政府迁移重庆,桂林则成为与华南、华东、西南乃至香港、东南亚联系的重要通道。该报又成为一个很好的对国内外宣传的阵地。1939年在桂林复刊后至1940年间,是该报的全盛时期。这个四开的小型报纸,由创刊时发行3000多份发展到8000多份。直到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救亡日报》于1941年2月底被迫停刊。

《救亡日报》内部工作是在进步力量主持下进行的,由刚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该报始终坚持全面的全民抗战的正确方向,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办得有自己的特色,使左中右三方的人士都要看或都喜欢看。夏衍集中了文化界的一部分写作力量,使该报编辑部的人员既是编者,又是作者和社会活动家。编辑部最多时达到五十几人,吸收文化界大部分进步人士办报,而且经常进行评报,听取改进意见,使报纸办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它认真实行精编,发展自己的评论和通讯以及文艺特写、报告文学,注意办好专栏,使报纸不断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这在当时被称为“报纸杂志化”,实际是在新闻来源受国民党控制的情况下,发扬救亡刊物的传统,突出进步思想内容的一种创造。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它始终是国统区内鼓吹抗战、团结、进步的响亮的号角,是国统区大后方广大读者最心爱的读物之一。

夏衍为办好《救亡日报》倾注了无数心血。他潜心于不断改革报纸的版面和文风,对于新闻报道实行了新闻简编。当时外国通讯社除塔斯社外,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哈瓦斯社的电讯都由国民

党的中央社统一转发,连同中央社的国内电讯,每天也只发几次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救亡日报》的处理办法是把当天中央社发布的国内外大事电讯简编为几百字到一千字。为了增进读者对新闻事件的理解,引起读者读报的兴趣,对于每天新闻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事件均加注释,力求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救亡日报》除非特殊情况,每天都有社论,从抗战形势、国际大事,一直到社会风气、人民生活,无所不议,无所不谈,自成一体,成为《救亡日报》吸引读者、影响舆论的一大特色。

夏衍非常重视报纸的评论工作,对于实现报纸的大众化、通俗化也用了很大力量去研究。他提倡办好副刊以适应广大读者各种不同的需要,增加报纸的趣味性、知识性。《文化岗位》是《救亡日报》的主要副刊,它主要报道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的特色。

当时外国的著名进步作家在《救亡日报》上专门写文章的有美国的史沫特莱女士和斯特朗女士、日本的鹿地亘先生等。另外,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朋友胡志明。1940年夏,胡志明为了便于领导越南革命斗争曾来到桂林,他以“平山”的笔名为《文化岗位》写过多篇文章,如《池蜗与黄牛》、《两个凡尔赛政府》、《造谣》、《越南人民与中国报纸》、《安南歌谣与中国抗战》、《鱼目混珠》、《意大利实不大利》、《越南“复国军”还是卖国军?》等。《救亡日报》除设有《文化岗位》这一重要副刊外,还另设有比较小的《十字街》副刊,还有其他一些专栏。属于地方性的有:地方风光、地方小志、香港杂碎、上海特讯、孤岛点滴、海外来鸿、倭国奇谈等;属于科学技术知识的有:科学趣味、科学新闻、科学小品、数学趣味等;属于文学新闻的有影坛新闻、学校风光、名人轶事

等；其他还有：讽刺小说、狗物志、小幽默、欧战奇谈、小统计、小信箱、邮票猎奇等。

《救亡日报》还经常向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进步华侨报刊发特稿。为了使海外真正了解国际形势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救亡日报》经常注意从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自重庆发来的资料和从延安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得来的资料，及时编写通讯报道和特稿向海外发出，颇受海外进步报刊的欢迎。

#### 四、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与国际新闻社的建立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以下称“青记”）的成员为骨干所建立的国际新闻社（以下简称“国新社”），是在国统区兴起的一个进步的新闻机构。它所以称为“国新社”，是由于它最初是搞国际宣传的。它适应当时对外宣传的需要，一直是向国内外报刊发新闻稿件的通讯社。它在国统区和部分敌后抗日根据地组织了广泛的通讯网，并派记者到战区和敌后采访，甚至派人潜入已经沦陷的上海，有时还潜入南京去采访。它的通讯稿广泛发表在国内各报和许多海外报纸上，还组织英文通讯稿向国外发表，在宣传抗日与民主、团结海内外进步人士，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国民党顽固势力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新社”的发起和产生要追溯到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段国际宣传工作。

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是继卢沟桥“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逐步全面地展开。中日战争形势的迅速发



展震惊了全世界。许多外国报纸和通讯社都派记者到上海采访。当时美国的著名记者斯诺也从北方来到上海。但国统区的新闻报道是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垄断，对新闻报道始终采取封锁政策，除国民党官方消息外，不容许报道在华北和华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消息，因此远远不能满足外国记者的要求。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驻上海临时办事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一部分地下党员和救国会会员（上海文化界的胡愈之、恽逸群、王纪元等）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其任务是向中外记者提供抗日战争的新闻资料。国际宣传委员会本身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包括进步的新闻记者，以及上海报界的负责人和其他新闻记者，其中也有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人员。国际宣传委员会每天午后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循例由国民党军方发言人口头报告淞沪抗战情况。这些报告不符合前线的实际情况，得不到外国记者的信任。于是国际宣传委员会另以国际新闻供应社名义，每日编发国际新闻稿，译成外文，在招待会上分发给外国记者。这些新闻稿的来源，一部分是由中共上海办事处所提供的战地新闻，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况；另一部分是由进步人士（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分析当前政治、军事形势的发言稿。这些新闻稿受到外国记者的欢迎，并通过他们发电给世界各地报纸，使世界各地逐渐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这是后来“国新社”的萌芽。

上海沦陷后，原国际宣传委员会的一部分人转移到香港，于是在香港成立国际新闻社，由恽逸群等负责。其业务发展很快，除印

发一种名叫《祖国通讯》的稿件外,也向海外华侨报纸寄发特稿;另外,还有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秘书的陈翰笙为“国新社”香港分社编印一种英文通讯稿《远东通讯》。《远东通讯》为16开本,每期登载关于中国局势的报道与评述及署名文章三四篇。这种出版物不仅寄给国外的一些报刊,供它们采用,而且也寄给国外一些机关团体和个人。

香港国新社当时起着开展对海外宣传的基地作用。由它供稿的报纸遍及东南亚、印度、美国、加拿大和澳洲、非洲等许多国家,它所发的稿件深受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的欢迎。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938年秋季以后,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香港国新社虽有经济来源,但此时无法取得稿源,这是致命的困难。而这时由范长江发起正在筹组的通讯社,稿件有比较充分的保证,因为有“青记”这个雄厚力量作为后盾,但经济上比较困难。于是双方都主张合并成为一个通讯社。两支力量合并,相得益彰,局面可以迅速改变。当时考虑到香港国际新闻社在海外已有很好的声誉,于是合并后的通讯社仍定名为国际新闻社,设在桂林的为总社,香港等于分社,但对外名称不变。

“国新社”在桂林正式成立时,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已有千余会员,并在昆明、曲江、金华、西安、延安、重庆、香港等地陆续设立分会。所以,“国新社”除总社设在桂林外,“青记”的各地分会也就成为“国新社”的分社。“国新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间通讯社,根据胡愈之的主张,学习邹韬奋组织生活书店的办法,用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创建的。总社工作人员比较精干,固定专为“国新社”工作的不超过20人,同时广泛联系只按期为“国新社”写稿或

关心“国新社”的社务,但不脱离原来工作岗位的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仅都是义务撰稿,而且积极为总社筹募基金。

为了适应当时形势,范长江和其他主要负责人都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分和其他各方(国民党、民主党派、桂系)联系,积极争取公开合法。

在“国新社”筹建的过程中,当时许多外国记者正在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要求提供报道中国各战场的新闻材料。他们虽然也想在对外宣传上有所作为,但又苦于能提供的材料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范长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当时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的胡愈之一起同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副处长曾虚白商谈。在武汉沦陷前夕,达成建立一个“国际新闻社”为国际新闻处服务的协议,由国际宣传处与“国际新闻社”订立了供稿合同,并开始向国内外发稿。于是“国新社”能够以公开、合法的新闻机关的身分积极进行活动,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国新社”的工作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的一个重要补充。同时因为新华社在一个时期还不能在国统区内公开发稿,“国新社”当时即以合法的身分,开辟一个窗口,代替新华社的作用。

“国新社”主要发表的是新闻通讯与国际大事等有关的评论,这正是当时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新闻通讯有战地通讯、地方通讯、文艺通讯等。“国新社”有自己特殊的有利条件,它有大批“青记”的战地记者奔赴抗日前线,深入战地进行实地采访,这是其他新闻机构无法比拟的。“国新社”曾先后设立重庆办事处和金华办事处。重庆办事处主要组织重庆、西北以及华北的报道,金华办事

处着重开展新四军活动地区的通讯报道。桂林总社和香港分社还共同向“孤岛”上海派遣记者,设立上海办事处。另外在敌后,各地的通讯员通过各地办事处和记者将许多采访稿都寄到桂林总社,然后由总社编好,作为专用稿分别寄往不同地区的不同报纸(包括海外的)。这样,事实上在全国形成了一个通讯网,不同地区都能了解到全国各地的情况,因此,不仅填补了国内其他报纸无力填补的空白,而且受到海外读者的极大欢迎。除了新闻通讯以外,有许多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各方面的评论文章,很受国内外人士的欢迎。

“国新社”香港分社起着开展海外宣传工作的基地作用,由香港分社发出的许多稿件寄往南洋、欧美和非洲等地,使国外,特别是国外关心、热爱祖国的华侨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抗战,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事迹,从而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做出了贡献。

1939年至1940年夏是“国新社”的全盛时期,桂林、香港、重庆三处成犄角之势,分工合作,桂林总社和重庆办事处负责国统区的新闻报道工作,香港分社面向海外,担负国际宣传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任务,并向国内提供关于国际新闻的稿件。这一时期,桂林总社、香港分社和重庆办事处的发稿业务,对国外有英文《远东通讯》,对华侨有《祖国通讯》、《国新通讯》,对国内有《国际新闻通讯》、桂林本市稿、特约专电和普发到国内外的特约专稿。当时登载或转载“国新社”稿件的报刊有《新华日报》、《华商报》,有国统区的其他报刊和海外东南亚、印度、美国、澳洲、非洲的华侨报刊达150家以上。香港分社出版的英文《远东通讯》用航寄发往国外,特别是

对美国的报刊和私人订户。这样，“国新社”在短时期内确实起到了对内对外宣传抗战，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

“国新社”从成立到结束经过一个艰苦曲折的历程，国内机构合法存在仅仅三年多。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反共面目彻底暴露，桂系也转而采取反共的立场，“国新社”桂林总社、重庆分社、金华分社相继被迫停办。后来大约有三年多的时间转入地下活动，一部分人员转移到香港，如范长江、孟秋江、黎澍等；留在国统区、沦陷区和游击区的“国新社”社员、通讯员继续将稿件投往香港开展活动。到1941年香港沦陷后，整个“国新社”的工作便一度中止。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新社”在上海和香港又恢复工作，一大批“国新社”的社员和社友，在上海设立不公开的办事处，坚持地下通讯工作，主要负责人是孟秋江。但到1947年，上海办事处又因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而停止工作。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国新社”宣告结束。

### 五、郭沫若与中外文化交流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以极大的爱国热忱，不仅为抗战文化宣传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发展国际文化统一战线，反对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法西斯而奔走呼号。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郭沫若不畏艰险，毅然离别妻子儿女，从日本回到祖国参加抗战。

抗战时期，郭沫若先后工作在全国国统区的上海、武汉、重庆。他领导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战时文化宣传工作。他组织和团结了大批进步人士和文艺工作者，使国统区的救亡活动、文艺宣传工作更加活跃。在此期间，他满怀爱国激情，撰写了著

名的《屈原》、《夏完淳》等多部历史剧，写了大量的诗文和演讲词，用以鼓舞人民的斗志。

郭沫若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伟大贡献，使他不但是中国的权威，也是世界的权威之一。他不屈不挠、英勇奋斗、辛勤劳动，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他在世界文化事业上所起的作用是极其伟大的。郭沫若当时对于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摧残人类文化，有着切齿的痛恨。他在《理性与兽性之战》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早就有三千多年的封建文明……日本人也正是受了我们的礼物的一个重要民族……然而日本回敬了些什么呢？自甲午战争以来，不断地侵略我国，目前更横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我们可以明白地说，日本人是在尽力发挥着他们的兽性，要摧残世界文化的……保卫文化的责任现在落在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人的肩头上了。”

中日战争在文化战线上就是中日文化战。郭沫若 1940 年在《三年来的文化战》一文中指出：“三年以来，敌寇的文化侵略可以说是日紧一日的，它虽然时时在改换花样，但它一贯的目的是想摧残我们民族意识和抗战精神。”

郭沫若认为：“全人类的任务——首先是先进人们的任务，就是消灭法西斯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以保卫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在这个总任务下，文化战线上一方面对敌进行文化战争，一方面对友促进文化交流。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主要是对法西斯（日、德、意）进行文化战争，对反法西斯的苏、英、美等沟通文化交流。这是反法西斯主义保卫人类文化伟大任务的两个方面——建立国际文化统一战线反对共同敌人。”郭沫若不仅以此伟大任务自负，并常

以此号召国人和世界人士。这在当时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和友好人士中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时,他认为国际文化统一战线,首先是中苏文化沟通更加重要和迫切。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一年(1940年5月20日),郭沫若就特别注意了加强中苏文化的联系与沟通。他在《中苏文化交流》一文中,慨叹着两国文艺交流未得到平衡的发展,指出中苏两国文艺间的关系:“由苏联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品可以说是洪流,由中国介绍到苏联去的作品似乎只是一条溪涧。”为补救我们的种种缺憾,在促进中苏文艺交流上,他抱着诚恳而迫切的期待,他说:“俄国文艺,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尤其是那些反映宝贵的革命经验,以前介绍是无系统、无计划的,革命以后的文艺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也还不多。而且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作品的欣赏和观摩,我们所需要的应该还要加上作品的创作过程和作家处理题材的方法和生活态度。这样的要求仅靠文字的介绍是断难满足的。就从苏联一方面来讲,苏联对于我们中国的关心,可以说是到至矣尽矣的程度。苏联的朋友同样迫切需要着中国的作品,这一方面固然出于他们的前进不息的精神,企图由中国作品中无论从内容或形式方面,吸取应有的营养,以促成文艺更高级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是饥渴着中国作品以反映着中国的现实——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为促进中苏两国文艺的交流,郭沫若更进一步提出了以下三项具体意见:一、希望中苏两国文艺工作者今后能够经常地交互聘问与交换讲学;二、希望中苏两国文化艺术团体今后能经常地相互往来并交换表演或展览;三、希望中苏两国的文艺能够更有计划、不断地介绍与翻译。

郭沫若的《中苏文化交流》一文发表后,在苏联文化界立即获得了极大的注意和反响。苏联文艺界的巴甫连柯和亚布莱丁于1940年7月31日寄给郭沫若的信中,热烈表示对郭沫若意见的同情、对中苏文艺交流关心,并提出了种种具体建议。自此以后,中苏两国文艺作家、文艺界领袖以及文化团体,特别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中苏文化协会加强了联系与沟通,研讨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关系问题。

苏德战争爆发后,当苏联科学家发表号召全世界人士反法西斯的宣言时,我国文化界人士纷纷响应,其中,郭沫若是主要的推动者和领导者。1941年7月11日,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文化界致苏联科学院会员书中说:“我们——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们,在这世界反法西斯大战中,更其奋发,更其坚决的加强我们的斗争,更要紧密的同苏联全体人民携手起来,扑灭我们共同的敌人。”

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中,郭沫若不仅重视中苏两国应当携手合作,两国文化应当密切交流,而且注意加强同一切反法西斯国家——英国、美国及一切被压迫民族在政治、军事及文化方面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所以他曾不断地号召与呼吁:“中苏英美联合起来!”“共同消灭德、意、日法西斯强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保卫文化的战士,请你们一致起来和我们携手,为全世界的文化而战,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战,消灭这东方的一大群疯狗!”“我们要把全世界的友人鼓舞起来,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郭沫若甚至号召法西斯国家里的先进人士与民众一致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耳曼人呀!恢复你们生产过康德和歌德的光荣,



恢复你们曾经贡献于世界文化的使命,跟着我们向纳粹凶手和他们的帮凶们,用钢铁的声音疾呼:‘不准进攻苏联!’在法西斯军阀奴役下的日本人民哟,我们依然没有把你们忘记,全世界爱好自由、正义、真理、文化的人早在要你们大声疾呼:‘不准进攻中国!’向着纳粹凶手和他们的帮凶,你们的军部,用钢铁的声音疾呼:‘不准进攻苏联!’”

郭沫若于1945年4月5日上午开始主持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同年5月28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费德林博士送来苏联科学院的邀请信,邀请郭沫若、丁西林赴苏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00周年纪念大会。6月8日,中苏文协、全国文协、全国剧协,为郭沫若访苏举行欢送大会,邵力子、茅盾、史东山、侯外庐、柳亚子、马寅初等致词,认为此次郭沫若之被邀请访苏,表示苏联对我国文化的尊重,希望郭沫若完成文化交流使命,希望通过郭沫若访苏,将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带给苏联人民和苏联领袖,并祝愿郭沫若“携世界民主潮流之真谛,以供建国之参考”。郭沫若在致答词中称中国人民和文化界人士都是主人,称自己为人民的“小使”、信差及跑腿,愿将进步的中国科学文化界的斗争成果带与苏联。郭沫若就是这样肩负着沟通中苏文化、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到苏联访问的。

郭沫若对苏联的访问整整进行了50天,加上旅途耽搁的时间共历时73天。他是6月9日乘美国军用飞机离渝,途经印度、伊朗,飞往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已是6月25日,未能如期参加苏联科学院的庆祝大会,但赶上了6月28日在列宁格勒举行的闭幕式。他在苏联期间,受到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特别欢迎和优待。苏联人民

把他当作远方到来的伟大中国人民的使者。他在列宁格勒曾参加了为他举行的大会，访问了苏联的老汉学家阿力克，并在东方研究所作过关于中国历史的讲演。他还到过斯大林格勒及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地方；游览过托尔斯泰的故居雅斯拿雅·坡里雅拿，参观了很多研究所、博物馆、工厂、集体农场、大中学校、幼儿园，欣赏了话剧、歌剧、木偶剧、音乐、舞蹈、绘画，会晤了许多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工人、农民、学者、作家、艺术家、工程师。在苏联访问的50多天里，正如他自己所说：“时间虽然并不算长，但所看到的似乎比住了50年的人还要多。”又因他是“抱着唐僧取经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苏联去的”，因此如饥似渴地学习，收获也就特别丰厚。他虽然没有参加苏联国家科学院成立200周年庆祝大会的全部会议日程，但他后来的参观和旅行，依然补偿了他的损失。

郭沫若访苏期间，全部的经过与观感，都详细地逐日写了日记，这就是开始在《新华日报》上连载，后来出版的《苏联纪行》一书（1949年8月重新改版，更名为《苏联五十天》）。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果夫曾将《苏联纪行》翻译成俄文在苏联广为发行。郭沫若在《苏联纪行》一书中，不乏对苏联红军英勇反击德国法西斯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和苏联人民迅速恢复战争创伤重建家园的赞颂，和对苏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及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的亲切描述，成为当时人们了解与认识社会主义苏联的一个窗口。郭沫若访苏归来后，还写了《苏联问题两三事》一文；并为《亚洲苏联》、《苏德大战史》两书作序；还应邀向许多单位作访苏报告，满腔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情况，增进

人们对苏联的了解和友谊。他还在文章和报告中,有力地驳斥了所谓二次大战后“美苏必战”的谬论,给当时处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的人民以“拨云去雾”般的政治影响。正如他在《亚洲苏联》序中所说:“阅读这样的书可以消灭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增进中苏人民的友谊,减少“不了解或误会而产生出的种种纠纷”,使“顽固分子们失掉蒙蔽和煽惑的活动余地”。由此也可以证明,当时郭沫若的访苏之行和他对苏联见闻的宣传,多么切合形势和斗争的需要,符合促进中苏友谊和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本利益,对于整个进步文化界人士是有深远的影响和鼓舞作用的。

#### 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对外宣传

国际宣传处,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设置的主管对外宣传的一个机构。1938年武汉继上海之后成为国际新闻报道的中心,云集在武汉的外国记者因为无法及时得到正确的战地消息而不满,这个在上海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又重新发生了。为了满足外国记者的要求和适应对世界各地开展对外宣传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国际宣传处,使之成为与中央通讯社并立的又一个国际新闻宣传单位,由当时新闻界资深的老报人董显光,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名义领导国际宣传处的工作,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曾虚白始终以国际宣传处处长的名义协助董显光推动对外宣传工作。

武汉失守,国际宣传处随迁重庆后,业务逐渐扩大,但组织机构设置比较简单。国际宣传处内部的人员及海外工作人员总计不超过150人。处下设六科四室:英文编撰科、外事科、对敌科、摄影科、广播科、总务科,四室是秘书室、新闻检查室、资料室、日本研究

室。

当时摆在国际宣传处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对外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暴行和制造的各种谣言欺骗,唤起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援。日本帝国主义不分日夜对中国不设防城市的野蛮轰炸、强奸妇女、并对无辜的老人、小孩、妇女任意屠杀,但日本政府却以各种谣言欺骗世界舆论。同时在抗战初期,其他外国人,对中国抗战能否持久,多数抱着怀疑态度。国际宣传处鉴于这一情况,首先要协助当时在华的外国新闻记者及各国驻华外交人员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因为新闻记者每天都要向他们的报馆发消息,各国驻华使馆人员亦要随时向他们的政府送递情报。所以国际宣传处,首先是董显光和曾虚白等经常在利用各种关系去接近他们,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目的是借助外国人替中国宣传,使中国的抗战消息经常能在外国重要报纸的远东新闻中出现。

为了协助外国人了解中国抗战真相,国际宣传处在利用文字、广播、摄影等宣传工具方面也都发挥了作用。在文字方面,除撰写新闻通讯稿外,还出版了许多宣传小册子。国际宣传处是自己采访,自己撰稿,自行印行,发送给外国人士。此项新闻通讯,特别对反映日军暴行和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事迹的报道,曾被国外新闻界广泛采用。外国新闻记者的有关中国抗战的专著或特写,有些也由国际宣传处出版发行,如英国人士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及美国人士范思伯所著《日本间谍》两书,均曾产生一定的宣传效果。

在广播方面,1938年春,国际宣传处曾与汉口广播电台合作,

举办国际广播,每日用英、法、德、俄、日五国语言播送新闻及时论,主要是为了满足在华外国人的需要。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的军事、政治中心撤退到重庆后,国际宣传处与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合作,通过XGOY广播电台向世界各地广播。这是最有效的推动国际宣传的方法之一,因为短波无线电台广播主要以国际新闻为主,对听众更具有吸引力,更能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当时为了争取英、美各国的同情与支援,国际宣传节目的内容,特以英、美为对象,并通过积极与英、美各大电台联系,他们也都愿意协助转播,取得了明显的宣传效果。

在摄影方面,利用战地记者采访拍摄的中国军队英勇杀敌以及民间劳军、国际友人来访、日军对沦陷区同胞的暴行等事件的照片,作为宣传的资讯证明。这种形象化的新闻图片,配以文字,既有新闻价值,更具宣传效果。如有些新闻照片送往英、美分发,使世界各国的报纸不但可以获得中国战场的文字报道,还可看到图片资料。1938年和1940年曾分别在武汉、重庆举办过“日本侵略摄影图片展览会”,并将它所有的作品分寄给南洋、英、美等国的一些大城市巡回展览,宣传效果很好。从1940年4月起,又将摄制的战地纪录电影片大量拷贝寄往英、美各国援华团体放映,有力地推动了援华运动的开展。

国际宣传处从成立时起,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讯畅通问题,即如何能使中国政府及广大人民了解国外大事,而同时又能持续不断地将中国战时新闻从重庆播送到世界的每一个新闻中心去。1937年秋,上海沦陷后,国际宣传处曾先后在香港、仰光、新加坡设立办事处;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些办

事处被迫仓促关闭。于是将仰光的办事处移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在此后的三年中,这所办事处虽竭尽全力将影片、无线电设备、主要杂志、报纸及书籍等,经由飞机飞越危险的喜马拉雅山“驼峰”运入内地;而重庆的广播站也在努力运用微弱的无线电发报机,将战事消息从重庆向外输送,但收效甚微。因此,加强对外宣传据点,解决通讯畅通的问题非常紧迫,尤其对英、美两国的通讯感到更为重要。

1940年开始,国际宣传处分别在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三城市设立办事处,以泛太平洋新闻社名义(后改为中国新闻社)对外发稿。接着又陆续调整、增加的办事处有美国的华盛顿、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英国的伦敦、墨西哥的墨西哥城、澳大利亚的雪黎等,但其中稍具规模的仅有纽约、伦敦两处,其他分散在各国或各地的办事处,每处不过三四人而已。

国际宣传处与设在国外的办事处经常保持密切联系。国际宣传处每天将中国国内的重要新闻写成英文(此项工作由编撰科和广播科共同承担)用短波无线电向美国西海岸城市文图拉作定向播音,再由在文图拉当地聘请的一位名叫查尔斯·司徒华的牙医兼业余无线电工程师收录后,录在打字电报机上传至国际宣传处驻纽约办事处,然后再分别以快速方法传递给其他海外办事处,据以发布新闻稿。在重庆属于国际新闻处管理的国际广播电台(XGOY)有几位广播员(其中一位美国人,两位英国人)轮流向美国方向播发预备好的稿件,每周七天中每天的广播词都在5000至10000字左右。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国际宣传处能将自己编写的新闻资料不断地向国外散发,是做出了很大努力的。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被迫对日宣战,中日战争已变成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因受日本侵略和迫害最深,时间也最久,早已引起国际友邦的同情,尤其是美国为了借助中国抗战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无论是政府或民间,援华运动逐渐蓬勃发展起来。此时,美国迅速成立了“美国各界联合援华委员会”,积极支援中国。而这一“援华委员会”为扩大宣传,需要中国提供各种受日本侵略、迫害的资料,作为宣传的根据。于是国际宣传处又从主动的宣传,变为被动的提供资料。过去国际宣传处无论对任何国际援华团体要求提供资料,莫不有求必应,于是特为“援华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响应配合工作。如邀请在华美侨执笔,撰写通讯,发表广播演讲,并将此项通讯及广播演讲稿辑为《美国联合援华丛书》,计23种,分发美国及远东各地;对于该会派来的电影故事创作人员在中国收集宣传材料及电影故事张本,亦尽量加以协助,其中专为响应该会宣传需要所摄制的宣传电影片三部,提供成套新闻照片共11套。

国际宣传处在新形势下为完成抗战后期的对外宣传任务,进一步调整和加强了设在外国的宣传据点。此时美、英不但不顾忌中国在他们国家设置的对外宣传据点的活动,他们自己也先后成立了宣传机构。于是国际宣传处的对外宣传由潜伏的姿态转为表面化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既已形成,在对外宣传上,为加强同盟国间的宣传联系与如何发动共同对敌宣传工作,由中、英、美、荷、澳等国家的宣传工作负责人在重庆成立一个“反侵略国家联合宣传委员会”。在分工上,由国际宣传处具体负责该会

宣传计划的制定和推动实施工作。

关于国际宣传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际新闻社有过的一段合作经历,本节第四部分已有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1939年至1940年夏,是国际新闻社的全盛时期,也是与国际宣传处的合作供稿很有成效的阶段。当时国际新闻社曾被誉为除中央通讯社、新华通讯社以外的第三大通讯社。

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的全盛时期,通过对外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宣传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勇事迹,博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1939年下半年起,抗战形势开始逆转,国民党采取“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并发动了多次反共高潮,国际宣传处从此在对外宣传中也专门研究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宣传上的策略和方法,竟在美国举办所谓“特种宣传”。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它创立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逐渐为国内外各方面人士所了解,国民党实行封锁陕北和敌后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做法以及进行的各种欺骗宣传,不断遭到破产。

## 七、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对外广播

中央通讯社(以下简称中央社)创办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2年4月1日成立于广州,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1927年迁到汉口,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不久,蒋、汪又合流,中央社于1928年迁往南京,与蒋派中央社合并。蒋派的中央社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于1927年6月15日在南京创办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蒋介石为了控制全国的新闻发布,在蒋派国民党中央党部内设立了中央通讯社。



1932年5月,国民党中央对中央社进行改组。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肖同兹担任社长,在南京建立了总社,向全国各地播发新闻稿。并且自1932年起,中央社先后开设了上海、汉口、北平、天津、西安、香港、南昌、成都、重庆、贵阳、广州等11个分社;此外,还在其他省会及重要城市派驻了30个通讯员,形成了一个全国通讯网,垄断了国内新闻。其后,它又与路透社、哈瓦斯社、合众社、海通社订立合同,购买新闻稿,并拿中央社的国内新闻交换国外通讯社的国际新闻。这样,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可以用中央社的名义转发国内各地,使中央社成了外国通讯社的转发站。到1937年,中央社已向全国250家报纸供应新闻稿,每日发出中文通讯8000字到12000字。

中央社于1928年由汉口迁到南京后,接着于同年8月1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当时只有500瓦功率。到1932年11月12日,发展为75000瓦的大功率电台,开始正式播音。对国内广播的呼号为XGOA;短波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对国外广播的呼号为XGOY。这两个电台均属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领导。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后,国民党政府迁往武汉,后又迁都重庆。南京75000瓦的电台分别拆运和破坏。同时在重庆改装10000瓦的中波机,仍以中央广播电台XGOA恢复广播。

国民党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在重庆是1936年开始筹建的,当时是向英国马可尼无线电公司订购的35000瓦的短波广播发射设备。整个安装工程于1938年完成,1939年初正式建成,开始以XGOY的呼号对国外播音。1940年,XGOY曾一度划归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管理,台名正式改为国际广播电台(英文名称为:

Voice of China, 简称 VOC, 意为中国之声)。当时播音语言, 除对国内用国语、粤语、闽南语、客家语和沪语外, 对国外有英、法、德、俄、日、荷兰、西班牙、马来亚、印度、泰国、缅甸、越南等十多种语言, 定时分别向欧洲、北美、苏联、日本、澳洲、南洋广播, 每天播音共 14 小时 30 分。同时, 该台还设置有传真机一部, 每晚安排有几分钟对美国的传真节目。如在 1946 年的重庆谈判中,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情景就是通过当晚的传真节目直接传送到美国的。

在抗战的最初三年中, XGOA 和 XGOY 在宣传抗战、揭露敌人和向全世界报道战况、争取世界舆论同情等方面, 做了不少工作。许多关心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 一般都从 XGOY 的广播中收听到一些信息。

在 XGOA 和 XGOY 的各类新闻节目中, 主要是采用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稿和从《中央日报》刊载的新闻。XGOA 的对国外广播, 除设有几位英语、泰语、缅甸语播音员外, 其余皆为各国驻华记者到 XGOY 进行自编自播。如当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加利福尼亚广播组织(CBS)、互通广播组织(MBC)及英国大英广播公司(BBC)等组织的来华或驻华记者, 经过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介绍, 就可以到 XGOY 直接播出自己的节目(并通过该台定时转播)。此外, XGOY 每晚有对美国广播的英语记录节目一至二小时, 由旧金山收录转播。

XGOY 在重庆开播后不久, 日机轰炸重庆日趋频繁。1939 年 9 月 4 日, 供 XGOY 备用的蒸气发电机厂遭敌机轰炸, 房屋坍塌殆尽。位于重庆小龙坎的 XGOY 发射台亦毫无防空设施。因此, XGOY 在国际宣传处接管期间, 即开始掘修防空机房, 于 1940 年

建成投入使用。XGOY 在敌机轰炸最剧烈时,也曾一度将机器由牛角沱山上迁到小龙坎防空机房内播音。

但是,从 1940 年起,XGOA 和 XGOY 改用了新的节目内容和时间表。在 XGOA 的节目表中,原来的“义勇军进行曲”、“抗战教育”、“抗战讲座”、“抗战歌曲”等有关抗战内容的节目都取消了。新设置了“总理遗教”、“总裁专论”、“公民教育”等节目。仅在 XGOY 对外广播节目表中,还保留有“抗战歌曲”的节目。这说明 XGOA 和 XGOY 作为国民党的喉舌,在抗战的最初阶段,对抗日宣传是积极的,宣传作用也较大;但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掀起反共高潮以后,抗战宣传就趋于消沉,明显地削弱了。

1945 年 9 月抗战胜利后,XGOA 随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XGOY 仍留重庆播音,每日仅晚上播音一次(约 4 小时),播音语言亦减为国语、粤语、英语和越语 4 种。如此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前夕为止。

---

### 第三节 上海沦陷前后

#### 一、从《译报》到《每日译报》和《译报周刊》

1937 年 12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依然保持着英、法等国家的行政权力。但两租界仅弹丸之地,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形如一个“孤岛”;加上日本侵略军在租界内建立了新闻检查所,勒令中国人出版的报纸一律要经过检查。因此,《民

报》、《时事新闻》、《神州日报》、《立报》等先后宣布停刊；而继续出版的《时报》、《新闻报》、《大晚报》等报纸经过了敌人的检查后，便再也无法报道抗日的消息和发表抗日的言论了。但是，不畏强暴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顽强地和敌人进行了争夺舆论阵地的斗争。他们利用英、美、法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利用日本对外商办的报纸不予检查的特殊条件，以外商的名义做掩护，在租界内创办了一批抗日爱国报刊，突破了日本侵略军的控制。当时在上海租界内出版的外国报刊种类很多，有英文的《大美晚报》、《字林西报》、《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法文的《上海日报》，俄文的《索拉报》、《斯罗沃报》、《俄文晚报》，德文的《远东新闻》。而在租界里还可以看到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法国的《人道报》，美国的《新群众》杂志，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等。不少外国报刊或多或少地刊登有关中国抗战的消息和资料，得以在世界各地传播。这也反映当时上海“租界”有“世界性”、“国际性”的特点。因此，上海党组织决定利用这些外国报刊在租界内的合法性，创办一种纯翻译的报纸，一切新闻、特写、通讯、论文都译自外国报刊，使租界当局找不到干涉的借口。而且这种报刊宣传不仅满足了广大市民渴望了解抗战消息的需要，也扩大了国际宣传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

这种纯翻译的报纸，当时取名为《译报》，创刊于1937年12月9日，主编为夏衍。《译报》的稿件全部是从外文报刊选译成中文的，新闻约占1/4，通讯、言论约占3/4，每天四开一张，内容主要是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进行抗战的英勇事迹。例如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对英记者发表重要谈话——中国绝大多数民众要

抗战到底,如少数人采取投降路线,则全国决心抗日的分子将坚决反对”的新闻,还有美国记者写的《中国西北的新社会》,及美国《新群众》杂志刊登的《中国如何才能战胜日本》一文。其中还刊登了译自苏联《真理报》、法国《人道报》的文章。

《译报》刚刚出版几天,便不断遭到日本侵略当局及汉奸的骚扰,强迫《译报》接受日伪的检查。后因印刷所受到威胁,无法继续出版,同年12月20日出版了第12期后,被迫停刊。《译报》出版期间很受广大人民欢迎。《译报》由于内容充实,编排新颖别致,销路曾达到2万多份。

《译报》停刊后,1938年1月21日,又改名为《每日译报》出版。这次出版请了两个与公共租界有特殊关系的英国人,孙特司·裴士为发行人兼总编,鲍纳为经理。真正的负责人是梅益、林淡秋、王任叔(巴人)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作家。这种“挂上洋商招牌”的办法,成了以后进步报刊普遍采用的战术。它既可以减少租界当局的阻力,又可以避免日伪的新闻检查。

《每日译报》最初为四开小型报,每天一张。内容与《译报》基本相同。

《每日译报》在出版一个月后,改变了编辑方针。从1938年2月20日起,除刊登外报的译文外,还刊登自己编写的新闻。到同年5月1日起,改为一张半,增加了一些专栏、副刊及周刊,如“社会动态”(上海新闻零讯)、“新闻”(时事评论)等专栏,新辟《星火》副刊,还有《星期评论》、《时代妇女》、《职工生活》、《书报评论》、《社会科学讲座》、《青年园地》、《戏剧电影》等周刊;还转载《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世界知识》等报刊的文章。这样,《每

日译报》已经不是初办时的纯翻译性的报纸。从同年6月1日起，由于读者增多，改出两张：一张为新闻版，内容包括消息、社论、通讯及特写等；另一张为译文及副刊。6月1日发表了该报第一篇社论《走投无路的日本》。到6月28日，《每日译报》扩充为对开的大型报纸，每天对开一张，并附四开一张，除了新闻报道外，特别注重副刊。

《每日译报》的“特讯”、“专电”，经常报道广大群众所关心的、其他报刊很少刊载的有关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消息。

《每日译报》还刊登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这些都是当时上海沦陷区人民极难看到的。

《每日译报》的论文、特稿曾经引起国内外新闻界的重视，经常被汉口、广州、金华、香港等地报刊转载，上海有些外国通讯社经常将《每日译报》的重要稿件译发欧美各国。这样《每日译报》起到了扩大国际宣传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

日伪当局对《每日译报》极为痛恨，经常对它进行恶毒的攻击，以至采取投恐吓信、投掷炸弹等卑鄙手段进行破坏。1939年夏，日伪与租界的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用金钱收买了英籍发行人裴士和鲍纳。同年5月18日，公共租界当局寻找借口迫令该报停刊，并再也不准《每日译报》复刊。只有《每日译报》编辑部出版的一个期刊《译报周刊》仍继续出版。《译报周刊》于1938年10月10日创刊，1939年6月22日被迫停刊。它由梅益、王任叔、林淡秋、冯宾符等编辑，发行量达到两万多份，销路是上海定期刊物中的第一位。《译报周刊》除具有《每日译报》的特点外，它还继承了《生活》、《新生》、《大众生活》等周刊的优良传统。它的评论深入浅出，分析时事政治

往往一针见血，而文字又浅显易懂。它还经常运用特约记者的报道和外国记者的通讯来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并出版了《新四军特辑》，动员上海青年参加新四军。《译报周刊》还对青年人的工作、学习、生活与斗争各方面提出宝贵意见，因此，在青年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译报》、《每日译报》、《译报周刊》等抗日报刊的兴起，使沦陷后的上海这一“孤岛”不孤，使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脉搏息息相通，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而且，这种影响不只限于上海一地，它具有全国性和世界性。

## 二、《文汇报》的出版及其他爱国报刊

“孤岛”上《每日译报》的出版发行，影响和推动了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包括资产阶级）也仿效《每日译报》的办法，以外商的名义在租界里出版抗日报纸，其中主要有《文汇报》、《华美晚报》、《大美晨报》、《大英夜报》、《循环报》、《导报》、《申报》等，以致上海租界成了沦陷区抗日报刊的中心，人们形容为“孤岛”上爱国报刊林立。

当《每日译报》出版发行后四天，《文汇报》于1938年1月25日问世。为了避开日方的检查，挂的也是英商招牌。报社股东找英国人克明担任发行人。创办人以爱国人士、京（南京）、沪、杭两铁路局高级职员严宝礼为首，总编辑是原《民报》的胡惠生，原《大公报》的徐铸成以主笔的名义参加，负责编辑部的全盘工作，他除了撰写社论及编辑要闻外，也要审发全部稿件，成为编辑部的实际负责人。国际新闻编辑为储玉坤，副刊编辑是柯灵，记者是邵伯南。全报社一共只有十多人。

《文汇报》创刊时，每天出版一大张。第一版为要闻，第二版为

国际新闻,第三版为本市新闻,第四版是副刊《文会》。《文汇报》以其鲜明的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宣传抗日的立场,其内容与言论对一般读者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很快在读者中博得声誉,销量直线上升,广告也越来越多。从1938年3月5日起,每日出两大张,要闻、国际新闻、本市新闻各扩大为两版,并增加了经济新闻版。到同年4月,又扩大篇幅,每日出三大张,并增加了教育与体育新闻版、社会服务版,还增加了一个通俗副刊《灯塔》。到同年5、6月间,发行量已超过5万份,而销量历来占全国首位的《新闻报》,由于接受日方检查,不能刊登任何反日新闻及言论,发行量从10万多份下降到5万份左右。《文汇报》创刊不到半年,销量便超过了《新闻报》。

《文汇报》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它能够在敌占区报道抗日的消息,发表抗日的言论。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上的败退,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后,使抗日战争一时受到很大挫折。日伪和亲日派对国民党进行诱降,大肆散布悲观论调。《文汇报》则坚持伸张民族大义,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卖国投降。

在“孤岛”上海,日伪势力当时比较猖狂,但它们不能检查控制《文汇报》,无法阻挠该报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严正抨击和揭露,它们就玩弄种种手段加害《文汇报》,并制造恐怖事件。面对种种恐吓和破坏,《文汇报》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并没有“改弦更张”、抛弃初衷,没有改变抗日爱国的立场,不仅继续大量发表抗日战争的军事新闻,还发表了《毛泽东谈对日抗战》,美籍女作家对记者的谈话——中国抗日必将获得最后胜利,还有介绍抗日军政大学的延安通讯,并在副刊中开始连载史沫特莱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红军行进》(梅益译)。报纸立场更见鲜明。



《文汇报》深刻揭露日本侵华和汪伪卖国殃民的罪行，歌颂爱国军民的抗日斗争的报道，被国内外不少报刊转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日寇、汉奸千方百计破坏《文汇报》，但屡遭挫败，最后还是通过重金收买发行人克明，才迫使《文汇报》停刊。

日伪对于在租界内以外商名义出版的其他爱国报刊也如法炮制，采取投恐吓信、掷手榴弹、暗杀等手段进行破坏。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便立即以上海为中心，大肆镇压抗日爱国报刊。首先枪击《导报》报馆，暗杀了《大美晚报》的副刊编辑朱惺公，捣毁了《大美晚报》的印刷所，打死了该所两名工人，接着又枪杀了《大美晚报》主持人张似旭、编辑程振章，并连续四次向《申报》扔炸弹，三次绑架《申报》的负责人。当时上海租界内一片恐怖气氛，许多报馆门前都布满了铁丝网、钢板，以防日伪特务袭击。

1939年夏，日伪进一步向抗日报刊伸出魔手，一方面，日伪要求租界当局禁止公共租界中的反日宣传与反日报纸；另一方面，派人以重金收买上海几家抗日报纸的外国发行人。这样，以外商名义办的抗日报纸被日伪特务一一绞杀了。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向英、美宣战。英、美、法在上海的租界完全被日本占领，租界内所有抗日报刊被迫停刊，甚至一些站在中间立场的报刊也不得不停刊。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只能以秘密的方式出版刊物，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这种小型秘密刊物有印刷的，有手抄的，种类不少。如《之江大学商学刊》、《东吴团契》、《酱工》月刊、《朋友》、《万象》、《读书》、《华华月刊》、《谷音》等。这些刊物，有些是临时性的，只出了几期就停刊了，只有《万象》坚持到1945年才停刊。

### 三、苏联罗果夫在上海办的中文版《时代》杂志

罗果夫在抗日战争初期是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社长。1937年9月,上海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孤岛”上苏联的报刊宣传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那时在租界办报风行一时的挂“洋人”招牌、请“洋人”做发行人,一般都是请英、美、法等外国人。

1941年6月28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英、美联合起来结成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此时,上海租界的形势也随之改变,租界行政当局允许苏联人在租界出版报纸。原白俄在上海办的一份俄文日报《新生活报》,在罗果夫的帮助下,将报纸的内容加以充实改进,发行范围也扩大了,每天大量刊登塔斯社的电讯,充分报道苏联的消息,特别是苏联军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消息,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在租界里还有一份苏联人匡开莫办的俄文半月刊《时代》杂志。这样,苏联在上海出版的既有一份日报,还有一份半月刊杂志,另外还筹备办广播电台。而当时在上海,由于日伪当局的胁迫和公共租界当局的刁难与限制,使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办的《译报》、《每日译报》、《译报周刊》等相继被迫停刊,于是就设法请苏联人帮助办报。

1941年8月初,上海中国共产党组织,通过领导上海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之一、精通俄语的姜椿芳,设法直接找到了罗果夫商谈办报一事,请罗果夫找一位可靠的苏联人出面向租界工部局登记出版一份中文的日报,经费由我方筹划,编辑人员由我方担任。但最后研究的结果是:为了不太显眼,决定不出日报,而是编一份周刊。以原来的俄文半月刊《时代》为母版,办一个《时代》的中文版周刊,选一些俄文《时代》的文章译成中文出版,经费由苏方出,翻译

由中方姜椿芳等三人负责。此事我方同意后，由罗果夫介绍了俄文半月刊《时代》杂志的编辑发行情况，并由姜椿芳和俄文半月刊《时代》的编辑和发行人正式接洽筹办。

《时代》周刊中文版，由于以苏联人的名义出版，报道内容主要由罗果夫提供材料，选一些俄文《时代》杂志的好文章，另选一些塔斯社的电讯，基本是反映苏德战场的情况，反映中国的消息自然减少。这是因为当时上海其他报纸很少刊登塔斯社的消息，而德国人在上海也办德文和中文的报纸、杂志，报道德国的消息，两家针锋相对。所以《时代》周刊中文版很容易获得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通过，1941年8月20日，《时代》杂志周刊中文版正式出版。

这一杂志是横排本，内容经常有介绍苏联共产党以及列宁、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文章，报道苏德战场的消息。版面上有镰刀锤头、五角星，这些都是上海其他报刊所没有的。在文字用词方面也耳目一新，读者购买踊跃，反应强烈，每期发行几千册。但是，没有中国人写的文章成为该杂志的一大缺陷。经姜椿芳提议，罗果夫赞成约请一些中国人写文章。如在11月16日鲁迅逝世纪念日刊登了阿英写的《鲁迅作品编目》，还刊登了郭沫若的文章。12月初是苏联宪法纪念日，罗果夫主动建议约请一些中国人写纪念文章。罗果夫对中国人写的文章内容很欣赏，要求再组织一些中国人投稿。当时读者来信也很多，从此该杂志即不断采用中国人写的诗稿和文章了。

另外，应罗果夫的要求，中文《时代》杂志上经常介绍苏联在上海的“呼声”广播电台的节目。电台节目里，每天都广播袁雪芬的越剧、卫仲乐的音乐，还有李德伦讲的文艺故事等，因此这一电台在

上海很受人们欢迎。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进占上海租界后,中文《时代》周刊也像其他洋办报刊一样,全部被迫停办。后来,由于日本要南进侵占香港及东南亚,既南进就要稳住北部后方,首先是与苏联接壤的“满洲国”,设法使苏联不动手。因此,日本暂时停止干涉苏联在中国的宣传活动。日本侵占租界后,塔斯社可以继续发稿,俄文的《新生活报》继续出版,英文的《每日战讯》也继续发行。经过罗果夫与日本方面几番交涉,中文版《时代》杂志半月刊,在短暫停刊以后,于1942年初又恢复出刊,内容也不断得到充实,在国内外的反响也越来越大。这时姜椿芳和罗果夫商量成立时代出版社,出些小册子。罗果夫很机警,他同姜椿芳商量将1941年7月3日斯大林的演说《关于卫国战争的方针》印成单张夹在杂志里发,以扩大宣传;接着又出了两本小册子,也夹在杂志里发出去。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是时代出版社的萌芽。1942年还出版了一本苏联卫国战争的画册,用俄、英、德、中、日五种文字发行。消息传出后,日本人很重视,日本人出面和罗果夫谈,要求日文画册不要发行。日方担心这一日文画册发出去会使日军军心动摇。经罗果夫与姜椿芳商量后,只好将日文版去掉。1942年还出版了《斯大林语言问题》的小册子,以及高尔基著作的单行本。194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25周年,在罗果夫的建议下,出版了《苏联文艺》(中文月刊)。上述种种做法,实际上达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目的。

苏联政府对上海苏方的出版宣传很满意。当时通过中东铁路和海参崴轮船,每月一二次运来纸张和不少书籍,积极创造更有利的物质条件,出版更多的报刊和书籍,而且开办了自己的印刷厂,

力量越来越强。

1943年下半年,罗果夫调走,上海塔斯社成为苏方的代表;姜椿芳主持中文版《时代》杂志的工作,属上海塔斯社领导。从此《时代》周刊中文版内中国人写的稿子越来越多,逐渐引起日伪的注意。1943年年底,日伪要审查《时代》的中文稿,而且限制《时代》杂志不能发中文稿,“呼声”电台也不能发中文稿。因此,1944年初,《时代》杂志中文版停刊,“呼声”广播电台的中文稿也不再发了,中文书也不能出了。但《时代》杂志的所有人员都保留下来,将翻译的文稿和中国人的投稿积累起来,准备一旦复刊时用。

1945年4月间,苏军已反攻到德国境内逐渐逼近柏林,第二战场也已开辟,而日本侵略军节节失败,《时代》杂志中文版抓紧这一有利形势,于1945年5月1日未经日方同意便复刊了,并将苏联攻克柏林的照片刊登出来。当送审时,日方也无可奈何。

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形势急剧变化。日本人占领上海塔斯社,将苏联人送进集中营,要中国人都留下地址后才准离去。一直到日本投降后,姜椿芳等原来在中文版《时代》杂志工作的编译人员才陆续回到上海,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并利用当时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微妙关系,以苏联时代出版社的名义,使中文版《时代》杂志和中文《苏联文艺》(月刊)复刊,并出了很多图书。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还酝酿以苏商名义增出一份报纸,这就是后来的中文《时代日报》。

## 第四节 香港及东南亚地区

### 一、在香港的抗战宣传与文化交流活动

香港是远东唯一的自由港，是联系欧美、南洋等地的海上通道，由于它的这一特殊地位，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曾发挥过特殊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冬派廖承志和潘汉年去香港设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进行抗战宣传和各种文化交流活动，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了大批国际友好人士，以及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人士，在精神和物质上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当时香港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它是英、美、法、荷、德、日、意、蒋记国民党和汪伪国民党这许多方面的情报活动中心。因此，要在这一地区开展抗战宣传与文化交流活动，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

早在抗战爆发前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设在香港的“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领导人为李章达、陈汝棠、何思敬等）曾出版《战鼓》作为会刊，进行抗战救国宣传。其他积极宣传抗战的报纸还有原十九路军蔡廷锴、陈铭枢等人主办的《大众日报》，广西地方实力派主办的《珠江日报》，以及内地迁港刊行的《申报》；香港还有比较大的报纸近十种，小报有三四十种，其中除几份与香港当局有关的大报外，其他都是纯商业性报纸。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上海、南京的失陷，大批著名民

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先后南下到香港,其中有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郭沫若、茅盾、邹韬奋、蔡元培、章乃器、阳翰笙、杜君慧、司徒慧敏、蔡楚生、沈西苓、林林、戴望舒、杨刚、林庚白、恽逸群、刘思慕、萧红、端木蕻良、金仲华、叶灵风、萧乾、楼适夷、徐迟、马国亮等。他们中的一部分后经香港转到内地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一部分仍留在香港,加强了香港地区文化界抗日救亡的领导力量和抗战宣传与文化交流活动。1938年,在上海办事处和中共香港办事处的推动和领导下,香港的抗战文化宣传活动蓬勃展开。内地迁来香港的报纸又有《大公报》和《立报》。胡文虎系统的《星岛日报》亦在香港创刊,由金仲华主持编务。新创刊的进步杂志、画报有茅盾主编的《笔谈》和《文艺阵地》、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郁风主编的《耕耘》、马国亮主编的《大地画报》、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以及香港学生赈济会主编的《学生呼声》、保卫中国同盟主编的《保卫中国同盟通讯》、何香凝指导编辑的《侨胞》等等。这些刊物积极宣传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香港抗战文化宣传带来了生机。这时,香港各青年团体和爱国团体还组织了读书会、歌咏队、戏剧社、宣传队,运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香港曾掀起抗战宣传和为祖国内地募捐筹款的高潮,特别是“八一三”献金运动,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

1938年日军人侵华南,广州和华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香港成为一块暂免战火的“孤岛”。当时香港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反映到各个领域。各种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中的斗争相当激烈。1939年,日本在香港办了中、英文的《香港日报》,汪伪汉奸的报刊有《南华日报》、《天演日

报》、《人华宇》杂志等，都在加紧进行反共和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宣传。蒋记国民党在香港的文化宣传活动也很多，办有《国民日报》等报刊；一批国民党大员还频频到香港，与日方作“和平”试探。日伪和国民党出于政治需要，都要求港英当局压制中共在香港的抗日、进步的文化宣传活动。此时英国政府对中国抗战实行了两面政策：日本全面进攻中国，危害了英国在华利益，英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的抗战；但从1938年冬起，英、美等国策划“东方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拉拢日本，促使日本进攻苏联，保住自己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因此，港英当局讨好日本，加紧限制中共在香港的政治、文化活动，对抗日宣传进行审查、控制，凡“抗日”、“抗敌”、“汉奸”的字样不准见诸报刊，一律改为“××”或“□□”。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香港抗战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要更加注意加强在上层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通过在香港建立的进步文化团体如“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木刻协会香港分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业余联谊社”、“香港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等，积极开展活动。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由许地山、戴望舒、乔冠华、杨刚、袁水拍、徐迟、刘思慕、林焕平等担任理事，下设有“文艺通讯部”、“青年文艺研究社”，培养和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文艺通讯部”出版的刊物《文艺青年》旗帜鲜明地把斗争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指向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反共、反民主的政策。香港文化界写了不少揭露、抨击“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文章，如韩幽桐的《从美国远东政策看日美关系》、乔冠华的《论远东局势》、邹韬奋的



《从三国同盟到美日谈判》等。这些文章抨击了英、美等国制造的“东方慕尼黑”危机，以唤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注意。1939年4月，“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主办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由许世英、陶行知任正副董事长，郭步陶任院长，金仲华任副院长。该学院开办了三届，毕业学员180多人，培养了一批适应抗战需要的新闻工作者。许多人进入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等新闻机构工作。其他各个方面也都积极开展文化宣传活动。在戏剧方面，司徒慧敏、卢斐等一批文化工作者在香港文化界及学校中倡导话剧活动，演出过《人若黄昏》、《凤凰城》、《雷雨》等剧目。1939年初，金山、王莹率领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到达香港，改名为“中国救亡剧团”，在香港演出半年多，剧目有《台儿庄之春》、《放下你的鞭子》等。在廖承志、潘汉年的安排下，该剧团于1939年下半年转移到南洋一带巡回演出。此外，欧阳予倩率领的“中华剧社”、唐槐秋率领的“中国旅行剧团”也先后到香港演出，剧目是《雷雨》、《日出》、《李秀成之死》、《打回东北去》等。1940年，香港一些进步剧团如“香江剧艺社”、“时代剧团”、“警号剧团”、“银行界青年业余联谊队”也演出不少反映抗战的剧目。在香港，宋庆龄为中国舞蹈艺术表演家戴爱莲组织了回国后的第一次演出，由“保卫中国同盟”出面，为延安筹款。演出的节目有《游击队之歌》和她自己创作的歌颂游击队的《东江》。在电影方面，司徒慧敏、蔡楚生等进步电影工作者在香港建立了“全球”影业公司和“启明”影片公司，团结了一批粤语电影工作者，创作并拍摄了《血溅宝山城》、《游击队进行曲》、《孤岛天堂》等抗战影片。1939年和1940年，香港成立了“大观影业公司”和“新生影业公司”，蔡楚生、司徒慧敏参加了编导工作。在歌咏方

面,抗战初期上海“八一三”歌咏队、武汉合唱团等都曾到香港进行过抗战宣传活动。1939年初,在香港成立了“红红歌咏队”,1940年冬改为“虹虹歌咏队”,积极开展抗日歌咏活动。综上所述,香港的抗战文化宣传活动是在斗争中卓有成效地广泛开展起来的。

抗战时期,宋庆龄住在香港的四年(1938—1941)是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排除当时其他人士不易排除的困难,为抗日救亡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而斗争的四年。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等人在香港宣告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宋庆龄邀请了许多中外著名人士参加或支持,其中有冯玉祥、孙科、宋子文,有美国的保罗·罗伯逊、克莱尔·布思,德国的托马斯·曼,印度的贾·尼赫鲁等。“保盟”初期的执行委员是宋庆龄、邓文钊、廖承志、廖梦醒、爱泼斯坦、塞尔温·克拉克夫人(即当时港府医务署长司徒永觉夫人)。由宋庆龄出任主席,副主席是塞尔温·克拉克夫人,廖梦醒是办公厅主任兼宋庆龄的秘书。“保盟”的成立团结了很多国际友人,展开了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工作,推动了国际组织、海外华侨支持抗日战争,从世界各地募集了大批医药用品和物资送到国内前线,用以救济国内千百万难民,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纵队。1943年,宋庆龄在《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的公开信》中写道:“保卫中国同盟完全致力于救济工作,但是,救济工作要有一定的目的。它希望在自己的范围内帮助打赢这个反法西斯战争。我们所以把重点放在游击区(八路军和新四军建立的边区),是因为他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但他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

中共中央非常关心“保盟”的工作。1938年8月,即在“保盟”

成立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曾派邓颖超赴港看望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宋庆龄特约见面，倾听中共对国事的主张和政策。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保盟”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但它们之间的工作关系非常密切。廖承志是“保盟”的执行委员，一直参与“保盟”的领导工作。潘汉年是中共与宋庆龄的联络员（后来由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接任），不仅常被邀请参加“保盟”的会议，而且和宋庆龄一起会见国际知名记者，如斯诺、史沫特莱等。“保盟”最高领导是宋庆龄，但许多日常实际工作则由廖承志负责，所以在接收和转运海外捐赠的款项及物资方面，便成为办事处与“保盟”共同的工作。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保盟”的协作是多层次的，这也表现在国际宣传工作方面。“保盟”的机关刊物《英文两周通讯》，除对外宣传揭露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外，主要是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经常刊载延安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的英文稿件和采用“国际通讯社”的供稿。编辑是澳籍记者贝特兰。至于出版毛泽东著作的英文版，则由办事处去办理。1934年至1940年，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先后在香港出版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新阶段》和《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开始每种各印行1000本。这些英文的毛泽东著作出版后，除在香港就地发行一小部分外，其余一部分交给“保盟”，一部分则由办事处分别寄发至欧美和南洋各地。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建立不久，为了开展海外宣传和进行文化交流，做好海外华侨的团结和统战工作，创办了《华侨通讯》这一油印刊物（为了避开向港英当局注册和送审，其编印发行是不公

开的),其主要内容是报道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这些报道来自延安和重庆以及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既真实又新鲜,深受海外侨胞的欢迎。另外,办事处还通过在香港的新文化书店(抗战初期由泰国爱国华侨集资创办的)出版发行了一些书刊,如延安出版的《论持久战》等书籍十分畅销。广州和其他方面纷纷翻印。该书店按照办事处的安排,还刊印发行了《新华日报社论集》,先后出版了几辑。后来,中共中央南方局将在重庆出版的《群众》周刊的纸型航寄来香港,也交由该书店翻印发行。办事处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将许多书刊发行给港澳和海外各地,扩大了对海外和各方面人士的宣传和文化交流工作。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事变”前后,强化了法西斯文化专制,加紧迫害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连续九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疏散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除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等少数人留下坚持工作外,欧阳山、艾青等撤往延安或新四军地区,其他大部分文化人撤退到香港,在香港建立新的抗战宣传与文化交流阵地,并待机向南洋等海外地区开展抗战宣传和文化交流工作。同时,周恩来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就如何接待文化人、建立文化工作领导机构和团结各界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文化宣传阵地等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

1941年1月底,桂林、重庆、昆明、上海等地大批文化人士陆续到达香港,他们是:张铁生、姜君辰、夏衍、范长江、邹韬奋、胡绳、茅盾、戈宝权、胡风、章泯、丁聪、胡考、宋之的、千家驹、林林、廖沫

沙、张尔华、于伶、于毅夫、黎澍、李凌、张友渔、韩幽桐、凤子、舒强、葛一虹、沙蒙、羊枣、胡仲持、沈志远、叶以群、周钢鸣、张明养、贺绿汀等。此时，在香港建立抗战文化宣传阵地的政治环境也较为有利，因为1941年日本侵略东南亚、太平洋地区的“南进”态势既定，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日益不可调和。为了利用中国的抗战力量，英、美均不太赞成国民党的反共内战行为；港英政府对中共在香港的抗战文化宣传活动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甚至主动与中共方面联络谈判，企图利用中共华南抗日游击队以抗击日军。由于香港的政治环境这一极为有利的变化，大批内地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到达香港，加上前面所讲的在上海、南京沦陷后撤到香港并仍留在香港的一批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阵容，使香港的抗战宣传与文化交流活动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在香港创刊，这是中共领导的以统战形式出现的宣传团结抗战的报纸，之所以取名“华商”，是考虑到当时在香港办报、办刊物也和国统区一样，稿件在发排前要送有关当局审查。为了尽可能使报纸公开发行，能够顺利地邮寄到海外和南洋各地，廖承志想出《华商报》这一报名。因为申请注册的法人邓文田是商人（邓文田、邓文钊是廖承志的表亲，是当时香港华北银行的华人买办。由于与廖承志的关系，他们甘愿在当时情况下，冒险为中国共产党代收海外捐款）。《华商报》的总经理部由邓文钊负责，社长是范长江，总编辑是胡仲持，编辑主任是廖沫沙，社论的总主笔是张友渔。写社论的分工是：邹韬奋写民主运动方面的，夏衍、茅盾写文艺方面的，胡绳写思想方面的，乔冠华、金仲华写外交问题和国际问题，张友渔写抗日、民主、宪政、日本问题方面

的。从而可以看出《华商报》的阵容是相当出色的，其社论的权威性可想而知。其副刊经常发表的小说连载、文艺评论、散文和杂文都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海外、南洋一带有较大的影响。《华商报》一份晚报，日销数万份，这在当时香港二三十家报纸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与《华商报》出版的同时，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由于《大众生活》以前在海外已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次与《华商报》紧密合作，在中外文化交流和宣传战线上起了更大的作用。

当年在香港较有影响的报刊，除《华商报》和《光明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1941年9月18日创刊，社长为梁漱溟），以及《大众生活》外，还有前面已提到的茅盾的《笔谈》、《文艺阵地》等刊物，加上救国会、中苏文化协会、保卫中国同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中共香港市委办的刊物近20种。

在香港，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的创作演出活动更趋活跃，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一时期发表的文学作品有茅盾的长篇小说《如是我见我闻》、《腐蚀》，夏衍的中篇小说《春寒》，邹韬奋的连载《抗战以来》，范长江的连载《祖国十年》等，以及他们写的大量短篇小说、文艺评论、杂文，都从各个方面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专制独裁的黑暗，呼吁民主、团结、抗战，讴歌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巴金、冰心、巴人、丁玲、郭沫若、端木蕻良、萧红、胡风、葛一虹、袁水拍等人也在香港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杂文、文艺评论、诗歌、译文等等，使香港的抗战文学盛极一时，影响深广。

1941年夏秋之交，在香港的戏剧工作者组成了以章泯、金山、司徒慧敏、宋之的、于伶、蓝马等主持的“旅港剧人协会”，先后演出

了揭露国民党腐败丑恶的《雾重庆》，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希特勒的杰作》（又名《马门教授》）和《北京人》等戏剧，在香港引起轰动。其中《雾重庆》在香港创造了一个剧目连演 14 场的记录。《希特勒的杰作》一剧得到了国际友人的热烈赞扬。著名粤剧艺术家马师曾、薛觉先、白驹荣等也在香港编演了一批爱国粤剧。

由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于伶、章泯、叶以群、周钢鸣等为委员的大观电影公司剧本审查委员会，相继组织摄制和上演了《小广东》、《小老虎》、《民族的吼声》等抗战影片。司徒慧敏、蔡楚生在“新生”等影片公司团结广大电影工作者，摄制了《保卫大四邑》、《最后关头》、《前程万里》等一批抗战影片。这些影片在香港、南洋等地上演，起到了很好的抗战宣传作用。

美术工作者也很活跃，有画家丁聪、黄新波、特伟、胡考、叶浅予、郁风组织的“新美术社”，叶浅予、张光宇、郁风等组成的“漫画家协会”，还有“木刻家协会”。为了介绍美术作品及评述美术动向，《华商报》开辟了每周一期的《新美术》副刊，一批美术工作者还编印了一本反映八路军、新四军浴血抗战的《团结抗战大画册》。

进步歌咏活动此时在香港也达到了高潮。虹虹歌咏队等进步歌咏团体甚为活跃；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创作的救亡歌曲广为流行。苏德战争爆发后，“香港文协分会”曾为响应国际反法西斯运动举行了音乐会，为支援苏、英战士募捐。

为适应大批进步文化名流到达香港的新形势，进一步推动和领导香港的抗战文化宣传活动，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1941年5月成立了“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文委），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下设文艺、学术、

新闻三个组。文艺组由夏衍负责，学术组由胡绳负责，新闻组由张友渔负责。他们通过公开的座谈会进行活动。计有文艺座谈会、戏剧座谈会、学术座谈会、新闻座谈会、国际问题座谈会、妇女座谈会等。此外还有统战座谈会，建立与所有民主派别的联系，奠定海外活动基础，策应国内的斗争。同时加强对华侨和海外报刊宣传和文化交流工作的领导。座谈会每一至三周举行一次，讨论当前时局和部门工作及其政策问题。廖承志经常参加各种座谈会，并在座谈会上传达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和指示，介绍国内外形势。中共香港文委就是通过这些座谈会，组织开展抗战宣传与文化交流活动和各种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斗争形势也极端错综复杂，国民党顽固派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香港的抗战文化宣传活动曾在一段时间内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为主，争取国内局势好转。当时在香港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中监委，谴责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积极实行剿共的分裂政策。1941年2月12日，香港各界名流联名上书林森、蒋介石，呼吁制止内战，一致对外。由国民党元老张一麐领衔，许地山、马鉴、阳翰笙、郭步陶、金仲华、羊枣、乔冠华、范长江、恽逸群、胡仲持、端木蕻良、郁风、周鲸文等400余人签名。1941年5月29日，邹韬奋、范长江、茅盾、金仲华、沈志远等9人发表《我们对国是的态度和主张》，严正指出，只有团结、进步、民主才能坚持抗战。1941年6月1日，金仲华、邵宗汉、羊枣、郁风联名发表声明，集体辞职退出《星岛日报》，以抗议该报屈从重庆国民党的压力而向右转，使他们不能坚持原来的立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出版了



《新四军事件面面观》，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1941年6月，由于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加紧侵略南洋各国，太平洋上空战云密布，国际局势的发展更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于是香港开展了以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目标的文化宣传活动，提出保卫香港的口号，号召中、苏、英、美联合共同反抗德、日法西斯；建立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的“中苏文化协会香港分会”；发表了郭沫若、茅盾、许地山、夏衍等署名的《中国文艺作家给欧美文化界的一封信》，茅盾、夏衍、戈宝权等署名的《致世界作家书》，呼吁全世界文化界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提议组织反法西斯作家同盟等。乔冠华、羊枣、金仲华、张铁生、张友渔、于毅夫、韩幽桐、胡绳、沈志远、恽逸群等人所发表的大量的国际政治、军事评论，更为国际国内广大读者所注目。如胡绳评论苏德战争的《历史新页》，沈志远的《论苏德战争》、羊枣的《希特勒侵苏的前途》、《德苏战争的军事形势》、《决定人类命运的大战》，乔冠华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德苏战争讨论提纲》、《论德苏战争》等，从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苏德战争爆发的原因，苏德双方力量对比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指出苏德战争标志着世界大战性质的根本变化，已转变为一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德国法西斯必将失败，最后胜利必然属于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关于剖析日军的南进或北进的评论文章如恽逸群的《日阀的南进和北进》，羊枣的《日本的动向》等，都分析了日本的南进、北进，可能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但无论南进、北进，日本都不会放松侵略中国，都不会放弃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以唤起中国人民的高度重视，密切观察国际形势的发展。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入侵香港，“八路军

驻香港办事处”按照周恩来两次紧急电报的指示,由廖承志等领导人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安排,在广东中共的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的全力协同配合下,于香港沦陷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营救出困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 800 多人,同时营救出—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并帮助—些英、印、荷、比等国侨民脱险。整个营救工作没有出现意外事故,全部疏散人员都安全抵达目的地。这是一次异常艰险和艰巨的任务,时间要求急迫,牵涉的工作面又很广。当时,具体领导这项营救工作的除廖承志和连贯外,还有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驻香港搞情报工作的刘少文(化名张明)、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和大队长曾生,以及当时当地的很多干部。这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次伟大的营救工作,这场秘密大营救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结束以前,在多方面协助下,全力以赴胜利完成的一件大事。随后,办事处即行撤消,蓬勃开展的香港抗战宣传与文化交流活动暂告停顿。

香港的抗战宣传与文化交流活动,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文化活动的—个重要组成部分。华南沦陷后,香港成为特殊的抗战政治、文化据点。中国共产党和—切爱国民主人士,文化、新闻界人士,通过—个特殊的据点,向国际、国内沦陷区和国统区有力地揭露了日军的侵略暴行,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倒退政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反对分裂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抗战功绩,宣传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国内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抗战宣传与文化交流活动广泛开展的上层统战、华侨统战和国际统战,也为支援祖

国抗战，声援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是值得特书的一页。

## 二、胡愈之在新加坡主编《南洋商报》及其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当时在上海曾为抗日救亡运动做出重大贡献的胡愈之，受命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宣传动员工作。他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文化界人士共同抗日，做了大量工作。武汉沦陷后，他受周恩来的指派，到桂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通过继续出版《国民公论》，参与组织“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创办“西南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等多种活动形式，使桂林很快成为大后方抗日文化的一块绿洲。“皖南事变”前夕，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1940年7月，他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离桂林到香港。接着，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赴新加坡（简称星洲，又称狮岛，以下同）开辟海外抗日宣传基地，团结广大海外侨胞共同抗敌，并帮助陈嘉庚主办《南洋商报》。

1940年12月1日，胡愈之从香港乘船抵达新加坡，便应新加坡《南洋商报》之聘任编辑主任，主持笔政。他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加强抗敌舆论阵地，协助陈嘉庚领导抗日筹赈运动。从这时起到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这个所谓“攻不陷的要塞”在10万英军向3万日军投降而陷落为止的一年多时间里，胡愈之以《南洋商报》为阵地，挥动如椽之笔，写下了一系列抗日救亡的宣传文字，在赤道线上发出了扣人心弦的怒吼，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敌救亡活动。

当时新加坡的华文报纸,除《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还有销路不大的《总汇报》等。在新加坡的福建人多爱看《南洋商报》,广东人多喜读《星洲日报》,但《星洲日报》的老板胡文虎却并不是广东人,而是福建人。这是当地号召力最大的两家大报,相互竞争激烈,经常“对垒”。

《南洋商报》是“橡胶大王”陈嘉庚于1923年创办的,比《星洲日报》早六年,原为陈嘉庚独资经营,以报道商业情况为中心内容。

20年代末,世界性经济萧条开始,胶价大跌,陈嘉庚经营的企业大受影响。《南洋商报》于1932年脱离陈嘉庚有限公司,组成南洋商报有限公司。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的弟弟李王荣任《南洋商报》董事长,董事经理是傅天网。他对业务做了较大的改进,尤其在宣传抗日救国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南洋商报》实际上是当时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南侨总会”,其分支机构遍及东南亚各地)的喉舌。

新加坡在1965年成立共和国以前,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各地华侨亦把它作为中心,“南侨总会”就是在1938年10月10日,由东南亚各地代表在新加坡聚会宣布成立的,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荷印)和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南洋商报》董事经理傅天网是老报人,很懂得迎合时代潮流,迎合广大爱国华侨的心理。而要迎合华侨读者,就要拥护陈嘉庚及他所领导的“南侨总会”。这一切与胡愈之来南洋的目的竟是天然巧合。这对胡愈之的工作将极为有利。《南洋

商报》这样一家销路较好、颇有影响的大报，长期以来却一直没有总编辑，也无专人写社论，而是由董事经理傅天阔、副刊编辑张楚琨等轮流主持笔政，一般要两三天才发一篇社论，并不是很有计划、有系统的，也不大讲究前后呼应。虽说那些社论各具特色，却几乎是各自为政。自胡愈之进《南洋商报》担任编辑主任主持笔政后，王纪元即接张楚琨任该报副刊《狮声》的编辑，张楚琨转而主编该报的晚报。由于胡愈之曾从事于国际问题研究，在“国际新闻社”工作过，抗战时期写了许多国际问题文章，这些文章海外华侨报纸曾纷纷转载，传诵一时，因此，从1941年元旦起，写社论的工作就自然落到胡愈之身上。他每星期要写五六篇1500字左右的社论，排在第一版左下角，除有特稿须让出社论版位外，几乎是一天一篇。另外，还要为星期刊写些较长的专论，每篇3000字到10000字左右，有时也要给晚报写简短的时评。

那时在海外办报，最感困难的是关于中国的消息来源太少而且太慢。胡愈之当时有个较好的条件，就是有他曾工作过的“国际新闻社”的全力支援，并与香港新闻界、文化界有较密切的联系。《南洋商报》的“国际新闻”、“祖国新闻”主要是靠“国际新闻社”提供，另外也依靠各国通讯社（如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等）的电讯和特约专电。“本埠新闻”、“东坡新闻”，则由胡愈之组织领导的一个采访委员会供稿，侧重于采访报道当时当地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抗日救亡活动实况，颇受读者欢迎。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抗日战争的最新消息、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都较及时准确地、在《南洋商报》上得到反映和披露。

《南洋商报》每天所发表的由胡愈之撰写的社论或评论，都是

经过苦心琢磨,尽量根据华侨社会的所想所急,对动荡激变的世界形势,对摇摆不定的国内政局,进行分析。写作态度力求客观公允,语言文字尽量通达简练,深入浅出,雅俗皆宜。总的目的是呼吁以国家民族为重,以大局为重,反对分裂投降,要求民主进步,反对专制倒退。如在题为《团结则存,分裂则亡》、《新四军事件所引起的国内外反响》等社论中,不但简明扼要地公布了“皖南事变”这一“千古奇冤”,而且一再引用蒋介石在各种时间和场合发表的所谓“要始终保持统一”,“做到绝对精诚团结”的那些冠冕堂皇的高调,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社论郑重宣布:“我海外侨胞,其中大多数,一向是无党无派的,我们心目中只有国家民族,我们决不存党派偏私之见。现值大敌当前,失地未复,我们所要求的是抗战建国,是民主团结;我们所反对的是和平妥协,是内战分裂。”这一方面是打击汪精卫的卖国投降主义和蒋介石企图利用日本秘密媾和的阴谋,另一方面也使蒋介石言行相悖的嘴脸暴露无遗,并使他耍两面派手腕时有所顾忌。又如为了孤立日本法西斯强盗,呼吁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题为《日本军事冒险的最近动态》、《论英美在远东的合作》、《感谢友邦新闻界的关心》、《论保卫南洋》等社论里,一再指出:“一个民族断不能完全倚靠外力以求独立解放,何况英、美在目前是不是能用武力制止日寇的侵略也是一个问题。”“要制止日寇的侵略,英、美在远东的彻底合作,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一再论述中国抗战对远东和平以及世界形势的影响。“美国是否必须在两洋同时作战,是要看中国抗战是否能坚持下去。”“今天中国的团结抗战,已经是和远东和平不可分离了。”“我们不要忘记,在决定时局动向的各种因素中,中国也是重要的一个。”

“要保卫南洋，首先得加强中国抗战，只要中国把日寇拖得半死半活，南洋根本就不会发生战争。”“所以我们认为保卫中国第一，保卫南洋第二，这不是我们华人自私的说法，为南洋各属打算，为英、美打算，亦是如此。”这些社论的诸论点得到当时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的赞同和响应。

继胡愈之以后，刘尊棋、张企程、蔡馥生等也陆续来到《南洋商报》，使编辑部的班底更加雄厚。《南洋商报》更进一步担负起引导海外舆论的重责，触角伸向华侨社会最敏感、最关切的各个角落，成为华侨观察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了解祖国的真实情况和国际局势的良好渠道，赢得了广大读者，尤其是华侨青年读者的心，因而销路大增，风行新、马，一时间跃居南洋侨报之首。同时，这一时期亦是南洋华侨爱国运动最活跃的时期，《南洋商报》的成功，使得其他华文侨报也竞相仿效，纷纷到国内聘请编辑，改造报纸。如应《总汇报》之聘而来的乔冠华和郑森禹，因英殖民政府的故意刁难，未能登岸，使《总汇报》大为遗憾。

胡愈之的老朋友俞颂华曾一度入主《星洲日报》，使《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这两家一向对立的竞争对手，一度出现团结融洽的气氛。后因国民党派了林霭民、潘公弼来接管《星洲日报》，俞颂华被迫离开星洲，返回香港主持《光明日报》。另外还有邵宗汉进入檳城《现代日报》，杨骚也由国内设法到新加坡南侨总会，主编《闽潮》，刘思慕拟去《光华日报》，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未能如愿。当时新华社在星洲建立了分社，生活书店也开了分店，许多当时在国内国统区的“禁书”，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在南洋却得以流传。总之，南洋成为向海外华侨进行抗战文化宣传的一个广阔

阵地,同时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利场所。

1941年12月7日,日本的炸弹轰炸到夏威夷美军的头上,接着12月8日,日本侵略的炮火也逼到新加坡英军面前。12月12日,名闻遐迩的英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被日本飞机炸沉。南暹、北马等许多地方先后沦陷,檳城、怡保、吉隆坡等城市相继被日本占领。1942年1月31日,英军从柔佛、新山撤退到柔佛海峡南岸的新加坡岛。新加坡立即成为“四面倭歌”的孤岛。值此危险时刻,陷于“孤岛”的文化界人士,仍然决心发动群众投入抗敌的热潮。经过紧张的磋商,立即成立了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参加的有文化界各方面的代表,以及郁达夫、王叔暘、沈兹九(胡愈之夫人)、王纪元、张企程、杨骚等。郁达夫为团长,胡愈之为副团长,张楚琨任组织部长,王叔暘任宣传部长,庄奎竞任训练部长。紧接着,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也成立了,陈嘉庚任主席,胡愈之任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郁达夫为执行委员。战时工作团搞得热火朝天,一面在炮火中培训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另外还组织演讲队、戏剧队、歌咏队,到群众密集的地方去进行抗敌宣传。《南洋商报》仍坚持每天按时出版。当英军无意防守的丑恶行径已明显暴露时,陈嘉庚提醒大家:“为免遭日寇的报复,务必设法迅速撤离这个随时准备举白旗的危城。”在陈嘉庚1942年2月3日乘船转移到苏门答腊的美德里港之后,胡愈之召集文化界战时工作团负责人开了二十分钟的紧急会议,大家决定迅速撤往苏门答腊丛林,于次日凌晨动身。1942年2月4日,胡愈之、郁达夫、邵宗汉、王纪元、沈兹九等20几人,乘一艘破旧的小电船,侥幸得以安全驶过布雷水域,到达苏门答腊丛林。1942年2月15日,



海对面传来新加坡沦陷的消息。从此，胡愈之等在当地华侨的掩护与帮助下，在苏门答腊的原始丛林中，隐埋名姓，以躲避日本特务和汉奸走狗的搜捕。他们在虎口中依靠素不相识的华侨的热情帮助，以酿酒、制肥皂、造纸来维持生计；同时，秘密地碰头、结社、聚会，等候着明天。经过辗转迁徙流亡，除郁达夫惨遭日本特务杀害外，其他同志和进步人士又艰难地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惊险岁月。这期间，胡愈之不但学会了印尼语，还写了一本《印度尼西亚语言研究》和中篇童话《少年航空兵》。

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底胡愈之等人返抵新加坡。从这时起，直到1948年3月他离开新加坡回到久别的祖国为止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领导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部，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斗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他也关注新、马兴起的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发展动向与华侨的地位和前途；他创办了《风下》周刊，并与陈嘉庚合作出版了《南侨日报》，以团结广大华侨反对美、蒋在中国发动内战，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同时协助“南侨总会”及陈嘉庚主席的工作，开辟规模更大的舆论阵地。

### 三、郁达夫主编《星洲日报半月刊》及写作活动

中国新文艺运动中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于1938年12月28日赴新加坡，接受《星洲日报》董事长胡文虎的聘请，担任《星洲日报》副刊《星洲日报半月刊》的主编。

新加坡是欧、亚、澳三洲海空交通的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华侨占当地人口70%多，有多种华文报刊，也有商务、中华、世界、生活等大出版机构的分店。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机构就非常重视对南洋华侨的抗日宣传活动。随着抗日战争形势

的发展,在国民党消极抗战、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面目日益暴露的情况下,国内文化界有一部分进步人士相继汇集到南洋,从事新闻、创作,展开抗日的宣传活动。

《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并列为新加坡两大华文报纸。

《星洲日报》出版的《星洲日报半月刊》创刊于1938年7月1日。它是一本综合性刊物,内容以时事评论和研究南洋的文化为主。郁达夫几乎每期都为半月刊撰写文章,内容以日本问题为主,有《南洋文化的前途》、《日本思想的中心》、《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作家》、《第二期抗战的成果》、《苏联与日本》、《从那里说起》、《日本的议会政治》、《关于抗战八股问题》等。

《星洲日报半月刊》自1939年6月1日第23期起开始增设《星洲文艺》栏,由郁达夫主编。原来1938年底,郁达夫到南洋后,即拟定计划准备在1939年3月间出版一本《文艺半月刊》,希望将南洋文化与中国文化作一个有计划的沟通。为实现他这一计划,他曾先后写信给在中国的许广平、成仿吾、丁玲、茅盾、戴平万和在香港的廖舒、楼适夷,以及国内其他作家聚集地,如上海、重庆、昆明、桂林、延安、迪化等地的友人,但终因国内虽有来稿,却很不够,加上纸源恐慌、成本昂贵等困难,只得改变初衷。自1939年6月1日起,将原拟出版的《文艺半月刊》改为与《星洲日报半月刊》合并,增加篇幅,另立《星洲文艺》专栏。

郁达夫主编的《星洲文艺》专栏共7期(从23期到29期),他自己发表过八篇文章,有1939年6月1日第23期的《星洲文艺发刊旨趣》、《回忆鲁迅》,1939年6月30日第25期的《回忆鲁迅》,1939年7月16日第26期的《抗战建国中的文艺》,1939年8月1

日第 27 期的《回忆鲁迅》，1939 年 8 月 17 日第 28 期的《语言及翻译》，1939 年 9 月 2 日第 29 期的《写作的内容》。

郁达夫除了编《星洲文艺》外，还负责其他三种副刊，这里指《星洲日报》的纯文艺副刊《晨星》和《文艺周刊》，以及《星洲日报》晚报《繁星》。后来，《星洲日报》还出版大型《星光急报》，每月一册，其中文艺栏也由郁达夫负责。

《星洲日报》借重郁达夫的名气，对读者有很大的号召力。郁达夫所编的副刊中，以《晨星》为最重要，它在早期新、马文学发展上有过极大的影响力与贡献。《晨星》创刊于 1922 年，郁达夫是 1939 年 1 月 9 日接编该副刊的。他首先写了一篇《晨星的今后》，以表明他要在新、马提倡文艺、培植提拔作家的决心。郁达夫这样写着，也是这样做着，他编了两个月的副刊后，又写了一篇《看稿的结果》，指出当地作品的笔法“太呆板”，要求作者多读、多写、多想、多改。他两个月所看的稿子，长短大小总计已有 1000 篇的数目，而且他看稿很用心，积极选取好作品，鼓励新作者，很喜欢提拔后进的写作者。

郁达夫除了得到以前那些文化界同行的继续支持外，还吸收了大批新人。此外，郁达夫还非常注意中外文化交流，经常发表中国名作家的作品，借以启发本地作者和沟通两地的文化。

郁达夫在新加坡不是一个过客，三年间他对新、马文学以及社会文化的发展，对新、马文化界的鼓励，都起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由于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声誉，又喜欢作诗词，正如他自己所说“偶吟哩句，南洋诗人和者如云”，因此深为当地文人所欢迎。凡文化圈子的活动多半请他参加，而且被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推销人。郁

达夫在新加坡三年，所写的诗词、书评、论述、游记等至少也有1万多篇，给当地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1939年著名画家徐悲鸿去新加坡，当时新华抗日赈筹会在3月替他举行画展，郁达夫在主编的《晨星》上出一专号，做介绍宣传工作；刻印家张斯仁去新加坡，他写了“印人张斯仁先生”予以介绍；1941年为著名画家刘海粟在南洋为国家筹集赈款而举办星华义赈画展的目录作序，并介绍了刘海粟的生平；1941年诗人杨骚南来，他又写《杨骚的南来》。现在还在继续活动的南洋学会，创立于1941年，郁达夫便是发起人之一。他为了南洋学会出版之《南洋学报》创刊号，特地写了一篇有学术味道的《马六甲游记》，对马六甲的历史名胜考证甚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开始从北马向南马进攻。郁达夫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他不但帮助新加坡英政府新闻部主编《华侨日报》宣传抗日，而且担任文化界战士工作团主席、文化界战时干部训练班主任，以及南洋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兼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等。

当时战争形势已经很危急，郁达夫本来可以提早离开新加坡，但他只把儿子郁飞先送回祖国，自己却毅然留下，与其他文化界人士尽力工作到最后关头，才前去当时荷属的印尼。从此，他几经艰险颠沛流离，1945年9月，不幸被日本侵略军枪杀，时年50岁。

## 第五节 从《新知周刊》到战工队

在抗日战争时期,缅甸是英、美盟军在亚洲大陆的南翼屏障之一,当时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又是美国向中国运输抗战物资的唯一陆上通道——滇缅公路的基地。保卫滇缅公路,对保卫中国的抗战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37年抗战爆发后,缅甸各地华侨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纷纷成立了包括工人、店员、妇女、学生、教育界、文艺界、音乐界和工商界等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广大侨胞支援祖国抗战。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精心安排下,一批国内的进步文化界人士疏散到缅甸,其中有张光年、徐迈进、刘惠之、李凌、赵汎、毕朔望、任以沛、黄雨秋、魏磊等。他们在缅甸一方面积极协助当地华侨发展进步教育事业,举办社会科学讲座,开展文艺活动,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以推动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相继创办了《新知周刊》、《侨商报》、《新音乐》等进步刊物。这几个刊物在当地是完全崭新的文化阵地,它们将抗日救国思想的火炬和祖国人民的战斗信息进一步传播到全缅甸各地的华侨大众中间。这几个刊物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新知周刊》,它是在缅甸首都——仰光出版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民主、团结、进步,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政治、文化综合性刊物,与缅甸另一大城市曼德勒由刘惠之等主持创办的《侨商报》互相呼应,当时在华侨社会赢得广大读者的支持,在

缅甸人民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新知周刊》于1941年初创刊，它由著名诗人、作家张光年主编。《新知周刊》是16开本，每周出版一期，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革命性，内容丰富多彩，包括社论、短评、国际时事述评、新闻集锦、当地抗日救亡运动简讯、通讯报道、诗歌和散文等。文字形式多样，但主题以反对日本法西斯对东南亚安全的威胁，支援中国抗战为中心。主编张光年一心扑在编务上，呕心沥血，勤奋耕耘，从创刊号到最后一期，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的文章，例如通俗性、系列性的“文学讲座”、政治评论、杂文等。从国内疏散到缅甸来的一批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也经常供稿，缅甸各地读者的来稿也源源不断。《新知周刊》以它丰富的内容、较高的文字水平吸引着广大的读者。按当地华侨社会的现实来衡量，《新知周刊》的发行量是可观的，很快就由最初的八九百份激增至2000至3000份。它的读者不仅是华侨，而且遍及缅甸各地各阶层人士，它的影响深入到缅甸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抗日救亡的力量不断地增长壮大。虽然《新知周刊》出版发行过程中也曾遇到敌伪干扰破坏等逆流，但当地人民抗日救亡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新知周刊》总共出了25期，从创刊开始到1941年底仰光遭日军大轰炸而被迫停刊为止，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它在广大读者中，特别是在青年读者中，播下了爱国抗日的火种，为稍后出现的缅甸华侨抗日救亡组织——“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法西斯悍然把侵略的战火扩大到南洋。为了保卫缅甸、保卫祖国西南边疆，必须尽力号召动员当地华侨和缅甸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张光年等联络

仰光各华侨组织的骨干,于1941年12月中旬开始酝酿成立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以下简称战工队)。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一些华侨中的积极分子、爱国僧侣、文化人士中的热心分子,自动集合在“战工队”的横幅旗帜下上街游行、喊口号、散发标语、参加街头讲演。

1941年12月底,仰光连续两次遭到日机猛烈空袭,市民死伤惨重,英国殖民当局的一切行政机构和城市交通均陷于瘫痪,居民纷纷疏散逃难,英国军队仓皇撤离,刚筹建起来的“战工队”遂不得不迁往曼德勒。1942年初,战工队在曼德勒、眉苗、腊戍及其他城镇活动起来。

曼德勒是缅甸的故都和第二大城市,也是当时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国民党第五军)抗日的主要战略基地。这里的华侨进步组织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上层统战工作做得较好。当时刘惠之、毕朔望和华侨文化界老前辈黄绰卿、黄望远等创办的《侨商报》已在这里问世,对于推动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当地爱国华侨已成立了缅甸华侨战时服务团(以下简称战时服务团),成员包括有粤、滇、闽籍各界爱国知名人士,团长为粤籍侨领曹忠楼,团务由秘书张培道负责。战工队来到曼德勒后,就成为战时服务团属下的一支队伍。1942年1月间,战工队又增添了来自仰光和勃生等地的一批侨团骨干,队员人数发展到70多人,于是正式举行战工队成立大会。它是一支革命的华侨青年的文化宣传工作队,也是一支进步的抗日的战斗集体,一切活动经费均由当地爱国侨胞捐助。

战工队领导由队委六人组成,他们是张光年、魏磊、李凌、赵沅、郑祥鹏和黄雨秋。张光年为总领队,魏磊为队长。李凌和赵沅

任音乐指导。战工队下设两个分队，第一分队负责宣传演出，第二分队负责后勤和安全保卫。

战工队的队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国内进步文化界人士，有来自仰光、曼德勒及上下缅甸其他城镇的中小学教师、店员、职员、工人、报刊编辑、记者、文艺工作者，还有许多正在中学读书的青年学生。在平时，队员除学习国际时事和政治理论外，大部分时间就忙于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印发中、英、缅文的《战工队成立宣言》和抗日标语、传单、绘画、海报，准备宣传材料和展览图片，自制舞台灯光道具，排练演出节目等等，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具体活动。排练的主要节目是《黄河大合唱》、话剧《团结起来》和小歌剧《黄花曲》。《黄花曲》是张光年（曾用名光未然）在国内的旧作（由田冲谱曲），歌颂妻子送丈夫上前线抗日。《团结起来》是张光年在战工队成立之后创作的，内容是揭露日本法西斯的野蛮暴行，号召中、缅、英、印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战斗，消灭侵略者。经过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战工队就在这座宁静的缅甸故都曼德勒，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宣传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热潮。

1942年2月初，战工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除了战工队队员和当地侨领们及几家侨校的师生外，许多缅甸僧侣和青年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游行队伍高举旗帜和抗日标语，并用华语和缅语高呼口号，沿途还张贴和散发用中、缅、英文印刷的标语传单。嘹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撼人心。每到一个比较热闹的地区或十字路口，战工队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日寇暴行录》的大量图片挂出来，并对围观的群众举行演讲会，由队员用缅文朗读《战工队成立宣言》和发表演说；缅甸的进步文化人士、爱国



的僧侣和青年也慷慨陈词,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在演讲的间歇时间,战工队又向群众演唱和教唱陈杰夫(进步华侨知识青年)用缅文填词的抗日歌曲《保卫缅甸》和《消灭日本法西斯》。

1942年春节,战工队在曼德勒的云南会馆的旧式舞台上连续举行三天会演,招待华侨和缅甸僧侣及各界人士,演出的主要节目是《黄河大合唱》。这一节目首次在缅甸演出,由词作者张光年亲自担任朗诵,赵汎、指挥,李凌负责舞台监督和乐队指导。尽管由于条件限制,乐队比较简陋,只有打击乐器和小提琴、笛子等少量乐器,但队员们情绪饱满,演唱认真,配上恰到好处的灯光效果,演出获得成功。《黄河大合唱》以其磅礴的气势、充满革命激情的歌词和雄壮优美的曲调博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在当时轰动了曼德勒。

在曼德勒演出结束后,战工队于2月下旬出发到眉苗、叫脉、西保、腊戍、实皆等上缅甸重要城镇进行巡回宣传演出。《黄河大合唱》、《团结起来》、《黄花曲》等节目,都受到普遍赞赏,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在叫脉和西保演出时,应当地闽籍侨胞的要求,临时增加了用闽南话演唱的民歌和抗战歌曲,更使听众备感亲切。

缅甸人民一向以能歌善舞而著称,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华侨,自然受到他们的熏陶。在缅甸,华侨聚居的大小城镇,普遍都有自己的学校,一般从小学开始都设有用简谱教授的音乐课,所以华侨青少年学生一般都识简谱,喜欢唱歌。另外,华侨创办的中文报刊,是向关怀祖国和家乡的海外赤子传递家乡信息和传播爱国思想的重要媒介。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孙慎的《救国进行曲》,黄自的《抗敌歌》,冼星海的《救国军歌》、《黄河之恋》、《流民三千万》,贺绿

汀的《心头恨》，何安东的《奋起救国》等抗战歌曲很快在华侨中流传开来，他们组织起华侨歌咏团和合唱团，在华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战工队正是以一批缅甸华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战工队的建立，又为缅甸华侨培养了一批文艺宣传骨干，使缅甸华侨民主进步的爱国歌咏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更高阶段。

战工队从坚持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原则出发，对英军当局和开抵曼德勒协同英军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很注意团结和支援工作，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战工队在巡回演出的第一站眉苗，就专门举行慰劳英国军人的专场演出。尽管节目都是用华语说唱，但在演出前，用英语作了简要介绍，这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意外的宣传效果。《黄河大合唱》雄壮激昂的歌声和《团结起来》的通俗情节均为观众理解和欣赏，演出后，英国军人都起立热烈鼓掌表示感谢。战工队这次外出巡回演出，均由曼德勒英军当局免费提供运输工具。中国远征军初抵曼德勒时，因语言有困难，战工队就提供缅文、英文翻译，帮助他们同当地有关方面和英军当局联系后勤支援等问题，受到远征军的赞赏。战工队到腊戍时，也为远征军举行了慰劳演出。3月底，战工队结束巡回演出返回曼德勒时，听说附近的战地医院有一批远征军伤病员，就携带慰问品专程到医院慰问，并为他们表演一些小型文艺节目，使远征军官兵深受感动。

1942年4月3日，日军飞机突然对曼德勒进行疯狂的轰炸和交叉扫射。战工队的驻地——云南会馆也成为敌机袭击的目标之一，致使三名队员不幸殉难，两名队员受重伤。敌机的突然疯狂轰

炸,使缅甸战局迅速恶化;《侨商报》当时也被迫停刊。日军轰炸以后,曼德勒城市陷于一片混乱,瘟疫流行,人心惶惶,当地居民和侨胞纷纷疏散,迫使战工队不得不作出撤离曼德勒的决定。除一小部分队员护送两名重伤员到缅北重镇密支那疗养外,其余大部分队员乘船前往缅北另一重镇八莫。原来计划以八莫为基地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然而战局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使原计划无法实现。日军在占领缅甸首都仰光和缅甸重镇东坞之后,立即向北推进。战工队到达八莫仅仅几天,当地侨胞又星夜往云南方向逃难,战工队遂作出有组织地分批撤退回国的决定:一部分队员先从八莫和腊戍乘汽车回云南昆明,其余大部分队员立即前往密支那,以便同那里的小部分队员和伤员会合。不料他们刚到密支那,就传来腊戍、曼德勒和八莫相继沦陷的消息,形势更加不利。全体队员连同伤员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多次战胜了死亡的威胁,于5月底才到达瓦窑,然后分乘由华侨领袖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派来的汽车回昆明。战工队的队员,除队长魏磊和少数队员不幸牺牲外,大部分安全抵达昆明。

战工队在缅甸的抗日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虽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在缅甸人民和华侨以及在英军和中国远征军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不少有关战工队的文章和消息,英国路透社也曾作为一项重要新闻报道战工队在缅甸的活动。

## 第六节 抗战戏剧史上的一次海外“长征”

金山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从30年代起在剧坛上即以其表演艺术逐渐成名,编导并参加演出过许多剧目。

王莹是30年代成长起来的在戏剧、电影、文学上都有卓越成就的表演艺术家。她在剧坛、影坛和文坛上,几乎是同时成名的。当她被称为“电影明星”、“女星英杰”时,文艺界就有人称她是“作家明星”了。

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在夏衍、于伶等的直接领导下,洪深与金山组成了“上海演剧第二队”,王莹是该队的主要演员。在武汉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郭沫若、田汉、夏衍、阳翰笙等都看过金山和王莹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剧目。在国民党第五战区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策划与资助下,经周恩来、董必武的决策与指导,将“上海演剧二队”从组织上调整、扩大并改名为“中国救亡剧团”,金山为团长,王莹为副团长。1939年,经李宗仁、白崇禧的倡议并得到周恩来的赞同,“中国救亡剧团”被派往南洋进行巡回筹赈演出。

1939年4月下旬,由金山、王莹率领的“中国救亡剧团”到达香港,一面进行筹赈演出,一面待机准备赴南洋。但在香港的演出活动遭到日本特务和汪伪汉奸的破坏捣乱。金山、王莹等率全团在香港排除万难,进行抗战宣传与文化交流。在紧张地完成了演出筹赈任务后,便立即冲破日汪特务设置的种种障碍,分三批秘密从香

港去当时的法国殖民地越南。全团在越南西贡会合后，暂时住进当地的福建公所，开始全力准备筹赈义演活动。

日汪特务像凶恶的猎犬，不久追踪到西贡。日本驻越南大使馆也如临大敌，向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妄图破坏剧团的公演。几家汪伪派系的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剧团的文章，甚至在茶馆酒肆里，也布置汪伪党羽，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恶毒诽谤。一时间，反动气焰甚嚣尘上。面对敌人的谣言攻势，剧团成员个个气愤难忍，有人主张写文章辟谣，批驳敌人的诬蔑。王莹沉着冷静地告诉大家：“我们第一要义是争取尽快公演。我们的有力武器，不是跟他们在这里打笔墨官司，而是用戏剧为武器，在舞台上用血写的事实来唤起广大侨胞参加到抗战营垒中来。只要我们的公演成功了，敌人的谣言就破产了，才会给他们以沉重打击！”广大爱国侨胞对日汪特务合伙围攻剧团的卑劣行径也都义愤不平，纷纷给剧团写来慰问信，许多人拿着汪伪派系报纸，当着剧团撕得粉碎。几家越南进步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伸张正义。

为了筹备演出，王莹和剧团团员分工几乎遍访了西贡的大街小巷，从这一侨胞家走到那一家，从这一个侨团组织走到另一个组织。在越南救国会及总商会、各侨团、侨领的广泛支持下，经过一个月的筹备，最后以十大侨团统一战线的联合形式，主持了剧团的隆重盛大的筹赈义演。义演在西堤的中国大戏院举行，剧目是《鲁南之光》（《台儿庄之战》）。开演前两个多小时，剧场早已爆满，门前买票的人拥挤如潮，剧一幕接着一幕地演着，观众都凝神静气地看着，日本侵略军在台儿庄对中国人民的暴行，激起了观众的强烈义愤。当演出进行中，在日伪的压力下，法国殖民当局的一名官员出

面干预,粗暴地喝令停演。全场观众愤怒站立起来,横眉怒视着法国官员。在一触即发的鼎沸的情绪中,经过王莹的一番巧妙的对答斗争,使得这个法国官员无计可施,狼狈离去。义演继续进行,博得全场经久不息、排山倒海的欢呼,口号声不断。这是发自千万颗中国心的雷鸣!王莹和剧团团员流着激动的眼泪,他们当时感受到这里似乎不是舞台和戏院,他们和侨胞也不是演员和观众,好像是在汹涌的大风大浪里同舟共济的患难弟兄和战友。

第一个晚上演出的难关胜利闯过以后,金山、王莹率领的剧团一连公演了16天,周一至周六每天日夜两场,星期天连演三场。演出剧目除《鲁南之光》外,还有多幕剧《正义万岁》、独幕剧《保卫祖国》等。在几十场的演出中,观众多达四五万人次。

中国救亡剧团的演出,在越南侨胞中燃起了熊熊抗战怒火,博得了越南人民的同情,成功地进行了抗战宣传与文化交流,同时使日汪特务的破坏阴谋彻底失败。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同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殖民当局在越南宣布战争紧急法,西贡笼罩着战争乌云。法国侨民急忙疏散,整个西贡人心惶惶。金山和王莹领导的筹赈义演无法再继续下去,决定撤离越南,分两路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开展筹赈义演活动。日本和汪伪特务并不甘心在越南的失败,他们暗中监视剧团的动向。王莹深知,由于欧战的影响,日汪特务的破坏将会更加疯狂。王莹自告奋勇率领部分团员作为全团的先遣队向新加坡进发。

1939年9月25日,王莹率领的先遣队共6人,抵达新加坡海港。英国殖民当局先是不让他们上岸,经过一再与英国海关进行交

涉,决定王莹作为代表只身上岸,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南洋侨胞筹赈祖国难胞总会,会见了陈嘉庚。王莹向他说明了中国救亡剧团来南洋的目的。陈嘉庚正在华侨中为筹赈祖国难民、支援祖国抗战而奔波操劳,他对王莹率先遣队来新加坡筹赈义演的爱国热忱极为赞赏,当即亲自陪同王莹去与英国海关当局谈判,英国海关的官员终于同意王莹等6人上岸。

1939年9月30日,金山又率剧团的其他全体团员从越南出发,同年10月2日到达新加坡海港,英国的海关官员又不准他们上岸,交涉未成,只好又返回越南。这样,中国救亡剧团被一分为二,隔海相望。虽经王莹多方周旋,想方设法为金山他们办理入境手续。但是,由于日本大使馆屡次向英国殖民当局递送抗议照会,百般施加压力,再加上汪伪势力从中作梗,英国殖民当局对金山等人入境之事,一拖再拖。王莹的先遣队在星洲只好被迫艰辛等待。

1940年3月初,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团启程以前,新加坡广大爱国华侨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王莹等6人为了表达对侨领陈嘉庚及其慰问团的敬意,在欢送会上献演了独幕剧《贼》、《反纳粹》、《放下你的鞭子》,他们每个人都扮演了两三个角色,还要兼管各种剧务工作,忙得团团转,但演出获得了成功,受到陈嘉庚和爱国华侨的热烈称赞。

经过王莹与英国殖民当局多次谈判,在南侨总会、星洲华侨筹赈会的多方支持下,英国殖民当局最后不得不批准金山等人入境。1940年4月全团终于在椰风蕉雨的新加坡团聚了。全团20多人立刻举行了欢庆团圆大会,商讨了活动计划。为了便于开展宣传工作,决定将中国救亡剧团改为新中国剧团,由王莹等人起草了申请

报告,送交当地政府审批。又经过各方面的支援和努力,当地政府于同年6月6日批准了他们的申请,并同意他们演出7个独幕剧《贼》、《反纳粹》、《放下你的鞭子》、《为自由而斗争》、《鬼夜哭》、《婴儿劫》、《人若黄花》和两个多幕剧《塞上风云》、《台儿庄之战》。于是他们制成了自己的团旗,召开了新中国剧团成立大会。南侨总会和星洲华侨筹赈会的代表和当地侨领都光临祝贺。王莹代表全团起草并宣读了决心书《我们的信念》。

金山、王莹和战友们,高举着新中国剧团的旗帜,开始了为抗战筹赈义演的一次戏剧史上的“长征”。在南洋两年的筹赈义演活动中,他们顶着烈日,冒着风雨,以披荆斩棘的锐气,坚韧不拔的韧劲,冲破千难万险,跋涉万水千山,走遍南洋的新加坡、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柔佛、吉兰丹等许多地方的近百个大小城镇,行程约两万多华里,在各地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战爱国热潮。剧团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欢迎,当地侨胞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和庆功会。南洋的一些报刊赞誉该剧团为抗战戏剧战线上的一支铁军。侨胞们把写有“抗战铁军”、“抗战劲旅”、“抗战楷模”的锦旗赠给该团。侨领所发表的演说或献辞及王莹的答辞,都洋溢着情真意切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王莹在工作繁忙之余,还兼任马来亚国民文学协会主席、马来亚国民抗敌戏剧协会导演和《南洋商报》特邀通讯员。在紧张的演出间隙,她为《南洋商报》撰写了几十篇报告文学,在该报以《长征杂撰》为总题目,连载了近一年时间,全文多达二三十万字,其中的小题目有《离星以前》、《我们在新山》、《在岑株巴辖》、《我们在居銮》、《永远光辉着的麻坡》、《马六甲的新精神》等等。在每一题目



下,王莹都满怀爱国激情,记叙了新中国剧团在各地演出的盛况和侨胞们热烈献金的动人场面。

该团演出的剧目,与上报英国殖民当局的剧名有所调整,演出最多的是《永定河畔》、《为自由和平而战》、《贼》、《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云》等。

该团演出的抗战戏剧,在南洋各地起了巨大的宣传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广大爱国侨胞抗战救国的热潮。在星洲、新山、马六甲、岑株巴辖、麻坡、昔加挽、居銮等地,都掀起了筹赈献金高潮,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献金事迹。

在两年的筹赈义演中,全剧团筹集的款项及各种物资、器材、药物、金银首饰等共计 3000 多万美元。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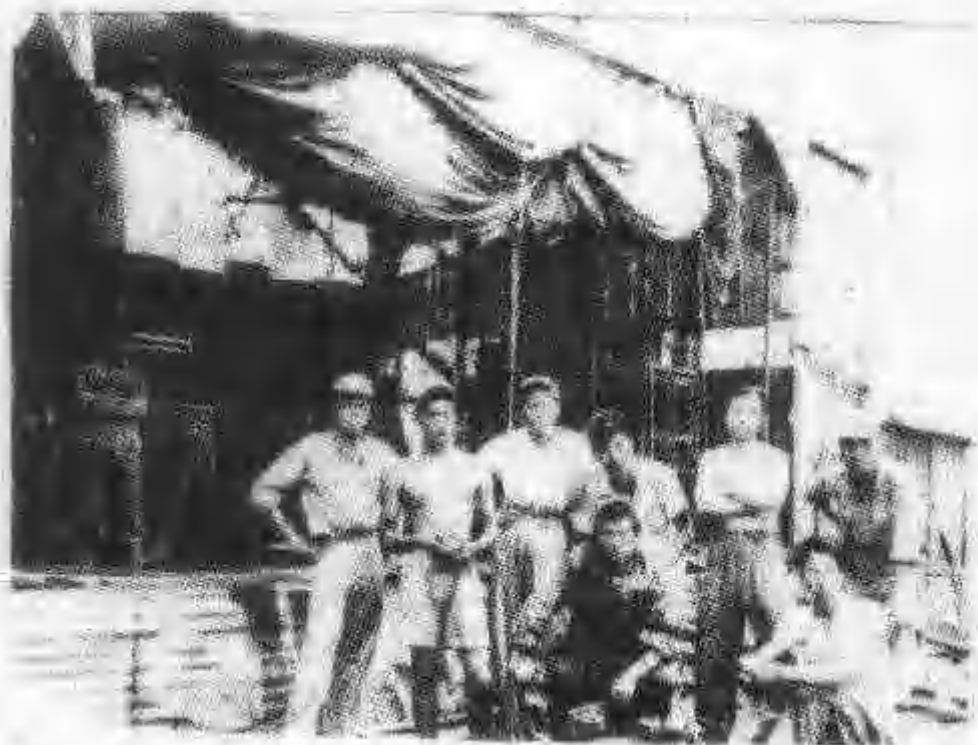
在南洋各地近两年的巡回筹赈义演中,新中国剧团受到海外侨胞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南洋的华侨报纸、当地的进步报刊都辟专栏和专版,刊载该团的义演情况,盛赞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劳苦,奔波海内外,为国效力”的高贵品质。有些华侨报纸报道说,“侨胞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希望,得到了教育,受到了鼓舞。”

1941 年暮春,金山、王莹率领新中国剧团,载着巨大的胜利,从新加坡回到香港。1941 年 6 月,王莹回到重庆后,立即向白崇禧作了详细报告,并很快在郭沫若家里向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汇报。周恩来高度赞扬剧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表扬他们为祖国抗战事业立了一大功,也为祖国、为民族争了光,勉励他们再接再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多做贡献。

1941 年 8 月,王莹返回香港。此时王莹他们的新中国剧团和



1941年10月，旅港劇人在香港公演《霧重慶》后合影。



1945年6月，演劇五隊在緬甸密支那裝置舞台時留影。



一批由国统区撤往香港的文艺界人士组织的中国旅行剧团在香港会合了。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战戏剧运动,在廖承志、夏衍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新的话剧组织——旅港剧人协会。但由于英国殖民当局的法律限制,剧人协会一时难以被当局批准。他们就决定只对内,不对外,对外则称“旅港剧人”。王莹是协会的主要演员,参加演出了以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为内容的《雾重庆》和以揭露希特勒摧毁文化、教育、科学的著名话剧《马门教授》等剧目,在香港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

两年前,金山、王莹在香港的戏剧活动,曾使这里出现过话剧热,但是,他们走后,又很快冷场了。旅港剧人协会的成立及其演出,很快使香港的戏剧界又热闹起来,香港的抗战戏剧运动又开始发展起来。作为香港剧运开拓者之一的王莹,又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香港话剧运动的振兴,做出了新的贡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香港全岛沦陷。廖承志领导下的地下党组织,用尽一切办法,保护金山、王莹等人的安全。1942年1月29日黎明,金山、王莹随同其他一批文艺界人士离开香港,安全返回内地。

---

## 第七节 抗战文艺的国际交流

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救国运动的洪流中,以反映抗日救国这一重大政治内容,为抗日斗争服务的抗战文艺也随之兴起。文艺上呈

现出异彩纷呈、百花竞放的可喜景象,老作家经受了锻炼,新作家纷纷涌现,造就了一大批文艺人才。文学作品的丰盛,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的创作和演出活动,比战前并不逊色。这一时期,无论是文艺团体的组建、文艺刊物的创办,还是文艺集会、文艺演出,总的是以动员民众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为主旨。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建立,标志着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在抗战救国的旗帜下,集合了全国不同阶级、不同政见、不同艺术流派的作家。尽管在世界观、文艺思想和文艺方法论上,大家有着各自的特点,然而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目标——抗敌,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抗战文艺的形势与战前有很大的不同,当时大致存在着三个地区的三支文艺队伍:一支活跃于延安以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支活跃于国统区,主要是重庆、桂林、昆明等地,还有一支活跃于上海“孤岛”、沿海、沿长江的一些城乡以至香港等地。队伍虽然分散,但中心却只有一个,就是都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和间接的领导下。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统区的桂林,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地位,当时桂林一地集中的文化人士就有1000多,其中闻名全国的就有近200人。创办的小说、诗歌、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和各种文艺团体十分活跃,开办的出版社、书店有179家,印刷厂109家,共出版发行各类杂志近200种,报纸从原来1家增加到11家,专著的出版也十分可观。除了自然科学和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专著以外,仅文艺专著就出版了1000多种,文艺丛书有50套之多。当时,一般报刊发行量均达到2000—3000份,有的达到1万多份,销往全国(包括港澳)各地,远至南洋。桂林这个小

城市,集中了这么多文化人士,能出版发行这么多的报刊和专著,在国内是罕见的,因此,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被誉为“文化城”,当时除了抗日根据地延安和国统区的重庆以外,桂林在一个时期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国统区范围内抗战文艺最主要、最活跃、最有成效的中心阵地。

抗战文艺的发展,从纵的方面看,由于在战争的形势下,不但要求文艺工作者同群众密切联系,奔赴前线,深入民间,更有效地为抗战服务,同时也为新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促进了文艺与群众相结合。五四以来就一直在进行探索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化问题得以真正的实践,这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在抗日战争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一开始便肩负着以文艺为武器教育群众和动员群众的伟大使命。从横的方面看,不论从地区上如何被分割,所处的环境如何不同,在延安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国统区各地,以及当时沦为“孤岛”的上海,同英、美的远东前哨的香港地区以至南洋、苏联、欧美一些国家,都有着数不清的实质的和精神的联系。政治上如此,经济上如此,文化上也如此。如文艺方面,有书刊的交流,有作家、艺术家的来往,有文稿的互投,有文艺问题相互讨论等等。自然这些交流当时在数量上比较有限,但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例如,《文艺阵地》这个由茅盾主编的重要刊物,不仅在香港编,还在上海“孤岛”编,也在内地编。上海“孤岛”出版的《鲁迅全集》和翻译出版的斯诺的《西行漫记》、金人译的《静静的顿河》、梅雨译的《对马》、曹靖华译的《油船德宾特号》等名著的流入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以及海外,延安和国统区出版的抗战书刊流入香港和上海“孤岛”及世界一些国家等等,所反

映出的地区之间、中国和世界一些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千丝万缕、非常密切的。

### 一、中国文艺界和世界文艺界的联谊与交往

早在抗战初期,中国抗战文艺就得到国外文艺界特别是苏联文艺界的注意和重视,那时,苏联的《国际文学》杂志对中国的抗战文艺十分支持。《国际文学》是用俄、英、法、德等几种文字出版的,它的主编罗科托夫曾写信给中国中苏文化协会,并通过塔斯社驻中国记者罗果夫同中国中苏文化协会联系,征集中国作家撰写关于中国抗战文艺的论文,编印中国抗战文艺的专号,茅盾、老舍、卢冀野、曹靖华等均有作品应征。

苏联有不少人研究中国的抗战文艺。例如,在费德林、关德林等学者写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论著中,都谈到抗战时期的文艺。50年代苏联有位研究人员马尔科娃,还写过一本《中国抗战期间的诗歌》。近一二十年来,欧美各国和日本研究中国抗战文艺的人就更多了。1980年在巴黎、1982年在香港都召开过中国抗战文艺问题座谈会,这一再说明抗战文艺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引起重视的问题。

抗战期间,中国和外国文艺界的交往、文艺作品的交流从未因战争环境中断过。

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从抗战一开始,就得到不少外国著名作家和记者的支持,如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又如翻译鲁迅作品的苏联记者罗果夫,再如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就参加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全国文协)1938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成立大会,并都

为“全国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写稿。稍后的日本反战作家、世界语学者绿川英子、英国诗人奥登和作家伊修乌德也积极撰写文章参加中国的抗战宣传工作。此外，苏联的电影摄影师和作家卡尔曼，荷兰的电影摄影师伊文思，他们都到中国访问过，并用他们的笔或他们的摄影机记录了中国抗日战争中许多可歌可泣的情景。

抗战时期的重庆，当时属于全国性的旨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国际文化团体多达二十余个，其中较有影响的如中苏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中德文化协会、中波文化协会、中印文化协会、中缅文化协会、东方文化协会等。这些协会通过举办各种纪念会、欢迎会、演讲会、讨论会、放映电影、演奏音乐及举办图片展览等活动，在促进有关抗战和反法西斯的斗争以及其他文化交流上均有一定的影响。各个协会一般都设有图书馆，都藏有一定数量的中外文报刊和书籍，定期举行学术讨论和专题研究，展览艺术作品，与对象国交流书刊以及出版刊物等。每个协会通过图书馆这一渠道加强与群众（包括外国的许多文化人士）的经常联系，其中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比较活跃，联系群众比较广泛。

“全国文协”是继“左联”之后，在全民抗战的新形势下建立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它先后在成都、香港、昆明、曲江、桂林、贵阳、延安、晋东南等地设有分会。“全国文协”一成立即发表了告全世界文艺界书，表明了团结抗战、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坚定目标和信念，盼望全世界中国之友的文艺家给予同情和赞助，并于1939年初在重庆成立了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加强了同外国文艺界的联系，还特别同苏联的作家开展了广泛的通信关系，如托尔斯泰、



马尔夏克、西蒙诺夫、戈尔巴托夫、爱伦堡等都有信给中国作家。在这以前,1938年11月,戈宝权、葛一虹等曾发起组织中苏文化研究会,并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取得联系,就苏联的文学、美术、戏剧、电影概论为题组织了座谈和讲演;另外,1944年春叶君健应英国战时宣传部的邀请去英国作战时宣传工作和文化交流活动;郭沫若1945年访苏,曾在苏联作过关于中国抗战文艺的讲演。1946年初,老舍、曹禺应邀访美讲学和1946年11月茅盾应邀访苏,对加强中苏、中美、中英的文化交流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各国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心灵是息息相通,相互声援的。1939年4月,“全国文协”在致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作家电中这样写道:“……代表着为世界的和平、进步和中国的平等、自由而牺牲奋斗的全中国人民对于用政治的行动或文化的工作为反抗法西斯侵略而努力的诸君,我们致送诚恳的谢意;对于被法西斯侵略者屠杀和禁锢的各国的作家和艺术界人士,我们致送真挚的同志的哀悼和慰问!”

当1940年8月19日日本侵略军肆意狂炸重庆和其他不设防城市时,“全国文协”向苏联托尔斯泰、法国罗曼·罗兰、美国屈莱梳、英国威尔士、印度泰戈尔转全世界作家致书指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已在血火中获得新生,团结一致,奋斗到底,日本法西斯盲目轰炸的威胁,断难动摇我抗敌的决心,中华全体文艺作家,莫不深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现将敌人可耻的暴行,公诸于全世界作家之前,以期同予谴责与制裁。”

1941年11月28日,重庆诗歌界50余人致书苏联诗人与人民,表示:“我们完全同意你们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号召;同法



1940年,重庆中苏文化协会聚会时合影。



西斯蒂讲话,要用烈火代言词,用刺刀代唇舌,用子弹代讽刺”。“我们向苏联人民,伸出热烈的友谊的手,让我们抗战的歌声互相穿过世界的屋脊,让我们手携手地打(击)人类中的丑类,那东方西方的野兽吧!”签名者有冯玉祥、郭沫若、田汉、冰心、老舍、冯乃超、长虹、穆木天、胡风、王统照、姚蓬子、戴望舒、安娥、艾青、臧克家、袁水拍、何其芳、常任侠、田间、力扬、林林等。

中国文化界和中国人民一向崇敬对人类做出过显著贡献的世界著名文化伟人。抗战胜利前后,在延安、重庆等地都为高尔基、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等世界著名作家的逝世举行过多次纪念活动。

高尔基(1868——1936)是中国人民深知的苏联文豪,1937年6月到1946年6月,延安和重庆等地的文化界曾先后多次举行了纪念高尔基的集会和宣传。毛泽东、朱德、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在延安出席并先后讲话;在重庆冯玉祥、周恩来、郭沫若、老舍、聂绀弩、戈宝权、张骏祥、舒绣文等出席讲话。

托尔斯泰(1883——1945)是中国人民所熟悉和尊崇的苏联著名作家。他的逝世引起中国人民深切的悼念。1945年3月6日,在延安,毛泽东收到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吉洪诺夫发来的讣电后,当即复电谨致哀唁。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亦致电哀悼。1945年4月,重庆文化界1500多人参加了悼念这位反法西斯战士、人民作家的大会,邵力子、郭沫若、曹靖华及苏联代表特洛雪也夫到会并分别讲话。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著名作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是一位为世界永久和平而斗争的战士。他逝世后,陕甘宁边

区文协发出唁电；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出了两期专刊，刊登了延安文艺界撰写的悼诗和纪念文章；重庆《新华日报》出了追悼罗曼·罗兰特辑；重庆文艺界还举行了追悼罗曼·罗兰大会，参加者有各国使节和各界人士千余人，于右任任主席。于右任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罗曼·罗兰先生苦难的一生。郭沫若代表“全国文协”朗读悼词。

1945年1月，在延安还举行过为世界著名画家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庆贺活动。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消息传来，延安美术工作者都很高兴，于1945年元旦在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毕加索画展，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枯曼（胡蛮）的文章《庆贺名画家毕加索加入共产党》，文章介绍了毕加索的创作及思想发展过程。毕加索为西班牙画家，1904年在他23岁时移居法国巴黎，是法国现代画派的主要代表，他的作品对现代西方艺术流派有很大影响。1944年他参加了法国共产党。1945年3月18日《解放日报》登出毕加索的《我为什么加入共产党》一文：“我加入共产党，是我的生活和工作的逻辑发展，入党使我的生活和工作有了意义。我认为，最真实的、最公正的、最好的，就是最美的。在敌人压迫和人民起义的时候，我觉得必须不仅要用图画来作战，而且要用整个生命来作战。我入党后，感到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自由、更完整。”毕加索是公开反对纳粹德国的艺术家，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人劝他到美国去，但他坚持住在巴黎不走。由于他的国际声誉，纳粹军队占领巴黎数年也不敢对他进行迫害。

## 二、战时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交流

抗战期间，中国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着。

中苏文化协会先后成立了由曹靖华主持的编译委员会和郭沫若主持的中苏文学研究委员会,翻译出版了多种苏联文学作品,特别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苏联战时文艺作品,大批地被介绍到中国来。其中有的作品甚至还有好几种译本,从而也反映了中国读者对于苏联战时文艺的挚爱。在小说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苏联作家瓦西列夫斯卡的《虹》(曹靖华译)、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茅盾译)、苏联作家巴甫连科的《复仇的火焰》(茅盾译)、苏联作家卡达耶夫的《团的儿子》、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胜利的保证》(张叔夜译),苏联作家吉洪诺夫的《战争》(茅盾译)等,翻译出版的其他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有西班牙作家柴玛阿司的《他们的儿子》(茅盾译)、希腊作家帕拉玛兹的《一个人的死》(茅盾译)、美国作家司坦恩培克的《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胡仲持译)、英国作家普利鲍依的《海底的战士》(鲍之静译)、法国作家蒙弗雷特的《红海逃亡犯》(陈占元译)、印度作家泰戈尔的《黄金之夜》等。

1942年起,特别是在桂林、重庆等地,竞相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已盛极一时,尤其是翻译出版世界名著,已形成风气。先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和他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周笈、罗稷南译)、《复活》(高植译),接着有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巴金译)、《父与子》(巴金译),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高滔、宜闲译)、《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邵荃麟译),俄国诗人、作家普希金的《复仇艳遇》(立波译)、《奥尼金》(苏天译)、《甲必丹女儿》(孙用译),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勾利尤老头子》(穆木天译)、《凯撒·罗比图》(穆木天译)等大量作品被翻译过来,有的则有多种译本,总的翻译出版数量之大非常可观。据不完全统

计,仅就桂林一地,抗战时期出版的 1000 多种文艺书籍中,就有 130 多种属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

抗战时期,国统区和延安以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所出版的文艺期刊和报纸的副刊在大量刊登以反映抗战现实为主题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文、诗歌、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文学作品的同时,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也占有一定的位置。下面只举出一部分文艺期刊所翻译介绍的外国文学作品,它们对于鼓舞人民抗战的斗志、借鉴外国创作经验、促进我国抗战文艺创作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苏文化》系一综合性杂志,1936 年初在南京创刊,1937 年 11 月迁至重庆出版。长期负责人是王昆仑、侯外庐。它以沟通中苏文化、介绍苏联情况为主,但其中的文艺作品(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翻译文学)、文艺理论文章和文艺研究论文也很多,并且出版过“文艺专号”。特别是《中苏文化》的“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和“抗战四周周年纪念特刊”中,都有关于抗战文艺各方面(小说、诗歌、戏剧、文艺理论、报告文学、电影、木刻、漫画等)的总结性文章,具有历史价值。《中苏文化》曾多次出过介绍俄国和苏联文艺的特辑。

《文学集林》1940 年在桂林出版,主要撰稿人有巴金、郑振铎、叶圣陶、王西彦、丰子恺、端木蕻良、关天竹、李健吾、柯灵、耿济之等。第 4 期为《译文特辑》,其中刊有巴金翻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俄国赫尔岑著)、鲍群翻译的《小城纪事》(苏联左琴科著)、祝敌翻译的《巴尔扎克论》(英国摩尔著)、汪宏声翻译的《中国的小说》(美国赛珍珠著)。

《半月文艺》是1941年4月于桂林创刊,以发表文艺评论和文学创作为主的文学刊物,对于外国著名作家及其著作的评介,在该刊文艺评论中也占有较大的篇幅。主要有袁水拍译的《惠特曼论》、宋玮译的《拜伦的〈哀希腊〉》、庄寿慈译的《普式庚的伟大》,还出版了“普式庚一百零五年祭”特辑。重要作品则集中对苏联著名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毁灭》、《带枪的人》等的评论。另外,还翻译了外国诗人、作家如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莎士比亚、普希金、高尔基的名诗,并出版了《半月新诗、半月文艺合刊》,刊登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中外反侵略战争的诗歌。

《诗创作》于1941年6月在桂林创刊,是抗战时期全国较大型的诗刊(月刊)。该刊的长诗为数不少,经常刊登著名诗人、作家如郭沫若、茅盾、田汉、田间、贺敬之、郭小川、端木蕻良、黄药眠、胡风、陈残云、臧克家、魏巍、鸥外鸥、艾青、韩北屏、周钢鸣、何其芳、钟敬文、焦菊隐等的作品。翻译诗作在该刊也占有一定位置,如马雅可夫斯基、莱蒙托夫、普希金、惠特曼、海涅、雨果等著名诗人、作家的新作,其中马雅可夫斯基的《乌拉季米尔·伊里奇·列宁》一诗的翻译发表,更是难能可贵,鼓舞人心。为扩大中外著名诗人及其诗歌的影响,该刊还经常出版纪念世界及我国名诗人的专辑,如“普希金一百零五年祭”、“惠特曼五十年祭”和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的“祝福郭沫若诗人”等。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后,该刊及时出了“不准进攻苏联”、“中国诗歌界致苏联诗人及人民书”等特辑,愤怒声讨法西斯侵略行径,坚决支持苏联人民抗击侵略的卫国战争。《诗创作》发表的诗论中也经常涉及外国著名诗人、作家的诗论,如肖爱梅的《正确的认识马雅可夫斯基》、周钢鸣的《关于〈欧根·奥



尼金》的几个问题》等。

《文学报》(月刊)1942年6月于桂林创刊,孙陵主编,主要撰稿人有孙陵、端木蕻良、骆宾基、臧克家、周立波、李广田、丁民、罗峰、方敬、张煌、路翎、田间、陈范予、张叔夜、柳叶长青、吕滢、绿原、庐静文、紫虚等。在其《作家作品介绍》一栏中,除中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外,还经常刊登介绍外国作品,如柳叶长青的《向〈静静顿河〉学习描写人物》、苏联鲁庚的《肖洛霍夫论》(禾康译)、布拉部依的《孤独的普式庚》(李葳译)、古尔斯坦的书评《叶夫盖尼·奥涅金》(吕滢译)、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齐蜀父译)、莫里哀的三幕剧《乔治·旦丁》(苏华译)、雪莱的《短诗》(立波译)、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援助中国》(张叔夜译)等。

《文艺杂志》是抗战期间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文艺月刊,于1942年1月在桂林创刊,由王鲁彦主编。1944年6月停刊后,于1945年5月在重庆复刊,由邵荃麟主编。主要撰稿人有巴金、老舍、沙汀、靳以、王西彦、张天翼、艾芜、立波、芦荻、端木蕻良、曹靖华、邹狄帆、穆木天、李健吾、姚雪垠、臧克家、易巩等。这些著名作家在抗战时期所写的重要作品,大都是在该刊上发表。该刊始终坚持抗战文艺的进步方向,在读者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文艺杂志》每期都以一定的位置和篇幅刊登翻译作品(苏联的较多),如曹靖华翻译的《苏联民间故事选》、《苏联作家战地报告》和《列宁的故事》以及高尔基的《窦姬》,穆木天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长生不老药》,孟十还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舞会之后》及普希金的诗《迦洛伯》和雨果的诗《我的童年》,邹绿芷译的狄更斯小说《淫徒之死》,许天虹译的杰克·伦敦的独幕剧《第一位诗人》等。

《文艺生活》是抗战时期较有影响的全国性大型文艺月刊,1941年9月在桂林创刊,司马文森主编,撰稿人主要有艾芜、邵荃麟、孟超、夏衍、田汉、何家槐、欧阳予倩、沙汀、郭沫若、聂绀弩、骆宾基、孟昌、宋云彬、葛琴、许之乔、秦似等。编辑方针在于加强抗战文艺作品的创作,多发表一些反映抗战现实的文艺作品,注重作家和作品的研究,介绍一些好的翻译作品。《文艺生活》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坚持不懈地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国统区人民介绍苏联作家的作品,借以鼓舞国统区人民的抗战斗志,加强中苏友好,共同反击德、意、日法西斯。苏德战争爆发后,该刊连续编辑了“苏德战争特辑”,发表了托尔斯泰的《我号召憎恨》(孟昌译),爱伦堡的《我见过他们》(秦似译),以及欧阳予倩的《寄慰苏联战士》,熊佛西的《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战》,荃麟、葛琴的《为了人类的利益》,许之乔的《莫斯科是人类精神的堡垒》,余所亚的《致苏联漫画家》、《中国诗歌界致苏联诗人及苏联人民书》,韩北屏的《声讨暴徒希特勒》等文章,表达了对苏联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对法西斯的憎恨。

此外,该刊还译载了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普希金等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刊登了有关外国文艺作品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如焦菊隐的《俄国作家与论莎士比亚》、艾芜的《关于〈哈姆雷特〉》、田仲济的《高尔基的社会论文》等。

《翻译杂志》是一综合性大型翻译刊物,1943年9月创刊于桂林,由翻译杂志社出版。该刊发表的翻译文章,一般都能较好地配合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如在其“时事论坛”专栏里,发表的《纳粹对欧洲的掠夺》(伦敦《泰晤士时报》文,垦林译)和《罗马尼亚——轴心傀儡的榜样》(康斯坦丁诺斯基作,司马林译),从不同侧面揭露

了德国法西斯侵略强盗的暴行。《日本的阴影》(美国阔尔莱作,简竹坚译),指出日本在占领南洋后所遭遇到的重重困难,预示其末日的到来。斯大林格勒之战及其胜利,当时被公认是“盟国胜利的牢不可破的基石”,该刊特辟了“斯城之战”专辑,刊登了《斯大林格勒苏军六周攻势的总结》(苏联《真理报》文,治品译)、《战史中崭新的一页》(苏联 V. 克雷洛夫上校作,志萍译)、《还要打仗吗?》(苏联爱伦堡作,曾乐译)等重要文章。另外还如实介绍了盟国特别是苏联及东欧南斯拉夫、波兰、保加利亚、捷克等国家反德国法西斯斗争的英勇事迹。这些都是思想性较强的报告文学或通讯报道。

该刊还辟有《战时文艺》专栏,主要是翻译介绍世界各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创作的反映现实斗争的小说,如苏联西蒙诺夫的《等着我》(铁弦译)、苏联巴夫连科的《生命》(肖弦译)、苏联铁霍洛夫的《春天》(周行译)、苏联卡斯西里的《一刻钟》(斯庸译)、苏联巴莱兹的《教育》(荒芜译)等,反映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小说《安妮西亚奶奶》(瓦雪柳斯卡作,庄寿慈译)、拉特维亚里也德列的《木片》(斯庸译)、雪勃尔的《地下的巴黎》(契若译)、卡泰耶夫的《少校杜冈诺夫》(孟昌译)等,反映了法国、波兰等国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争生活。该刊的“山水人物”专栏则以小品文的形式揭露法西斯暴徒的嘴脸,如《纳粹王巨魔的面影》(灵珠译)、《一个德国俘虏的自供》(吕梅译)、《但尼堡——法西斯铁蹄下的牺牲者》。漫画有美国波恩斯的《纳粹的幻灭》,还有介绍各国文学近况的评论或书讯,如《苏联文学传统及其发展》(托尔斯泰作,蒋路译)、《当代美国小说的趋向》(宜闲译)、陈翰笙等写的有关英、美、苏等国家最近的书讯等。

除上述的文艺期刊所列的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期刊杂志所刊登的翻译作品尚未列入,至于战时各报纸的文艺副刊所登的翻译作品也不在少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抗战期间,中国的文学作品也有一些被翻译介绍到国外。

抗战初期,以小说为例,当时文艺工作者都忙于更直接地全力去抢救那垂危的祖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构思,去执笔写作,因此,作者只能抓住现实的某一个片断,用最单纯、最直接的形式将它反映出来。这就是短篇小说迅速兴起,中篇小说创作较少的客观原因。在这些短篇小说中,也不乏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优秀作品。例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就是在当时国统区受到好评的短篇之一,这是姚雪垠抗战时期的成名之作。《差半车麦秸》是一个农民游击队员的绰号,他怀着“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的抗日保家的朴素观念来到抗日队伍,但又保留着小生产者的自私弱点。在一次进村侦察敌情时,竟然顺手偷走老百姓的一根牛绳,因为他那时还记挂着“俺家还少一根牛绳哩!”后来在紧张频繁的战斗岁月里,终于认识到抗日救国的大道理,锻炼成为游击队里作战勇敢而身负重伤的“最有趣的好伙伴”。作者对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缺乏文化的农民战士,在集体生活的陶冶下的性格转变过程,描写得入情入理,自然可信。伴之以作品中北方通俗口语的运用,小说更显得真切动人。因此,小说在1938年的《文艺阵地》上发表时,以其写出农民的新人形象而受到文艺界的广泛赞许,并被译成几种外国文字出版。如英国新派文学刊物《新作品》首先发表了叶君健译的这一小说的英文译文。

抗战初期,张天翼的《速写三篇》,其中的《华威先生》,于1938年11月由日本《改造》杂志转载,日本的编者竟在按语中借题发挥,诋毁中国抗日工作者和中国人民。因此,文艺界当时曾就抗战文艺作品暴露与讽刺问题引起了一场争论,但《华威先生》仍被认为是一部好作品。它以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而被列入世界优秀短篇小说之列,曾由叶君健译成英文发表在英国的新派文学刊物《新作品》上。《华威先生》是作者在纷繁的社会现象中,选出的几个漫画式的生活镜头,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塑造了一个国民党文化官僚——“华威先生”。他身兼数职,忙忙碌碌,“恨不得取消晚上睡党的制度”,他名谓从事“抗战工作”实际上所忙碌的是在进行钳制群众的抗日组织、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勾当。

当时在抗战文坛上与姚雪垠、张天翼的两个短篇同享盛名的佳作还有相当的数量。

抗日战争进入后期,文学创作由短篇逐渐向中长篇开拓,反映抗战现实的更深层的重大题材的作品相继问世。最先在文学作品中反映“皖南事变”这一事件的是茅盾,他在长篇小说《腐蚀》里,以第一人称的日记体形式,通过失足落水的女特务赵惠明的痛苦反思,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与汪伪特务精心策划“皖南事变”的罪恶阴谋。《腐蚀》于1941年6月首先在香港《大众生活》上开始连载。在当时空前的投降危机和空前的抗战困难的历史条件下,这篇作品的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对中外反动派在政治上是一个沉重打击。

延安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延安文艺整风以后,作家们深入农村和前线,创作

了大量富有时代气息的文艺作品。赵树理等人的中短篇小说,以其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和新的形式,显示了它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崭新地位。

40年代后期,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创作已由短篇发展到长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抗日根据地优秀长篇小说的代表。两部巨著都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并由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翻译出版发行。同时发表了许多有关这两部巨著的评价文章。

### 三、战时戏剧、电影、音乐、漫画和木刻艺术的发展与国际交流

(一)戏剧 整个抗战时期,戏剧的创作演出活动,堪称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丰收时期,而且在实践中注意了开展戏曲理论的探讨,注意了对传统戏曲的推陈出新,注意了吸收外国戏剧的精华。特别是一些具有现实教育意义和借鉴意义的苏联剧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一些反映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卫国战争时期的几种代表剧作,都先后有了中译本。如包戈庭的《带枪的人》,列昂诺夫的《侵略》,古塞夫的《光荣》,西蒙诺夫的《望穿秋水》、《俄罗斯人》,卡达耶夫的《蓝手帕》,苏合多尔的《傻瓜》、《青年军官》,罗穆的《钟表匠与医生》,拉夫列涅夫的《破坏》,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柏洛乞可夫斯基的《生活在召唤》,考涅楚克的《前线》,德国作家费尔德里希·沃尔夫写的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马门教授》,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三兄弟》等也在文化交流中介绍进来。

上述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卫国战争时期的剧作,大都在延安公演过,而且有些是多场次的。少数也在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上演过。有的也在重庆、桂林等地演出。上演的剧本中,尤以1944

年在延安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上演的《前线》最受欢迎，曾引起轰动。剧本所塑造的戈尔洛夫、欧格涅夫、米朗、新闻记者客里空等人的形象，至今都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1938年，在重庆、桂林、延安等地先后公演了一批欧洲17世纪和19世纪以反映暴露农奴封建制度的黑暗与腐朽，以及封建贵族、僧侣和资产阶级的吝啬、自私、伪善、阴险等丑恶本性为主题的世界名剧。如英国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哈姆雷特》（梁实秋译），法国莫里哀的《伪君子》、《悭吝人》、《生财有道》（顾仲彝改编），由许幸之根据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改编的话剧《天长地久》，俄国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华剧社文学部翻译）、《婚事》，俄国契诃夫的三个独幕话剧《求婚》、《蠢货》、《纪念日》，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

此外还有宋之的、陈白尘根据法国席勒的《威廉退尔》改编的话剧《民族万岁》，李庆华根据美国奥尼尔的《天边外》改编的话剧《遥望》，陈锦根据法国戴尔的《缓期还债》改编的话剧《天网》，李蓝天根据意大利卡玛奇阿与阿福利亚的《青春不在》改编的《黄金时代》，以及法国本那特的《妒误》、美国雷非亚的儿童喜剧《它的城》等。

总之，这一时期通过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大量剧作和戏剧演出活动，不论是反映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戏剧，一方面可以使剧作家从这些作品中学习写作和演出技巧，开拓境界，使戏剧活动接触多方面的题材，不局限在狭小天地里，以丰富和提高戏剧创作和演出水平；同时也开阔了观众的视野，提高了鉴赏水平，满足了观众的欣赏要求。



1941年，延安马列学院演出法国话剧《马门教授》。





为了借鉴外国戏剧创作的经验,这一时期,除了注意翻译介绍外国戏剧家的剧作外,同时也十分注意国外的戏剧活动,开展戏剧评论。如当时在桂林创办的戏剧刊物《新中国戏剧》上专门辟有“世界名剧选集”、“名人名论择要”,以及“边疆敌后海外各地之剧坛动态”专栏。又如抗战时期由田汉主编的大型艺术刊物《戏剧春秋》,在内容上除了整理介绍一些适合中国抗战需要的戏剧理论,刊登剧本,经常发表剧作的评论文章外,还经常介绍外国主要是苏联的戏剧活动及戏剧理论,如《苏联集体农庄剧场的戏剧节》(瞿白音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涯最后几节》和《第一研究所》(瞿白音译),查哈瓦的《导演论》(曹靖华译),《莎士比亚新论》(宗玮译)等,这对于中国戏剧运动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二)电影 中国电影在抗日的烽火中有了新的发展。抗战一开始,中国电影界的爱国人士即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7月30日“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在上海成立。上海沦陷后,除一部分电影工作者留在“孤岛”继续坚持斗争外,大部分撤退到武汉。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组成。该会成立的宣言提出:“我们将坚强的团结起来,用同一的意志趋向同一的战斗目标”,要使电影“服务于抗战宣传”,“成为抗战的有力武器”。

抗战初期,主要是摄制反映抗战实况的纪录片。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中央电影摄影场(以下简称“中电”)即摄制出纪录片《卢沟桥事变》,这是最早反映“七七事变”的电影。“中电”的前身是成立于1932年5月的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下属机构电影股,后扩

建为摄影场。“七七”事变以前，很少拍摄出值得一提的作品。“八一三”后，“中电”迁往芜湖，1938年初转迁重庆，相继拍摄了《克复台儿庄》、《东战场》和《抗战实录》等数部反映抗战的新闻记录片。

继“中电”之后，汉口摄影场也拍出了较好的抗战记录片。汉口摄影场成立于1935年。该场于1937年夏秋拍摄的《抗战特辑》第一、二集分别纪录了“七七”事变后的抗战动态和平型关战役等珍贵镜头。此时，中国影片向海外输出逐渐引起重视。如国民党政府的宣传部门曾将已编辑成的《抗战特辑》先后在香港、澳门、新加坡、越南、缅甸、菲律宾等地上映，受到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在国际上也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有些新闻素材，曾被美国各电影公司的新闻片选用；国际反侵略协会还曾致函中国有关部门，热切希望中国抗战影片能到世界各地去放映，认为这是对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抗战特辑》第一辑在日内瓦世界禁毒会议上放映过，曾受到日本代表的抗议，以至在会上引起激烈的辩论，而世界各国代表均对中国表示支持。《抗战特辑》第二集在英国利物浦上映时，当地观众自动捐献200多英镑支援中国的抗战。

不久，该场扩充改组为“中国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吸引了许多优秀的电影工作者。1938年1月至10月，“中制”拍出了《抗战特辑》第三、四、五集，以及《抗战歌辑》、《抗战言论集》、《电影新闻》等新闻记录片。在这些纪录片中，摄下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冯玉祥、郭沫若等人的抗战演说等历史镜头。这些影片有的曾在南洋、苏联、美国等地上演，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8年1月开始，“中制”和“中电”从以拍摄记录片为主发展到拍摄抗战故事影片。1938年“中制”完成了由史东山编导的“七七”事变后第一部抗战故事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此后又摄制完成了由袁丛美编导的《热血忠魂》和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1938年9月，“中制”迁往重庆，此时的“中制”，云集着一大批优秀电影人才，它的编导委员会由阳翰笙、史东山、司徒慧敏、应云卫组成，夏衍、蔡楚生、沈西苓等担任特约编导编委。还有舒绣文、魏鹤龄、黎莉莉、张瑞芳、陶金等强大的演员阵容。其他如音乐、美术、摄影等方面也有任光、贺绿汀、张光宇、王士珍等一流专家。因此，“中制”在此后的两三年中拍出了由何非光编导的《东亚之光》，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的《胜利进行曲》、阳翰笙编导的《塞上风云》，以及由阳翰笙根据意大利人范斯伯所著《神明的子孙在中国》改编而成的影片《日本间谍》等数部颇具特色的故事片。

中国的故事影片向国外输出的，以《貂蝉》和《热血忠魂》两部影片在当时引起的反响最大。《貂蝉》由新华电影制片厂出品，是一部隐含抗战意义的较好的影片，由上海金城影片公司欧丕铎购得放映权，将影片运往美国，经好莱坞专家整理剪辑以后，于1938年11月18日在纽约最高贵的大都会歌剧院首映，纽约市长赖格第、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及各国外交使节均出席开幕式。放映收入的几万美元，美国方面全部捐给中国作为教育基金。《热血忠魂》是中央电影制片厂的出品，是一部直接反映抗战的故事片。该片于1939年在美国罗斯福戏院首映，片名改为《抗战到底》。公映后，美国报纸发表了大量文章认为：这部影片不但表现了中国电影技术有极迅速的进步，而且昭示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热诚和忠勇，受到同情中

国的友邦人士的欢迎。曾经创作过大量剧本的著名作家夏衍，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1939年他发表题为《中国电影到海外去》的专论，其中指出：应该积极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和环境，有计划地制作和输出对欧美人士宣传我们这次抗战的影片。他认为：这是“争取欧美大众援助中国的有力武器”。事实证明，夏衍的论断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项工作并未能得到很好的实施。

1939年4月，“中电”也完成了它的第一部抗战故事片《孤城喋血》，接着又推出了由沈西苓编导的《中华儿女》和孙瑜编导的《长空万里》等两部优秀的抗战故事片。

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电影事业，由于条件极其艰苦，起步较晚。1938年秋，在延安的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延安电影团”，由袁牧之、吴印咸等投入了纪录片的拍摄，当年10月1日即开始拍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此后，又摄制了反映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各方面情况的许多珍贵素材的纪录片，如《白求恩大夫》、《南泥湾》等，并于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时摄下此次盛会的历史镜头，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延安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于同年9月开始陆续拍摄故事片。

香港作为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基地，在抗战爆发前夕，有大小几十家电影公司，大多数只产粤语片，而且一般格调都不高。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香港电影界深为震动，以抗战为题材的影片开始涌现。上海沦陷后不久，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从上海辗转来到香港，他们与香港电影界进行了较好的合作，拍出了描写上海“八一三”抗战的《血溅宝山城》和反映敌后游击队抗日斗争的《游击队进行曲》这两部粤语故事片，放映后受到观众欢迎，引起香港电影

界的强烈反响。1938年底,“中制”打入了香港,在香港设立了“大地影业公司”,专拍国语片。蔡楚生、司徒慧敏、谭友六、吴蔚云、黎莉莉等参加了该公司的工作。半年后,“大地”即拍摄完成了《孤岛天堂》和《白云故乡》两片,前者是描写上海沦为“孤岛”后,一个爱国青年领导下的秘密组织铲除汉奸的惊险故事片;后者是描写一个为女交际花(实为日本特务)所感而泄露军事秘密的青年最终觉醒,走上抗日前线为国捐躯的故事片。这两部国语片电影在香港连续放映近两周,更为观众欢迎。

1939年底,“大地影业公司”停办后,在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于1940年6月组成了“新生影片公司”,并拍出了故事片《前程万里》,描写了香港的汽车司机、失业青年、舞女等社会下层人物摆脱恶势力的束缚,毅然回内地参加抗战的故事。

尽管在抗战初期香港电影界拍出了上述一些描写人民抗日斗争等较优秀的国语片和粤语片,但此时香港电影作品中的大多数仍是迎合小市民口味的武打、神怪和色情的粤语故事片,谈不上在艺术上、思想上有何追求。这种状况与国破家亡、民族危急的时局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对照,从而引起了香港正直舆论和爱国人士的指责与批评。1941年以后,更多的进步电影工作者来到香港。同年4月,《华商报》在香港创刊,展开了对香港电影的评论,由此导致香港电影界的一个转机。虽然一些无聊低级的影片仍不断出现,但确实也拍出一批新的内容健康博得好评的粤语片,如《民族的吼声》、《流亡之歌》、《烽火故乡》、《国难财主》等片。这些影片中,有的描写了农民、工人抗日斗争的故事,有的叙述了在日本侵略者炮火下失去家园、背井离乡、流落香港的人们生活遭遇,有的是直接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汉奸恶棍以及乘机大发国难财的投机商人们的嘴脸。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香港的电影工作者或通过各种途径离港返回内地,或隐居、改业,没有一家电影公司与日本侵略者合作,香港影业从而也暂时停顿。

中国的抗战震撼了世界,世界人民关注着中国。一批外国电影摄影师先后来到中国,用他们的摄影机和笔,记录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可歌可泣的情景。荷兰著名的记录片电影家约里斯·伊文思与几位美国朋友组织了“当代历史家”影片公司,于1938年1月,携带三架摄影机和两万米胶片来到中国。在华期间他们曾前往台儿庄前线进行拍摄,后又在武汉拍下了保卫大武汉的活动,还拍摄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等的镜头,并向八路军办事处赠送了一架摄影机和部分胶片。伊文思回到美国后,制作完成了长纪录片《四万万人民》。1938年10月,苏联著名纪录片电影家罗曼·卡尔曼也携带摄影机,踏上战火弥漫的中国,摄下武汉会战的一幕幕的场景,后又在湘、桂、粤、川等省拍片,1939年5月抵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拍片。后来,他利用所摄素材,制作了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两片。伊文思和罗曼·卡尔曼所摄出的记录片,都真实地纪录了日军在华的暴行,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无畏的斗争,寄托了作者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这些纪录片在美国、法国、荷兰、苏联等国放映后,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38年冬开始,一些外国影片,特别是反映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影片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戈宝权于

1938年在汉口《新华日报》上,以《介绍四部苏联的电影片》为题,撰文介绍了《献身革命》、《赤子效军》、《十三勇士》、《普希金》等影片的内容,并在武汉、延安、重庆、桂林等地相继上映。尔后又陆续上映了一批苏联影片,主要的有《列宁在1918》、《海军暴动》、《祖国儿女》、《马戏团》、《虹》、《女战士》、《保卫斯大林格勒》、《爱护祖国》、《铁马》、《为国忠心》、《游击战》、《鹏搏九天》、《古班驃骑》、《斯维尔特洛夫》、《塔拉瓦》、《新世界的一天》、《苏联红军收复诺沃罗西斯克》、《彼得一世》、《喀萨克斯坦》、《乌克兰》、《战争一日》、《铁翼巨人》、《马门教授》、《会师柏林》、《今日之苏联》、《苏联青年》等。从1938年至1945年,每年的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纪念日,均举办苏联电影周,放映一些反映苏联反法西斯斗争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内容的影片,而且在报刊上几乎对每部影片都有评介文章。通过这些电影的放映,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坚定了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信心,同时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对发展中国的电影艺术有借鉴作用。

抗战期间,在中国放映的美国影片,如《血雨腥风》、《左拉传》、《锦绣山河》、《大独裁者》、《苏军血战记》、《莱茵河的守卫》、《居里夫人》等,得到中国观众较高的评价。但这些由美国进步电影工作者创作的影片,在美国输入中国的影片中只占极少数,大多数仍是中国观众不喜欢的属于低劣的海淫海盗的影片。1942年以后,美国影片大量涌入重庆,据1944年底统计,重庆全年放映的外国电影中,美国影片即达419部,英国影片140部,苏联影片56部。由于国民党四大家族对电影的垄断和它对进步电影所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措施,使得这个时期的进步电影事业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美国



影片的倾入,更加强了对进步电影的压力。1946年,上海首轮影院放映的故事片383部中,中国影片仅13部,而美国影片却达352部,其他为英国影片15部、苏联影片3部,这些统计数字最确凿地再现了30年代美国电影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垄断局面。

(三)音乐 抗战时期的音乐艺术,在歌曲创作、演出活动上,堪称是中国音乐史上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音乐艺术的国际交流也有新的发展。

中国现代音乐,无论声乐或器乐的发展,都缘于中外音乐艺术的交流,抗战时期的音乐艺术交流也从未中断过,通过音乐作品的互译互播和演出活动,使中外音乐艺术的交流有了较广泛的开展。例如,1939年9月,著名苏联歌曲家克利曼蒂克基马利夫编译了中国抗战歌曲15首,其词意都由苏联名诗人沙诺夫·阿尔托森等人译成俄文,其中有数首制成留声机唱片,行销很广,最受欢迎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和《救亡曲》。1945年1月美国米高梅公司将赛珍珠的小说《龙种》摄制成影片,其中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至于由中国作家、诗人、音乐家翻译介绍的外国名曲,更有相当的数量,主要刊登在《新音乐》、《现代音乐》等音乐杂志上,多数是苏联歌曲,有《斯大林之歌》、《图拉来福枪》、《两个雄鹰》、《运动进行曲》、《我们生活在歌声中》、《最后的圣战》、《斯大林歌》(电影《战斗的女友》插曲)、《新生命的脉搏在跳动》(歌曲集,陈原译)、《苏联名歌集》(陈原译)。由刘流编、华北书店出版发行的《世界名歌选》收集的世界名歌,包括奥地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匈牙利、苏联等国家的音乐家的歌曲作品达60多首。

在重庆、桂林、延安等地出版的报纸和音乐刊物,经常发表苏

联等国家的音乐消息和动态,刊登有关外国音乐的评论文章;特别是由李凌主编的《新音乐》(月刊),这一抗战时期国内的主要音乐杂志,它所刊登的国内外乐坛动态、音乐家介绍、世界名曲介绍、音乐理论、歌曲等,深受读者的欢迎。它辟有专栏,主要评介俄罗斯伟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格林卡及苏联著名的音乐家杜那耶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这些对中国人民了解俄罗斯的音乐家和苏联的音乐艺术,对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开展,都起了促进作用。这一时期报刊所登载的对外国音乐的评介文章主要有:《歌曲在苏联红军中》(亚力山德洛夫作,立波译)、《蓬勃发展的民族音乐》(塔斯社莫斯科讯)。由李绿永,赵沅合编的《苏联音乐》这本书中,选辑苏联音乐研究的理论作品 10 余篇,译者为立波、安娥、葛一虹、王云阶、赵沅、元庆等;书中选辑的歌曲为苏联当时最流行的名曲 40 余首,配词翻译是由光未然(张光年)、李嘉、陈原、吕驥、施谊、塞克、赵沅、陈歌辛、丁珩、叶圣陶合作完成的。《音乐社会学论》(山根银二作,李嘉译)、《贝多芬与俄罗斯》(G·格买德作,李丽水译)、《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李嘉作)、《唯物史观的音乐论》(山根银二作,李嘉译)、《柴可夫斯基的伟大和苦闷》(G·胡波夫作,雨鲸译)、《列宁格勒我的列宁格勒》(D·沙斯塔科维奇作,洛辛译)、《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李嘉为中华交响乐团二周年纪念演奏会而作)、《贝多芬与约翰·克利斯朵夫》(李嘉译)、《音乐的颂歌》(罗曼·罗兰作,黎家译)、《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立成作)、《论歌曲的练习》(米罗斯拉伏夫作,卢明译)、《安魂曲介绍》(焦菊隐作)、《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修悲尔德〈未完成交响乐〉》(晴沈、荷荃作)、《莫扎特的〈周彼得交响乐〉》(晴沈、葆荃作)、

《一个反法西斯的热情的乐曲》(徐迟为中华交响乐团三周年纪念日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列宁城)交响曲》而作)、《略谈美国音乐》(荒芜作)、《苏联音乐教育》(李嘉译)、《自修和声学》(李绿永、黎国荃译)、《罗曼·罗兰和法兰西乐坛》(李元庆译)、《唐·罗伦梭·皮若西》(罗曼·罗兰作,白桦译)、《想念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作,陈原译)、《第八交响乐》(赫尔巴格作,谭林译)等。

这一时期,在中外音乐作品相互翻译交流的同时,还通过国际广播电台互相转播反法西斯的歌曲。它激励着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志,也震荡着广大海外爱国华侨和同情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国际友人的心弦。1938年9月,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的抗敌演剧队首次通过汉口短波无线电台,向国内外播送了许多抗敌歌曲,其中有《反侵略进行曲》、《心头恨》、《打日本》、《救亡对口曲》、《安全土》、《军民抗战歌》、《长城谣》、《青年进行曲》、《九月的夜》、《新中华进行曲》等,并同时由该队队长冼群介绍歌词。另外,武汉合唱团及武汉怒潮乐社的管弦乐队通过汉口短波无线电台,向国内外播送了精彩的音乐节目。歌咏有男女混声四部合唱的《抗敌歌》、女声三部合唱的《女青年战歌》;管弦乐有《军队进行曲》及提琴二重奏等名曲。

1940年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为了宣扬中国儿童爱国精神及抗战歌咏艺术,特约孩子剧团、育才、巴蜀小学儿童,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举行儿童音乐晚会,同时对苏联广播,节目有钢琴独奏及合唱、独唱抗战歌曲,广播最后一个节目为合唱苏联最新流行的《中国之友》一歌,并由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对苏联广播讲话。她热情地介绍了参加这次音乐晚会的儿童,表达了对苏联

人民和儿童的良好祝愿和友好情谊。1941年为庆祝中国儿童节，苏联广播电台专门举办了对中国儿童音乐广播。

此外，1940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蔡绍序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美国广播了抗战歌曲；同月，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教官洪达奇女士对美国播唱抗战歌曲，重庆华夏歌咏团对南洋播唱了抗战歌曲，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应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约请，对美国进行了世界名曲演奏广播。1940年9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音乐组对苏联播出中国民族音乐，计有《嘉兴乐锣鼓》、《闲居吟》、《侯门弹铗》，古筝《高山与流水》，二胡、琵琶、扬琴合奏《青云直上》，琵琶独奏《月儿高》，广东乐曲《龙虎门》、《变体新水令》，南胡独奏《月夜》等，并由莫斯科广播电台向苏联各地转播。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山城合唱团等，都先后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国外作音乐演唱广播，均受到听众的欢迎。

1939年开始，有一个时期通过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多次连续转播苏联特别为中国听众放送的音乐节目，包括苏联作曲家新创作的歌曲、进行曲及苏联民族音乐、民歌、舞曲等，其中有苏联国立合唱团及国乐队演奏的杜那耶夫斯基的《故乡》等12个节目。由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转播的苏联东方民族音乐主要的有《东方民歌》等13个节目。另外还有由苏联铁路歌舞团演唱的节目以及由苏联管弦乐队伴奏的苏联歌剧和舞剧。1942年12月起，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于每晚9时30分起，由美军司令部供给唱片，为远东美国侨民作半小时的美国音乐广播。

1940年6月6日在武汉成立的中华交响乐团，通过举办音乐

会以及纪念活动和外事活动,并借嘉陵宾馆作定期演奏。内容主要是世界名曲。通过这些名曲的演奏活动,有利于推动国内音乐运动的发展和音乐水平的提高。

延安是在音乐器材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于1941年6月成立了延安乐队。1941年7月,延安鲁艺为声援苏联反法西斯的宣传,纪念中国抗战四周年和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由鲁艺音乐部和延安乐队主持演奏了抗战歌曲20多首。同年11月,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演奏了苏联名歌曲:《布琼进行曲》、《我们是红色的战士》、《人民进行曲》、《穿过海洋,穿过波浪》、《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1942年,鲁艺音乐部、延安乐队搞得很活跃,举行过多次音乐会、合唱、独唱会、钢琴独奏、小提琴独奏,歌曲多系世界名作,音乐水准有了快速的提高。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文化界与外国音乐文化界的联系与交往也不断增多,特别是加强了与苏联音乐文化界的联系。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于1940年6月曾致函苏联杜那耶夫斯基、克里阿、珂法兰、米耶珂夫斯基等音乐名家,与苏联音乐文化界取得了密切联系,对沟通中苏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1940年8月,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予中华交响乐团许多有价值的乐谱,如柴可夫斯基、莫索尔斯基、贝多芬、莫扎特、卡里尼古夫等所作全部交响乐谱。其中尤以卡里尼古夫的作品为最珍贵。卡氏为帝俄时代最有天才的音乐家,生前郁郁不得志,终至贫苦而死。其作品介绍到中国,当以此为首次。美国国务院也向中华交响乐团赠送了若干现代名曲唱片。另外,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于1943年3月在重庆举行美术音乐作品展览,其中音乐作品有苏联各民族歌剧曲谱、交响乐曲谱等。

早在1938年9月武汉失守前,为扩大国际宣传,争取广大爱国华侨和南洋各国朋友对中国抗战的声援和支持,曾由武汉合唱团一行26人,经香港赴南洋各地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合唱团的26人分为音乐、合唱、话剧等几个组,先后在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历时一年又七个月,举行了戏剧、歌咏公演,深得广大爱国华侨和当地人民及外国朋友同情,并为支援中国抗战进行了捐献活动。另外,中国著名作家、诗人、《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和中国著名音乐家李凌、赵沅等于1941年在缅甸,以音乐艺术手段,通过开展抗战歌咏活动,在缅甸华侨和当地人民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抗日宣传活动和音乐作品的创作与交流。

(四)漫画、木刻 抗日战争爆发,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中国的漫画、木刻这种艺术形式脱颖而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延安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统区的漫画、木刻艺术都有蓬勃的发展,成为宣传抗战、争取民族解放的犀利战斗武器,其影响所及,为国内外人士所注目。

(1)漫画 抗战初期,上海成为“孤岛”以后,绝大多数漫画作者撤离了上海,一个去向是延安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另一个去向是国统区。由此也就使漫画作者形成了延安以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两个主要宣传阵地。

延安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漫画宣传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其作者的主要代表有华君武、蔡若虹、张谔和张仃等人。延安《解放日报》常常发表漫画作品,如华君武的《榜样》、蔡若虹的《新中国的基石》,张谔的《第二战场》、彦涵的《请到船上来》。另外还发表一些内部讽刺画,并举行内部讽刺画展,展品都切中时弊,使人深受教

益。1942年1月还举办过“反侵略漫画展”，展出蔡若虹、胡蛮、张谔、力群、华君武、古元、张望、张悟真、钟灵、王曼硕、王式廓等十多人暴露日、德、意法西斯侵略的作品百余幅。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漫画在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涌现了很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作品，如华君武的《肉骨头引狗》、《丰收》，张谔的《强盗的故事》、《一样的主子，一样的声音》和《我正在后退，为什么你倒前进呢？可恶的统一破坏者》等。在敌后英勇杀敌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出版的报纸、画刊中也都经常发表大量的漫画作品，如吴耘的《难兄难弟》、江有生的《新四军一夜筑好碉堡》、李劫夫的《希特勒堕入深沟的时候》，徐灵的《诸位，不要为军阀财阀送死》，吕蒙的《我们的阵容》等。这时的漫画创作更加注意通俗化、大众化，使广大群众易于理解，以利起着更有效的宣传教育作用。

国统区的漫画作者主要代表有丰子恺、张光宇、叶浅予、沈同衡、廖冰兄、余所亚、张文元等。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上海漫画界于上海沦陷前夕在上海成立的漫画宣传队，由叶浅予、张乐军、特伟、胡考等先后领队从上海出发，进入南京、江西、湖北、广西、四川等地，经常冒着日军的轰炸，进行抗日宣传，在南京举办了“抗战漫画展”，每天观众达数万人，影响颇大。南京沦陷后，漫画宣传队来到武汉，隶属于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并于1938年初在武汉成立了漫画界全国性的组织——“全国漫画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使漫画的宣传活动的活动更进一步轰轰烈烈地展开。叶浅予所领导的漫画宣传队在武汉进行街头漫画

宣传,绘制了大量的墙头漫画、布幅漫画和搞漫画展览,揭露日军暴行,动员人民支援抗战。接着又编辑出版了《抗战漫画》、《日寇暴行录》和在香港出版了英文版的《今日中国》。这些刊物都拥有大量读者,在国内外都有影响。武汉失守后,漫画宣传队辗转长沙、桂林、东南战地和重庆,沿途作了大量的漫画,宣传抗战。漫画宣传队是抗战初期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漫画组织,创作了漫画近千幅,展览百余次,涌现了不少优秀作家和作品。如叶浅予的《换我们的新装》、张乐平的《帮助军队杀敌才是生路》、廖冰兄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联合起来》、陆志庠的《轰炸》、张仃的《欲壑难填》、胡考的《用血肉筑成长城》、特伟的《汉奸土匪的下场》等,都颇有宣传感染力,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

国统区其他地方的抗日漫画也开展得很活跃,特别是桂林,在武汉失守后一度成为中国东南地区漫画宣传的中心。在桂林及一些地方开办了漫画研究班、训练班,出版一系列漫画刊物,如《漫画战线》、《广州漫画》、《救亡漫画》、《民众漫画》以及《全国漫画杰作选》等,并举办一系列的漫画展览。

重庆的漫画宣传活动,因国民党当局对书刊的严密检查,“皖南事变”后,首先是漫画宣传队受到掣阻被迫解散,许多漫画刊物被迫停刊,漫画作者便转向举办展览。因此,漫画展览一时成了重庆开展漫画宣传活动的特点。“漫画联展”是重庆众多展览中规模最大、在中外人士中影响最广泛的展览。参展者有著名漫画作者张光宇、叶浅予、丁聪、廖冰兄、沈同衡、特伟、余所亚、张文元等。漫画家用夸张影射手法,揭露国统区社会黑暗,宣传抗战,如廖冰兄的《犬视》、《猫国春秋》,张文元的《前方与后方》,张光宇的《窈窕淑



兵》、《西游漫记》，叶浅予的《战时重庆》等都具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

在香港，叶浅予等人与香港的漫画家一道举办了规模较大的以抗战为主题的漫画展。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观看后题词：“现代漫画展极值得一看，它描绘出中国多方面的斗争，它证明中国艺术阵线是中国军事阵线的坚强后盾。”这一时期，全国漫画协会还选集了漫画45幅赴苏联举办“中国抗战漫画展”。这是中国漫画第一次参加国际交流。

(2)木刻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沿海一些大城市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许多原来在上海等城市从事木刻艺术的作者，分散到全国各地，以木刻艺术为武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其中大部分木刻作者会集到武汉。当时为适应全面抗战的新形势，1938年6月20日在武汉建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协会（简称全国木协），并先后在延安、成都、昆明、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由于木刻界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就更有利于坚持团结、坚持斗争，使木刻艺术在各地迅速开展起来。1938年武汉失守前后，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当时来到延安的木刻工作者先后有温涛、胡一川、沃渣、江丰、陈铁耕、罗工柳、马达、陈九、力群、刘岷、张望等人，成为推动延安木刻艺术蓬勃发展的一批骨干力量。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延安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木刻作品有了明显的进步，作品表现了新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有了真实感，作品的生活气息浓厚了，感染力增强了。同时延安的木刻工作者，积极进行了民族形式的探索，将习惯于用西洋的明暗法表现人物，考虑到农民的欣赏习惯，开始运用了中国人物画的传统表现

法,创造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较早是沃渣和江丰曾试用民间木刻年画的形式,刻单线人物《春耕图》,而后,古元、力群、戚单、彦涵等都进行了这种探索,出现了木刻年画、木刻窗花等许多民族形式的作品,减少了群众所不习惯的阴影与复杂背景,增强了木刻作品的普及性。但延安的木刻民族化,并没有排除外来的西方的技法,而且在适当融合于阴刻线条造型的中国传统木刻技法中,创造性地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木刻艺术。

为了扩大宣传和繁荣木刻艺术创作活动,延安举办了一系列的美术展览活动,这些展览的主要作品大都是木刻和漫画作品。1940年鲁艺成立了木刻研究班,并举行了第一次木刻展览会,选出200幅作品印成《木刻集》。1942年延安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木刻首次在重庆展出,博得好评,特别是古元的作品,得到徐悲鸿和茅盾的极高评价。此外,延安的木刻工作者为汲取欧洲一些画家的创作经验,选展了苏联版画家斯达洛索夫的版画作品,其中多数是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画,还有法国著名女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集。1942年延安还成立了由刘岷等主持的“D. H. 孚·宗版画研究社”,并举行了世界版画展和出版版画丛书,以介绍中欧版画,达到互相研究、交流学习的目的。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木刻创作活动也十分活跃,它是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钳制的环境下,坚持阵地、坚持斗争发展起来的。它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继抗战前30年代中国新兴木刻许多团体的建立,而相继建立起各种形式的木刻训练班、木刻函授班和出版刊物,举办展览等活动,以培养木刻人才,注意使作品与群众见面,进行社会宣传并推动木刻创作活动的开展。

“中华全国木刻界协会”(以下简称“全国木协”)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后,同年在武汉首先由马达主持创办了“木刻学习班”和举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并选编了一本《全国抗战木刻集》,1939年在重庆由陈烟桥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设置了“木刻班”。从1939年起直到抗战结束,在重庆每年都举办木刻展览会,如“抗战木刻展览会”、“全国木刻展览会”、“第一届双十木刻展”、“第二届双十木刻展”、“渝延木刻联合展”、“抗战八年木刻展”等。1939年“全国木协”在桂林举办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木刻展”;翌年,又举办了“木刻十年展”。其他如李桦在湖南、赖少其在广西、荒烟在江西、许霏在福建等地都举行过多种形式的抗战木刻巡回展览。在上海“孤岛”、在香港也都有木刻家的木刻创作和展览活动。另外,木刻函授班的举办也是广泛地开展。1939年由孙福熙、野夫等人在浙江举办的木刻函授班,是规模较大、学员范围较广的系统性强的函授教育,报名参加木刻函授班的学员达100多人,分布于浙、闽、赣、桂、湘、黔、滇等省。

当时全国木刻出版物散布非常广泛,凡是木刻工作者所到的地方,当地的报纸杂志上就有木刻作品发表;木刻创作活跃的地区,还有相当多的木刻书刊的出版,全国出版的木刻刊物约在4000种以上。影响较大的有“全国木协”在桂林主编的《救亡木刻旬刊》(《救亡日报》的副刊之一),由“全国木协”在桂林与漫画宣传队合编的《漫木旬刊》,重庆的《新蜀报》开辟了《半月木刻》副刊,重庆《新华日报》开辟了《木刻阵线双周刊》、《国民公报》开辟了《木刻研究周刊》。野夫撰写了《怎样研究木刻》一书,万湜思出版了个人木刻集《中国战斗》,李桦与李海流出版了《燎原集》,鄞中铁编写出

版了《木刻概论》等。木刻刊物和著作的大量涌现和通过新闻媒体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新兴木刻创作活动的开展,扩大了木刻作品在国内外的影响。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出于对革命和进步文艺的畏惧,“全国木协”于1941年终于在重庆被国民党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撤销。“全国木协”虽仅活动了两年零七个月,但它是中国新兴木刻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它与其他艺术并驾齐驱,独辟“沙龙”,在宣传抗日、普及和推动木刻创作活动的发展中起着开拓性作用。

继“全国木协”而起的是由王琦、丁正献、卢鸿基、刘铁华、邵恒秋五人发起筹建的“中国木刻研究会”。该会于1942年1月3日在重庆正式成立,并相继在湖南、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北、安徽、陕西等省成立了分会。从此,中国新兴木刻不仅以合法的地位生存下来,而且创作活动仍然十分活跃。

1942年秋,中国全国美术会在重庆举办了一次联合国艺术展览会,展出的木刻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以抗日战争生活为题材的。当时,正值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威尔基访华,美国《时代》、《生活》、《幸福》三家杂志派驻中国的记者白修德,便向主办单位建议,将联合国艺展中的部分中国作品由威尔基带到美国去。这批作品中,木刻有50余幅,当年11月6日,由美国援华会主办在纽约博物馆展出。《时代》杂志为配合这次展览会的宣传,发表了7幅中国木刻作品。据当时合众社的电讯报道:“这次展览会的全部门票收入均作援华之用,展览会的作品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欢迎。”

1945年2月23日,经乔冠华的推荐,白修德以及他的同事贾安娜找到了从延安来重庆的版画家王琦,要他介绍中国现代木刻

的情况,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中国现代木刻和古代木刻的关系,两者有何异同之处?二、中国木刻和外国木刻的关系,彼此有何异同之处?三、国统区的木刻和解放区的木刻,在内容和形式上各有什么特点?为配合文字报道,又根据白修德的要求,提供了一部分木刻原作。一个多月后,在4月9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便刊出了4个版面的中国木刻特辑,一共刊出了14幅作品,其中有荒烟的《最后一颗子弹》,李桦的《保卫长沙》、《运输队》,蔡迪支的《祈求》,黄荣灿的《上焊》,彦涵的《抢粮斗争》、《搜山》、《卫生院》、《结婚登记》,古元的《冬学》、《儿童艺术院》、《逃亡的地主归来》、《八路军生产》,刘铁华的《月夜进军》。接着,在7月出版的《幸福》杂志上,又刊出了荒烟的《残敌的搜索》,梁永泰的《机车粮食的开采》、《子承父业》,刃锋的《这是命运吗?》。

中国的木刻作品在美国权威性的杂志上发表后,立刻在当时驻华的美国人士中引起一股“中国木刻热”,许多人都想购买中国的木刻原作留作纪念。有些在美国陆军总部服务的美国画家也想学习中国木刻。其中有两名中士军衔的随军画家西隆斯和鲁宾顿,他们在学习中国木刻技术的短短几个月中,不但同重庆木刻界人士结下友谊,而且也熟练地掌握了黑白木刻技术。鲁宾顿的一幅木刻《抢水》还发表在1946年6月上海出版的《文萃》月刊上。

1945年,白修德随同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赠送他一批解放区木刻作品,加上他在重庆征集来的一部分,数量相当可观。这些作品后来由美国艺术家协会主办,在美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其中部分作品还刊登在美国《艺术》杂志上。评论家在撰文评价时,指出这些作品是“破除了旧有的传统”,“虽然没有竹、

树、叶子、微风或是林荫隐士,但他们显然并未抛弃他们更有原则性的优良传统,这就是中国艺术家的最大贡献”。

1946年春夏之交,回到美国的贾安娜,又通过当时在南京的版画家王琦征得100幅木刻作品,由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员费蔚梅(费正清博士的夫人)设法运去美国展览。同时贾安娜还代表纽约市立图书馆向王琦个人征集一部分作品,供该馆收藏。那100件作品带往美国后,曾在一家画廊展出。著名的美国版画大师洛克威尔·肯特(1882—1971)在看了展览后撰文评价,认为“中国木刻是用黑白形式表现真理与谬误之间的斗争的最好武器”。

抗战时期,中国的新兴木刻与30年代比较有了很大的发展,木刻创作的题材范围扩大了,生活的真实感增强了,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质量和数量都有所提高,已进入逐渐成熟的阶段,有许多作品不仅在国内有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并在许多国家展出,为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所收藏和出版。

鲁迅曾说过:“木刻打出世界去,即于中国的活动有利。”木刻向国际发展是有特殊意义的。鲁迅于1934年和宋庆龄一起选了55幅中国木刻和绘画交由法国“Vu”杂志女记者绮达·谭丽德带到法国展览。后来这个被名为“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先后在巴黎和莫斯科展出得到了好评,这使国民党反动派要镇压木协运动就有所顾忌了。全国木刻运动从此获得一条宝贵经验,就是要多方面争取中国木刻出国展览。1939年4月“全国木协”在重庆还曾举办过“第二次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选出了80多件作品送往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战时艺术展览”。

“中国木刻研究会”于1942年为响应国际反侵略运动,曾发出

致苏、英、美三国木刻家的信。此后，国际联络逐步频繁起来。从1942年到1944年，“中国木刻研究会”一连三届在全国分17个地区同时大规模举行“双十全国木刻展览会”，从此，中国新兴木刻不仅以合法的地位生存下来，而且多次将木刻作品选送到国外展出。1943年选送木刻作品100多幅到英国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1944年选送了木刻作品74幅，经中苏文化协会送苏联展览。同年印度加尔各答国际大学在中国抗战七周年纪念日举行了“中国木刻展览会”。同年“中国木刻研究会”供稿由美国约翰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中国木刻集》。又应印度亚细亚民间文艺会的要求赠送给该会一批中国木刻，并选了30幅参加在孟买举行的“国际艺术展览会”。1946年在上海举行了“抗战八年木刻展览”后，“中国木刻研究会”选了木刻作品183幅交国际宣传处送英国展览。同年又选了木刻作品228幅交画家钱瘦铁带到日本展览。这是抗战结束后，中国送日本的第一批木刻作品，曾在日本许多城市展出，影响很大。1947年，“中国木刻研究会”又另选了木刻百余幅，赠送“日中文化研究所”，在东京和神户展览，引起轰动。日本版画界和版画团体举行了座谈会，对中国木刻给予很高评价。同年“当代木刻展览会”在伦敦的中国学会举行，10月又移至曼彻斯特国际俱乐部继续举行。同年“中国木刻研究会”应法国二次大战博物馆的请求，选了木刻170幅送法国展览。1948年重庆中外文艺联络社征集中国木刻50幅送到新西兰展览。这些展出也都受到好评。

通过上述中国木刻频繁的出国展览，使中国木刻确实“打出世界去了”，使各国通过中国新兴的木刻艺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有所了解。他们很重视中国木刻的发展，尤其是日本版画界。中国

---

木刻的国际活动,增强了它在世界艺术中的地位,同时也促进了新兴木刻在中国的发展。



## 第九章

#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 第一节 解放区

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宣布投降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新闻战线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独吞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国民党政府趁机“接收”了大量的日伪报刊、通讯社、广播等新闻机构和单位，扩大了进行反共反人民宣传的实力，并且以“接收”日伪宣传机关为名，实行蒋伪合流，许多日伪报纸改头换面，成了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海著名的汉奸报《新中国报》改名为《正言》报，成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机关报，而该报的第一篇社论还是唱的汉奸报的老调——“中日亲善”。汉口市国民党党部的机关报《华中日报》，也是“接收”了汉奸报《大楚报》以后改个名字就出版的。国民党在华北的机关报《华北日报》，使用的还是日伪报

社的人员。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帮助和利用日伪的结果,在其夺取了上海、南京、北平、杭州、天津等大城市后,使这些地方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均成了国民党新闻事业的组成部分。国民党在各地的党政机关、特务组织还创办了一些广播电台,出版了许多报刊,建立了庞大的新闻宣传网。这些都成了国民党发动内战和实行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宣传工具。

在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新闻事业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为了反对国民党篡夺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坚决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到1945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解放区迅速扩大,使原来被分割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几个大的战略区。解放区的面积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其中有506座城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新闻宣传事业,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实力。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的广播事业也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在1945年8月中旬恢复广播外,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也于同年8月底建成并开始播音;与此同时,在东北地区的哈尔滨、抚顺、通化等城市也建立起人民广播电台。这些广播电台都承担转播延安广播的任务,弥补了延安台广播发射电力不大、收听范围小的缺陷,进一步扩大延安台广播的影响。据统计,到1946年9月,各地已建立起人民广播电台11座。延安《解放日报》在1946年10月发表了《介绍XNCR》和《大家办广播》两篇文章,其中说明:“XNCR诞生了!这是一个喜讯,这是一个福音,中国人民能用自己的嘴巴直接向全国、向全世界讲话,开展中

外文化交流还是首次。”“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宗旨在于使不了解人民的政党、军队和解放区情况的人士，都能知道它的主张和事业。”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后，受到国内外听众的欢迎。一位美国朋友从美国西维尔尼亚州写信来，要求跟延安台经常联络。上海、南京、重庆、昆明、西安以及新加坡等地的某些报纸，还采用了延安台广播的记录新闻。

上述情况表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年时间里，国内形成了两大地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这两种地区均有自己的军事、政治力量与新闻事业。在内战全面爆发以前，国民党利用通讯社、报刊、广播为发动内战制造舆论准备。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在宣传上，运用报刊、广播从各个方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并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和其他各方面的努力，为争取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斗争。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在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暂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各解放区的解放军部队，从战略上考虑，不得不主动地、暂时地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以便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敌人侵占的部分解放区，人民的新闻事业暂时遭到了破坏。东北地区在蒋军进攻时，许多地方的报刊被迫停刊。其他一部分地区的报刊也遭到严重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加强了对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领导工作，并通过新华社和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各地和全世界进行宣传报道。新华社担负起“一身三任”的重责，既办文字广播，又兼办语言广播，同时还担负着党报的评论工作。

在1946年春全面内战爆发前夕,新华社已改组为中共中央的机关通讯社,并加强了新华社总社编辑部的建设。原编辑科各组扩充为解放区新闻部、国民党区新闻部、国际部、语言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英文广播部、英文翻译科等。此外还增设了资料室和电务处。延安的和一大批从国统区回来的新闻工作者陆续参加了新华社总社的工作,增强了总社的力量。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以后,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更加紧张繁重;同时,还为选择新华总社的战备地址做准备,着手筹划部署新华总社的转移工作。由于有了此项准备,所以在国民党军队猖狂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以后,确保了新华总社的日常宣传工作按原定计划转移到既定的地点(太行山下的涉县境内)顺利进行。在转移过程中,新华社的文字广播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保证了中共中央的声音继续传向全国和世界各地。新华总社的全体人员在向太行山转移之初,还在陕北留下了一支40多人的工作队(后来增加到100多人)。这支工作队在跟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转战陕北一年多的时间里,行程几千里,历经艰难困苦,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付的许多艰巨任务。它担负着中共中央与太行山新华总社之间的联络工作:一方面向太行山新华总社传达中共中央制定的宣传方针和具体指示,将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撰写的评论文章传给总社;另一方面转送总社的有关请示报告和重要消息,评论,请中央审定。此外还负责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及外电报道,油印《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参阅;同时还负责整理、分析收到的电讯材料,提供意见供中央机关参考;另外还负责组织陕北战场的军事报道。

1947年3月19日,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便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其中经过两次转移,在战备台坚持继续播音。1947年3月28日,陕北广播电台向全国报道了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的第一个大胜仗——青化砭大捷,歼敌一个旅部,共3000人,活捉旅长李纪云。《东北日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晋绥日报》等解放区报纸,都根据陕北广播电台的广播,刊登了这一消息。青化砭大捷传遍全国各地,粉碎了敌人关于歼灭了西北解放军主力的谣言,大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这些消息自然也会流传到国外)。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敌人重点进攻而被迫两次转移的情况下,能坚持播音,具有重大政治和军事意义。从1947年9月5日起,陕北台每天播音时间增加到了3小时,还增设简明新闻节目,更加及时地报道解放军的捷报。接着陕北台又增设了英语新闻节目,每天一次,每次20分钟。这是陕北台开办的第一种外语节目,使国外听众能正确并迅速了解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

从1947年7月起,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则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为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军事宣传和对外报道,新华总社在人民解放军内普遍设立了新华社的分支机构。1947年8月,开始在反攻部队中设立新华社野战分社,后来经过调整,在野战军中建立了四个新华社总分社,在兵团一级领导机关中建立新华分社,各军建立新华支社。许多军事记者为了采写到前线的真实情况,不避战斗深入第一线,将解放军在各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消息迅速向国内外传播。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

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胜利，震惊了全世界，国际舆论从各种不同角度予以报道分析。在此关键时刻，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政治上遭受的惨重失败，支持国民党内部某些人妄图以“第三条道路”作垂死挣扎。新华社及新华广播电台，在中共中央及时的指示下，反复广播了一些评论和文章，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批判“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新华社及陕北广播电台反复广播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评论文章。上述文章通过无线电波送到国统区和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打击敌人、教育人民、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均起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原来被敌人占领或因敌军进攻而被分割的解放区得到恢复和扩大，原来停办的一些报刊也得以恢复出版，原来停播的广播电台均先后恢复播音，而且随着更多城市的解放，又陆续创办了一些新的报刊和建立了一些新的广播电台。从1949年下半年起，新华总社、总分社、分社和广播电台相继从农村迁入新解放的城市，取代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新闻机构，从而使解放区对全国和对全世界的宣传形势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规模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华社总社注意了扩大国际宣传。从1947年7月开始向国外派出记者，至194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建立了第一个驻外国分社——布拉格分社，由延安时期原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负责筹建和直接主持这个分社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一些国家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

获得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地处中欧，是东西方交通枢纽，当时许多国际会议在东欧或西欧一些国家举行，因此在布拉格设置一个“据点”，是开展国际宣传和进行中外文化交流比较理想的地方。同时在没有与东欧国家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这样安排也便于做些对外联络的事宜。

1947年7月在布拉格举行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中国解放区派出由陈家康、蒋南翔率领的青年代表团去参加，吴文焘便作为该代表团的成员前往。在布拉格，经苏联塔斯社的介绍和捷克有关方面的帮助办理了各种手续后，吴文焘便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留驻布拉格，参加当地的记者俱乐部，与当地及东欧各国驻布拉格的记者乃至西欧的记者接触和建立了联系，逐步开展活动。

在与东欧记者及西欧记者的广泛接触中，吴文焘了解到他们都很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但对中国解放区的建设、发展和国统区人民参加和平民主运动的消息以及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些真实情况，他们知道甚少。因此，工作开始时，吴文焘利用他和中国青年代表团随身携带的资料，给东欧几个国家的党报（如捷克的《红色权利》、波兰的《人民论坛》、南斯拉夫的《战斗报》等）编写些介绍中国解放区情况的文稿。当时中共中央已主动撤出延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肆进攻解放区，解放战争正处在艰苦的阶段。外国进步力量和舆论对中共的处境极为关切，因而对于介绍中国解放区的稿件和资料，是非常欢迎的。例如吴文焘写的第一篇英文稿件是在国际民主记协书记兼捷广播电台负责人赫朗奈克的帮助下，先在捷电台上播发，随后又附上一张醒目地标明解放区所在位置的中国地图，在广播杂志上转载。这一时期，吴文焘还作为捷克电通社的通讯

员,用英文给它提供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进行自卫反击战及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所发动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消息和稿件,通过它对世界各国广播。电通社是一个进步的群众组织,有时国内有些代表团去捷或从捷路过,吴文焘将所得到的一些有关国际宣传的新材料编好以后,先交给这个通讯社发表。

加强国际宣传,始终是布拉格分社的一项首要任务。当时要在国际宣传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还得设法将新华社总社的每日英文广播抄录下来,在当地印刷发行。那时在布拉格请捷通社抄收,未能收到。如果在英国伦敦,通过爱国华侨陈天声以“天声公司”的名义抄收新华社的英文广播,但又收得很不完全。1948年春,通过南通社收到一份新华社播发的英文稿。从而认定,既然南通社能够收到新华社的英文稿,在布拉格一定也能收到,于是即着手在布拉格筹建一个收报台,这时该分社的工作人员也逐步增加。1948年8月布拉格分社正式成立,开始了对新华社每日英文广播的抄收工作,使国际宣传如虎添翼,得以进一步展开。

布拉格分社当时在新闻业务上主要有两项任务:①国际宣传方面就是每天晚上抄收新华社总社每日播发的英文稿,第二天上午打字、油印,每天平均约印500份。除在捷克发送外,还分送东西欧、美洲,以至非洲和印度。②对内报道方面,是将在布拉格每天收到的世界各地的报纸(有英文、法文和俄文近百份)经阅读、分析,从中摘发消息,每天用英文或中文发往国内。急稿就用电传打字机直接往邮局传送。又如对国内发来电报的电码的翻译工作,有时国内电报一份就有几千字,都是不分昼夜赶译出来。朱德给《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写的一篇文章,从国内用明码发到布拉



格分社,便马上“开了夜车”译出中文,再迅速译成外文,定稿后不失时机地送出发表。

当时该分社对总社发稿的重心,主要是以摘发世界各地报刊对中国的反映、评论为主。因为当时中国解放区在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封锁下,国外报刊来源很少,而且外国报刊上登载的有关中国的重要资料,往往为各大通讯社所忽略。例如该分社从法共《人道报》的一条广告上,看到法共有一个区党委发了一个通知,告诉所在区的共产党员从某天起开始集体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社就将这条广告写成消息发回国内,《人民日报》将这一消息登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这类消息在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中是很难看到的。

布拉格分社的主要任务是上述两项,但在当时新中国即将成立,还没有驻外大使馆的情况下,一些对外联络工作自然落到该分社的工作范围内,这是当时客观条件促成的。

在对外联络任务中,第一类就是参加国际性会议。这类活动大都带有文化交流性质,也是进行国际宣传的论坛。该分社曾受命就近出席了许多国际性会议。吴文焘到达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后,又曾相继代表中国解放区新闻工作者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国际民主记协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广播工作者参加了总部设在布拉格的国际广播协会;代表中国解放区法律工作者,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世界民主律师协会布达佩斯大会;还代表《人民日报》参加了英国《工人日报》30周年庆祝活动;1948年参加波兰乌洛斯瓦夫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知识分子大会(这次大会是筹备世界和平理事会与和平大会的),并应邀在大会上讲话,介绍中

国解放区的情况,介绍中国解放区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以及国统区知识分子如何受迫害、要求和平和民主等情况。会后,这个发言稿被出席大会的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送到苏联发表在《文学报》上。

该分社所进行的第二类对外联络工作,就是送往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国内要派人到欧洲甚至美洲参加会议,以及从欧美到中国解放区的人士日益增多起来。他们经过布拉格时,都得到该分社的接待。他们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是朱学范,他是1947年在参加世界工会联合大会以后,从伦敦要回解放区,在布拉格等待苏联的过境签证的。刘宁一在参加世界工会联合大会以后,在欧洲停留了一段时间,并对该分社的建立费了不少心思。李德全、萧华等也都在分社停留过。当时国民党驻法大使馆参赞凌其翰和秘书孟翰如在巴黎起义参加革命时,周恩来对凌、孟的指示电,也是由布拉格分社传达给他们的。后来他们回国,自然也是途经布拉格的。

当时有不少国际友人经布拉格去中国解放区访问,如荷兰著名电影艺术家伊文思、加拿大的和平人士文幼章、美国著名作家斯特朗、英国著名人士蒙塔古(当时国际乒乓球协会主席)、法共作家兼书记马尼安、印度国际活动家简贝格尔夫妇等,都曾是该分社的客人。

布拉格分社在人员很少的情况下,带有开拓性地在国际宣传、对外联络、进行中外文化交流中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1950年新中国在捷建立使馆后,新华社布拉格分社的对外联络任务逐渐减少。这样他们便将全部力量集中到新闻业务上。

## 第二节 国统区

### 一、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民主报》等进步报刊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并通过其庞大的宣传机器,为大规模发动内战制造舆论。因此,在国统区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与民主党派报刊及其他进步报刊,积极开展了维护政协决议、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实现和平民主的宣传斗争。重庆的《新华日报》及时刊登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的一系列主张,刊登了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和所揭露的国民党反动派内战的阴谋和进攻解放区的大量事实,使国统区人民和许多外国人士,了解了事实真相。

1946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民主报》在重庆诞生,该报的创刊号上刊登了民主同盟代表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消息。接着连续发表了保障人权、要求民主的社论,还对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警管区制度进行了抨击。以后,针对国统区官僚资本横行、民不聊生的情况,发表了《打倒官僚资本》的社论。因为这篇社论发表时,正是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不久,《打倒官僚资本》这个口号,受到民族资本家和广大群众的欢迎,成为轰动一时的话题。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校场口事件”,《新华日报》、《新民报》、《民主报》等报纸均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破坏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的行动。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民主报》集中报道

了血案的真相和人民的愤怒、控诉、申斥与哀思，并连续发表了社论。

1946年2月22日中共在北平创办了北平《解放报》，设立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内战的种种罪行，受到华北国统区人民的欢迎，北平《解放报》发行量曾一度达到5万份。1946年4月3日，国民党特务以“检查户口”为名，逮捕了北平《解放报》及新华社北平分社的39名工作人员，企图摧毁中共在北平地区的新闻报道中心。北平《解放报》及新华社北平分社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继续坚持出版和报道工作。1946年5月29日，国民党反动派又进一步封闭了北平《解放报》与新华社北平分社。

1946年6月3日，《群众》周刊从重庆迁到上海出版，并改为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机关报，使它兼有报纸和杂志的特点，以便更好地在广大收复区宣传中共的政策和主张。1946年春，为了更直接及时地对外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创办了英文《新华周刊》，以传播新闻、评论时局。一出版即受到国内外文化界、舆论界的极大重视。而国民党当局对此却十分恐惧，在《新华周刊》只出版了三个月后即强行查封。接着《群众》也被迫停刊。

1947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彻底关闭和谈大门，将内战进行到底，迫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人员撤退，重庆《新华日报》于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封闭。不久，《民主报》也被迫停办。从此以后直到全国大陆解放为止，中共和民主党派在国统区再也不能公开出版报刊。

在国统区，虽然中共和民主党派的报刊被迫不能公开出版发

行,但其他一些进步报刊仍然继续坚持斗争,中共和民主党派报刊不得不转入隐蔽的方式或转移阵地。他们在上海、在香港、在南洋,通过所掌握的舆论工具,向国统区人民、向海外华侨、向世界人民报道国民党反动派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发动全面内战的真相,报道国统区人民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斗争,报道解放区军民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真实情况,报道中共所发表的各项政治主张以及世界各地的进步舆论。

## 二、活跃于上海的进步报刊:从《周报》到《展望》

在国统区,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封闭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和英文《新华周刊》并迫使《民主报》停刊,但是其他一些进步报刊与进步报人仍然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不妥协的斗争。特别是在上海,进步报刊的宣传十分活跃,先后出版的进步报刊有《周报》、《文萃》周刊、《民主》周刊、《消息》半月刊、《学生报》以及当时对知识界和民族资产阶级颇有影响的《展望》等进步报刊。此外,《文汇报》、《新民晚报》也开始向进步方向转变。

### (1)《周报》

《周报》是1945年9月8日最先在上海创刊的,由唐弢、柯灵主编。经常为这个刊物写稿的有:夏衍、茅盾、马叙伦、吴晗、周而复、郑振铎、李平心、叶圣陶、宦乡、楼适夷等人,以及一些青年作者。第一期的发刊词说明这个刊物的出版方针是:“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将以坦白的心地,诚恳的态度,坚定的意志主张:加强团结、实行民主。这是本刊的使命,亦即每一人民的要求。”《周报》以《血的控诉》为题,披露了1945年12月1日昆明学生遭受国民党特务打死打伤的事实真相,激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反响,这期刊物多

次再版都销售一空。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也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镇压。《周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由于《周报》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发行不久,销售量已超过1万份,但在出版50期后,于1946年8月24日被国民党查禁而被迫停刊。

### (2)《文萃》

《文萃》周刊1945年10月9日在上海创刊,孟秋江任经理,黎澍任主编。这个刊物的创刊目的是:“一、沟通内地与收复区的意志,二、传达各界人士对于国是的意见,三、分析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第一期选载了茅盾、田汉、李公朴、邓初民、萧军、乔木、孟南、张申府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是从重庆、昆明、成都、贵阳等地的报刊上选来的。1946年3、4月,《文萃》还先后选登了两篇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驳蒋介石》。以后还转载了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如《可耻的大公报社论》、《起来,制止反动派全国内战阴谋》等。因为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不能发行到上海、南京及华东其他一些城镇,所以《文萃》将转载这两家报纸的重要社论列入优先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还转载了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一些有进步内容的社评。

《文萃》周刊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有经销处。最多的时候,每期发行2万份以上。《文萃》周刊从创刊到1947年7月被迫停刊,共出版了72期,还出版了地下版9期。另外还发行了几期“北平航空版”。

### (3)《消息》半月刊

《消息》半月刊是1946年4月在上海创刊的,主编是周建人。

这个刊物是中共上海市委筹办的。因为计划中的《新华日报》上海版当时无法出版，于是决定先出版《消息》。《消息》是一个以报道政治新闻为主的刊物，内容是新闻、通讯、特写、时事述评以及诗歌漫画、小品杂文，实际上是个杂志化的报纸。它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黑暗政治，反映民主进步人士的意见及人民的呼声，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它报道了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以及国统区和平民主运动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爱国运动的浩大声势，大长了人民的志气。这个刊物一问世，深受各界群众欢迎。每逢《消息》运到报摊，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全国各地也纷纷来函订阅，许多外国通讯社、报刊如美联社、路透社、塔斯社、法新社以及美国的《大美晚报》、英国的《字林西报》等也将《消息》作为新闻来源的一条渠道。但是这个刊物仅仅出版了三个多月就被迫停止。

#### (4)《文汇报》

《文汇报》在1946年3月请进步报人徐铸成担任总编辑后，由徐铸成和宦乡、陈虞孙、柯灵一起主持编辑工作，使报纸面目发生很大变化。它积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由于《文汇报》发表文章反对国民党在上海实行警管区制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而被罚停刊一周之后，国民党当局曾多次企图利诱收买《文汇报》，均遭徐铸成的拒绝，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终于在1947年5月勒令《文汇报》永远停刊。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后，该报于1949年6月21日复刊。

#### (5)《学生报》

1947年5月，全国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抗议美军暴行、要

求美军退出中国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上海学生联合会于同年5月1日成立后,在同年6月1日出版了《学生报》。不久中国学生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学生报》又增加了报道全国学联和各地学生运动的内容。在上海各大中学校及外地一些大学里,都有《学生报》的发行员。《学生报》一出版,很快传到了全国许多大中学校,有些大学还把《学生报》张贴出去,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有些大学的学生还创办了其他一些报刊,如复旦大学的《中国学生导报》,其他城市如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办的《燕京新闻》等。这些都是当时当地中共秘密组织支持创办的影响较大的学生报刊。

#### (6)《展望》周刊

《展望》周刊于1948年5月1日由中华教育出版社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40年名为“国讯同志会”,是1945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母体。《展望》与它的前身《生活》、《国讯》这三个杂志,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不同时期的喉舌,它们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25年来的政治历程。

《展望》杂志社的社长是俞寰澄,副社长为黄炎培、陈仁炳,编辑委员会主席为杨卫玉。这个刊物在上海编印出版,但刊物上却印着在南京出版。这样就避免了不少纷扰。新出版的《展望》,大胆揭露国民党军事上的惨败和政治上玩弄“真内战假和谈”的阴谋,揭露美军在华的暴行。《展望》的“军事一周”专栏,每期都有对战局的报道与分析,很受读者欢迎。在广大读者的支持下,短短的一年中发行量增至五万三千多份。到1949年3月19日,《展望》第3期刚出版,即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至上海解放后,该杂志于1949年6月11日复刊。



上述这些进步报刊,虽然出版时间不长,但却百折不挠地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由于它们大都是上海出版发行,不仅对国内的舆论界、文化界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国外的新闻界、文化界在沟通交流信息、加深对中国形势的了解也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 三、《时代日报》与《密勒氏评论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外国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中国的新闻机构,美国报刊在国统区大量发行,美国的《大美晚报》在上海复刊。美国新闻处的宣传活动扩大到中国许多重要城市。美、英、法等国的通讯社也都在上海恢复发稿。英国的《字林西报》在上海恢复出版。英、法等国使馆的新闻处也在许多大城市积极开展活动,使上海恢复了作为当时最主要的新闻报道和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地位。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通讯社、报刊,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在上海没有自己公开宣传的阵地,一些进步人士创办的报刊也相继被查封或勒令停刊。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欺骗人民群众的反动宣传,为了向人民群众并向国外提供真实的国内政治、军事情况,中共被迫采取隐蔽迂回的方式进行宣传。

#### (1)《时代日报》

《时代日报》是上海苏商时代出版社在解放战争时期增出的一份中文报纸。

苏商时代出版社在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为“孤岛”的形势下,为了进行抗日宣传,曾出版过《时代》杂志(中文版),本书第八章第三节已有论述。抗战胜利后,苏商时代出版社又恢复活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利用国民党与苏联的微妙关系,通过主持《时代》杂志工作的姜椿芳与苏方商定在时代出版社增出了中文《时代日

报》，姜椿芳任总编辑。

当时，美、英、法等外国通讯社，根据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报道所谓国民党军队胜利的消息，有时也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发表一些中共方面的战讯。《时代日报》便每天采登一些美、英、法记者发的电讯，再加上一些自己直接收听到的延安的广播新闻，透露一些真相，但由于经常受到上海国民党当局新闻处的责难，因而只能偶尔发表几条延安广播的重要电讯。

《时代日报》总编辑姜椿芳，经常秘密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成员姚溱联系，研究怎样充分利用《时代日报》这块宣传阵地，在可能范围内用比较巧妙的方式报道有关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工运、学运的真实情况，扩大对国内国外宣传的影响。但《时代日报》是一张八开的小型报纸，容纳不下许多新闻报道和文章。针对这一情况，决定采用报纸杂志化的方针，就是在原来已有的每天交替发表的新文学、新文字、新美术、新木刻、新音乐、新妇女等几个专题副刊之外，再开辟三个专栏：半周军事述评、半周国际述评、半周经济述评，将每半周（后来改为一周）的军事、国际、经济方面的大事用概括、综述和评价的形式约请专人撰稿；从1947年1月起，每周6次轮流与读者见面。实践证明，上述方针和具体做法对于国内和国际舆论，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里要特别提到姚溱化名在《时代日报》所写的军事述评（已于1987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姚溱的《军事述评选集》）的影响和作用。姚溱除了经常介绍几位专家为《时代日报》撰稿外，他自己承担了军事述评的撰写任务，利用“苏商”这块牌子，在《时代日报》上大做文章。这些“军事述评”，透露了千千万万人民日夜翘望得知的

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不仅满足了上海一地读者的要求,实际上还满足了上海附近以及国统区人民的渴望,也是一些在上海的外国记者获取新闻的渠道。1948年6月3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时代日报》“暂行停刊”,报馆多方奔走请求复刊,但国民党有关当局互相推诿,支吾其词,终于未能复刊。

## (2)《密勒氏评论报》

《密勒氏评论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7年由美侨密勒在上海创办的一份英文周刊,它当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密勒氏评论报》的英文报名曾三次更改,但中文都习惯地称之为《密勒氏评论报》。

密勒早在日俄战争时曾担任《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远东记者,他创办《密勒氏评论报》的目的是要使美国人了解远东局势的发展,同时也要使东方人了解西方的发展。创刊两年后,密勒退休,他将刊物交给他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的低班友鲍威尔。

鲍威尔在宣布《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方针时说:“本报历来主张中国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不是西欧或日本的附属品。这种主张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主张也是一致的。美国主张门户开放主义,中国关税自主,取消外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美国对于中国一向主张政治经济工业的改进,俾与欧美列强有并驾齐驱的地位。要解决远东问题唯一途径即在于此,因为中国如软弱无能,即能引起列强侵略之野心。”

“九一八”事变后,《密勒氏评论报》又明确反对日本,采取不承认主义,这在客观上支持了中国革命。以后,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

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和它所进行的伟大的长征,《密勒氏评论报》的态度也多表示同情。1928年埃德加·斯诺曾担任过《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1936年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的某些内容,也曾先期在该报上发表,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处于上海“孤岛”的《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鲍威尔撰写的大量有关揭露日军暴行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宣传报道。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鲍威尔立即遭日军逮捕,在集中营遭受严刑拷打。1942年作为交换被俘人员,由狱中用担架抬上轮船返美,但是回国后已被锯掉两腿,1947年死于华盛顿。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初《密勒氏评论报》复刊,由老鲍威尔的儿子小鲍威尔主持。在此期间,《密勒氏评论报》同情支持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态度更加鲜明。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所发表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这一论断,上海读者首先得自《密勒氏评论报》。特别是在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戡乱”,对上海新闻界实行全面控制以后,《密勒氏评论报》便成为上海读者和一些外国记者获得真实新闻信息的可靠来源之一。

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先后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当时驻华大使高斯和军事上的史迪威为代表的“开明派”,一“派”是以接替高斯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军事上的陈纳德为代表的“死硬派”。“开明派”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在客观上同情共产党,这种同情是基于他们认为中国打内战对美国不利;如果国共合作,将日本的兵力牵制在中国大陆上消耗,将来美国在太平洋反攻的时候,就可以减少日本对

美国的压力。“死硬派”则坚决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而小鲍威尔属于“开明派”。他 1922 年在中国出生，在中国的小学、中学学习，以后回美国，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受大学教育。抗战时期，他在上海美国新闻处当记者，经常到中国各个战场采访、写通讯。他对中国的革命持同情态度。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他主持下的《密勒氏评论报》所发表的一些评论，对某些中国政治、军事事态的发展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当时在《密勒氏评论报》任编辑的中共党员（未公开身分）杨承芳，从一般看稿写文章逐渐发展到受鲍威尔的委托，有时担负该报撰写社论的任务。许多社论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后，影响很好。这些社论逐渐引起上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向美国大使馆提出抗议，说《密勒氏评论报》替共产党讲话。美国大使馆当时也有两“派”，对此事也没有直接进行干预，只是善意劝告小鲍威尔，并挑剔行文的口气，认为用词、用句还不是典型的美国方式，要小鲍威尔当心一点，并向他提供了一个国民党当局认为是为共产党讲话的社论的单子。从单子上看，其中 2/3 的文章是杨承芳执笔的。因此以后的社论就改由小鲍威尔写，但小鲍威尔所写的问题多数是征求过杨承芳的意见，或采用杨承芳提出的题目。这些文章确实起到很好的作用，在美国国内将《密勒氏评论报》作为研究远东问题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另外，《密勒氏评论报》还出版了两个不公开发行的内部刊物，一个是《每月报告》，内容是将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按专题写成材料，每月一次，按期出版，供美国驻华大使馆和其他美国驻外机构订阅。第二个是《文摘》，内容是将每天收集到的有关中国经济方面的消息，由中文译成英文，

供一些美国“洋行”订阅。这两个内部发行的刊物，很赚钱，影响也很大。

抗美援朝中，《密勒氏评论报》在揭露美军进行细菌战等事件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那时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密勒氏评论报》无法再从海外获得广告客户，加上上海的外侨大量回国以及邮路不通，《密勒氏评论报》也无法得到大量订户，因此在1952年宣告停刊。小鲍威尔回美国后，即遭到麦卡锡法案的迫害，被控告有所谓“叛国罪”。经过两年零两个月的“官司”，最后不了了之。他一直与中国有往来，每年来中国一次，为实现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又做出新的贡献。

---

### 第三节 香港

香港，由于它的特殊地位，不论在抗日战争时期或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一切爱国进步人士开展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据点”之一。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不得不由南京、上海撤回延安，代表团的部分工作人员即转移到香港，一些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镇压迫害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新闻界、文化界进步人士，也纷纷聚集到这块弹丸之地，并通过创办报纸、刊物，向国内外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以及它所进行种种欺骗宣传。

当时在香港,由中共、民主党派和进步文化人士创办的报刊和出版社,在海内外影响比较大的有:

(1)《正报》

《正报》于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出版。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香港办的第一张报纸。《正报》创刊号及时报道了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起义的消息。由于这一消息是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纸一直封锁不敢发表的,所以《正报》的报道,立刻震动了整个香港和华南以及东南亚各地,打破了国民党企图封锁新闻的局面。香港和广州的广大读者,纷纷写信要求《正报》改出日报,但因当时人力物力的限制,只能从三日刊改为双日刊,后又改为八开旬刊、周刊。当时的主编为黄文俞。

《正报》发表的消息和文章,其特点是简单、精干、通俗易懂,富有知识性、趣味性,每期都有独家新闻和评论,显示出独特的风格。特别是在《华商报》还没有复刊前,新华社的电讯和《解放日报》的社论只有《正报》独家登载,一些想了解中共态度的人,便争相购买《正报》。

《正报》的“两日一谈”评论专栏,针对时弊而写的杂文,每篇500字左右,只谈一个社会问题,文笔生动、言之有理,颇受读者欢迎。其次是诗歌、散文、科学小品和小小说。该报连载的章回小说《黄村血泪》(作者楼栖),内容描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攻人民子弟兵——东江纵队,血洗广东省东莞县黄村的残暴行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胜利后打内战的阴谋,颇得群众好评。此外还连载郭沫若的《苏联纪行》,介绍了苏联建设的新情况,这些都

使光复不久的香港人民耳目一新,影响很好。

《正报》的发行面很广,除香港、九龙、广州等地外,还远销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对海内外新闻界、文化界的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平均每日发行8000份左右,最高时曾销到2万多份,对海外华侨有很大的影响力。1946年6月,《正报》在广州的营业处被国民党封闭,读者不能公开买到《正报》,发行工作人员便想尽一切办法,将《正报》秘密送到广州等地的读者手里。《正报》从1945年11月13日创刊至1948年11月13日整整三年的时间共出版115期后停刊。

## (2)《华商报》(晚报)

《华商报》始创刊于1941年4月8日,1941年12月12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迫停刊(本书第八章已有介绍)。日本投降后,《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改为日报复刊,至1949年10月15日终刊。

《华商报》的复刊,使得来自国统区的以及海外的进步文化界知名人士聚集在一起,报社并拥有一批知名的编辑、记者队伍,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办报阵容。

《华商报》是一张由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报纸,董事长是香港华比银行的副经理、爱国民主人士邓文钊,总编辑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总经理是民主同盟负责人萨空了。《华商报》的中共党内领导人是中共香港工委报纸工作委员会书记章汉夫。报社内设有社论委员会,先后参加该委员会的有:章汉夫、刘思慕、许涤新、狄秋白、陈此生、廖沫沙、夏衍、乔冠华、张铁生、饶彰风、杨奇、高天、张其光等。从复刊开始几乎每天都有社论



或评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向海外和国统区人民正确阐述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如实报道国际国内形势,这些任务自然由《华商报》担任。从创刊之日起至1949年10月15日停刊止,四年多的时间里,《华商报》以香港作为联系华南与南洋一带的枢纽,通过反映人民希望和平民主的意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在海内外社会舆论中起了重大作用。《华商报》已是当时港、澳、南洋一带了解中国真实情况最权威的报纸。

《华商报》复刊初期的日销量一般不超过1万份。从1948年起,随着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香港的形势也日益对《华商报》有利,日销量逐日增多,广告收入也随之多起来。特别是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商报》通过北平这一渠道,能够很快看到解放区的报纸,于是《华商报》就将解放后北平的政治情况、人民生活等方面以及其他解放区的消息改编为“本报北平专稿”在《华商报》发表。这时正是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刻,不仅香港,连南洋以及欧美各国的华裔、华侨和一些外国人士,都渴望知道新北平和其他解放区的消息,所以从1949年2月起,《华商报》的日销量从9000份激增到2万份左右。每份报纸经过辗转传阅,流传之广,在思想、文化交流上所产生的影响,决不是单纯的销售数字所能表示的。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后,港英当局对中共在香港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49年4月26日,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名义,在香港大酒店二楼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在港的中外各界名流、工商巨子以及文化、新闻、艺术界100多人参加了这次酒会,气氛非常热烈。4月27日下午,香港文化、新

闻和文艺界人士共 600 多人又在金陵酒家举行了大规模的集团聚餐,还表演了庆祝胜利的文艺节目。

1949 年 10 月 14 日广州解放。翌日,《华商报》发表社论,宣告完成了历史使命,与香港同胞告别。原《华商报》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奔赴广州,迎接创办《南方日报》这一新的任务。

### (3)《群众》周刊

《群众》周刊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和海外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它于 1937 年 12 月 11 日在武汉创刊;武汉失守后,于 1938 年 12 月迁至重庆出版;抗战胜利后,1946 年 6 月 30 日,该周刊又从重庆迁至上海出版。不久即遭国民党禁止,被迫迁到香港于 1947 年继续出版。《群众》周刊是中共权威的理论杂志之一,在章汉夫、胡绳的主持下,每周都有针对时局形势的精辟论述,已成为当时海内外关心中国政局的人不可缺少的读物。例如当时对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争论,自然涉及到人们对中国国内战争的前途以及对世界形势的估量。围绕这一重大问题的评述,陆续在《群众》周刊和其他一些报刊上出现。其中突出的一篇是乔冠华撰写的《论世界矛盾》,引起很大震动。又如当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全国局势正在发生剧变的时候,海内外出现了一股所谓“中间路线”(即第三条路线)的思潮,他们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对中共和中国人民具有战胜一切内外敌人的力量表示怀疑。如果这股思潮任其发展,将会使中国形成南北朝的局面,不利于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针对以上情况,《群众》周刊及其他报刊迅速发表了坚强有力的评述文章,及时清理了一些人由于这股思潮的影响所产生的一些糊涂思想。

《群众》周刊由于是理论刊物，长文章多，有些读者认为它“太高深”，“内容太单调，不够多样，不够活泼”，于是就作了一些改进，开辟了一个《茶亭杂话》的专栏，经常由夏衍每期写几篇介于杂文、政论之间的随笔。夏衍从《群众》周刊 31 期起用“汪老吉”、“任晦之”两个笔名，每期写 2000 字左右，一直写到 1948 年底，共写了大约 10 万多字，这些杂文、小品锋利、精辟，深受读者喜爱。

1949 年 10 月，《群众》周刊出至第 3 卷第 43 期停刊。

#### (4)《中国文摘》

《中国文摘》是英文半月刊。创刊于 1946 年 12 月 31 日，它的前身是 1946 年春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新华周刊》。

抗战胜利后，中国将向何处去，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国民党反动派依靠其庞大的宣传机器，对外进行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中共方面，主要通过新华社以微弱电波用英文对外广播，力量十分单薄。《中国文摘》是当时一本主要的对外进行宣传和文化交流的英文刊物。它传播新闻，评论时局，能迅速报道解放战争战况，反映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反映解放区信息和中国的全面真实情况。因此，这本英文刊物一问世，即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来自国内外的订数直线上升，发行量曾达到 4000 份左右。在这一综合性的半月刊里，既有关于时事的权威评论，又刊载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独家通讯。它的幽默专栏和讽刺漫画多半出自名家，诗歌的译者也常常是第一流的。很快它就成为一本被国内外新闻界、文化界频繁引用的颇有影响的刊物。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文摘》特派记者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并且郑重宣告，这个特殊时期

的特殊刊物已经胜利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即将向读者告别。今后,将由在北京出版的新中国第一本外文刊物《人民中国》继续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新的历史画卷。

#### (5)新民主出版社

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是1945年10月在《华商报》的复刊筹备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由《华商报》的总经理萨空了直接负责。经理先后由邓家愷和吴仲担任。这一出版社的任务是采取生活书店的办法,既搞出版也搞发行。当时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强调将出版进步书籍放在首位。

首先是重新出版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形式是每一篇文章作为一个单行本,每一个单行本都冠以“毛泽东选集”的总称。从1946年1月到1949年10月,这套香港版的《毛泽东选集》,先后出版的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中的战略问题》、《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农村调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等19篇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港澳和南洋一带一些读者渴求了解毛泽东思想的愿望。

1947年下半年,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经常利用大连和烟台等港口开展和其他地区的贸易。这样,新民主出版社就有机会得到东北新华书店、华东大众书店的一些在香港难得一见的新书样本,其中如《毛泽东自传》(这是埃德加·斯诺在撰写《西行漫记》采访过程中,毛泽东的一段个人自述的记录)、《毛泽东论》(张如心编著)、

《少年毛泽东》(米谷绘制的连环画)等。经过新民主出版社重印后,深得读者欢迎。这些书出版后销售量很大,南洋各地不断要求增加印量。另外,如重印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史》(范文澜主编)、《中国历史读本》(叶蠖生著)等也都受到读者的欢迎。

为适当满足港澳及南洋各地广大青年自学的需要,新民主出版社参照生活书店编印的《青年自学丛书》的做法,出版了曹伯韩编写的《怎样求得新知识》、高天编写的《生活与理想》和《怎样交朋友》、怀湘编写的《恋爱新论》、吴费(洪通)编写的《读书的故事》、华嘉编写的《学习的故事》和《怎样做一个好学生》、杜埃编写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人民文艺浅说》等。

新民主出版社还出版了几本南方作家的作品,计有马宁的《将军向后转》和《椰风胶雨》、陈残云的《南洋伯回乡》、华嘉的《铁树开花》、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等。这些小说都曾在《华商报》副刊上连载过。由于这些作品富有时代气息和地方色彩,既有战斗性又有趣味性,受到读者的喜爱。日本进步人士青山和夫看到这几部小说后,来信委托出版社同作者商定,在日本用日文翻译出版。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延安及西北、东北、华东、华中一些老解放区,不断出版反映解放区民主革命和建设与揭露蒋家王朝黑暗统治的许多新书,其中由新民主出版社翻印的有《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土地改革问题》、《从一个村看解放区的文化建设》以及《蒋党内幕》、《美蒋阴谋秘闻》、《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书。这些书出版前,先在《华商报》刊出预告。港九和南洋各地的同业纷纷来信询问其中的《中国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敌蒋介石》两本书的出版日期并提出预订数目,南洋同业一次就订 1000

册。书籍出版的当天,出版社的两处门市部均盛极一时,挤满了购书的人群。

为了扩大文化交流,新民主出版社除本身翻印书籍外,也很注意多方面扩大图书货源。该社建立之初,即通过夏衍从上海生活书店和新知、读书、开明等书店购进一批进步书籍在港澳推销;后来通过东北解放区与苏联边境沟通的有利条件,由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文版苏联文艺书籍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流入解放区和香港。同时,通过《华商报》与莫斯科外文出版社联系,使苏联翻译的中文图书得到较充分的供应,从而更进一步充实了门市部,在中苏文化交流方面增色不少。

新民主出版社作为面向港澳、南洋以及对一些西方国家的华侨进行文化交流的据点,在业务方针上将出版进步书籍与加强海外的发行工作并重。该社发行进步书刊工作是同《华商报》的发行工作紧密相联的,《华商报》的发行网实际上也就是出版社的发行网。当时,香港一些进步报刊的海外发行工作主要靠新民主出版社承担,计有《群众》周刊、《正报》周刊、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的《光明报》、张铁生和黄秋耘主编的《青年知识》、司马文森和陈残云主编的《文艺生活》、孙慎和联抗主编的《新音乐》、林涧青主编的《自由丛刊》、秦似主编的《野草丛刊》、赵元浩和古念良主编的《经济导报》、胡希明主编的《周末报》、黄庆云主编的《新儿意》等等。

新民主出版社发行工作的重点(主要批发户)是南洋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华侨报社及爱国华侨所经营的书店。其中有曼谷的《全民报》社、新加坡《南侨日报》社的南侨出版社、旧金山的《华侨日报》社、巴黎的巴黎书店、马尼拉的现代图书公司、吉隆坡的联合书报

社、越南堤岸的亚新书店、苏门答腊的光华书店等。以上这些报社、书店都积极代销《华商报》、《群众》、《正报》、《光明报》和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另外，出版社还直接派人在新加坡和吉隆坡设立了分销处。这一切都为传播交流进步文化思想，在促进海外侨胞和外国人士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的正确理解上起了较大作用。

新民主出版社，从1945年10月至1949年10月在香港的四年中，经销发行的中共报刊和其他进步报刊共有12种，出版发行的毛泽东著作和马、恩、列、斯著作共有224种。它所联系的海外“传播点”有十多处，卓有成效地对外进行了进步的政治、文化、思想交流任务。

---

#### **第四节 南洋《风下》、《南侨日报》 等进步报刊**

1945年9月底，胡愈之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返回新加坡后，就紧张地投入了新闻出版的宣传活动，以便与当地各界人士进行文化、思想交流。这期间他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参与中国的政治斗争。他认为要促进祖国的和平民主，完成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必须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不能没有海外华侨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为了便于发表政见和宣传正确的思想，他排除万难创办了《风下》周刊，继而与陈嘉庚等人合办了《南侨日报》，

筑起了一道阵容强大的宣传舆论阵地。

### (1)《风下》周刊

胡愈之从苏门答腊返回新加坡后,即以沙平为笔名,主编出版《风下》周刊。第1期《风下》于1945年12月1日问世。“开场白”写道:“新加坡现在是东南亚总部所在地,实在也就是西南太平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重镇。因此本刊的报道、分析、评论,将侧重在这西南太平洋的各项问题上。本刊愿意作为这一广大地区内的一万万人民的报道机关,以求反映他们的意志和情感,传达他们的民族愿望。”这是胡愈之创办《风下》周刊的初衷。

为什么这一周刊题名为《风下》呢?胡愈之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大约450年前,当第一批‘红毛’帆船来到马六甲和巽地海峡沿岸时,沿海一带操马来语的居民,第一次见到白皮肤蓝眼睛的怪客,只好用手势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就用手向西方一指,表示他们是被西南季风吹过来的。因此,马来人以后就把西方称作‘风上之国’,而把他们自己的土地叫作‘风下之国’。从锡兰(斯里兰卡)以东,一直到菲律宾群岛、缅甸、马来亚、越南,以及整个印度尼西亚,都被称为‘风下之国’。至于‘风上之国’则成为欧洲及近东各国的总称。经过若干年的侵略与反侵略斗争,‘风下之国’逐渐成为西方强国的殖民地,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立地位,这里数万万人民,数百年来都过着被剥削被奴役的生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争民主、求解放的浪潮高涨,‘风下之国’已不愿再受西方的支配和奴役,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运动风起云涌。怎样去理解‘风下之国’,怎样去倾听‘风下之国’的被奴役的人们的呼声,反映出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便成为《风下》周刊创刊者的使命。因此,这



个刊物便题名为《风下》，以配合“风下之国”如火山般爆发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宁，其中也包括中国人民为反对美蒋勾结、争取和平民主而进行的斗争。”

《风下》创刊之初所发表的评论文章，其注意力主要是集中于对战后世界局势的分析、探讨。从1946年7月以后，重点立即转向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关注。这是紧扣时代脉搏，配合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风下》周刊对世界局势的分析、探讨，是针对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英帝国主义推行“原子外交”所进行的核叫嚣和核讹诈所发表的评论文章。如《风下》又发表了一系列反原子恫吓，反战争叫嚣，支援印度及东南亚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文章。《原子与外交》、《从战争到和平》、《环绕于印度尼西亚问题的外交战》、《向印度学习》、《原子弹已失去效用》、《闲话原子》、《从牛角尖看世界》、《歪风吹来风下之国》等等。

当蒋介石挑起的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以后，《风下》发表了《救国有罪？民主该杀！？》、《内战大规模打起来了！》、《苛政猛于原子弹》、《天下一家、一家天下》、《谈谈外交》、《从右手还给左手》、《向全世界人民控诉》、《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人民翻身与换朝代》、《准备迎接伟大的新时代》等一系列主要由胡愈之撰写的“卷头言”，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将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助长中国内战、促使中国分裂的阴谋策划公诸于世。1946年9月，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以南侨筹赈总会主席的名义，代表南洋一千多万华侨通电美国：“本人代表南洋一千多万华侨，特向贵国呼吁，请顾全国际信誉，以日为前车之鉴，勿再信武力可灭公理。”电文中抨击蒋

介石政府独裁腐败,任用小人,致造成民生疾苦;赞誉中共推行政治民主化,获民众拥护。几乎就在陈嘉庚致电杜鲁门的同时,美国商务部长华莱士在美国发表了反对杜鲁门外交政策的演说。而国民党反动派在新加坡办的众多报刊则避开华莱士的演说,大骂陈嘉庚是“共产党尾巴”,掀起一片“反陈”浊浪,即当时所称的陈嘉庚“电报风波”。《风下》第42期发表了《陈嘉庚与华莱士》的“卷头言”,将陈嘉庚从新加坡发出的通电,和美国商务部长华莱士在纽约等地发表的演说,比作从东西两方面放射出的两枚“原子弹”;并指出,这两枚“原子弹”,恰巧打中了中美两国的反和平民主阵营,比一年前落在广岛、长崎的两枚还来得惊人,不但中美两国的反动派大受震动,而且在全世界各处都发生影响……接着,《风下》第43期又以《展开民主运动的大旗》为题,报道新加坡侨团代表大会开会,响应陈嘉庚致美国的通电。同时,《风下》在《我们拥护陈嘉庚主张》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民主运动的号角》、《时代的进步》、《真正是代表了华侨的呼声》、《这正是人民大众的主张》、《读陈嘉庚电后》等一组共8篇文章,表示对这位爱国华侨领袖、南侨总会主席的推崇和拥戴。《风下》是新加坡最先打破国民党反动派众多报刊的封锁,报道各地华侨“拥陈”实况的,深受广大爱国华侨的欢迎。

《风下》周刊一问世,就代表了进步潮流,提出了明确的政治主张,为引导华侨社会的舆论尽了它应尽的责任。《风下》是一本综合性的刊物,有政治性的评论文章,有文艺创作与翻译作品,有文艺介绍与批评,有哲学漫谈与科学小品,有人物介绍与书报介绍,有每周一课与一周一书,还有新音乐以及笔谈、各地通讯、信箱、画刊

等,不一而足,称得上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特别是每期由胡愈之执笔的首页“卷头言”,以犀利的笔触,切中时弊,可谓短小精悍之作,颇受读者的喜爱。《风下》从内容到形式都较清新可喜,它得到了许多著名作家和知名人士的热情支持,如郭沫若、茅盾、陶行知、黄炎培、沈钧儒、许广平、楼适夷、何其芳、马凡陀、沈志远等。由于当时在国内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找不到发表文章和作品的园地,解放区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围攻,所以他们寄到《风下》的文稿越来越多。至于杨骚、巴人、汪金丁、卢心远、陈仲达、沈兹九、张企程、吴柳斯等流亡在南洋的文化界人士,他们都是《风下》的作者和记者,每期都有他们采访的新闻、通讯和各种文章发表。另外《风下》也很注意培养自由投稿人中的青年作者,发表过许多当地青年的作品。青年人的作品有些即便不成熟,《风下》也耐心地代为修改,只要稍有可取之处,就尽量予以刊载,这样既培养鼓励了年轻人,也因此赢得了读者,扩大了影响。

《风下》周刊为了帮助解除战后许多华侨青年失学的痛苦,满足他们忙于生计,得不到进入正规学校攻读的机会,而又渴望获得较多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心愿,便办起了一个“自学辅导社”,鼓励青年社员利用空闲的时间进行自学。胡愈之亲任辅导社社长,聘请许多名家担任指导教师,对学员的作业、作文进行认真的批改,好的文章还推荐到《风下》周刊或《南侨日报》上发表;对学习成绩优异者,还赠阅《风下》和新书。据1948年2月统计,报名参加自学辅导社的已达1000多人,遍及南洋各地,一时间《风下》编辑部门庭若市,成为自学青年的活动中心。所以《风下》周刊创刊以后,深受广大华侨的支持,尤其受到广大青年的拥戴。

《风下》周刊自 1945 年 12 月 1 日问世，一共出了 132 期，直到 1948 年 6 月英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法令”后，《风下》的编辑与撰稿人逐个被迫离开新加坡返回中国。《风下》于 1948 年 6 月 26 日被迫停刊。

## (2)《南侨日报》

《南侨日报》创刊于 1946 年 11 月 21 日，它的创刊是时势使然。在它出现之前，南洋各地由国民党所控制的报刊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服务，一时蒙蔽了不少华侨，也欺骗了外国的各界人士。当 1946 年 9 月发生了陈嘉庚的“电报风波”后，国民党的党报和它所控制的报纸对陈嘉庚口诛笔伐，气势汹汹。虽有几家报刊为陈嘉庚申辩，但力量显得单薄。为了揭露美蒋勾结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罪行，评析国际形势，团结广大华侨，促进祖国的和平民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同时为协助南侨总会和陈嘉庚主席开展工作，经胡愈之与陈嘉庚商量，决定出一份大报，定名为《南侨日报》。陈嘉庚与其亲友一起慷慨解囊，一些爱国侨领和华侨也纷纷入股，很快便筹集了必要的资金，由胡愈之负责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不到 20 人的编辑班子。大家齐心协力，忘我工作，仅用两个月时间，于 1946 年 11 月 21 日，将《南侨日报》创刊号送到了读者手中。《南侨日报》每天翻译、采访、撰写、编辑近 8 万字，共 8 大版。胡愈之组织能力之强、工作效率之高，为华侨新闻界起了示范作用，不愧为人们所赞誉的“斫轮老手”。

《南侨日报》的董事会主席是陈嘉庚，胡愈之为社长，张楚琨为总经理，李铁民为督印。《南侨日报》在创刊词中开宗明义提出：“以前南侨是抗日长城，现在南侨是和平先驱、民主堡垒。”创刊词中标

明该报是以促进和平与民主为宗旨。其态度是：(1)反对以武力解决政治问题，拥护促成国际国内和平的言论和行动；(2)反对一党专制，支持各党派组成联合政府，以实现民主；(3)提出建设性批评，避免恶意的批评与谩骂；(4)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南侨日报》以准确无误的消息和说理透彻、深入浅出的社论而著称。其活泼清新的版面，丰富多彩的栏目，如“祖国要闻”、“中外电讯”、“本坡要闻”、“马来亚新闻”、“南洋要闻”、“经济商情”、“读者园地”、“青年周刊”、“出版周刊”、“民主”、“体育”等专栏以及副刊“南风”、“小世界”等，都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被誉为“民主堡垒”、“公众喉舌”。

《南侨日报》的社论，除星期日外，每天一篇，有时以专论取代。以1947年为例，共发表了社论253篇。就社论的性质划分，其中有关评论中国问题的最多，占50%；评论国际问题的居次（其内容也大都与中国问题相关联），占25%；评论新、马问题的居第三，占14%；评论有关华侨问题的居第四，占7%。总的来说，《南侨日报》最关注的是中国问题，关切中国的前途，为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而大声疾呼。

《南侨日报》的社论，绝大部分出自胡愈之的手笔，他以深邃的观察力与分析力，将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得简单明了，以不可辩驳的论据，紧紧抓住读者的心理，像剥冬笋似的一层一层地剥下来，让读者自己看到核心部分，从而不仅使读者能豁然贯通，而且能发人深省。评论中国的社论，涉及的问题有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政治的压迫与斗争以及中国经济的崩溃等等。社论的作者由于掌握了大量资料，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

执笔行文，因此社论能配合瞬息万变的新局势，能与时代的脉搏同跳动。国际国内局势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在其社论中反应出来，其所阐述的观点便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起到它应有的宣传与思想交流的作用。

1947年7月中旬，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魏德迈来华调查中国的局势。这期间《南侨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如《魏德迈不是救星》、《魏德迈之行》、《魏德迈的讲价》与《中国主权在出卖中》、《再论魏德迈声明》、《三论魏德迈声明》等。

《南侨日报》这一系列社论加上其他专稿，揭露了魏德迈援蒋侵华的大秘密后，引起全世界各方面人士的关心和重视。美联社和其他国际通讯社，将它传播到世界各国的报章上，一时颇为轰动，在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针对中国军事形势的演变，《南侨日报》也适时地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如《谣言攻势的内幕》、《不能挽救的颓势》、《论内战新战场》、《从军事看大局》、《论冬季战局》、《国民党民主派的道路》、《抗议独裁暴行》、《如此政府如此党》、《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抗议国民党剿灭民主文化》、《抗议南京血案》、《侨胞起来援助祖国青年》、《化愤怒为力量》与《抗议无法无天的暴行》等多篇社论。

1947年7月初，国民党政府曾宣布了总动员令，中共被诬蔑为“叛国谋反”，国民党政府决定以军事力量剿灭它。为此，《南侨日报》在一篇题为《总动员令与华侨》的社论中指出：“总动员令是有作用的，这就是使内战成为合法化。”“内战合法化之后，政府就有理由来加紧压迫人民，一切反内战的人民都成为非法，因此总动员令是为对付一切反内战的人民。”

1947年10月初,国民党政府还曾指责民盟“参加背叛政府之行动”,“实为中共之附庸”,这其实是封闭民盟的前兆。《南侨日报》发表题为《政府与人民为敌》的社论加以驳斥。同年10月27日,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政党。《南侨日报》在一篇《独裁对民主宣战》的社论中指出:“这是独裁政府对民盟的宣战,对民主人士的宣战,对全国人民的宣战。”

《南侨日报》的社论也涉及中国经济的日益恶化,最明显的是面临当时国币的汇率江河日下,一泻千里,跟着是物价腾涨,工商业停滞。因为内战,农村破产,出口贸易停顿,购买军火又造成外汇与资金外流;而贪官污吏(尤其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又将黄金带到国外,在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金的情况下滥发纸币,造成恶性循环。《南侨日报》就这方面发表的社论有:《路已走到尽头》、《经济风暴又吹到了》、《从国币看时局》、《翻新花样不能挽救危机》和《论国币汇价》等。

至于新、马华侨问题,《南侨日报》的社论有:《工商界的觉醒》、《商人与政治》、《华侨在马来亚》、《从树胶跌价说到华侨经济》及《论民意测验》等。涉及华侨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教育等有关问题,其主旨都是为侨民利益服务。1948年1月,在胡愈之即将离新加坡返回祖国的前两个月,他发表了署名的专论《准备心理的改造——迎接人民胜利年》,充分表达了他对新、马华侨政治上的关怀,也是对侨胞的临别赠言,对于华侨社会起到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对于国际问题的评论文章和社论,涉及的主要对象是美、英、法、苏与日本等国家,其反殖民主义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也有多篇谈到越南、印度尼西亚与印度等国家的独立斗争,暹罗(泰国)政

变,巴勒斯坦与朝鲜问题。

总之,《南侨日报》所发表的社论,用事实说话,丝丝入扣,逻辑性强,风格清新。读者读了之后,如拨云雾,不仅对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深刻认识,而且有利于思想意识的改进与提高。一位苏门答腊署名罗斯丁的读者来信就他对《南侨日报》社论的感受谈到:“《南侨日报》的社论不仅是每篇言之有物,最好的还是文字通俗明畅,使小学毕业生也能看得懂;读者用一二十分钟时间,一口气读下去,即可明了当前一件事的因果,以及今后可能的发展,同时告诉你对这件事应持的态度。”

1948年3月胡愈之因另有任务离开新加坡后,《南侨日报》在一段时间内仍坚持出版,直到1950年9月20日,英殖民当局查封该报,才被迫停止出版。前后共出版发行了三年零十个月,拥有广泛的读者。回忆起来,没有一家华侨报纸像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过这么激烈的斗争,起到这么显著的作用。毛泽东曾在1949年11月为该报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当时周恩来的题词是:“为宣传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

此外,在泰国由李启新等人负责主编的《真话报》和在菲律宾先后由林季良、李实(罗理实)、张思明(张敏思)、黄薇主编的《华侨导报》,都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日本占领时期,在法西斯的恐怖环境中和极度艰难的物质条件下创办的。它们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内战、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和所在国由国民党控制的报刊对国际国内形势大肆进行歪曲事实、混淆是非及诬蔑中共和人民解放军的一些报道,及时地以社



论、评论、专论进行揭露和抨击；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促进祖国和平民主以及宣传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后 记

1988年11月,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在青岛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化系统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会上谈到了征集对外文化交流史料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前后,文化部党史办公室召开了一系列由文学艺术各部门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负责人和翻译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了现当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有关问题。对这项工作提出过指导性意见的有黄源、周巍峙、林林、叶君健、仲秋元、吴文焘、罗俊诸同志。大家认为,现当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专门性的、系统性的研究还不多见,如不及时地将这方面的资料征集、编写出来,有不少史料将趋于湮没。

座谈中决定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编成一册(上册),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编成一册(下册)。在文化部党史办的主持下,商定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册由外文出版事业管理局担负,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册由对外文化联络局担负。

其后,从1989年起,即分头拟定编写提纲,组织力量进行编写。经过几年努力和反复修改,终于编就了,并决定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册定名为《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册定名为《当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

《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一书,各章的执笔人是:第一章齐铉,第二章郭毓基、齐卉之,第三章郭毓基、刘朝晖,参加本章初稿撰写的还有侯毅,第四章郭毓基,第五、六、七章倪隆德,第八、九章蓝子安。

书中如有不当或重要遗漏之处,尚希读者指正。

编 者